

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苏智良 张华腾 邵雍 主编

袁世凯与 北洋军阀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文
社科
新论
丛书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人物

ISBN 7-208-06212-9



9 787208 062122 >

定价：49.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苏智良 张华腾 邵雍 主编

袁世凯与 北洋军阀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苏智良等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ISBN 7-208-06212-9

I. 袁... II. 苏... III. ①袁世凯(1859~1916)-人物研究-文集
②北洋军阀政府-历史-文集 IV. ①K827=52②K25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0836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

苏智良 张华腾 邵 雍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2.25 插页 5 字数 546,000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6212-9/K·1206

定价 49.00元

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袁世凯与 北洋军阀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T0403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除学术专著以外，频繁举行的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也形成了大量群体性的学术成果。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论》丛书，意在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论文集中的文章，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 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

尊敬的骆平安院长：

尊敬的各位代表：

各位可爱的同学们：

经过一年余的准备，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的文化名城，中国七大古都之首的安阳开幕了。我谨代表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向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的五十多位学者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据我所知，国内学界召开专门研究北洋人物的学术讨论会议，尚属首次。北洋集团，是处在清末民初的转型社会应运而生的著名政治集团。其成员涵盖政治、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作为北洋集团核心人物的袁世凯，被称为“一代枭雄”，其一生经历跌宕起伏，曲折复杂，他不仅培植军事骨干力量，而且网罗一批文人、政客，形成智囊机构，进而聚合成庞大的北洋集团，这个集团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北洋集团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中既有为抗击外敌、捍卫国家独立建立功勋的战将，也有个别落水投敌、附逆为獠的汉奸。同样一位历史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促进近代化进程和阻碍共和的截然

不同的表现。

对于北洋集团人物的评价，既不能脸谱化、简单化，又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我们提倡百家争鸣，而不是建立学术霸权，人物评价的标准只能是实事求是。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以及“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进行审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等分析方法，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考察历史人物的一生，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即其所作所为是站在了束缚生产力的一边，还是站在了解放生产力的一边，是顺应或推动了社会发展还是阻碍了社会发展，从而揭示历史人物的本质，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历史，因此人物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为中国现代史学会下设的二级学会，是由苏州大学原副校长张祈福教授、安徽大学徐承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郭绪印教授等前辈学者发起成立的。该会以现代人物为研究对象，希望今后能与各地的学界同仁齐心协力，推动现代人物的研究。人物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的学术问题，实际上也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观、价值观的问题。历史学家负有通过学术争鸣来廓清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使命。

河南人杰地灵，“文王演易”、“苏秦拜相”、“西门豹治邺”、“岳母刺字”等历史故事，我们大多在儿时就已耳熟能详，历史学家郭沫若曾留下“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今天我们大家能云集于洹水之畔，评说历史人物，是我和与会者的荣幸。

莅临本次会议的既有大家尊敬的老学者，也有取得重大成果的中年学者，还有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年轻学人。大家不远千里，汇聚中原，济济在中华民族重要诞生之地的安阳，实在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希望各位代表充分利用安阳师院所提供的良好条件，切磋学问，交流思想，考辨得失，将北洋政治人物之研究推向新阶段。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所有与会的学者，向为本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持的东道主——安阳师范学院，向尽心尽力主持其事的张华腾教授和他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 研究学术讨论会欢迎词

骆平安

(安阳师范学院)

尊敬的苏智良先生：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近六十位专家在这里召开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安阳师院党委、行政，代表全院一万五千多名师生，对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安阳师范学院是一所师范教育为主、多学科并存发展的省属本科院校，是古都安阳的第一所本科院校，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它源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师范学堂，迄今已经走过了九十余年师范教育的办学历程。学院占地面积一千六百多亩，建筑面积 43 万平方米。现有三个校区：黄河大道校区是主体校区，占地一千三百多亩，主要用于普通全日制学生教学；文明大道校区占地二百一十多亩，是独立学院——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的校区；中华路校区占地八十五亩五分，是继续教育学院校区。学院现有十九个教学系（部），有五十五个普通本、专科专业，教职工一千三百多人，有全日制普通学生一万二千七百多人，不久将达到一万六千人。学院公开出版发行《殷都

学刊》和《安阳师范学院学报》。其中，《殷都学刊》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荣誉会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多年来，安阳师院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多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学院长期聘任十余名外籍专家、教师任教。

长期以来，学院党委、行政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安阳市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甲骨文和周易发源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我院在甲骨文与殷商史、袁世凯与北洋军阀集团、隋唐史、元史等研究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我们的甲骨文与殷商史、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研究具有一定的特色。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就设立了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研究室，集中研究袁世凯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群体，十余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出版了两部专著，主持完成了两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发表了二十余篇文章，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袁世凯虽然是河南项城人，但与安阳结下了不解之缘：生前他在这里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被清廷罢官后又隐居在这里；武昌起义后从这里重新出山，死后又葬在这里，所以在这里进行袁世凯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今天，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聚集在这里，举行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进一步加强和加深袁世凯及北洋人物的研究，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各位专家，安阳师范学院是一所发展中的高校，特别需要得到科研院所、兄弟院校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有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有的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著名高校，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请各位专家在紧张的学术

研讨之余，对我们学校的工作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建立起我们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安阳市和我们学校接待条件有限，会议期间可能会有一些考虑不周之处，请各位专家谅解。

最后，预祝本次学术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学者在安阳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 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华腾

(安阳师范学院)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研究辛亥革命等，无论从什么角度研究都离不开袁世凯这个人物，都应该加强和深入对袁世凯的研究，基于如此目的，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市博物馆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

2004年4月23日至4月26日，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师范学院召开。著名学者侯宜杰、袁伟时、骆宝善、谢俊美、曾景忠、朱东安、苏智良等不仅参加会议，而且还为会议撰写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论文。为会议提供论文的学者有五十六人，参加会议的学者有五十八人。学者中有德高望重的史学前辈，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骨干，有富有朝气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者来自全国十六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谓一次学术盛会。

经过几天热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一个方面：

1.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社会诸问题研究

过去很少研究的社会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比如袁世凯与禁毒，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袁世凯与赌博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些问题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作为统治阶级中重要人物的袁世凯，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做法，对近代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与禁毒》一文认为，袁世凯主持中央政权时期，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继续清末发轫的中国第二次禁毒运动，采取多种行动实行禁毒，对民初之禁毒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袁世凯的作用不容忽视。邵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一文认为，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与他对革命党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帮会既查禁、又利用，标准为是否为我所用。袁世凯对秘密社会中的会道门总体上采取了明禁暗纵、小禁大纵的暧昧态度，给相当一部分的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空前发展与袁世凯的放纵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霍晓玲（河南大学研究生）《袁世凯与禁赌》一文认为，晚清社会，赌风日炽，禁不胜禁，成为社会一大痼疾。袁世凯对赌博却矢志禁绝，在小站练兵时期、督抚时期以及民国初年均厉行禁赌，范围包括治军、从政、教育乃至日常家庭生活。袁世凯厉行禁赌，整肃了社会风气，赢得了政治声誉。

2. 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研究

对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研究，以往几乎是个空白。由于袁世凯长期被视为反动人物，外国顾问则是侵略分子，所以无人涉足这一问题。这次会议在此问题上有重大突破，有四篇文章涉及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莫理循，一个是有贺长雄。侯宜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莫理循与袁世凯》一文认为，在1915年8月以前，莫理循对袁

世凯极力效劳，维护袁世凯和中国的荣誉与信用。袁世凯对他也很欣赏。对袁世凯的帝制，莫理循极力反对。袁世凯后来延缓和撤销帝制，固然有许多原因，但采纳莫理循的建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上文主要从内政方面揭示袁世凯与莫理循的关系，窦坤（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的《袁世凯及其政治顾问莫理循与〈二十一条〉》则主要从外交上阐述二者的关系，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作为中国雇员的莫理循，全心辅佐袁世凯，在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世界舆论支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张学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一文，主要考察了袁世凯集权、称帝过程中有贺长雄在理论上的重要作用，认为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理论家，是民初袁世凯政治的理论指导者。

3. 袁世凯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作用

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中的重要内容。对袁世凯在法制改革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没有深入，本次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至少有七篇文章涉及这一问题。康大寿（西华师范大学教授）等《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一文认为，袁世凯在这场法制改革中利用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身体力行，积极参与。袁世凯对推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方面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王先明（南开大学教授）《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改革》一文则对袁世凯在天津地方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有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其纳旧入新的渐进性特征，绅官体制的过渡性模式，以及以新代旧的总体性目标等内容，体现出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4. 袁世凯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的处理研究

对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问题，以往的研究过于

简单化，主要集中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和袁世凯与党人对立斗争等方面。本次会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研究，有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马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后清政府旧的政治权威被推翻，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以来新的政治权威尚未被地方接受，如何恢复中央权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成为袁世凯面临的首要问题，袁世凯采取传统集权思想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但最终走向了集权的反面，从而导致了中央失去统治权威，北洋系分裂，国家陷入军阀内战和割据的混乱局面。沈晓敏（广东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民初袁世凯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一文，则考察了袁世凯政府和地方议会的关系，认为袁世凯中央政府和地方议会的矛盾及斗争，中央和地方权力之争，对于初建的民国来说，本来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立法或其他途径逐渐解决。但地方议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中央政府的争吵之中，影响了其地方议会正常职能的发挥。而袁世凯中央政府，则利用强势地位以命令和实力代替法律，解散议会，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由此说明民初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唐凌（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政府与边疆地方势力的经济关系》一文以广西为例，对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经济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他们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但均从维护统治和各自的利益出发，从根本上制约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5. 关于袁世凯称帝

这本是一个老问题，但过去的研究也似简单化，把袁世凯称帝完全解释为个人行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袁世凯个人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一文，具体考察了袁世凯帝制行为的心路

历程，从民初政治运作实践看袁世凯思想演变的轨迹，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他一味加强个人独裁的种种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地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而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

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是学者们注意的视角，但列强干涉的细节、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日本在列强中的突出地位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于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一文就《近代史资料》新近转载的档案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之不足，尤其认为列强干涉洪宪帝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但客观上有助于制止帝制在中国的复辟。岳珑、赵虎（西北大学教授、研究生）《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特点初探》一文对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洪宪帝制不是一场简单的封建帝制复辟，而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建，是近代中国政治历史变化的产物。

6. 关于《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

袁世凯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主要是因为他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屈辱地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侵华要求，但以往的研究多认为袁世凯为了称帝而接受，其实《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称帝没有必然的联系，近年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一文对袁世凯与《二十一条》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袁世凯接受日本侵华要求并不甘心情愿，而是进行了相当的抵制。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既有侵华的用意，同时也有去袁的打算，是日本实施的一箭双雕之计。

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外交，以往的研究多持否定态度。石源华

(复旦大学教授)《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一文作出新的解释,认为袁世凯执政时期,袁世凯丰富的外交经历与他面临的外交难题,使他有可能会也有能力实施“元首外交”,亲自处理各种外交活动。他处理外交的思路和做法,对民国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有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也有某些值得借鉴之处。如其“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方针,以及在处置西藏问题时,采取搁置的方式,以待时机等做法,就有可圈点之处。张艳(河南大学讲师、浙江大学博士生)《顾维钧眼中的袁世凯》一文,则从与袁共处的职业外交家的角度,从外交家如何认识评价袁世凯来评价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外交入手,很有见地。

7. 对袁世凯史料的搜集整理

尽管当前学术界在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等方面多有创新,但任何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此次会议继续弘扬了史学的优良传统。如《莫理循与袁世凯》、《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等文,就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国内外的档案资料。丁进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清练兵处及其档案》一文,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关练兵处、袁世凯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介绍。骆宝善、刘路生(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多年来不辞辛劳地搜集整理袁世凯资料,准备编纂出版《袁世凯全集》,此次会议首次以《〈袁世凯全集〉介绍》一文,介绍了搜集资料的情况和资料价值,已搜集整理的文献字数达一千二百万字上下,未刊者不下三四百万字,与会学者殷切期望这些资料早日刊布。

8. 史实考证

史实考证是治史的基本要求。袁世凯距我们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当时政局不稳,内战不断,或一些事件本来就处在非常秘密的状态,很少有人知道内幕,给研究造成一定的困难。比如袁世凯戊戌告

密，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即八月初四日袁氏告密说。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一文，以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考证袁氏告密不可能在八月初四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宋案是民初的第一大要案，谁是刺宋主谋，当时人们就指向了袁世凯，研究者也似乎无疑义。廖大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生）撰文《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认为从袁世凯的信仰特别是通过对袁世凯主谋说的原始依据（电码破译）的逐条文考析，认为从袁世凯当时的身份、地位，从宋教仁对袁世凯构成的威胁程度，从在上海行刺的困难度等方面，认为袁世凯是刺宋主谋缺乏真正依据，传统说法不符合事实，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此为一种全新的观点。王晓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初总理赵秉钧的悲剧》一文似乎与此完全相反，既然不是袁世凯，那么应该是赵秉钧了。该文在为赵秉钧喊冤，认为赵秉钧是代袁受过。宋案主谋到底是谁？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有学者建议将现代审判制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建立历史审判法庭，以解决历史疑案。该问题引起了宋案武力解决还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争鸣。

9. 国外袁世凯研究状况介绍

袁世凯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对袁世凯的研究向来为欧美、日本学者所重视。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关于晚清统治权力结构的一种新的解释》，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麦金农的专著《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中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认为麦氏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它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关晚清朝廷政治方面的内情，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其对袁世凯直隶改革和他

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关系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则丰富和深化了以往国外学者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这些也是国内袁世凯人物研究所不能涉及的。但对该书中有关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不具有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以及关于袁世凯并非近代军阀的说法提出了与麦氏相反的意见。

10. 关于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七篇，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均承认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时所起的作用。但在对袁世凯的总体认识上有明显的不同。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成败简论》一文认为，袁世凯去世前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同时也是他走向败亡的五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一切反对革命的人们的簇拥下，东山再起，当上了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而后他以拥护共和为名，骗取了革命人士的信任，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利用民主革命的力量，逼迫清帝退位，从而结束了在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统治。此时的袁世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而被中外所承认，备受民众的尊重和拥戴。然而时隔未久，他却背道而驰，铲除共和，消灭革命，复辟旧制，僭号称帝，成为历史的败类、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徐松荣（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民元前的袁世凯》一文将袁世凯的一生分为两段，民元前积极进取，发挥重要作用，民元后政治上倒退，走向反动，并自取恶果，前期活动的作用基本上应该肯定。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对袁世凯的重新解读》一文，则把袁世凯放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进行考察，认为袁世凯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称帝，则是自取灭亡，认为评价袁氏不能因为后来称帝而忽略他早期的贡献，也不能因为他早期的贡献而

掩盖他后期称帝的罪恶。所不同的是，张华腾还认为，即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京政府的统治，袁世凯在政治上反动，但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情。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建树和失败》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政治建树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依照《临时约法》，执政的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依法进行选举，召开国会；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推行军民分治，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等。他的施政确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杀等。问题是为什么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走向帝制，犯下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呢？袁伟时认为这是制度错失和文化状况所致的恶果。这些真知灼见，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火花。

马小泉（河南大学教授）《清末民初元首更替的政治解析》一文，则对清末民初元首更替进行政治解析，探讨国家政治形态的演进和政治权力的变异，以加深对早期中国早期现代化艰辛历程的理解，这完全是一种新的视角。

11. 袁世凯与各社会群体的研究

袁世凯与其周围人物的关系为研究者所重视，这方面的论文有九篇，《袁世凯与近代名流》专著一部。但研究者已经从袁世凯与个体人物的关系，深入到袁世凯与各种社会群体的研究。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评载沣驱袁》一文，实际研究的是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的关系，认为载沣驱袁是清末政治中的一桩重大事件。它是满洲贵族同汉员实力派地方督抚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与斗争的突出表现，也是自咸、同以来统治阶级内部满汉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逻辑，标志着满汉君臣之盟的破裂。姜新（徐州师范大学教授）《晚清袁世凯与归国留学生关系浅析》一文，研究袁世凯与归国留学生的关系，认为袁世凯与公认进步的留学生集团有着不解之缘，他们

结盟共事，相互支持，荣辱与共。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仅是研究袁世凯等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而且包含着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路径的信息，成为探寻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课题。冀满红、李慧（暨南大学教授、研究生）《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一文，认为袁世凯的幕府人员在清末宪政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深化，但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总之，这次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代表了袁世凯研究的最新水平，会议的召开，大大推进了对袁世凯的研究，而对袁世凯研究的深入，则进一步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正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指出，袁世凯是破解清末民初政治的钥匙，弄清了袁世凯的问题，诸多谜团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许多问题不可能期待一次会议就能够解决，有许多问题刚刚提出，尚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袁世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社会转型与近代复杂人物的研究还缺乏理论上的阐述。当然这不仅是袁世凯一个人物的问题。袁世凯与外国顾问的研究有突破，袁世凯与日本、俄国的关系也有人涉及，但袁世凯与英国、德国、美国的关系则缺乏研究。袁世凯在政治集权的同时注意发展经济，他与民族资本家的关系也缺乏整体上的研究。民初袁世凯的政治措施已经有学者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缺乏具体的研究。袁世凯称帝之前的政治体制为后人所抨击，但为什么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等。袁世凯研究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和较高的起点，有待进一步深入。

上海人民出版社相关书目

袁世凯	寒 波	32 开	33.80 元
李鸿章与曾国藩	寒 波	32 开	32.30 元
盛宣怀	寒 波	32 开	30.50 元
北洋泉将孙传芳	王晓华	32 开	25.00 元
阎锡山这个人	王树森	32 开	29.80 元
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	杨者圣	32 开	27.00 元
苦雨斋主人周作人	倪墨炎	32 开	33.00 元
大红大黑周佛海	王晓华、张庆军	32 开	25.50 元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	【美】裴斐·韦慕庭	32 开	17.00 元

以上图书均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到

邮购地址：上海市绍兴路 54 号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邮编：200020

联系电话：021—64313303

邮购方法：在定价的基础上加收 15% 的挂号邮寄费，量大者（请先致电联系）可免邮寄费

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 刘家峰

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张希清等

澶渊之盟新论 张希清等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 苏智良等

目 录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苏智良	1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欢迎词/ 骆平安	1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华腾	1
袁世凯成败简论/ 谢俊美	1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对袁世凯的重新解读/ 张华腾	16
袁世凯简论——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作用/ 徐松荣	37
顾维钧眼中的袁世凯/ 张 艳	55
袁世凯与禁毒/ 苏智良	64
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 邵 雍	78
袁世凯与禁赌/ 霍晓玲	96
莫理循与袁世凯——读《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 / 侯宜杰	113
袁世凯及其政治顾问莫理循与《二十一条》/ 窦 坤	127
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 张学继	148
评载沣驱袁/ 朱东安	166
晚清袁世凯与归国留学生关系浅析/ 姜 新	182
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 康大寿 康 黎	193
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改革/ 王先明	207
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 梁严冰	222
论清末立宪中袁世凯活动的原由与影响/ 肖育雷 岳 珑	237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冀满红 李 慧	255
袁世凯组阁的法制意义/ 陈晓东	269
浅议幕府在袁世凯练兵活动中的作用/ 冀满红 刘文军	282

目 录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建树和失败/ 袁伟时	298
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 马平安	311
袁世凯政府与边疆地方势力的经济关系——以广西为视域/ 唐 凌 ..	331
民初袁世凯政府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 沈晓敏	352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马 勇	372
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特点初探/ 赵 虎 岳 琰	391
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 石源华	409
关于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 曾景忠	414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 苏全有	436
袁世凯与俄国/ 景东升 苏全有	446
从“壬午兵变”到甲午战争——评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活动/ 杨 涛	458
《袁世凯全集》介绍/ 骆宝善 刘路生	471
清练兵处及其档案/ 丁进军	484
关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一种新的解释——《晚清权力与政治： 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述评/ 崔志海	497
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 傅德华	511
袁世凯与袁林/ 史军红	526
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 刘路生	533
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 廖大伟	549
民初总理赵秉钧的悲剧/ 王晓华	571
重评北洋时期冯玉祥治军/ 郭绪印	586
附录	
袁世凯在朝鲜/ 刘路生	602
袁世凯与河间、彰德会操/ 张华腾	633
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 刘路生	658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 苏全有	674

袁世凯成败简论

谢俊美

(华东师范大学)

近代中国是一个复杂遽变的时代。这种复杂遽变反映在人物身上，就是一些人物的大起大落、沉浮败亡的迅速。在这些人物中，袁世凯是最富代表性的一个。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去世，享年五十七岁。用今人的眼光，年纪并不算大，但其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影响却极为深远。袁世凯去世前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同时也是他走向败亡的五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一切反对革命的人们的簇拥下，东山再起，当上了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而后他以拥护共和为名，骗取了革命人士的信任，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利用民主革命的力量，逼迫清帝退位，从而结束了在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统治。此时的袁世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而被中外所承认，备受民众的尊重和拥戴。然而时隔未久，他却背道而驰，铲除共和，消灭革命，复辟旧制，僭号称帝，成为历史的败类、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任何历史现象的出现均与特定时代有关。袁世凯的升沉败亡，既有他个人的政治因素，也与当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诸多因素分不开。

一、“乘机以立功”，夺得全国政权

袁世凯的同乡、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王锡彤曾指出：袁世凯

“一生得力处在乘机以立功”。^①他在辛亥年间被各方拥戴，夺得全国政权，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

自1901年李鸿章去世，清朝统治集团明显缺乏“干练得力之员”；而1908年慈禧的去世，更使清朝统治失去了重心。遍及全国的如火如荼的抗捐抗税斗争和革命党人策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使统治集团日夕不安，迫切希望有能人出来支撑危局，渡过难关。此时袁世凯因时应运，遂成为全社会所瞩目的人物。

在清末，袁世凯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他思想不旧，曾赞成和拥护维新变法，被维新志士视为变法成败的关键人物。光绪帝特任命他为兵部候补侍郎，这一任命曾给他政治生命带来极大的风险。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实行“保境安民”，保护传教士，处理民教冲突“妥帖”，从而赢得列强的信任。慈禧对外“宣战”，他抗旨不遵，参加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活动。“互保”保存了清朝的东南半壁江山，为日后两宫回銮、清朝的苟延残存提供了根据，因而博得了慈禧等人的好感。辛丑议和后，诸多牵连获咎大臣被杀被革逐，朝廷中枢一时乏人。李鸿章在与列强艰难议和，猝然去世。临终前遗折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举荐遂奠定了袁世凯在晚清政坛上的显赫地位，成为继李氏之后，左右晚清政局的权臣。1901年新政开展后，他大办巡警，编练新军，举办实业，开设各类新式学堂，成效显著。此外，从他个人的为人处世来看，他勇于承担责任，他识才，能笼络人，所以部属咸予用命、效忠于他。正如王锡彤所说：“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谄过于人。凡一才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从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之成，而奖藉不遑；

^①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①其言虽不免有所溢美，但所说袁氏善于笼络人为其所用大体符合事实。也许是犯了“功高震主”的忌讳，1908年慈禧去世、载洋监国后，深感袁氏权重望深，是对朝廷的威胁，于是“袭用国初歧克汉人之习，首与为仇”，决定杀掉他，以加强皇权。“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②亏得张之洞、鹿传霖等人从中周旋，“百方调解”，袁氏才得“放归”田里。此后他隐居洹上，表面上装着一副“心似南湖常淡泊，身依北斗最高寒”、淡泊官场权势的样子，其实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徐图再起。清末，权贵当政，宵小弄权，满汉矛盾尖锐，政局不稳，朝野对此十分不满。与此同时，人们对袁氏被逐遭遇越来越感到同情，“袁公去位已将两载，天下仰望之者愈众。旧日僚属明目张胆复来趋附，不似从前藏头露尾矣”。^③“使非数年间之废罢，则至晚清末造，其声望必不能隆然至于彼极”。^④此时袁氏“声望日隆”，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他。认为他是当时“收拾中国最合宜之人”。^⑤所以，待到武昌起义爆发，举朝上下，凡一切拥护清廷和反对革命的人们都寄厚望于他。环顾当时朝内外，也唯有他最具政治资本、最具号召力。他正是在这些人的信任、期望下东山再起的。袁世凯出山后，又很快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目标。在武昌，革命党人迅速作出决定，只要袁世凯能顺应革命，推倒清室，未来的民国大总统一席就让予他。革命党人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道理很简单，从反满立场出发，袁世凯是个汉人，当然属于革命争取的对象。而当时有不少人就是为反对“异族专制”、

①②③⑤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199、238、198页。

④ 黄远生：《社会变迁中的袁世凯》，《远生遗著》卷一，第1页。

进行“革命复仇”而投身起义的。不少起义省区发布的檄文中也均标有这方面的内容。其时，在北方，一批对清朝统治早已灰心失望的汉族官僚也希望他能去满复汉，恢复汉族的统治。去满复汉同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宗旨相吻合，但革命党人揭橥的标帜是建立民主共和。因此，去满和拥护民主共和与否就成为袁世凯面对的难题。

去满复汉是晚清政治中的一个老问题，它并不始于辛亥革命期间。早在同治年间曾国藩就曾遭遇过。据说湘军攻占南京后，湘军中一批将领曾力劝曾国藩建都南京称帝，取代清朝。但曾氏深谙中国传统政治，对于历史上弄兵称制、功高震主的人的下场了然于心际，他不但拒绝了部下的劝告，而且主动解散了大部分湘军，作出让满族最高统治者放心的姿态，因而被加封晋爵，死后赐谥“文正”。如果说咸同时代，倡导和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基础还不存在的话，那么到了光宣年间，情形就不同了。此时民主共和政治已成为先进志士救国救民的方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已为之奋斗了十多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就是要推翻满族权贵建立的清朝统治，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袁世凯出山后，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无法回避的。

去满，对袁世凯来说，从感情上一时还感到为难。他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地位，全是清朝一手提拔的。宣统改元，曾“托孤受命”，曾表示要“鞠躬尽瘁”。然而一想到宣统改元后，摄政王载沣对他的打击，几陷于不测，则又不寒而栗，恨从中来，从内心深处又不愿去扶持这个岌岌可危的朝廷。正如章太炎说的那样：“袁氏仕清，权藉已过矣，不遭削黜，固不敢有异志，趣之者满洲宗室也。”^①宣统改元

^①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后，皇族对他的打击迫害，使他潜意识地萌生去满背清的念头。

武昌起义后，陆军大臣荫昌奉旨率军前往武汉镇压起义。但荫昌胆小，只在信阳停留，并未亲至前线，军队也并不用命。原因是他所带去的官与兵都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北洋军。清廷无法，只好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节制调遣两湖军队及所有水陆援军（包括荫昌在内），这是清朝史无前例的。在清廷那里，希望袁世凯能帮它迅速扑灭起义，好渡过危机。庆亲王奕劻的代表阮忠枢力劝其迅速成行，但袁世凯并未马上应命，这倒不是他嫌湖广总督一职太小，不能满足他的权欲之心。凭着他在北洋军中的威望，“一鼓作气荡平”起义和拿下武汉并非难事，但问题是一旦拿下武汉后，清廷对他如何处置却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敏感的问题。他身边的幕客、同乡王锡彤和他的儿子袁克定（云台）均“力劝其不必应命”；从北京赶来彰德的杨度也代表“民党”竭力“阻行”，他向袁氏进言：清廷“殆无希望，无可救药”，纵使助清荡平了起义也不能改变清廷的危亡。王锡彤、袁克定“袒杨”，他人或“袒阮”，交进迭谏，袁世凯“两容之”。王氏对袁说：“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袁曰：“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王氏“因言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主，家族且不保，前朝此案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他甚至认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①半月之后，又有数省宣布独立，张绍曾在滦州实行兵谏，形势对清廷越来越不利，清廷被迫让权，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同意他组阁。袁世凯在摸清清朝王室内部动向和各方的反应后，感到若再不出山，将错失良机，不仅会失去一大批同情他遭遇、支持他的官僚，而且各省相继独立，将使以后的局面更难收拾。直到这时他才奉命督师，下令猛攻汉

^①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

口、汉阳，随后入京组阁。

袁世凯组阁后，他的僚属仍分为两派：“一拥旧清，一复新汉”。其中他的长子袁克定“力主复汉”，并以北京锡拉胡同住处作为联络机关。王锡彤也一再提醒袁世凯“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之奇功，结果只有两路可走：一为岳武穆（岳飞）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曹操）风利不得泊也。此两者非君杀臣则臣弑君”。劝告袁氏“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况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①袁氏同意对南方民军方面“留有余地”，但他坚决表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②袁氏这一番表白，都是私下对亲信幕僚说的，并不是公开言论，但这一态度直接决定了他日后反对革命、取消共和的立场。

袁世凯说对南方民军“留有余地”，说明他对整个时局有个人的一番打算。就以以后形势发展的情况而言，用今天的话说，他要在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两边取得“双赢”：一方面对革命党人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但又不去立即“荡平”，让革命党人看到他的实力存在，并在南北和谈中以“维护清室作价码”，压迫革命方面向他让步，造成推倒清室“非袁莫属”、“非袁莫能”，好将未来的统治权交给他。所以，当汉口前线“主战派锐欲渡江”时，他“亲以长途电话勒止之”。^③另一方面，对清朝皇室则采取高压政策，逼使清廷就范，听其摆布和指挥。12月，当得到革命方面有关只要他推倒清室就将大总统一职让予他的确切保证后，他遂借革命声势恐吓清政府，指示段祺瑞与其他北洋将领联名通电拥护共和。汪精卫得悉后在给袁氏的复电中，称赞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表示只要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

^{①②③}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38、198页。

外国承认，则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①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得到袁氏拥护共和、推翻帝制的承诺后，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立即掉过头来逼宫。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13日，袁世凯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发出了“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保证。^②“清帝退位，虽仰赖当局阴阳捭阖之妙，而实藉民党发扬蹈厉之势，乃可以恫喝而成功”。^③袁世凯就是这样靠着清政府及反对革命的人们的支持和一切赞成反清革命的人们的信任，最终夺得全国政权的。

对于袁氏上述政治行径，以往的史书都把它说成是袁氏反革命的两手，但就事实而言，袁氏当时虽不赞成革命，但也未公开反对革命，他只是利用了革命。而他所作这一切的结果则是推倒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君主专制统治，结束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对此，章太炎曾说：袁氏“虽为僭伪之主，不无匡国功，而亲莅行阵，其要者也”。^④有人甚至把袁氏处理这一复杂的政治局面说成是袁氏的“大智慧”，把他比做西周时的姜尚、春秋战国时的商鞅。“然当辛壬之交，革命初期……袁乃从容谈笑收复汉族已失十八省之山河，于满族盘踞两百余年之后，且益汉、满、蒙、回、藏数万里之岩疆同隶五色旗下，其胸襟胆量，视吾所称古之三大怪杰者（按：指姜尚、商鞅、李文饶，三人皆河南人）胡多让焉？！”^⑤

袁世凯的出山和他的上述作为，使他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

①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临时政府公报》第16号，1912年2月14日。

②③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215页。

④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⑤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一个能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之后能重建和平及秩序的人物。然而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袁世凯上台后却逆从民意，倒行逆施，背叛民国，帝制自为，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千古罪人。

二、僭号称帝，自取败亡

同一个王锡彤在论及袁世凯败亡时说：“洪宪之举，迹近儿戏，背叛民国，夫复何辞？”“洪宪乃自己造机。”^①也就是说袁世凯称帝完全是自己一手制造的，因此，他的败亡不应归罪于别人，是他咎由自取、自己造孽的结果。

还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时，当时一部分清朝官吏希望袁世凯能做曾国藩，扑灭起义，立不世之功。而时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总司令的黄兴则希望袁世凯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拥戴明公这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②蔡元培知道后，致函黄兴，说袁世凯既不会做曾国藩，也不会做华盛顿，他只能做皇帝。蔡元培的这一卓识，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当初袁世凯之所以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看中的不是大总统的这一名器，而是透过大总统背后统治国家的权力，是为了夺得全国政权。他从内心深处对于中华民国这个民主共和的体制

①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5 页。

② 黄兴：《致袁世凯书》（1911 年 11 月 9 日），《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82 页。

并不赞成和认同。他长期生活于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在清末宪政运动中，他是君主立宪的拥护者、推行者，并不具备民主共和政治意识。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迫于形势，被迫交出政权，袁世凯成为继皇族内阁之后的执政内阁总理大臣。“摄政王革去摄政名义，政权一归内阁，英使朱尔典实助袁公以成之”。载洋监国时，执掌全国大权，“政权一归内阁”，亦即一归袁世凯，袁世凯取代载洋，成为事实上的“君主”。清帝退位后，在袁世凯和旁人看来，他已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是有一个不可无视的事实，即发动起义的革命党人对于让出大总统一职，并不甘心。他们利用民主共和政治的法则，制订和通过了《临时约法》，规定未来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并开展政党政治，在议会内获取多数席位，企图重新夺回失去的政权。袁世凯“深感国会、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都是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执定民主制度万万不能行于中国”。^①他由讨厌民主共和政治而憎恶革命党人，乃至决心铲除和消灭这个经由无数革命党人为之流血牺牲换来的民主共和国。1913年3月，他派人暗杀了国民党代理董事长宋教仁。7月，发动“赣宁之役”，撤销鄂、皖、苏、赣、粤等省督军，一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此后派出大批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接着下令解散国民党，停开国会，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凡从前起义有功之人多以嫌疑被逮”，“进步党固予政府接近者，亦一例待之，人心不寒乎？”所以有人说“此为政府失人心之始”。^②袁世凯干的这一切都是为其日后帝制自为扫清障碍。待这些一一“战胜之后，奢望顿生，一班宵小益得以种种媚术蛊之，而洪宪之祸作矣”。^③

① 侯宜杰：《袁世凯家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②③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231页。

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运动，使立宪思想在知识群体及诸多领域内很流行。而绝大多数官僚人士因直接参与宪政活动，都具有了一定的君主立宪政治意识，对于君宪政治表示认可。清朝推翻后，相对于民国而言，他们从感情上更留恋君主立宪政治而不喜民主共和。就人事而言，他们与袁世凯本是旧同僚、旧同事、旧部下，同在清末预备立宪政治的环境下一起共过事，这种久惯于君主专制下的政治情结，使他们往往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而“洪宪新国究不是前清王朝的复制，有三点不同于清朝：一立宪，一永废跪拜礼，一永不用阉宦”。所以，有人指出民元以后，“政府所用之大老，皆一班预备立宪之旧人，故所行仍是（前清）预备立宪之故伎”，“旧梦重温，覆车相蹈也”。^①这一部分人客观上成为袁氏帝制自为的精神支柱和帝制活动的支持者、拥护者。

袁世凯不敢用“崭新人物”，因为这些崭新人物大多是在辛亥革命中显露头角、具有民主共和政治倾向的年轻一代。所以，他所用之人以及聚集在他周围的都是“一班亡国之清流”，“又甄录一班嗜进无耻、热衷利禄之恒流以充塞庶位”。^②“筹安会六君子”则是复辟帝制的鼓吹者。“宵小窥伺，而有筹安会之设也”。杨度素主君主立宪，因而为袁氏称帝不遗余力。他发表《君宪救国论》，袁世凯看后大为激赏，称其为“旷代逸才”。杨氏又将袁克定比作唐代的李世民，大加吹捧，从而博得袁氏父子的信任。继后他又组织筹安会，宣言“筹一国之安”，“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公开为袁氏称帝摇旗呐喊。

袁氏僭号称帝，背叛民国，引起全国上下一片反对。当初他是利用了一切拥清反对革命的人们和一切赞成反清革命的人们的支持而夺

^{①②}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1 页。

得政权的，现在则是在一切曾经拥护他、支持他的人们的反对声和讨伐声中走向败亡。

为了称帝，他大肆搜括，以致民怨沸腾。“今民国纪元而后，验契有费，公债派钱，一切新税正在议行者，尤不知凡几，民间纷然以为加赋，且与日本交涉失败，薄海志士罔不短气。当此时而铺张功德，谋称尊号，得毋非为其时乎？”^①他的帝制活动很不得民心。

袁世凯历来迷信武力，认为只要有武力，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殊不料他的帝制一出笼，就引起北洋内部的分裂。1915年12月参议院开会时，各省纷纷设立筹安分会，“请愿行帝制者率上书于参议院。虽明知其非义，亦无词不予收受。其时云南、四川已在兴师，中央亦派兵讨伐，而兵不用命，将帅观望成败，不肯用力。内则段芝泉（指段祺瑞）别有怀抱，外则阎百川（指阎锡山）、冯华甫（指冯国璋）均另作主张”。^②北洋军事集团主要人物段祺瑞、冯国璋的不支持，是直接导致洪宪帝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后，凡一切对帝制持反对意见者均被扣上“图谋不轨”的罪名，“皆以乱党相待”。周馥、周学熙父子是反对帝制的，周馥愤慨地说：“既行之于今，何必当初？”“帝制之行，缉之（指周学熙）不愿签字。有人谗之当局，诬缉之勾引国民党，潜谋不轨”。^③周、袁是儿女亲家，周氏听到这个说法后气得吐血。张謇劝告袁世凯做中国的华盛顿，不要效法上断头台的法王路易十六。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麐也进行规谏。严修则曾从天津赶往北京进行劝阻，并指出其子袁克定蒙骗袁氏。但袁氏就是不听。梁启超知国体有变，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见劝说无效，知大祸临头，急忙携

①②③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177、198页。

家人前往天津躲避。据说，他是经冯国璋授意，才秘密潜赴云南讨袁的。自筹安会发起，将军府签名赞成（帝制）时，蔡锷实首先签名者，但袁氏仍怀疑蔡锷有异志，竟派军执法处发兵围住蔡宅，进行搜查，虽一无所得，但蔡氏不能无所惧，仍日日在球房拍球，某一天，穿上球役衣服坐三轮车出京以去。云南、四川、湖南、广西护国讨袁战争爆发后，袁世凯“知用兵无益，遂于三月后复改洪宪元年为民国五年”，声言取消帝制。结果这一改、一取消，又造成两个“离心”：袁氏称帝时，“使一班新人离心”，使当初拥护他当民国大总统的官僚士大夫离他而去；而宣布取消帝制后，“又使一班旧人离心”，使支持他帝制活动的一班官僚政客寒心而去。所以有人指责袁氏“始也不量时势，背宣誓之言，失大信于天下。继也反声四起，兵不用命，复取消前言，自失权威，宜乎坦坦康衢，顿生荆棘也”。^①终至众叛亲离，自取败亡。

袁氏帝制失败还与列强态度变卦有关。袁氏称帝当初，曾得到英、德等国的认可。英、德都是君主立宪国家，认为民主共和不宜于中国。德国在远东没有友邦，因而瞩目于袁世凯，然而绝不愿中国成为共和国。德皇威廉二世与中国驻德公使梁敦彦谈及国体问题，谓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度。他还通过袁克定致函袁世凯，“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并说中国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西接英、俄，亦以帝国为宰割。中国地广民众，位于日、英、俄之间，不能师法遥远的美国。美国也不能远渡重洋，给中华民国以强有力的援助”，表示“德国誓以全力赞助经营，财政、器械，无条件地供给，中国当信我能履行诺言”。^②英国也认为“民国初立，执政者皆帝制时代之旧人，革命

^{①②}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8 页。

分子势力甚弱，如果挟大总统之威权，一变中华民国而为帝国，也是英、日、俄等帝国所愿”，^①表示“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②袁世凯“以有两大国之奥援，国内为其所掌握，用远交近攻之策，日本器小易盈，容易对付，百无一失”，^③于是决定实行帝制。岂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成为交战国，忙于厮杀，自顾不暇，使袁氏帝制活动遂陷于孤立。而日本则坚决反对袁氏称帝。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曾直言不讳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④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趁机向袁氏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氏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帝制的承认，竟于1915年5月25日表示接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民众怒不可遏，誓死反对，要求严惩卖国贼。段祺瑞本来对袁世凯就“不事趋承”，袁氏称帝严重损害了他（也包括冯国璋等人）的利益。论其资望、地位，在共和制下，他们都有继袁氏而任总统的可能。既改帝制，皇帝世袭，还要向袁氏子孙称臣，这是他们不愿意的。日本趁机收买了段祺瑞，拆散了袁氏的班底。至此袁氏集团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空前孤立，帝制活动遂告失败。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此时有人劝其放弃政治，回河南老家息影待时再起，“今取消帝制，即彻底垮台，退为总统亦未能久，仍是大错，宜回河南”。^⑤但他

① 侯宜杰：《袁世凯家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②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

③ 《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之记录》；凤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版，第296页（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

④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第328页。

⑤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没有接受，仍厚颜无耻地以大总统名义发号施令，因而为天下所不齿。孙中山在《讨袁檄文》中说：“天下有死灰复燃之皇帝，断无失节再醮之总统。”指责袁氏总统资格业已丧尽，根本无权再发号施令。^①6月6日，袁氏在举国唾骂声和讨伐声中，带着万分羞愧死去，了结了他的一生。

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出现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对于久惯于封建君主专制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共和”、“民主”、议会、总统之类的东西，还很陌生。当时他们并非出于对“民主”“共和”的自觉而热情拥护革命，在民国和国民之间还存在着客观的距离，即未产生同构效应。民初国民党同袁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使人感到厌倦。晚清几十年的内忧外患使民众饱受痛苦，企盼能早日恢复秩序，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人们拥戴袁氏，基本上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种人心意念，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可乘之机和文化心理基础。一部分官僚士大夫拥戴袁氏称帝除了对君主立宪政治认同外，还与下列心理因素分不开：在他们眼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以及各地参与反清起义的人都是一群“乱党”、“乱民”，让他们掌权、治国是绝不可行的。由对“乱党的不信任而在无意识中倾向于袁世凯。各地土匪蜂起，假借革命者，不能认为同志，此后民居必扰，秩序难保，非桑梓福也”。^②

再从袁氏个人政治素质来看，他的败亡也并不奇怪。“履霜坚冰，业不终其有由矣”。^③他是地地道道的武夫出身，王闿运曾说：“嬉笑怒骂，曾、左、李、彭、丁、张为净友，袁以下自郅无高。”^④“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⑤郅为西周诸侯，后被郑武公所灭；无

① 孙中山：《讨袁檄文》，《孙中山选集》（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0页。

②③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98页。

④ 王仁清：《民国人物联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⑤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高，指无足称述。意思是说袁氏根本无法与曾、左、李等一班人相比，他不过是一个寡廉鲜耻、十足无赖的小人。梁启超干脆将其行政比之为“流氓政治”。所以，一旦“君临天下”，大权在握，只有听任群小包围。利令智昏，忘乎所以。殊不知自民国改元以来，革命党人力量虽一时软弱，但民主共和政治毕竟已成现实，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擅改民主为君主就是民贼，就是背叛民国，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袁氏竟逆潮流而动，只能是自取灭亡了。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对袁世凯的重新解读^①

张华腾

(安阳师范学院)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没有任何肯定之处，似已成为历史的公论。但“历史上起过重大反动作用的人物，由于他身居要津、拥有权力，处在发号施令的关键地位，往往能左右事态的发展，影响历史的命运”。^②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清王朝灭亡和统一的中华民国确立的历史命运。我们一般认为他靠阴谋和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是窃国大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思维方式的进一步灵活，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人们对袁世凯有了新的认识。一些学者如戴逸先生等认为，“袁世凯不同于其他封建官僚，他注视历史潮流的趋势，善于利用刚刚在中国生长的新的军事、经济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因而他在同侪中胜人一头，能够攀登到权力的顶峰”。^③然而，有些学者似矫枉过正，过分夸大袁世凯的作用。更有甚者，在褒扬袁世凯的同时，一味地贬低孙中山，把民初的政乱归怨

① 除少数论著如李宗一《袁世凯传·前言》、戴逸《袁世凯评传·序》、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引言》等对袁世凯有概括介绍外，很少有学者对袁世凯作宏观上的全面评价。

②③ 戴逸：《袁世凯评传·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为孙中山。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扬袁抑孙”现象。^①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袁世凯？我认为戴逸先生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袁世凯放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地进行考察。我们看到，袁氏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但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称帝，那是自取灭亡。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②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如果我们如此来评价袁世凯，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清末民初的“袁世凯现象”。为什么清末在袁世凯周围聚集了那么多的中国各个方面的人才？为什么辛亥革命中各派政治势力、名流、名家包括孙中山及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凯？统一中国“非袁莫属”，建设中国“非袁莫属”，自然，统一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也“非袁莫属”。可是整整四年之后，各派政治势力、名流、名家又都抛弃了袁世凯，一致认为“非去袁不可”，各派政治势力结成了一条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发起护国战争，最终打倒了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从“非袁莫属”到“非去袁不可”，仅仅是历史的短短的一瞬间，但确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最丰富的内容，也是评价袁世凯的最好的说明。

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政治极端腐败、经济十分落后、备受外国欺凌、灾难沉重的近代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是近代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政党都要考虑的问题。先进

^① 李文海：《从“扬袁抑孙”想到学术创新》，《人民日报》1995年7月28日。

^② 《孙中山选集》手迹之五。

中国人在民族屈辱的一次次刺激下，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拯救民族的真理，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容闳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郭嵩焘的“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未有能舍此而可收效一时也”；^②到孙中山的“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只要中国人民奋发努力，“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③先哲们探索的道路是共同的，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统治地位后，在其生产力大为发展，不断开拓世界市场，“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④的过程中，近代中国要想不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就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⑤即变法改制，学习西方，摆脱外国的控制，争取民族独立，由数千年的封建古国跃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为文明富强的国家，这就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的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政坛上活动了二十余年，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袁世凯以军旅起家，虽然没有像众多的仁人志士那样高瞻远瞩，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振臂高呼，腔洒热血，但他在许多方面，顺应了近代中国发展的趋势，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一）练新军，变军制，中国军队从此走上近代化道路

当西方各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军事走上近代化之时，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封建旧轨上踏步不前，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仍然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页。

②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8、4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是士兵的主要武器。军制不分兵种，以营为单位分散防守于全国各地，没有一支集中统一灵活机动的野战部队，无怪乎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军队不谓不众，也不乏忠勇爱国将士，但一次次都失败了。中国军队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更新装备，变革军制，走上军事近代化。但由于中国长期闭关，对世界了解不多，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封建观念使这一进程非常缓慢。洋务派在军事近代化方面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没有引起根本性的变化。甲午战争一役，海军覆没，陆军崩溃，旧军不可恃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加速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进程，并最终在袁世凯手中完成。

甲午丧师，马关签约，割地赔款，举国震动，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战后不久，全国掀起了一股练兵自强的热潮，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庶民百姓，朝野上下，莫不谈中国练兵自强之事，“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①在这股求强热潮中，袁世凯显得更为清醒和主动。他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采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②不仅如此，他还积极组织人翻译西书，将西方兵制营规介绍到中国，并上书主政者。袁世凯的积极态度和战后清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博得了“知兵”的美名，被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

袁世凯果然不负众望，他采取西方兵制，结合中国特点，严肃治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制二，第9509页。

②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

军，倾心练兵，短短几年时间，练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的近代化陆军——新建陆军——北洋新军。这支军队与旧军相比，其根本区别在于：第一，北洋新军实行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一军中配备有步、骑、炮、工程、后勤（辎重）等多兵种，各兵种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中国军队从此由单一兵制走向合成兵制。袁世凯后来又创办了巡警，使军队从地方杂务中解脱出来，成为灵活机动的野战部队，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第三，改进募兵制，仿行外国征兵制。对应募兵丁提出严格要求，如年龄限在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身高限在四尺八寸以上，步速每小时限在二十里以外，平举限一百斤以上等。对军属给予多方照顾，如地方官有保护军属之责，每一名士兵准免差徭三十亩等。对军属的照顾，使士兵解除了后顾之忧，专心操练，这在中国军事史上尚属首创。第四，改革军官制度，大力举办不同层次的军官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懂得军事专门技术、具有指挥才能的军事人才。第五，练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他聘用了许多外籍军官（初德国，后日本）担任教官，一丝不苟地进行训练。第六，全部西式装备。这支军队的武器，全部购自西方。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步兵一律使用奥国造的口径为8厘米五响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①这是一支全新的军队（北洋新军时期的武器也购自英国、日本）。

袁世凯仿行西法创建的这支军队，是中国的第一支近代化军队，

① 《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汇编》第10辑，第233—248页。袁世凯：《北洋创练常备军厘订营制饷章折》，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8—534页。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中国真正的近代化军队是从袁世凯按西法练成的新军开始的”，^①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用先进的资本主义军制取代腐朽落后的封建军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袁世凯在甲午战后特定的环境下，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转变，这是袁世凯开创性努力的结果，对此我们应该给以充分肯定。战后练兵者不乏其人，唯有袁世凯取得了成功。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对袁世凯的军事改革给予高度赞扬，认为袁世凯“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②问题是北洋新军成军以来，多次镇压人民起义，而乏抵抗外国侵略的战功。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它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外国侵略者的对立物，1897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袁世凯的新军奉命开往山东德州、沂州操演行军阵法，实际就是阻止德国进一步向内地侵犯。袁世凯在军中写信给徐世昌说：“德人必有诡谋，岂瞍瞍者所能见及”，“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③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北洋新军严守中立区域，防止日俄对中国领土侵犯的扩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那种认为北洋军“一开始就附属于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说法，^④是很不妥当的。

（二）参加维新运动，大力推行新政，政绩卓著

袁世凯还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是古老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向近代中国演变过程中的必然运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维新思潮，

① 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②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6页。

③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④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页。

预示着近代中国的进步倾向。甲午战后，在民族危机的感召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努力下，迅速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维新运动是不甘受辱的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机、变革封建制度的政治运动，袁世凯最初以积极的态度参加，本身就是进步的。有人说这是袁世凯的政治投机，其实不然。我们认为，袁世凯参加维新运动，非但不是他的政治投机，而恰恰是他政治态度的真正表证。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成立第一个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袁世凯是发起人之一，^①并捐纳五百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强学会每次在松筠庵的集会，讨论时局，策划变法，袁世凯都能参加。他和康梁的关系十分密切，据康有为后来回忆，“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指袁）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②康梁相继南下后，他在繁忙的练兵之余，参加天津维新派的活动。这时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③“必须大变法以图保全数省”。^④袁世凯还曾上书光绪皇帝，向当国的翁同龢投递说帖，详细阐述了他的变法主张。^⑤纵观袁世凯在维新期间的言行，说他是一个十足的维新派并不过分。至于他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康有为、光绪皇帝，向荣禄告密，是他从双方力量悬殊的对比中作出的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从政治品格、政治操守方面看是恶劣的，但对于一个正在积极谋取权势地位的封建政治家来说又是不足为奇的。

① 《梁任公年谱长编》，第41页。

②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近代稗海》第3辑，第255页。

③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49页。

④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⑤ 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维新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变法维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所以，扼杀维新运动的西太后，三年之后也不得不沿着维新的道路走下去，高唱变法，于二十世纪初举办新政。新政几乎是维新运动的翻版，但在内容上更为广泛，客观效果更为明显。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由于有较深厚的思想基础，所以成为新政的急先锋。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自己的辖区——北洋，将新政搞得红红火火，以至于直隶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①他在新政中的举措，如扩练新军，创办巡警，大办实业，广兴教育，改革司法，推行地方自治等，都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他在直隶办的新式教育，堪称各省的楷模，在中国教育史上大放光彩。

中国新式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袁世凯站在这股潮流的前面，对新式教育大唱赞歌，多次上奏要求废科举，兴学校。他说：“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学问，国家永远无救世之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②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1905年，清廷终于下旨废止了阻碍新式教育发展的、延续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袁世凯不仅是新式教育的鼓吹者，而且还是新式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在此前后，他在直隶大办新式教育。他办教育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注重军事教育，又重视实业、师范、女子、留学教育，从初级教育到高级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形

① 《北洋公牍类纂》卷十一，第2页。

② 袁世凯：《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页。

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到1907年，直隶新式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据学部统计，直隶大小学堂达八百余所，在校学生有十六万人之多，^①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尽管袁世凯办新式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培养人才，但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却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袁世凯在新政期间，曾对天津大力治理。据其弟子沈祖宪等说：“公（指袁）既驻津……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街衢修治，一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②天津城市的近代化是从袁世凯督直开始的。^③

（三）顺应共和，颠覆清朝，有功于民国

二十世纪的中国，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为“洋人的朝廷”，日益成长和觉醒起来的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这场运动领导者自然形成两部分——温和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和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改造清政府，发起立宪运动，希图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二者手段、方法、道路不同，但根本目的相同，即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由于清廷缺乏立宪诚意，立宪运动失败。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但传播了民主思想，宣传教育了群众，通过立宪运动，使人们认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更多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

① 学部编制：《光绪三十三年教育统计图表》。

②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三。

③ 据笔者详细考查，上述记载是属实的。张华腾：《论袁世凯对天津的治理》，《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通过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袁世凯不仅是一个君主立宪派，而且还是官僚立宪派的领袖。他和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领袖张謇，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上下呼应，密切合作，推动了立宪运动的蓬勃发展。但袁世凯势力的坐大，威胁到满洲贵族的统治，1909年初被满洲贵族赶下台。袁世凯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悄悄地等待时机。武昌起义的胜利，遍布全国各地的革命烽火，使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廷束手无策，被迫起用袁世凯，不久又授予他总理内阁大臣，使其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实权。历史又给了袁世凯一次选择的机会，要么像当年的曾国藩一样，指挥北洋军全力镇压革命，做清廷的忠臣，青史留名；要么，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反戈一击，推翻清王朝。袁世凯默察大势，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也是南方革命党人极力争取的，当时客观环境所决定的。

袁世凯把清帝赶下台，决非偶然，其思想早就发生了变化，与清廷的离心力越来越大。早在他被罢官前夕，就曾产生了联合黄兴等革命党人推翻清廷的想法。他曾派特使到日本与黄兴联系，“当时袁世凯的地位告危，不得不和革命党携手合作。这位特使没有到东京，电报是在京都打的。黄兴是在元旦（1909年）那天到京都去的”。^①正当黄兴与特使谈话之际，袁世凯给特使又打来电报说：“一切已晚，速归。”^②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和做法，民国后由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进一步得到证实。黄兴说：“袁氏当未辞职之先，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官保此

① 《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0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7页。

② 《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69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7页。

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然代表人去后，终不见袁氏有些须举动。未几袁即辞职回籍，以意测之，或者因有为难之处，故不能动也。”^①此两则史料说的是一回事，只是地点不同罢了，有可能是一方记忆错了，但史实是清楚的，而且一方还出自与黄兴关系密切的日本人之后。这是袁世凯与黄兴的第一次间接接触，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均不成熟，所以袁世凯的这一想法没有能够实现。虽然如此，但由此说明袁世凯后来叛清是有一定基础的。一年后，他怀着同样的目的还曾派人与孙中山联系。^②

武昌起义前的1911年6月，立宪派首领张謇于进京途中，在彰德下车拜访了袁世凯。袁世凯向张謇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民意而行。”^③武昌起义后没几天，奕劻电询袁世凯对付革命的办法，他回答说：“……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使。”^④果然，他一出山，就向清廷建议“宽容武昌诸人”和“解除党禁”，这对革命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南北议和中，表面上他坚持君主立宪，实际上他和徐世昌密商，“认为国体共和，已是大势所趋”。^⑤他对形势的估计是非常正确的，正确的估计使他采取了正确的行动，他最终答应了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条件，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威逼清朝皇帝退位，从而结束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清王朝，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成为现实，

① 《黄兴集》，第374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7页。

③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2页。

④ 《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

⑤ 同上，第294页。

这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功劳。孙中山、黄兴都曾给以充分肯定。孙中山说：“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①黄兴也非常诚恳地说：“项城处两艰地位，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实不可没。”^②正因为袁世凯有如此功劳，所以经孙中山推荐，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任大总统。

当然，在此过程中，袁世凯有着极大的私欲，而且，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欲，不惜使用了一切手段。不管袁世凯的手段有多么卑鄙，但他最终顺应了民主共和的潮流，使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目标得以实现。

（四）制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法规，促使经济的较快发展

辛亥革命后，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工商业，振兴民族经济为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刚刚脱离专制的资产阶级喜不自胜，对国家、对民国政府寄予无限希望，“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供此运气，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③袁世凯最初适应了这种形势，提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④他先后邀请民族工商业巨头张謇、周学熙入阁，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促使了工商业的较快发展，赢得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拥护。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称颂说：“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工商业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业

① 孙中山：《复谭人凤及民立报馆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

② 黄兴：《致伍廷芳电》，《黄兴集》，第125页。

③ 《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

④ 《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词》，《近代稗海》第3辑，第38页。

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①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1912年为十四家，1913年为二十五家，1914年增为八十九家，1915年更增加到一百零二家，^②呈逐年上升之势。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并未到政府注册。1913年11月，袁世凯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声称：“此后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飭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③这就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所以1912—1919年间，仅华侨投资的企业就达一千零四十二家。^④原有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大为扩展。如以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著称的无锡荣氏兄弟和南通张謇，都是在这—时期奠定雄厚基础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从1912年起不仅扩展了原有与人合办的茂新面粉厂，而且开始筹办福新面粉工业，1912—1914年，创办了福新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从1915年起，又开始投资创办申新系统纺织工业。^⑤张謇的大生纺织公司，从1912年起开始摆脱数年来的停滞状态，利润急剧上升，巨额的利润促使其扩大生产规模，1912年集资六十万两增设大生新厂，1915年又集资一百二十万两创办大生三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确确实实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固然，袁世凯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和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①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0卷第10号。

②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史料》，第6页。

③ 《中华实业通报》第8—9期。

④ 转引自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企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⑤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7页。

问题在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一政策贯彻到底，且在鼓励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加紧了对工商业者的盘剥，且越来越甚，致使工商业受到极大压抑，引起了工商业者的强烈不满。时在华的外国人看得非常清楚，“过去民族资本家对袁世凯寄予一定期望，现在已犹肥皂泡似的消失了。商人责怪政府，埋怨之声到处可闻”。^①

总之，辛亥革命之前，袁世凯在许多方面都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即使在辛亥革命后，也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做出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正因为如此，其仕途顺利，直线上升，由道员、按察使、侍郎、巡抚，直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仅仅几年时间，在清末官僚中是升迁最快的一员（我们不否认袁世凯手段、权术的作用）。武昌起义后他一出山，既为清廷重用，又为革命者寄予希望，初被授予湖广总督，进而内阁总理大臣，直至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此可谓顺之者昌。

二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特别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帝制自为，天怒人怨，举国声讨，终被民主共和的潮流所吞没。此可谓逆之则亡。

（一）排斥异己，扼杀民主制度

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合作，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以他为首的北洋势力与革命党人的联合政权，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社会由此向前大大迈了一步。受尽专制之苦的人们对袁世凯、对新政府寄予无限的希望，“推翻四千余年之专制政体，而易建共和，实为我国历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43页。

史上一重大转变，况当国难日亟，腐败之满清政府覆亡以后，国人于民国元首有非常厚望，固也”。^①“在此际革故鼎新，人多朝气，内而台阁，多属名流，外而封疆，多属首义，一时物议，庶几长此可以久安，目前可以图治”。^②

袁世凯本应顺民心，与革命党人携手，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励精图治，共谋建设大计，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具有新思想，非一般清末封建官僚所能比，可他又是一个极端专制主义者，不但拒不与党人合作，还妄图使党人就其范围，“在我（袁自称）个圈子里”。^③对不入其圈子的人，必欲图之而后快。唐绍仪是袁世凯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从驻朝鲜办理外交、小站练兵，到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内，患难与共。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为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南北议和作为袁世凯的总代表与南方革命党人谈判，深受革命党人的影响，迅速转变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与革命党人真诚合作，坚持《临时约法》上的责任内阁制度，为袁世凯所不容。袁世凯以王之祥督直事，不经内阁副署而径下命令，迫使唐绍仪辞职，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党人宋教仁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年轻有为，特别赋有建设才能。他信守民主制度精义，在法制范围内行使权利，发表政见，抨击时政，被袁世凯所暗杀，酿成一时的“宋案”。继而袁世凯不经议会同意，签定善后大借款合同。他为所欲为，不把任何力量看在眼里。

袁世凯的违法行为遭到国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他却以国民党人反对统一为口实，调北洋军南下，挑起赣宁之役，打败国民党，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后记》，《近代稗海》第3辑，第275页。

② 蕉鹿客：《十年前洪宪纪元之回想》，《申报》1926年10月10日。

③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将北洋势力扩展至南方。镇压国民党人的胜利和不久正式大总统的选举，使袁世凯更加得意忘形。为扫除其专制独裁的障碍，1913年11月4日，他下令解散国民党，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休会。次年1月，又以一纸命令解散国会。5月，还下令废除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宪法、国会、内阁等，被其破坏无遗，只剩下中华民国的空壳子了。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当时经过几代先进中国人的努力向西方找到的真理，辛亥革命后人们把它移植到中国，期望国家由此摆脱贫困，走向富强，进而与世界各国争雄。虽然后来证明此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但在当时是人们的崇高理想和寄托。袁世凯扼杀民主制度，确立起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排斥异己，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混乱，有碍于社会的安宁和进步，冷却了国民的人心。人们对袁世凯的希望破灭了，“溯自三年半以前，国会方始诞生之日，世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期望方殷，袁世凯竟利用善后大借款，得五国之赞许，推倒国会之势力，而实行专制……”^①

（二）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变国体、称皇帝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打倒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的潮流势不可挡，谁违背了这个潮流，谁就自取灭亡。

1914年，袁世凯消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扼杀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立起专制独裁的统治后，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历史给中国、给袁世凯一次大的机遇，发愤图强，全心内治，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摆脱列

^① 辛博森：《论中国退化之由来》，《申报》1916年12月2日。

强的控制，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中国由此走上富强道路，是大有希望的，而人们对于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或将给予默认。当时国内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大都有这样的心理，“当欧战延长之际，乃吾国内治岌岌之日，借以立国延命者，在此时乎！”^①“又窃尝谓当新约法公布，大总统集权制完全告成后，袁氏而能公忠谋国，无洪宪帝制之事，则其时人心厌乱，局面小康，财力称阜，足谋建设，而欧洲方多事之秋，正中国大有可为之时也”。^②袁世凯却违背国民的心理和意愿，利令智昏，一意孤行，背弃自己“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③更改中华民国国号为“中华帝国”，做起洪宪皇帝来。袁氏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终被民主共和的潮流所吞没。袁世凯的皇帝梦仅仅八十三天而已，而袁世凯自己也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袁世凯称帝，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场大的灾难，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影响。袁世凯死后，中国社会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南北纷争，战乱不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

袁世凯生前死后至今的一个世纪中，一直是一个受人唾骂的人物。他出卖维新志士，资产阶级维新派骂他；他在山东镇压义和团，

① 《康有为再与袁世凯促退位远游书》，《近代稗海》第3辑，第256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后记》，《近代稗海》第3辑，第275页。

③ 《临时政府公报·电报》1912年2月14日。

农民及下层劳动群众骂他；他逼宣统皇帝退位，满蒙贵族骂他，骂他是奸雄，是曹操一类的人物，要和他拼命，甚至要干掉他；他残杀国民党人，扼杀民主制度，国民党人骂他；他背叛民国，帝制自为，更遭到全国人民的痛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继续骂他，认为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集团，它上继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的榜样。^①它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袁世凯的道德品质恶劣，政治操守极差。他口是心非，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玩弄权术，手段毒辣，阴险狡诈。他曾出卖过两个皇帝，戊戌变法中出卖了光绪皇帝，辛亥革命中又出卖了宣统皇帝，出卖光绪皇帝博得了西太后、荣禄的青睐，为其官运亨通开辟了道路；出卖宣统皇帝使他戴上了临时大总统的桂冠，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背叛了自己的总统誓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对袁世凯的道德和政治操守，远在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曾揭露得淋漓尽致。列宁说：“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起来而出卖民主派。”^②稍后，列宁又进一步指出：“袁世凯昨天是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就成为一个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成为复辟君主国家的首脑，就是说，打算出卖共和制。”^③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

袁世凯是一个盖棺论定的反动人物，有乱世奸雄、窃国大盗、卖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史话》上册。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3页。

③ 《列宁文稿》第2卷，第129页。

国贼等多种称谓。但我们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均十分复杂。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众多的矛盾，诸如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反对外国侵略和向西方学习的矛盾，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以及维新与革命、改良与保守、反帝与反封建等多种矛盾。这些矛盾纵横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冲突，生活在诸多矛盾中的近代人物不可能都很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其人物本身凝聚着复杂性，因此，我们对袁世凯的评价，决不能简单地冠以“窃国大盗”、“卖国贼”、“乱世奸雄”等了事，而应该深入细致地进行分析。

对复杂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①袁世凯是清末封建大官僚，民国大总统，北洋军阀集团的总头子，从阶级感情和道德情感上，没有任何可肯定之处。但我们不能仅凭感情用事，“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②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袁世凯的历史功过。列宁为我们认识和评价这方面的人物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俾斯麦是德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对他的评价，列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指责“俾斯麦是德国反革命地主的代表”，^③但从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上，列宁又充分肯定俾斯麦的历史功绩。他说：“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的进步事业。此外，俾斯麦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散的受异族压迫的德国人联合在一起。”^④袁世凯决非俾斯麦式的人物，但我们可从列宁对俾斯麦的评价中得到许多启示。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

③ 《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第86页。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复杂性的人物，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为我们评价袁世凯提供了某些借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的两个月，撰成《李鸿章传》一书，在其书的《序例》里，表述了他评价李鸿章的基本思想。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资产阶级史学家尚能如此客观地评价人物，而我们却不能。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限定在一定的框框之内，格式化、模式化，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比如袁世凯，有人就说“他一天也没好过”。^①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政坛上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其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着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认为主要应将其放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地考察，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功过。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就给以肯定，而不管其动机、手段如何。反之，逆历史潮流而动，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灾难的，我们就骂，给以严厉地谴责。如上述袁世凯练新军、变军制，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军队从此走上近代化道路；他参加维新运动，大力推行新政，短短几年取得那么多的成就，将直隶治理成为中国的模范省；武昌起义后，他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和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得以在中国实现；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使民族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些，都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中国社

^① 李新：《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

会的进步，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而在辛亥革命后，他违背国民的心理和意愿，不但拒不与革命党人合作，且残杀功臣，破坏、摧残民主制度，确立起军阀专制独裁统治。特别是他利令智昏，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做洪宪皇帝，与中国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场大的灾难，遭国人痛骂，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这就是我们对袁世凯的基本评价。最后，让我们用郭沫若先生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段精彩论述，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①

^① 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3卷，第486页。

袁世凯简论

——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作用

徐松荣

(广东社会科学院)

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从封建专制过渡到民主共和的重要时期，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各种人物都摆脱不了这种历史局限性。袁世凯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他个人的身份与素质，决定了他成不了拿破仑，更成不了华盛顿，最后走向专制独裁，导演洪宪帝制而身败名裂，成为可悲的人物。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在清末的新政改革中，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于此，作以简论。

一、清末革新派的代表人物

袁世凯出身于官宦世家，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封建专制制度的训练，后者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可他又没有被传统文化所羁绊，自少“不喜章句之学”，不走科举正途博取功名。年轻时出国，接受了新事务、新思想，所以他进入政坛后与新派结缘，关系十分密切。袁世凯从小雄心勃勃，“夜究兵书”、“喜御悍马”，与强者争胜。他既借助祖父辈的荫庇，又相信有军则有权的道理，走上乱世投军的道路。经过几番拼打，他成了强者，奠定了他后来驰骋政坛、叱咤风云的政治基础。

袁世凯起家，始于投军入朝。1881年（光绪七年），他赴山东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次年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因“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初显才干，得到上司吴长庆及李鸿章的赏识，随后执掌驻朝清军营务处。他坚定地支持韩王为首的革新派，阻止大君院保守势力发动叛乱，又协助韩王组建训练新军，平定亲日派叛乱，显示开明趋新的思想意识。1885年（光绪十一年），袁世凯出任驻朝通商与交涉事务监督，后改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委员，直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期间奉调回国。二次出任朝鲜，长达十余年，接纳了新知识新观念，历练了见识与能力。

回国后，袁世凯跻身于维新改革的行列，成为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初时，留京撰写兵书十二卷，又连连上书倡导仿西洋练兵，改革军事。时值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遂得时宜。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被奏留直隶编练新军。他对军队的招募、编制、训练、纪律、教育、军官选拔及装备后勤等，先后仿德国、日本制度。从保定到天津，历时十年，编练了北洋陆军六镇，共七万人。同时主持建立了多所军事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型军事人才。创建新军，开办军校，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运动，是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军制改革、军队近代化的开始，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袁世凯的开创之功不可否定。北洋新军既是清朝统治的支柱，也成了袁世凯的政治资本，由此他成为清末政局走向的关键人物。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袁世凯任直隶按察使，专任练兵，得到光绪皇帝的嘉奖，称其所练新军“为中国自强关键”。^①同时，多次奏请改革军事、科举和发展工商，支持维新变法，并参加强学会，捐款助会。戊戌政变时，他虽有“告密”的不光彩举动，但属于权力之争。

^①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二九，第1页。

戊戌政变后，袁世凯继续督练新军。次年升任山东巡抚，既残酷镇压义和团，又整顿海防，防备列强入侵山东，参与“东南互保”，既稳定了清廷在山东的统治，也扩大了他的影响。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变法”，推行“新政”，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兼练兵处会办，开始进入清廷的权力中心。袁世凯利用其地位和职权，大力主办新政，除督练新军，在警政、实业、教育、官制、宪政改革等五个方面，业绩辉煌。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即警察部队），取代天津驻军，维持城市治安，是为清朝警政之始。又先后在保定、天津设立警察局，开办警察学堂，各县设立巡警传习所。

袁世凯是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清末推行新政期间，他主持或委派周学熙等人创办了大批实业。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办天津银元局，后开办天津官银号，又代户部经营户部银行，活跃了资金市场，并为北洋集团开辟了财源。次年，开办直隶工艺总局，再开办有工艺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劝业铁工厂、纸厂、种植园、工商研究所等机构。扶持奖励官绅兴办实业，引进机器、技术、人才。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开办启新洋灰公司，次年成立滦州矿务（煤矿）公司，均为全国大型民族工业企业。此外，从比利时人手中收回临城煤矿。交通方面，取得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经营权，获得关内外铁路督办督修权，如著名的京张铁路。农业方面，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农事实验场、农业学堂，各县设立农务会，引进西方农务农学器艺。为发展机器工业和市政建设，引进机械设备、知识技艺、管理方法，并仿天津租界设立“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

袁世凯是清末教育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戊戌时期，他即主张改革科举，兴办学堂。新政推行期间，袁世凯多次奏请废科举兴

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领衔奏请立停科举，起了重要作用，随后清廷下令废除科举，推广学堂。袁世凯在直隶境兴办学堂，成绩很大。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除了军事学堂，全省开办有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各一所，初等农工学堂及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初级、女子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共九十一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初等小学堂共四千三百四十二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另有电报学堂、图算学堂等，凡见册报入学人数达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①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直隶全省有专门学堂十二所，实业学堂二十所，优师三所，初师九十所，师范传习所五处，中学堂三十所，小学堂七千三百九十一所，女子学堂一百二十一所，蒙养院二所，共计八千七百二十三所，学生共计十六万四千余人，居全国第二位，学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银元，居全国首位。^②

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领域开创的业绩，树立起维新改革家的形象，成为实力派和新派的领袖人物。他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集中在实行宪政、改革官制、地方自治三个方面。

袁世凯主张立宪十分坚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前后初步提出立宪，推行宪政改革。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对是否“仿行宪政”开展了激烈的争论。袁世凯的态度明朗坚决，表示“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当以死力争”。^③他进京讨论宪政，接连四次觐见慈禧，极力鼓吹立宪。在他与五大臣、奕劻、张之洞、张百熙等众多大臣的支持下，清廷终于颁布了“预备

① 台湾故宫博物馆编：《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版，第2224页。

② 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另见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下卷，传，“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6—397页。

③ 《齐东野语》，《盛宣怀档案史料选辑》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9页。

立宪”的诏旨。袁世凯立即成立了宪法研究所，编辑《立宪纲要》。1907年后，全国立宪运动进入高潮。袁世凯奏请“赶紧实行立宪”，并与立宪派建立政治同盟，成为立宪派的头面人物。

对于官制改革，袁世凯最为积极。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他借“仿行宪政”，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主张。参与编纂官制，力主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虽遭到顽固保守派、皇族势力的反对抵制，但他凭借实力和新派人物的支持，立场坚定。到宣统年间，官制改制初见结果。

袁世凯大力推行地方自治。他认为“地方自治为我国创办之事，非先以预备，则不能实行”，^①“地方制度，必先乎立宪政治而兴”。^②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袁世凯派天津知府拟订自治章程，成立自治局和议事会，试办天津地方自治。次年，正式举行天津地方选举，成立天津议会，是为中国破天荒之举，开了民主选举之先河。随后，他下令全省各州县推行地方选举、自治三年完成。天津、直隶的自治选举运动，迎合和推动了民主潮流，也突现了袁世凯的政治思想主张，奠定了他后来接受共和、成立民国的政治思想基础。

清末十余年间，袁世凯锐意改革，大力推行新政，使他成为革新派的首领，并逐步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客官僚。袁世凯博得中外各界人士的赞誉和拥戴，并不是偶然的。连孙中山也认为袁世凯“是个能干的人”，“他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确一直献于他对于革新的信念”。^③袁世凯在辛亥时赞同和接受共和，也不是偶然的。其业绩与影响，奠定了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政治、社会基础。

① 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0页。

② 《袁世凯奏折专辑》，第1520页。

③ 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下卷，传，“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页。

二、政坛要角及与清廷的激烈冲突

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集团是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是清朝统治危机不断加深、清朝统治集团演变的产物，是继曾国藩湘系集团、李鸿章淮系集团，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汉族军阀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冲突激烈，展现了新特色。

袁世凯始终以革新派的形象出现，迎合时代潮流，争取中外各种新势力的支持，又极力迎合清朝皇族要角、亲贵及最高统治者的旨意，通过玩弄权术和诡诈手段，抓住政权的核心问题军权，插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网罗各种文武人才，以出类拔萃的才干和业绩博得世人的瞩目、社会的肯定，并利用“老成凋谢”、新人补缺的机会，逐步爬上高位，从而进入清朝权力中枢。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袁世凯从三品浙江温处道、直隶按察使升任山东巡抚，成为重地疆臣。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廷重臣。此后又兼任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政务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等职。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再迁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直至辛亥年（1911年，宣统三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是为清末政坛的明星、要角，炙手可热的人物。

袁世凯在其权势不断壮大、膨胀的时候，伴随并卷进新旧斗争、权力争夺、由来已久的满汉民族矛盾，他与清廷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从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事变、乙巳立宪、丁未政潮，到戊申罢逐、辛亥逼宫，袁世凯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物。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开始卷入清廷的权力之争，其“告密”行为（是否引发政变，这里不作讨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留下恶名。

但这只是权力争斗的产物，不能否定他的维新思想。正因为他在维新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康梁维新派才对他寄予厚望，光绪帝才对他予以重托。“告密”虽然获得慈禧、荣禄的重用，但并没有解除他们的疑虑和猜忌。

己亥建储与庚子事变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统治集团的尖锐冲突。己亥建储发生时，袁世凯没有直接卷入漩涡。但他鄙视封建顽固派大阿哥党，站在刘坤一、张之洞等疆臣一边，反对立储并在后来第一个提出惩凶方案。义和团运动爆发，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软硬兼施，剿抚兼用，扑灭了山东义和团运动。他对外明确表示，“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取一致坚定立场，维护和平”，^①实际上是对清廷宣布“独立”。并配合默契，主剿反战，不奉宣战“矫诏”，参与东南各省的“中外互保”。在这场争斗中，封建顽固势力大阿哥党失败覆灭。袁世凯在两大事件中的处断和作为，赢得朝野中外的赞誉和倚重。外国列强誉他为“明达督抚”、^②“天生领袖”，^③外商吹捧他，“中原人物，袁某其首也”。^④因在两宫蒙难时，袁世凯敢于任事，表示忠诚，极力为慈禧、荣禄开脱罪责，赢得了重用。因阻止八国联军入鲁，使山东得以和平安宁，深得地方实力派的吹捧和推重，张之洞实意推荐他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⑤盛宣怀等寄望于他，“北门锁钥，微公莫属”。^⑥袁世凯如愿以偿，步入清廷权力中心。

乙巳立宪发生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时载泽等五大臣出国

① 《英国蓝皮书》1901年，中国第1号。

② 《徐抚辰档案》00075号。

③ 《山东教案史料》，第403页。

④ 斯福：《保华全书》第3章。

⑤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四，电牍五十三，第29—30页。

⑥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十六，第27页。

考察政治回国后连上奏折请求立宪，但遭到军机大臣铁良、荣庆和大学士孙家鼐等顽固诸臣的反对阻挠，一时间，“泽、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①袁世凯挺身而出，利用进京参加立宪讨论和慈禧征询意见的机会，鼓吹、力争立宪，甚至弹劾军机大臣铁良，“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②当时双方斗争激烈，京师空气相当紧张，“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③慈禧碍于袁世凯等地方实力派，权衡利害得失，终于同意立宪，又迁就反对派，发布的是“预备立宪”诏旨。立宪之争，显示了袁世凯的激进革新主张，亦非等闲之辈，也加深了他与皇族、守旧重臣的矛盾，引起他们的敌意，也引起慈禧的猜忌和防范。

丁未政潮发生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源于立宪之争，而始于官制改革。考宪大臣端方、戴鸿慈奏请立宪时，提出改定全国官制八条，第一条就是撤销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这一削弱皇权之举措，即刻引发争议。守旧军机大臣瞿鸿禛、铁良及胡思敬、赵炳麟等再次反对，鼓动慈禧否定责任内阁制。袁世凯及奕劻等则坚决支持。这样，双方展开激烈的争斗与倾轧。时任两广总督、并非守旧的岑春煊，因与奕、袁、端等有矛盾，加入到反对派行列，亲贵老臣、立宪派都卷入这场政争，是即有名的“丁未政潮”。结局虽是慈禧宠信的两员大臣岑春煊、瞿鸿禛先后免职，袁世凯权势更大，但是清廷权贵对袁世凯的嫉恨更深。慈禧也决不容忍袁世凯的势力坐大，随即采取明升暗降、架空的办法，将他内调军机处，叫做“明示优崇，隐收兵柄”。同时将载沣、张之洞调入军机处，让他们牵制袁世凯及奕劻。

① 《东方杂志》1906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

② 《齐东野语》，《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一，第26—27页。

③ 同上，第29页。

这样，暂时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戊申罢逐，发生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是袁世凯与亲贵集团激烈冲突的结果，袁世凯失势。是时，光绪、慈禧先后死去，载沣摄政，对袁世凯嫉恨很深，久欲去之。于是联络载洵、善耆、载涛等，对奕劻、袁世凯发动攻击。善耆欲行康熙诛鳌拜事，置袁世凯于死地，但载沣顾忌袁世凯的势力，不敢贸然行动，只好以“足疾”为名，将他“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但是，以载沣为首的亲贵集团统治乏术，一味保守，拒绝改革，推行集权政策，最后失去人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可以说，他们拒绝改革，镇压立宪运动，把立宪派推向革命阵营，他们罢逐袁世凯，也就把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推向对立面。

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不断加深，冲突越演越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也就决定了他在革命高潮到来时的政治倾向和采取的行动。只要革命党一造反，立宪派一倒戈，袁世凯及北洋集团决不会陪葬清王朝，势必成为清朝政权中转移、取代清朝统治的主要力量。

三、辛亥革命高潮中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迎来了辛亥革命高潮，十四省先后独立，形势急转而下。其时，清朝统治集团惊恐万状，分崩离析；革命军、民军四处起义，烽火连天；立宪派倒戈，放弃清廷，倾向共和；汉族官僚或参与地方独立，或作壁上观；边疆部分少数民族头目乘机闹“独立”，实为分裂；外国列强口称“中立”，实则虎视眈眈。谁能收拾这一局面？革命力量弱小，难当重任，“非袁莫属”，已成天下共识，历史选择了袁世凯。历史必须前进，清朝必然倒台，这是大势所趋。袁世凯顺应了大势，赞成推翻清朝，实行共和，虽是勉强的、被迫的、有条件的，但他没有拼死抗拒。于是，袁世凯在国体变更、政权转移

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由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客观方面，史学界论述较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朝统治集团空前孤立，无力应对局面，挽救危局。支撑清朝的军事力量——新军，南方的或起义或倒戈，北洋的听命于袁世凯，指挥不了。秉政的载沣、隆裕太后及亲贵无能无术，无力回天，四顾茫茫，只好起用昔日政敌袁世凯。结果是政局更加险恶，倾覆更加迅速。

第二，外国列强的态度和选择，加速了革命党人的挫败，增强了袁世凯的势力。列强初时宣布中立，但他们要维护在华的经济、政治利益，保障在华外籍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混乱局面，便迅速作出了选择。他们选择了强人、实力派袁世凯，希望他出来收拾残局，建立稳固统一的新政权。他们唱起了“非袁莫属”，“非袁不可收拾局面”的论调。英国表示，“承认袁世凯为使中国得有一个稳定的政府的唯一希望”；美国“尤盼在袁世凯支持下建立一巩固政府，而袁世凯为最适当人选”。^①对于建立共和政府各国态度不一，但这是主流，而支持袁世凯是基本一致的。革命党人也看到，列强“助楚则楚兴，助汉则汉王”。^②

第三，立宪派、旧官僚、地方政权倾向、支持袁世凯，助长了他的声势和力量。立宪派是辛亥前夕国内影响最大的政治派别，有着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他们被清朝抛弃，虽赞成共和，又不愿附从革命党人，于是成为袁世凯的支持者和重要政治力量。武昌起义前，立宪派首领张謇即拜访了息影彰德的袁世凯，表明支持他重新出山的意愿，之后，又公开表示“拥袁”。旧官僚更愿意接受，也寄希望于袁

① 朱文原：《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台湾正中书局，第85、95、109页。

② 《民主报》1911年12月23日。

世凯。如黎元洪等是被革命“请”出来的官僚、军人，欲借助袁世凯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黎元洪明确表示不能同意清廷的君主立宪，希望袁世凯出来赞助共和，并支持他出任民国总统。^①地方政权已独立光复的多由立宪派、旧官僚掌权，未独立反正的由汉族旧官僚把持，他们是袁世凯宏大的政治基础。

第四，革命党分裂，革命力量弱小，革命党人无力担当全国领袖的重任，时局危机迫使他们妥协让步，而只要达到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目的。同盟会不是一个信念坚定、团结统一的党。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只主张推翻清朝，虽能接受民权主义建立民国，终究分道扬镳了。在他们看来，谁能推翻清朝，并能稳定政局和社会秩序，就支持谁上台。时局危机、力量弱小迫使革命党人把推翻清朝当作首要目标，民国新政权能否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求其次。孙中山表示，无论黎、袁谁当总统，“随宜推是，但求早定国基”。^②即使在做了临时大总统后，也一再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将“虚位以待”袁世凯。^③黄兴等担心重蹈太平天国覆辙，于是鼓励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④宋教仁、陈其美、汪精卫等均对袁世凯抱有期望。革命党人如此，袁世凯也就众望所归，成为推翻清朝的关键人物，担任民国总统的首选人物。

主观方面，袁世凯是否愿意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能否担当起这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28页。

③ 《孙中山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29页。

④ 《黄兴致袁世凯书》上册，《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一历史重任？如前所述，袁世凯是清末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政治倾向是激进的，大势所趋，他能够暂时接受建立共和民国的主张。袁世凯与清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加速了他的离心倾向，尤其是戊申罢逐，增强了他的反叛心理。他更看到满汉民族矛盾由来已久，汉族光复的呼声十分强烈，清廷贵族集团空前孤立，推翻清朝即是盖世之功，又是举手之劳。在动乱和危局之中，实力起着决定作用。袁世凯经营北洋数十年，建立起雄视全国的北洋新军，又凭借新政、立宪运动中造成的业绩与影响，加上拥有雄厚的政治、社会基础，环顾天下，其势力压倒所有各派，只有他能够保住清朝，也能够推翻清朝。袁世凯选择了后者。辛亥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为袁世凯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他也通过各种途径表明心迹和政治倾向，并迅速制定了行动纲领和策略方针，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武昌起义前夕（1911年6月），立宪派首领、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在洞察了政治形势和政局走向之后，为了加强同袁世凯的政治合作，专程赴河南彰德拜访袁世凯。张謇在言谈中试探性指出，清廷必将倾覆，如果袁世凯以推翻清廷、实行共和为目的，必可得到各省议会的普遍支持。袁世凯当即作出反应，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民意而行”。^①并要求张謇“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②武昌起义后，张謇与袁世凯“函电交驰，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持落日，要来扶起朝阳”。^③

武昌起义后，作为“洄上钓徒”的袁世凯凭借实力和影响，确定

①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91—193页。

② 刘厚生：《张謇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5页。

③ 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辑，第41页。

了“慢慢走，等等看”，对清廷、革命党又利用又“两面开弓”的行动方针。清廷请袁世凯出山，他以“足疾未愈”拒绝，目的就是胁迫清廷交出大权。同时授意冯国璋不要急于进攻，意在保留革命党对付清廷。另外，袁世凯神秘地派遣亲信密访美国驻京使馆，既摸底，又透露袁世凯的“抱负”：“袁世凯会来的（指出山），但以后我们将有一个共和国，他是这个共和国的总统。”^①言下之意，袁世凯赞成共和，但他要当共和国总统。袁世凯又派长子袁克定向英国大使朱尔典试探英国的态度，也表示“赞成共和”，但要推他为总统。^②初时英、美等国还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推翻清朝，成立民国，却摸清了袁世凯的政治意向。袁世凯亦没有公开表示赞成共和，但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确。

与此同时，袁世凯设法与革命党人拉拢关系，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先派长子袁克定结好刚出狱的汪精卫，并通过汪精卫写信到武昌，表明自己不是效忠清朝的人，只要革命党举他为总统，他愿意与革命党一致行动。^③当皇族载泽、溥伟、良弼等激烈反对重用袁世凯，斥骂他“私通革命”时，袁世凯立即授意汪精卫派革命青年彭家珍炸死贵族少壮派首领良弼，给了皇族一个下马威，起了震慑作用。袁还通过唐绍仪、张謇、黎元洪等结好革命党领袖人物，函电往还等各种活动十分频繁。

南北议和开始后，袁世凯即派最知道他心迹、底细的心腹唐绍仪代表北方参加谈判。既交待谈判底线，如君宪通不过，即赞同共和，又授意唐绍仪多与张謇协商，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尽快达成“和平解

① 卫理：《中国之今昔》，第564页。转引自夏良才：《袁世凯谋取共和国总统的最初一次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第271页。

② 同上，第272页。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577页。

决”的协议。唐绍仪心知肚明，在谈判桌上很快妥协，还支持共和主张，并保证取得袁世凯的合作。正如美国记者欧勒所说的，“南方党人之间普遍存在分歧，只有极少数领袖人物心里相信他们的共和理想”；“不过唐绍仪是倾向共和政体的”，在秘密开会时，唐绍仪“还向他们保证袁那边一定给予合作，这打开了他们的眼界”。^①唐绍仪在谈判会议上亦表示，“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意向”；“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②孙中山在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信中也说过：“当选总统袁世凯革命伊始即明确表示拥护共和纲领。他与南京政府之间函件来往的目的，仅为了使事态取得和平解决。此事曾有意不为外界所知晓，目前可以公之于众，盖因南北之间以融合为和谐之总体者也。”^③孙中山一再公开表示，只要袁世凯反正，就“转敌为友”，“以功以能，首推袁氏”。^④总而言之，袁世凯不赞成革命，但赞成共和，同意推翻清朝，于是，唐绍仪谈判的基调是拥袁共和，和平解决。革命党人以孙中山、黄兴为首唯恐清朝不倒，重蹈太平天国覆辙，于是他们争的是共和政体，而非总统席位，争取袁世凯反正，而非把他推向清朝。他们顾全大局，最终避免了事态恶化，也达到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目的。

既然袁世凯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国内立宪派、旧官僚甚至部分革命党人的支持，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取清室而代之？除了他有比较激进的政治倾向，激荡的共和潮流迫使他谨慎行事外，也另有隐忧。正如徐世昌所说，袁世凯世受国恩，他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诟病；旧臣尚多，且具相当实力，

①③ 《艾·爱·贺璧理来函》，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960页。

② 《第二次会议录》，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9—16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23页。

未必全力支持他；北洋旧部实权者，未能完全掌握他们的意向，不可贸然行事；北洋军控制的不过北方半壁，对南方尚需用兵，胜利没有把握；南方的民气发展程度看不透，不敢轻率发动战争。于是他要借助共和革命，威迫清帝退位，又借助南京临时参议院的选举，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职位。与此同时，他也利用清廷和北洋军压迫革命党人屈从就范，又让北洋军压迫清廷让权、退位。这就是袁世凯“左右开弓，两面夹击”的策略和手段。袁世凯夺权，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和手段如何，从客观效果方面说，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还是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四、袁世凯的作用评价

评价袁世凯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作用，必须联系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袁世凯本人的政治倾向、态度和活动。推翻腐败的清王朝，是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的首要目标，也得到袁世凯的认可和参与。固然没有革命浪潮的冲击，清王朝不会倒台，袁世凯可能永远息影政坛，不会有发挥作用的机会。但如果不是袁世凯及其北洋新军纵横捭阖，要清朝交出政权也不会这么容易。袁世凯及其部属顺应时代潮流，借助革命大势，采取“逼宫”的行动，才使清廷顺利让了位。如果袁世凯死保清朝，则是另一种结局，甚至重蹈太平天国覆辙。革命党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并付出极大的代价去争取袁氏反正，投入反清阵营。纵观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推翻封建王朝，并夺取政权，无不借助各种力量，无不需要暂时妥协，无不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历时数十年，甚至近百年。要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打倒有着二百六十余年根基的清朝，必须经过

多次革命，必须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革命党正是争取和利用袁世凯实力派，才顺利达到推翻清朝，完成“第一次革命”的目的。

实行共和，建立民国，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也得到初步实现。这与袁世凯赞同和接受共和（哪怕是暂时的），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袁世凯没有利用革命取清朝而代之，建立袁氏王朝，而同意建立共和民国呢？虽然袁世凯的顾忌很多，但他最终还是顺应潮流，采取相应行动，就具有积极意义，值得肯定。至于他后来走向独裁帝制，必须否定，但那是另一回事。袁世凯由此成为“二次革命”的对象，以悲剧终结，是咎由自取。

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袁世凯以实际行动认同、支持推翻清朝，赞同、接受共和，是进步的表现。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他来说，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附从革命党人，参与打倒清朝，建立民国，并要冲破封建纲常、封建正统思想的精神桎梏，甘冒叛臣贼子的罪名，本是难能可贵的，也值得肯定。

初建时的中华民国总统应该由谁出任？从革命的立场出发，从政治威望方面说，非孙中山莫属。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尤其在一个封建半封建的国度里谁当总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除了政治威望，实力和政治、社会基础起了重要作用，还在于他能否稳定政局和社会秩序，能否实现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惟有政治、军事强人方可问鼎总统职位。辛亥革命后，全国出现大混乱局面。各省向清廷独立，又各自为政，甚至独立背离革命。党派林立，政团形形色色，同盟会也处于分裂状态。清朝旧势力疯狂抵制革命，不断反扑。边疆一些少数民族部分头目闹分裂，日、俄、英等国侵略势力对东北、蒙古、西藏虎视眈眈，策动分离，或准备出兵占领。仅仅以“革命”二字能否解决这一切问题？回答是否定的。谁能收拾这一局面？革命党人深感力量不足，于是不

借代价请出袁世凯（武昌起义后建立湖北军政府请出黎元洪，不少省份成立军政府请出的或是新军统领，或是立宪派头目，或是旧官僚）。千千万万民众不懂宪政和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还不被广大民众，尤其是从旧时代过来的农民和官绅所理解和接受，对于民国，对于孙中山还是陌生的，或者敬而远之。从袁世凯方面说，最具实力，是一个政治、军事强人，政治威望虽不及孙中山、黄兴等，但他自清末树立起新派人物形象，影响很大。政治、社会基础更为广泛深厚，除了北洋派、北洋新军，各省新军大多支持他，立宪派、旧官僚、地方官绅支持他，外国列强大多支持他，连清廷也有他的人。就是昔日政敌梁启超维新派，也认为袁世凯“有支撑全局之能力”，也提出“和袁”、“拥袁”的方针，主张由袁世凯出面建立“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避免国家动乱和分裂。袁世凯自然成了权威人物、偶像人物，各种力量聚集在他的周围，民国初年的总统桂冠，自然地落到了袁世凯头上，也就并非怪事了。袁世凯集团经过革命的冲荡和洗礼，从支撑清末十余年统治的支柱，转化为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统一政权的代表。袁世凯一死，全国分裂了，可见袁世凯的作用和力量。但袁世凯只能作过渡总统，是过渡时期的人物，这又是由他的思想意识、个人素质及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也是历史证明了的。

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作为清廷的叛逆、革命党的对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一方骂他是“私通革命的奸细”，一方骂他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强盗”，双方都骂他是“窃国大盗”。这合乎情理，可以理解。但在后世的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笔下，对于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功过、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应该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

晚清民初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大多数历史人物都属于过渡型的，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具有进步的、消极的两面性。袁世凯也

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任何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贡献，哪怕是一点、一个方面，也应该肯定。当然，过分的夸大和强调个人的主观作用，而忽视政体力量，忽视客观的社会环境、历史进程，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司马迁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去记述和品评历史人物，这就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顾维钧眼中的袁世凯

张 艳

(浙江大学)

在后人的心目中，袁世凯最遭非议之处有二：一是帝制自为；二是卖国。正因此，袁世凯不仅得有中世纪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①的评价，而且被贴上了“乱世奸雄”、“窃国大盗”、“卖国贼”等多种标签。长期以来，我们心中的袁世凯形象往往被这些主流话语所遮蔽而显得单一和模糊。民初曾在袁世凯身边任职的一批外交官，如顾维钧、颜惠庆等人，与袁世凯都有过直接的接触和交往。这些人，不仅对中国的国情有一定的体认，而且长期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谙熟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之精髓；不仅都是颇有见识之士，而且又非袁氏的门生故旧。如果适当参考他们对袁世凯的亲身观察与评价，也许更能走近一个丰富而真实的袁世凯。所以，他们的日记或回忆录等是我们研究袁世凯时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顾维钧的回忆录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

顾维钧 1888 年出生于上海，1905 年远涉重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国际外交。1912 年二十四岁时，自美国留学归来，

^①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饮冰室合集》第 4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8—19 页。

任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及国务总理唐绍仪的英文秘书，开始接触外交事务。一年多后，升任外交部参事，同时兼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此后一直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重要人物。顾氏晚年在美国写下一部巨幅回忆录，译成中文约有五百万字，记载了从民初之后五十年间中国的重大外交事件。其中中译本第1册较多地回忆了他当年与袁世凯共事的经历和对袁氏的观察与评价。其内容大体上可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顾维钧描写了对袁世凯的总体印象。

顾维钧第一次见袁世凯，对他的感觉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面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①这一印象与辛亥革命后任外务部左丞、后又任民初唐绍仪内阁外交部次长的颜惠庆对袁世凯的描述不谋而合。颜氏在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自传中说，袁世凯“主政有方、处事果断”，在朝中享有“不一般的威望”，^②他“身材不高，但长得较粗壮，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果断、精力充沛的人”。^③

接着，顾氏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袁氏的总体看法：“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旅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

② 颜惠庆著、吴建雍等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以下简称“颜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

③ 颜书，第95页。

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第90页）

其次，顾氏披露了民初的一些政治内幕。

关于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友情与分歧，目前已有学者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①，但对二人关系破裂的政治影响似乎还挖掘不够。顾氏作为一个亲历者，不仅见证了民初袁唐由“称兄道弟，颇为亲热”，到在直隶都督的任命上产生尖锐冲突的整个过程，还进一步分析了唐氏辞职对民初政局的深远影响，指出，“唐的辞职当然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胜利。国会在曾任唐内阁农商总长的宋教仁领导下继续发挥其影响，但唐的辞职在国民党和以袁世凯总统为首的北洋系之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鸿沟。这一破裂乃是宋教仁被暗杀、不幸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一破裂也导致了袁世凯总统所谓的国会造反。国会终于被解散，内战又起。整个这一段情节清楚地表明，袁世凯总统对国会缺乏信心，对国民党在北方的目的一直存在疑虑”。（第375页）这一分析无疑是颇有见地的。

另外，顾氏还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袁世凯执政期间总统府与国会、内阁等三权之间的权力冲突，对我们研究袁世凯与民初政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再次，顾氏揭示了袁世凯对民主共和的认知水平，并分析了中国在1912—1928年间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这一部分内容是回忆录第1册着力较多的地方。

据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在1912年秋曾问他“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共和的含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通过这次谈话，顾氏作出的判断是：“袁

^① 张华腾：《袁世凯与唐绍仪关系述论》，《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

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第93页）袁世凯对中国老百姓“是否能有足够的一心为公精神来建成真正的民国很感怀疑”，他对于民主的内容则是“一无所知的”。（第367页）从这些判断中我们至少能获得三个信息：一是袁氏对民主共和是一无所知的；二是他对在中国能否实行民主共和是怀疑的；三是他主观上没有实行民主的要求。从袁氏的这种心理状态和认识水平来看，他开历史倒车走专制之路是必然的。

不可否认，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追求革命与民主的一个成果，但这一成果无论从它的内在构成，还是从它根植的社会土壤来看，都是很稚嫩的，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并没有真正改观。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体认，顾氏并没有把考察的重点仅仅放在袁世凯本人身上，他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时代根源的分析上，也即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当时民众群体的民主素质。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顾氏指出，中国没有根深蒂固的代议政治传统是1912—1928年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说，“就民主制度或代议政治而言，在中国是没有传统的，而传统在中国却至关重要”。孔孟的教导“民为邦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只是箴言、理论，从未完全实施过。中国“并没有代议政治的实践。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任何人民团体都很难正常地通过制度来施加其影响”。另一方面，虽然在中国农村“有着一定的民主精神，地方上修桥补路、慈善事业都在士绅领导下由百姓来办理，但其效果仅仅是地方性的，并没有我们看到的北美城镇会议中美国式民主的基础”。（第365—366页）

不少学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认为，从儒家民本传统中能够开掘出

现代民主政治新局面来。然而，封建时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概言之，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只是儒家知识分子借助于弘扬天道希冀能对皇权专制有所制约，而并非从根本上取消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因此，民本思想始终将立论的落脚点放在体察民情的好皇帝和清官身上，却未见对封建君主制度与官僚体制发出根本质疑。它与近代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观念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名为民本、实则君本的民本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它至少不是人民对自身权利的确认与追求，只是君主的术治符号。所以，顾氏所说的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

对于民众素质，顾氏说，袁世凯的思想状况“可以代表当时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仅有的例外也不过是几个曾在外国学习、旅行和看过民主在西方如何实行的少数知识分子”。（第367页）他还具体指出了当时国人缺乏法治观念和不能正确理解言论自由原则等种种现象。应该说，顾氏对当时民众民主素质的估计并不夸张。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就曾感叹地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①

在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文化土壤中，复辟帝制就具有了强大的外在动力。袁世凯与帝制派正是因为自身与民众的民主意识和革新观念的极端脆弱而得以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纵横捭阖。诚如颜惠庆所说，“人们不应忘记，他（指袁世凯——引者）完全是一个出自旧中国历史背景、并且受其支配的人，况且，聚集在他周围的是一群专事谄媚的食客。他恢复帝制，当起了封建王朝的皇帝，成为历史的罪人，对于这些愚蠢的妄为，那些食客应该说难辞其咎”。^②这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4页。

② 颜书，第98—99页。

也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①

尚需提及的是，顾氏还谈到了袁世凯在帝制运动期间对舆论和外交的错误估计。他说，在帝制运动期间，唯一刊登人们反对意见的报纸是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袁世凯怀疑中国报纸不可信，一向多依靠《顺天时报》。不过帝制运动的首领们竟在有不利的评价时，精心复制新版，以拥护帝制的假报道替换。因此，当袁世凯想了解舆论如何看待恢复帝制，尤其是日本舆论如何时，他看到《顺天时报》表示赞同，即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第392页）^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为野心驱使的袁世凯误以为舆论与外交支持帝制实际上也成了他推行帝制的一个原因。

最后，顾维钧对袁世凯的外交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顾维钧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其大部分工作都与外交有关，所以他得以观察袁世凯处理外交问题的态度与方法。顾氏在书中回忆了中国因西藏问题与英国的谈判、因外蒙古问题与俄国的谈判、关于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与日本的谈判的过程。他从袁世凯对这些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中得出对袁世凯办外交的看法：

第一，袁氏极为重视外交工作。顾维钧认为，从对外交关系所表示的关心程度和对中国驻外使节的观点所给予的重视的程度来看，袁世凯都与民国其他总统不同，他本人极其关注外交事务。

第二，袁氏处理外交事务很有经验。顾氏说，袁世凯对人对事有数十年的经验，担任直隶总督以及以后当政务处政务大臣时，除了握

^①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② 顾惠庆在自传中对此事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见顾书，第380页。

有军权以外，还插手外交事务，所以他“虽然没出过洋，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一个外国字也不识，他还是知道怎样对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第110页）他还指出，“在民国的各位元首中，袁世凯可谓是例外，此人对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不论是有关帝俄对外蒙的要求，或因西藏涉及与大不列颠的关系，或是关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第390页）

第三，袁世凯是个“爱国者”。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他认为，“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第392页）他“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第121页）顾氏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第367页）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不仅是卖国的，而且其卖国是为推行帝制服务的。而顾维钧作为一个既有实践经验，又有较为系统的外交理论和国际法知识的外交官，不但不这样认为，反而说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颇值得人们深思。

以上简单梳理了顾氏在回忆录中涉及袁世凯的内容，着重考察了他对袁世凯的亲身观察，并从顾氏晚年作为一个外交家的视角来认知和评价袁世凯的帝制行为与外交工作。应当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外交折冲和政治风雨，顾氏晚年所持态度是冷静的。比较梁启超当年发动护国战争时所写的政论文章《袁世凯之解剖》，可知二者的心态迥然相异。对袁世凯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启超，怀抱的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他所列举的袁氏“识想性格”方面的七大缺点，包括缺乏现代国

家观念；骄傲自大，不能容人；以经验治国，凡事临时对付；法律观念薄弱；专制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揽诸己，过推诸人，万事不负责任等等，出于政治煽动与宣传的需要而显得绝对化。他的文章强调的是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把专制的责任由袁氏个人承担。比较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可以看出，顾维钧对袁氏称帝的历史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他的评说尽管不能让我们据以否认袁世凯存在着极大的个人私欲，或为他的这种私欲辩护，也不能使我们对民初袁世凯的思想行为有全面的认识，但顾氏更能把袁置于中国的社会背景中，考虑较多的是其所受的时代和国情的局限，这至少可补充或加深我们的认识。他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认识袁世凯，而应同时关注袁氏帝制行为的时代根源，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集团、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拓宽思维空间，通过层层解剖，认真清理袁氏内心深处的真实理路，透视袁氏思想与行为的真貌。

近代民主思想并非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面临着多重困境，诸如与中国文化传统本质上相冲突，与民众素质相脱离，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民族救亡的紧迫局势也有相抵牾之处。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文化传统、民众素质与时代条件对政治人物所起到的难以逾越的制约作用。这些困境，凝聚着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时代矛盾和文化冲突，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往说到袁世凯称帝，往往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野心，此说尽管不无道理，但却显得笼统与武断。笔者在此无意为袁世凯的过错辩解，只是希望从顾维钧的体认中得到一些启示，以俟更多的学者从学理上来探讨造成袁氏过错的更深层的原因。顾氏晚年对袁氏行为与思想的阐释无疑引发我们对有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例如就理论层面而言，袁世凯本人对民主政治的自身认同究竟如何？广大民众的民主素养又是怎样？就实践层面而言，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

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都有哪些？其有利条件可否转化为现实条件？能否离开创建民族国家的话题来谈近代中国的民主？这些是看待袁世凯帝制行为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回眸二十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民主政治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目标。今天，在距袁世凯时代近一个世纪的时空中，我们应该能够更加平静更加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重读顾氏的分析，也许能使我们从前人多一份同情的了解，对中国早期步履蹒跚的民主化进程多一层深刻的认识。

袁世凯与禁毒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

1912年至1916年间为袁世凯主持中央政权时期，袁世凯政府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继续清末发轫的中国第二次禁毒运动，展开自上而下的禁毒，张扬反鸦片的旗帜，对民初之禁毒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以往对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的研究中，忽视了袁世凯个人和内阁的作用，几乎无人顾及袁世凯在该运动中的表现，并给予恰当的评价。本文拟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对袁世凯在禁毒方面的言行作一粗浅的梳理，并给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一、晚清中国烟毒之进一步泛滥

外国鸦片之走私问题由来已久。十八世纪后期，英国为平衡三角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确立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输运鸦片进入中国的垄断权，从此，中国的洋烟走私问题日益加剧。因鸦片问题而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并没有解决洋烟问题，反而日趋严重。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烟以“洋药”之身份合法进入中国，数量飞速增长，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达到创纪录的年入九万担。与此同时，中国各地自产的土烟也逐渐盛行。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清政府的财政已入不敷出，亏欠严重。于

是，政府只能广开财路，增加鸦片税便是其中一途。1896年户部制订《筹款十策》，规定土药行店等必须缴捐^①。三年后，户部在《筹款六策》中又确定洋烟的捐税^②。于是鸦片烟税在税收中的份额日益增加，有一些省份鸦片烟税达到总税收的8%^③。八国联军侵华后，为了偿还“庚子赔款”，户部于1901年再加征土药税三成^④。在清政府以鸦片税收支持萎靡的财政为重要手段的思想支配下，全国土药税额也飞速上升。1900年土药税为一百八十万两银，到1907年增加到九百万两。^⑤鸦片税厘成为“国家收入大宗”^⑥。各级官员之使命便是确保财政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了确保收足鸦片税，并从中捞油水，就必然要鼓励种植罂粟，当时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自然也不例外。

关于直隶省的土药之税，早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已设立稽征土药落地税局，并定下细章十二条：每百斤为银二百五十两，征落地税银二十两。后略有增加，计直隶每年征收税银二万两左右。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继续执行鸦片过境之收税政策。当时“各省之土贩，群起群漏。有设法绕越以避税者，有勾通贡差以包庇者，于是私土颇觉畅销”，^⑦税收不见起色。于是，1903年8月27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五），袁世凯上奏《土药商贩入境漏税续拟增订试办章程折》，提出对进入直隶的土药征税办法四条：第一对外省之土药入境，须查明

①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0页。

②④ 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04页。

③ George Jamieson “Report on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Chinese Empire”, Foreign Office, Miscellaneous Series, No. 415. 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 19, pp. 595—655. 转引自林满红：《晚清的鸦片税，1858—1906》，《思与言》第16卷第5期。

⑤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8249页。

⑥ 同上书，第8106页。

⑦ 天津图书馆等编：《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7页。

后分别征免。第二，派大员在沿边要隘设局稽征。第三，印花粘在烟土上，土用去，印花也必须随之销毁，以杜绝作弊现象。第四，严禁留难需索，以恤商艰。不准故意刁难，并允许商民告发^①。这四条的核心是确保能有效地收到、收足鸦片税，但又要避免给烟商带来过重的税额，而影响鸦片的输入。

1901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到1907年9月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在鸦片问题上并无什么高明的主意。在清政府“寓禁于征”、实际是“只征不禁”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出现鸦片泛滥之局面。不仅洋烟进口剧增，罂粟种植更是不断扩大，阳春三月，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是罂粟花开的景象。袁世凯统治下的直隶，虽非植烟大省，但土烟种植也在扩大之中。据统计，1906年直隶的罂粟种植面积达四十万亩，鸦片产量为一百二十万斤^②，在全国居第十四位。

二、清末袁世凯之禁毒主张

1905年中国吸毒人口已上升到两千万人，超过鸦片战争时的十倍^③。城乡各地，烟馆成为最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更加败坏。马克思曾痛心指出：“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④在帝国栋梁崩

① 天津图书馆等编：《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9—830页。

②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1909. 茶圃：《各省禁烟成绩调查记》，《国风报》第1年第18期。

③ 详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析、民族危亡之关头，一些正直有责任心的官员继承林则徐的遗志，再扬禁烟旗帜，终于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

1906年9月，光绪皇帝发出了十年禁绝烟毒的上谕，指出：“自鸦片烟市弛禁以来，流毒几遍全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①是年10月，《禁烟章程十条》颁布，主要内容有严禁栽种罂粟及阻止洋药进口、严禁官员吸食、预防新吸、戒除烟瘾等。1907年4月，光绪皇帝再颁上谕，下令民政部、步军统领、顺天府、各省将军督抚等“严飭所属，于栽种、贩卖、吸食各项，遵照奏章，切实办理”。“限年将洋土药之害，革除净尽，不许因循欺饰”。^②于是，禁烟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1907年5月19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八），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预筹革除鸦片折》，表示：“欣逢明昭，锐意革除，凡在臣下，何敢不实力奉行，做拯溺救焚之举。”他明确提出“为革除鸦片，应先事预筹，以期实行”。在该奏折中，袁世凯指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原。”^③他分析说：“目前所以观望不前之故，盖有二端。一则与外人未订约也。”所以“土药少销一成，即洋药多销一成”而无法抑制。“一则拨补须筹的款也”，烟税已成财政收入之重要来源。袁世凯认为这两点是“禁烟根本”。针对这两个问题，袁世凯建议，首先须“速与各国尚定期限，妥立专约，使民间晓然大信之必昭，而后限制土药放手办理”。其次，“速筹

① 《上谕》，《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二〇二，第7页。

② 转引自天津图书馆等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9页。

③ 天津图书馆等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9页。

拨补之法，使待用者无后顾之忧，实为釜底抽薪之策”。^①

分析袁世凯提出之两对策，应该说是切中时弊。清末禁毒之所以有所成效，一是三令五申，接连颁布《禁烟查验章程》等，宣示中央政府的决心，并在北京设立戒烟所，严厉惩罚违法吸毒的官吏，告诫各级官吏以身作则。1909年的《禁烟条例》再次强调：“禁烟大臣及京外各衙门长官，务须认真纠察，不得循情避怨。”^②二是1907年与英国订立《禁烟条约》，从而逐渐减少洋烟之进口，对英国承诺的国内严厉禁烟，反过来又成为继续禁烟的动力。三是增加其他税收，弥补烟税取消后的空洞。如1907年推出印花税法，以后又加收盐税等，通过这些筹抵之方而减轻禁烟的后顾之忧。

1907年《申报》报道，近闻直隶京官联名公请都察院代奏，略谓乃自禁烟令下，直隶官场仍视为具文，奉行不力，以致庶商民人等照常吸食，无甚效果。直隶为他省表率，现犹如此，则他省不问可知，倘临期不能禁绝，外人必照约索赔，恐罄全国之财力亦难赔偿。请飭下直督迅仿台湾官膏专卖法招商承办，由官绅监督，庶商民人等知国家决意禁烟，自可渐次式绝，不致受十年之罚云云。此后，直隶的官员与百姓对禁毒较为认真，时时想到“政府与各国驻使订禁烟条约，洋药进口按年递减，内地亦递减种植，如十年后中国不能禁绝，应将洋商损失之利加倍赔偿。关系何等郑重”。^③

根据各省自订的全面禁种罂粟时间表，袁世凯管辖的直隶属于第二批，从1909年下半年起实行。时朝廷查禁较严，为严肃法纪，1910年秋，清廷降旨将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福建、广西、

① 天津图书馆等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0页。

② 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34页。

③ 《申报》1907年7月30日。

云南、新疆等省总督、巡抚交刑部严加议处。直隶非但未遭谴责，还是严禁成功之地。直隶成立禁烟总局，委任一批干练官吏主持各项禁烟事务。“酌拟详细规则，核定凭照、保结式样，首申官吏戒烟之令，责成该管上司分别取结，设所调验，以端表率。各属种烟地亩，售烟铺户，及吸烟军民各项人等，责成该管地方官并巡警员弁，分别给照，认真编查，据实报告。”^①在禁止吸售方面，直隶共设立二百余个戒烟分所，铲除烟馆八百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一千三百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②到清末，直隶禁烟人人以为最有成效，被视为禁烟模范省。

清末禁烟运动遏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毒品日益猖獗的态势，并有效地减少了外国鸦片的进口。平心而论，袁世凯也是这场运动的推动者之一。

三、民初袁世凯之禁毒主张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因新旧嬗递，人心惶促，禁政有所退步。临时总统孙中山即颁布禁烟令，继续推动禁烟运动。3月5日设立全国禁烟公所，然后宣布吸食鸦片者不得为参议员，禁烟运动轰轰烈烈继续展开。

1912年2月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他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实行禁烟政策，袁世凯当政之时，所颁禁烟条令等颇勤。据笔者的统计，仅《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③，其余各种涉

①② 《申报》1909年2月3日。

③ 现所查证的有1912年6月11日、1912年12月25日、1912年12月28日、1913年10月27日、1915年5月12日、1915年7月17日、1915年8月13日。

及禁烟的法令等更多，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鸦片危害，要求全体国民严禁。

袁世凯多次发出呼吁：“禁烟为除害救民之要政”，^①“强国睦邻，为民除毒”。^②指出：“鸦片之害，至为剧烈，损人神志，害人生命，耗人财产，不可纪极。而种烟之处，吸食尤易，竟致老幼男女皆染此习。易嘉禾以蠹贼，视毒品为良剂，驯致谷麦日少，游惰日繁……饿莩满野，顶口减少，市井为墟，竟将召灭国灭种之祸。”^③严令“吸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在袁世凯的严令下，内务部等也不断下发文电，要求各省“恪遵大总统命令，督飭所属积极进行”，在“现当烟苗下种时期，必须预为谕禁”。^④

第二，实施严刑峻法，举行禁烟大会，成立禁烟组织，保证和推动禁烟运动的有效进行。

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即宣布前清法律与民国政体有冲突者外，均暂时使用，这样禁烟的章程法律仍有效用。“所禁种禁运禁吸各办法，前清即定限厉行”。^⑤此后，在临时政府公布的新刑律中，列有鸦片烟罪十条（第20章），宣布“凡现任官吏犯有刑法鸦片烟罪者，除依法惩办外，并免现职”。规定开设烟馆或栽种罂粟者，处以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的罚款；凡制造、贩卖、收藏鸦片烟及吸食者，处以三至五等有期徒刑，并课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吸食鸦片烟者处以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的罚

①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拒毒委员会编：《禁烟条令、政令辑要》，1924年刊行。转引自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0页。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989号，1915年2月8日。

③ 《临时政府公报》第181号，1912年12月29日。

④ 《临时政府公报》第528号，1913年12月18日。

⑤ 《临时政府公报》第239号，1913年1月5日。

金。^①1914年3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督察禁烟处章程》，4月11日颁布《吗啡治罪条例》，5月5日颁布《禁种罂粟条例》。共十一条，宣布今后不得再种罂粟，如有发现各地政府须强行铲除。这一系列的法律出台，保证了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

为协助烟民戒断，各地设立戒烟局，情知烟民入局戒烟。1913年3月，各地代表在北京举行首届全国禁烟大会，袁世凯特派总统代表顾维钧在开幕式上演讲，表示：总统对于全国禁烟之举深为注重，希望会议对中国之禁烟能迅速推进。^②数日后全国禁烟研究会成立，在禁烟研究会第一次会议上，袁世凯又遣派顾维钧致辞指出：“大总统对于此次会议甚为注意，望各代表研究一极善方法，各省一致进行，庶得铲除祸根永脱苦海。”^③1914年，袁世凯在北京建立督察禁烟处，隶属于内务部之警政司，并由警政司司长亲自担任禁烟处长，以主持全国的禁种、禁售、禁运、禁吸事宜。

第三，严禁私种罂粟。

要根治土烟就必须彻底铲除罂粟。1912年6月11日，袁世凯颁布《铲除烟苗令》，指出：“禁烟为除害救民之要政”，“乃闻各省自上年军兴以来，禁令废弛，无知愚民往往贪图近利，偷种烟苗，若不痛予铲除，则毒卉复萌，何以导新机而除旧染”。因此，他要求：“如再有私种鸦片情事，即严饬分列犁拔。凡国民尤宜互相惩戒，毋得干犯禁纲，致貽后悔。”^④数月后又颁令要求：“现在时令正当从前烟苗下种之期，切宜劝令相地所宜，种植他项农产，万勿轻弃工本植兹毒卉。如有违抗者，一经发觉均照律治罪，决

① 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53页。

② 《申报》1913年3月5日。

③ 《申报》1913年3月10日。

④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拒毒委员会辑：《禁烟条约政令辑要》，1924年刊行。

不宽贷。”^①袁世凯多次强调，禁烟“以实行禁种为最要”。^②并指令工商、农林两部“广筹生计，庶几标本并治，根株痛断，厚生正俗”。^③1915年春夏，陕西附近罂粟复现，袁世凯极为愤怒，即令内务部彻查，他指出：“乃风闻陕省地方，仍复栽种土药，官吏竟不过问。如果属实，则吕调元前呈认真查禁示谕搜查等语，岂非捏词粉饰，欺蔽中央？着内务部派员前往切实查勘。倘有阳奉阴违，败坏要政，惟该巡按使是问。”^④同时在实际禁烟中，顾及少数民族之特殊情况，袁世凯曾指令云南当局，对各土司“应以劝谕为入手，不宜过于操切，致酿意外”。^⑤

第四，要求官员以身作则。

袁世凯认为“烟禁甚严，厉行之法，必自上始”。遂要求“各该长官自奉到此次训令以后，应再立饬该管各地方官查照条约，振刷精神，分别严禁，并按月将禁烟实在情形报明外交、内务两部，以资考核”。^⑥“官员故纵者，一并分别重轻按律惩治。”^⑦然而到1914年底，“据访查，近日官吏吸烟者颇不乏人”。于是，袁世凯要求禁烟督察处对官吏进行督察，“凡中央各机关，嗣后无论委任何项人员，均须自具甘结及同僚保结证明向不吸食鸦片字样，呈送禁烟督察处存案”。^⑧这些禁令迫使许多官吏戒除鸦片烟，并成为禁烟运动的执行者。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禁毒活动，敦促英国停止鸦片贸易，要求日本减少吗啡进口和栽种罂粟。

①⑦ 《临时政府公报》第181号，1912年12月29日。

②⑥ 《临时政府公报》第239号，1913年1月5日。

③ 《临时政府公报》第265号，1913年10月28日。

④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拒毒委员会编：《禁烟条约政令辑要》，1924年刊行。

⑤ 天津《大公报》1915年7月17日。

⑧ 天津《大公报》1914年11月6日。

民国政府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禁毒。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是国际间禁毒运动的开端。随着国际间贩毒活动的频繁，人们感到有必要在各国间订立具有法律效用的禁烟条约。于是1912年1月国际禁烟会议在海牙举行。中国等十二个国家参加，最后协商签订《海牙禁烟公约》，该条约成为国际禁毒运动及各种禁毒文件的基础。次年又在海牙举行第二次禁烟会议，出席国家扩大到了二十四个。为了贯彻国际禁烟会议精神，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5月批准了《海牙禁烟公约》。

时日本商人乘中国禁止鸦片之际，从英国大量输入吗啡，然后转运至上海。1911年，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吗啡为58 852盎司，到1914年已上升到352 130盎司，其中的大部分被日本商人运入中国，填补鸦片缺乏的空当。此举既破坏禁毒运动，又进一步毒害中国人。为了进一步提高利润，日本开始制造吗啡，仅“星制药公司”一家在1915—1918年间，就因此而获利二百八十万日元。据估计在1911—1918年间，日本向中国走私的吗啡总量在500万盎司以上。对于危害远甚于鸦片的吗啡，1914年4月，袁世凯政府颁布《吗啡治罪条例》十二条，严惩制造、运输、贩卖吗啡之毒犯。对于日本在大连一带的关东洲公然大规模种植罂粟的行径，袁世凯政府多次出面交涉，强烈要求日方“务将私种烟亩设法禁除，并严杜外运密卖”。^①可见民初袁世凯政权还具有一定的维护民族利益的决心和勇气。

1912年囤积上海的英鸦片商拟将巨额洋烟销往中国各地，遭到中国官民反对。12月18日，袁世凯将既定方针交给国务院，要求：一、该次鸦片交涉，由外交部妥善抗议之方，其驳议理由务须根据

^① 外交部抄存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转引自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7页。

1911年中英禁烟条约，以免贻人口实。二、各省除安徽已派代表来京外，应再电飭浙、鄂、湘、赣等省，一律派员从速来京，以便会同讨论。三、关于交涉上种种进行事宜，须邀请万国改良会会长丁义华君出为赞助。^①丁义华系美国旅华侨民，曾组建万国改良会，是中国禁烟运动的热心推动者。1913年5月10日，袁世凯接见丁义华，丁义华介绍英国议会决定于5月立案，英国政府还提议开放中国禁烟自由。袁世凯即明确表示，继续禁烟，并与英国交涉。^②

1913年6月28日，中国驻英代表章通骏就上海存土问题第四次上书袁世凯，指出，我国“政府太形软弱”，要求袁世凯尽快命令外交部，向英国政府交涉，明宣我国禁止外国鸦片进入之决心，而堵英国政府要求赔偿之口，禁止上海存土之权。^③

袁世凯在执政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禁毒运动，取得一定成绩。此点得到万国改良会会长丁义华的充分肯定，他指出：“大总统、国务院电飭各省禁烟之通令，再再申明……是禁烟者已成民国上下一致之心理。寄语向之抱禁烟悲观者，其亦可以废然返矣。”^④外国人控制的海关也颇赞赏袁世凯政府的作为，上海海关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全力支持下，完成了表面的禁烟，所花的时间比中印协定所规定和熟悉内情的人士所预料的时限都要短。”^⑤

但民初的鸦片烟毒最终仍没能彻底地革除，其原因有四。第一，

① 天津《大公报》1912年12月21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13年5月11日。

③ 天津《大公报》1913年7月4日。

④ 天津《大公报》1912年12月6日。

⑤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政府各级官吏素质的局限性。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报刊指出：“连年以来，一般劣绅皆以禁烟一事为发财秘诀。”^①不少地方的官吏阳奉阴违，因此罍粟长植，烟馆洞开的现象并不鲜见。内务部报告中多次承认“山西、陕西、甘肃等偏僻地方，烟案间犹发现，例之滇、黔、川、桂等省，或恐未能一律肃清”。^②

第二，遭到外国势力的百般阻挠，尤其是来自英国的干扰。各租界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成为英商继续贩卖洋烟的基地，成为鸦片瘾者的最后避难所。中国政府的禁烟措施无法达到这些“国中之国”。如“禁烟手续，华界已着手进行，乃租界放任如故，新开土行之广告，几多于仁丹之市招，上海为烟鬼逋逃藪之说，不信然哉”^③。

第三，禁烟运动遭到靠鸦片维生或从中得到好处的各种势力的反对。如禁种罍粟的阻力主要来自烟农，而城市中的鸦片商人也自然是禁烟政策的抵触者。

第四，民国初期奢靡的社会风气也妨碍了吸毒积弊的革除。北京“国变后，茶社酒观的林立，娱乐场所的增加，都是风俗奢靡的表现”^④。上海“旅馆游戏场舞台遂应而起，日有增益，务以导淫侈败闲检为事”^⑤。于是，吸毒之风在纵欲主义、享乐主义之下不仅没有禁绝，反而没过几年，再度泛滥开来了。

第五，政府是禁烟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核心，但由于整个官僚机构的腐化，由于政府对禁烟的态度左右摇摆，虎头蛇尾，致使清末以来相延十年的禁烟运动功亏一篑。1913年自二次革命始，国内纷争

① 《时报》1913年1月20日。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685号，1914年4月4日。

③ 《申报》1913年1月11日。

④ 《消费与储蓄》，《大公报》1913年4月24日。

⑤ 《首都乡土研究》，《风尚》。

不断，袁世凯政府开支日增。于是，中央政府的烟禁日渐松弛，各地新生的军阀视鸦片为军饷之源，纵容烟毒的现象逐渐增多。如1914年张广建任甘肃总督，设禁烟总局，宣布厉行禁烟，但为增加财源，只禁种而不禁运、不禁售、不禁吸。于是甘肃出现“无商不土”的局面。到1915年，袁世凯为了筹措经费，竟自食前言，亲自批准在江苏、广东和江西三省试行鸦片专卖，以收取鸦片税，从而变相地承认了鸦片的合法存在。从此鸦片是“新税既加”，“烟禁复弛”^①。4月29日，袁世凯任命蔡乃煌为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蔡乃煌的头衔名为“禁烟”，实是贩烟，他的主要使命是推销积滞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巨额官土——即政府所控制的烟土，总计在一千一百万元以上，来为袁世凯政府筹饷。据说袁世凯所遣之梁士诒协助对香港运上海的六千箱印度大土予以征税，前后所得达两千万元，这些钱后用于袁世凯筹备帝制，占其筹备帝制所需经费之三分之一^②。这种上行下效，使得禁烟出现夭折现象。海关指出：“不幸得很，在涉及禁烟的问题上，人们使用一些像‘表面的查禁’和‘合法的买卖’那样的修饰语是太有必要了……非法的鸦片交易早在1916年就同合法的买卖势均力敌。”^③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后，国内政局日益演化为北洋军阀和非北洋军阀集团之间的较量，前者又分裂为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政局的转变与动荡给禁烟运动带来根本的变化，禁烟日益成为政治的装饰品，而各地军阀为了扩军发展的需要，先后弛禁，继而鼓励、推动、甚至强逼种植罂粟，贩卖鸦片。这样，

① 《实行鸦片新税之近况》，《申报》1915年6月18日。

② 周志俊：《袁世凯帝制活动与粤皖系之争》，《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③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一场浩浩荡荡的禁烟运动最终断送在政府之手。不过数年，烟毒回潮，罍粟遍野，鸦片泛滥，不仅数年的禁烟成果荡然无存，而且毒品更丰、吸者更众，中华大地再次被黑烟毒雾所笼罩。时人痛斥，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这白色是吗啡和海洛因，而这黑色就是鸦片烟了。

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①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中华民国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内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尖锐。如何对待秘密社会是袁世凯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关系到秘密社会各个分支在民国社会中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方向。

—

从现有记录来看，民国时期袁世凯最早过问、干预秘密社会是在1912年9月。当时他已经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权力，统一号令全国。他在会见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时指责中华国民共进会“时常闹事”，要陈其美“南返时，使中调查”。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陈其美自京返宁后也与陈其美谈及国民共进会问题，陈其美只得以“集会当初组织之主张固属纯正，近乃大反本旨相对”。

中华国民共进会是于1912年7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会长是与陈其美有一定交情的青帮大字辈应桂馨。在该会的筹建过程中始

^①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 T0403。

终得到了陈其美的支持。6月19日，陈其美还联合应桂馨、张尧卿、高士奎等十九人在《民立报》上刊出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①从7月12日共进会发出布告，号召“各省同志诸君，如愿担任设立支部者，既祈先就所在地点设立通讯处，并祈速派代表来申接洽为幸”^②后，在江浙地区陆续设立了一些支部。9月，杭州机关部向帮会密集的金、衢、严、处、宁、绍、台、温八府每个县各派出调查员二十人，广招会员，准备各设机关部一所。同月，会长应桂馨又因参与策动武昌马队的倒黎暴动，遭到黎元洪的通缉。于是国民共进会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

可能是为了摆脱干系以示清白，也可能是真的对国民共进会失去希望和控制，陈其美回沪后“与应（桂馨）亦不相往来”。^③但浙江都督朱瑞最先开始对国民共进会下手了。他“连日召集政军两界密筹对付办法”，定出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全浙新旧军官无论官弁兵丁一律不得入共进会，先入者限期出会，缴销党证”。根据这一规定，杭州机关部会长、洪首领阙麟书和总务、青帮通字辈杭辛斋等人纷纷辞职。朱瑞还极力扩大事态，“电呈中央请示办法”。^④

袁世凯以此为契机，于9月29日发出惩治帮会的《大总统令》，宣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骚乱者，不问是何名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92—893页。

② 《民立报》1912年7月12日。

③ 《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

④ 《申报》1912年9月12日。

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①袁世凯的这一命令给朱瑞撑了腰，壮了胆。10月，朱瑞指令金华驻军逮捕国民共进会龙游事务所负责人、金华帮会首领管伟，旋又罗织罪名，将其枪决。当月下旬，朱瑞又发出《解散共进会示》，认定共进会会员“莠多良少，恃众横行”，省内各地“几无一处无该会员之扰乱，更无一案不与该会有关系。小者恃强敲诈，愚弄乡民，大者开堂放票，聚赌敛钱，甚至明目张胆，谋为叛乱……令良善人民，未入会则迫胁堪虞，已入会则拖累难免，荆棘遍地，左右为难。……本都督为大局安危计，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如有不遵，“惟有遵照大总统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权”。^②至11月19日为止，浙省当局在嵊县、余姚、绍兴、东阳、汤溪、金华、台州、建德、兰溪、寿昌、吴兴、安吉、桐乡、石门、嘉禾、嘉善以及沿海海面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五十三人，全部处决。^③

朱瑞在浙江对共进会的镇压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1912年11月9日，袁世凯借题发挥，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取缔秘密会社的布告。布告称“近闻各省秘密结会之风仍未消戢，名目繁多，宗旨毫无，并有骗取重资，设会结党，以图暗杀破坏大局者。……应再由该都督等飭所属民政各机关割切出示，设法劝谕。凡从前秘密结会，如能知悔自首解散者，均准不咎既往，其有愿改组社会者，但能不违背法律，不扰公安，自应在保护之列”。^④此外袁世凯在接到朱瑞

①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0页。

② 《申报》1912年10月26日。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933页。

④ 《顺天时报》1912年11月10日。

“共进会在苏沪一带，有不法情形事”的电报后，马上下令国务总理赵秉钧“电飭程都督密查”。^①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然不敢怠慢，于12月中旬发布训令：中华国民共进会实系青红帮组织，如果查有共进会会所，着即勒令解散。

另一方面，袁世凯暗中于1912年10月派内务部秘书、密探头目洪述祖南下，经人介绍，收买了走投无路的应桂馨。10月16日晨，洪述祖带应桂馨去南京面见苏督程德全，程德全当即委应桂馨为驻沪巡查长，并支付月巡查公费一千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两千元。18日，袁世凯电示同意。10月27日，在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黎元洪致电国务总理称，“据程都督电，应夔丞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请将通缉原案取消”。29日，袁世凯批准“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惟应夔丞是问”。^②12月16日，袁世凯、赵秉钧传见了应召进京活动的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五万元，供解散共进会之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③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

1913年春，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全国各地演说，鼓吹实行民主政治，大有出任下一届内阁总理之势。袁世凯拉拢宋教仁不成，便下令应桂馨刺杀宋教仁。应桂馨一面利用与革命党上层人物的老关系刺探机密，一面将山西人武士英拉入共进会中，用请客嫖妓等手法使其为己效力卖命。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武士英刺刺，两天后伤重死去。袁世凯利用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的帮会势力

^{①②}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

^③ 《神州日报》1913年4月11日。

悍然破坏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开了民国时期流氓政治的先河，自然引起了国民党进步势力的极大义愤，最终酿成了8月间的二次革命。

二

1913年3月，驻扎湖北麻城县米埠陆军第二师第八团中哥老会会员、三营司务长张军和司书生刘某“受纯粹社会党煽动，暗中勾结该营一、三、四连兵士约于某日起事抢劫该埠绅富，为实行均贫富之计”，并称“黄州一带戍兵及驻扎襄河各营均已联盟同时起事”。后因消息泄露，张、刘及“授有伪职”的三连士兵胡某等人被处死，“抄出证据名册一概焚毁”。^①

6月28日，冯国璋在呈北京政府内务部文中说，“此种会社，人格半系流氓无赖，男女杂沓，混入其中，并无程度秩序”。内务部先是以中国社会党破除遗产制度系破坏民国现行制度，通行各省不准该党立案。1913年8月7日，袁世凯又亲自出马下令“将所有社会党本部、支部，一律严行查禁”，“勒令解散”。^②其实早在晚清编练新军时，袁世凯就对会党在军队中的传播保持警觉，在他制订的《简明军律二十条》内特别规定，士兵“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③同年，四川民政长陈廷杰到任后，会同都督胡景伊下令将中华国民社会党机关一律解散。从陈廷杰向内务部的报告中指责“奸人利用”哥老会、“恐其渐染邪说，将流为无政府一派，且与国民党同恶相济”^④等特点推断，在四川被解散的中华国民社会党极有可能就是中国社会党。

① 《申报》1913年3月21日。

② 《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③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1898年刊本，第1页。

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

中国社会党是1911年11月由江亢虎发起成立的，其“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稅，罢免一切稅；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①的纲领吸引了一些游民会党。该党成立后在一些地方建立了支部，“有若干会党是集体参加的”。^②如1912年8月江亢虎和陈翼龙共同发起中国社会党北京部，陈翼龙“似乎加入过洪门之类的会党，所以他很能接近下层群众，也有一班‘三教九流’的朋友”。^③该党四川支部于1912年3月6日在重庆成立，由袍哥首领唐廉江任部长，以哥老会作为社会基础，围绕普及平民教育、开办小型工厂等福利事业展开活动。后又与哥老会“汉流惟一社”结合，出版《国是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但也受到同盟会的某些影响。1912年6月23日，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与中华民国工党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党“切实联合，一致进行”，“社会党员与工业有关系者，同时为工党党员；了解且信从社会主义者，同时为社会党党员”。^④工党领袖徐企文在政治上接近同盟会，推孙中山为名誉领袖。据北洋政府调查，“工党中人……多半隶属与青红帮，奉其本帮首领，伊若神明，敬若父子。故工党极力联络青红帮首领者，欲其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也”。^⑤事实上，工党核心成员中确有一些帮会人物，如顾问旅美洪门成员朱卓文、庶务科主任青帮通字辈韩恢等，这些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袁世凯下令查禁中国社会党，使孙中山的健康力量同时受到了打击。

① 《民立报》1911年11月8日。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499页。

③ 同上书，第500页。

④ 《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

⑤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三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下令通缉参与起事的张尧卿、韩恢、陈犹龙、王金发、吕东升、阙麟书等帮会首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迫逃亡日本。袁世凯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的稳固接连下令严禁秘密结社。

1913年9月底，大总统秘书厅致函内务部，查询谭人凤在湖南设立的社团改进会是否报部立案，旋得内务部否定的回答。

一年前当革命党人、长江巡阅使谭人凤和他的部下陈犹龙联合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发起筹组社团改进会时就遭到了内务部的刁难和阻挠。谭人凤等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试图对帮会组织进行取名去实釜底抽薪的试验，在致内务部警政司的呈文中称，“吾国社会夙称复杂，而纠结蟠踞足以为国家和平之障碍者，尤莫如会党。……人凤等奔走国事十有余年，深知此辈性质，刀锯所不能威吓者，可动之感情；法律所不能防维者，可化之以道德。诚使纳之正轨，导以生计，以联络为同化之具，富解散于归并之中，不特可祛隐患于将来，且可慰遗民于地下。用是不自揣量，发起一会，定名日社团改进会，拟暂时就上海地方设立事务所，并次第于各省设立分会，专为化除固有秘密会党”。^①并就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及安置无业的会党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但袁世凯控制的内务部警政司认为“此项社团系集合哥弟、天地、三合、大刀等会而成，旧日徒党，品类太杂……倘办理不当，恐不免别生枝节”。于是将社团改进会章程详细推敲，找出“稍有未妥之

^① 《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页。

处，酌拟数条，于质问之中隐寓限制之意”，交参事孙培等人前去与谭人凤等接洽。^①警政司共向谭人凤等提出十条意见。10月10日谭人凤作出逐条答复。尽管谭人凤作了上述详细的说明，谈了今后的打算。但内务部仍存戒心，10月11日对社团改进会作出批示：“应俟该会详细章程修订完善，呈报到部，再行查核办理。”^②实质上是采取拖延的态度。此后谭人凤等人并未在北京续报，而是于同年11月9日呈文湘督谭延闿，要旨予社团改进会在湘立案。而谭延闿在此之前采取严厉手段镇压帮会，未能解决问题，此时决定换一种方式来对付帮会，于是在1913年3月同意立案。但不久由于当地反动势力的破坏，该会也无法办下去了。

10月3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宣称，“湘中会匪素多，自叛党谭人凤设立社团改进会，招集无赖，分布党羽，潜为谋乱机关，于是案集如鳞之巨匪皆各明目张胆，借集会自由之名，行开堂放票之实，以致劫案迭出，民不聊生，贻害地方，不堪设想。……着湖南都督一律查明，分别严禁、解散，以保公安。至此等情形，尚不止湖南一处，并荐各省都督、民政长，一律查禁……切勿姑息养奸，致贻隐患”。^③至此，社团改进会被彻底取缔。

四

但袁世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决定在严禁国内帮会的同时，内紧外松，对于海外致公堂网开一面，批准其在国内的立案请求。

^① 《警政司致内务部呈》（1912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② 《内务部批稿》（1912年10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③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第535—536页。

1913年12月26日奉大总统国务院批示云：“呈及简章均悉，该华侨等，倾心祖国，志存光复，实属深明大义，效忠共和，自应准予立案；至所请颁给铃记，应自行查照本月十八日公报内务部训令，按照仪式，自刊图记，呈由该管领事报院及外交部备案可也。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大总统印。”^①

从历史上看，袁世凯对美洲致公堂素无关系，谈不上有何好感。相反他的政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同美洲致公堂倒是有过一段精诚合作、共筹革命军费的佳话。正因为如此，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总堂在1912年1月9日电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提出在国内组织政党的要求。电文称：“前本总堂所委谢秋君偕公同至各埠筹饷事已经完全，是以今日本堂之谢秋君回国办理，偕翼汉君共为本堂代表，组织一完全政党，故望大总统回念当日花亭之事，须要协力扶持完全政党之事。”^②29日，维多利亚致公总堂又致函孙中山，提出“愿牺牲公产为民国军用，求大总统早日北伐，直捣幽燕，生擒建酋……故特命谢秋君、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人仰望之心”。^③同年3月，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自美国回国向南京临时政府呈报洪门筹饷局的各种文件、捐册，同时也向孙中山提出海外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活动的要求。

但此时的孙中山已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从建设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考虑，他不愿再做致公堂的“大哥”，也不支持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活动。他认为包括致公堂在内的洪门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已经完成

①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② 《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1页。

③ 同上书，第437页。

了历史使命，“今既治溥大同，为共和之国，自不必仍守秘密。……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治之”。^①因此孙中山对加拿大致公堂的函电置之不理，对旧友黄三德的面请则虚与委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约黄三德在广州会见，虽然口头上同意致公堂立案，但仍要求黄三德按正常途径向广东都督胡汉民具呈请其批准。胡汉民对孙中山的真实意图自然心领神会，再加上其副手陈炯明为了维持广东全省秩序，“握兵权，锐意办匪，而彼并嫉会党，力沮其事，谓彼必俟土匪荡平之后，否则土匪窜入，会党更难收拾”，^②于是胡汉民采取了拖延不办的态度。1912年8月18日，焦躁不安的黄三德专为此事致函孙中山追问立案之事，孙中山复信仍要黄三德找胡汉民交涉。黄三德接信后去找胡汉民，仍不得要领。黄三德盛怒之下向胡汉民提出，若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应当一一为之赎回。但孙中山、胡汉民并不为黄三德施加的经济压力所动，立案之事并未出现转机，反而就此不了了之。黄三德认定孙、胡这样做，“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③

加拿大温哥华《大汉公报》主笔冯自由在民国政府成立后，被征召返国担任稽勋局局长，于1912年7月21日致函温哥华城及纽威士缅士打致公堂，调查各团体及个人对革命之功绩，俾便颁给勋章或抚恤金。1913年，驻温哥华领事张康仁函复冯自由，请转呈国务院，表扬加国洪门之功绩。函内称：“慨然冒险而筹革命巨款者，则以加属致公堂为始。”又说：“洪门致公堂者，实为世界历史所未有，殊非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

② 《孙中山集外集》，第368页。

③ 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版。

过言也。”他向政府建议：“鄙人意见，以为致公堂之应得酬庸者，莫如赏之以年金，以显新政府崇德报功之美意。且致公堂牺牲之志愿已成，目的之希望已达，应由政府给以永久之印信，彰其盛德，表其固有完备之组织，及保全其爱国党派之真诚，如是则后世永远引为纪念，皆知洪门致公堂为最高尚之爱国模范。”

致公堂获悉领事的肯定态度后，为参与祖国政治、组织政党铺路，由陈振崇、黄派贤、许济栋、黄介石具名，于1913年分呈驻加拿大总领事卢炳田、驻温哥华领事林锡垣及北京国务院，请批准致公堂立案为正式社会。同年10月15日奉卢总领事批示：“据禀称，加属云（温）哥华、域多利、兰拿、纽威士缅士打，并各埠致公堂同人，前创《大汉报》鼓吹革命，并慨捐革命军费前后逾数十万，自民国成立以后，主张统一建设，改良会章，以联络华人团体，讲求侨民自治，研究工商实业，赞助国家行政为宗旨，恳请立案，作为正式社会等情，查核所禀会章，与正式社会相符，应准如所请立案，以垂永久，仰该会员等，自此联络华侨，融和党见，实行自由，使我华人商业，彪炳寰球，裨益国家，本总领事有厚望焉。”^①

袁世凯就是在加拿大致公堂对孙中山心存误解和怨恨的情况下作出上述批示的，这无疑使他在海外致公堂和华侨中赢得了好感，为他在海外捞到了一些政治资源和资本，同时也扩大了孙中山和加拿大致公堂之间的政治距离，给革命党的海外工作造成了新的困难。

五

1914年1月9日，袁世凯又发布《严禁哥老会令》，称“我国哥

^①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

老会……勾结土匪，扰乱治安，或要挟地方官，于各属设立码头，以及开山立堂等事，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小之贻社会之忧，大之为国家之患，若不严行禁阻，何以弭隐祸而靖人心。嗣后，各省如再有哥老会设立码头暨开山立堂，或另立共进、改进等项名目，应由该省都督、民政长严予惩办，并通飭所属，一律悬为严禁。其已经设立各处，亦宜设法迅速解散，以杜乱萌，是为至要”。^①袁世凯当然要在全国范围内查禁哥老会，但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斩断与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一切干系，因此他在命令中将共进会列名哥老会各分支之首。刺宋案的要犯、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在二次革命时从上海越狱脱逃，经青岛于1914年1月贸然进京，招摇过市，并向袁世凯索要原先答应的刺宋酬报。袁世凯拒不接见，并矢口否认自己与应桂馨的关系。十天后，满腹怨气的应桂馨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在北京至天津的火车上。中华国民共进会至此灰飞烟灭。

1914年2月初，袁世凯又在四川民政长陈廷杰呈明解散中华国民社会党善后办法上批示，“所呈各节，尚属妥协，仰即认真督飭办理，以靖地方”，^②企图借查办以哥老会为主体的中华国民社会党之际，彻底根除四川哥老会。3月2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规定“严禁秘密结社”等。^③

这里有一点是耐人寻味的，与革命党合作、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包括哥老会在内的洪门遭到严禁，被认定为非法组织，而与革命党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青帮倒是安然无恙，优哉游哉。这种刻意的安排对革命党看来是咄咄怪事，但在袁世凯看来理应如此。从长时段

①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第540页。

②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③ 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0页。

来看，民国时期青帮势力的猖獗与袁世凯的只针对洪门的这纸禁令有很大的关系。

六

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的较量中，为了战胜对手、增强自己的实力，也在查禁帮会的同时一再利用帮会。民国初年，他除了拉青帮大字辈应桂馨之外，还有意笼络扬州军政分府都督、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袁世凯向徐宝山赠款二十五万元，“并送其子往北京为质”，^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内担任侍卫武官。徐宝山虽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员，但并不听从南京临时政府的调遣，在政治上有时甚至公然唱反调。1912年4月16日，徐宝山未经批准擅自致电袁世凯，自请取消扬州军政分府，^②拥护袁世凯“统一治权”。4月20日袁世凯下令取消扬州军政分府后，徐宝山仍充第二军军长。1913年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打算进攻南方军队时将“徐宝山所部（约步一师）为扰乱宁苏内部之牵制队”。^③徐宝山更是真相毕露，公然劫夺国民党自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过境军火。1913年5月24日徐宝山被陈其美等人用计炸死。徐宝山被炸死后，统率办事处即任命其弟徐宝珍为代理军长，并派人运动南京附近的九龙会和徐海一带的青洪帮组织，“以备急需，而济北兵之不及”。原受陈其美指令组织暗杀队的长江青洪帮首领章武被袁世凯政府收买后反戈相向，准备伺机刺杀国民党中坚要人。^④徐宝珍部后来在镇压江苏地区的二

① 《近代史资料》第40期，第7页。

② 《民立报》1912年4月18日。

③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96页。

④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第132—133页。

次革命时攻打南京，卖了大力气。袁世凯政府因此收编徐宝山旧部张仁奎为江苏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马玉仁为清江镇守使。

原广东民军首领、帮会头领王和顺在二次革命爆发后，为了发泄对陈炯明的愤懑，竟从香港跟随黄士龙进京投靠袁世凯。“袁氏皆收为党羽，助以巨资”，^①并派陈宦在北京参谋本部和他们密商分化瓦解广东陆军之策。

王金发则于1914年6月中旬变节投袁，带领密探连夜捉拿正在上海从事讨袁活动的蒋介石，迫使蒋介石逃亡日本。1915年1月袁世凯政府陆军部向王金发之母下达批示称，“据禀已悉，尔子王逸既未附和乱党，已准免缉，嘱其安分读书，养才待用可也”。^②王金发在通缉令正式取消后虽然花了两万多元疏通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但终未取得袁世凯的信任。1915年6月，陆军部以王金发投诚后“延宕数月之久，迄未捕获一匪”为由，批准督理浙江军务朱瑞之请，“依法处决死刑，用为图乱者戒”。^③

1915年初，袁世凯为了搞垮中华革命党，有意分化、收买该党中的某些帮会人物。他通过驻日使馆放出风声，应先解决《二十一条》交涉，然后再着手改革内政，拉拢收买在日本生计窘迫的张尧卿和何海鸣。张、何二人被拉下水后于2月间多次密会中国驻日公使，成为为袁世凯政府收买在日革命党暗中奔走的主要人物。^④张尧卿变节后，还利用原有的帮会关系“充恶政府侦探，倾害同志”。直至1916年张尧卿仍在假借黄兴名义“欲在宝庆一带招兵”。黄兴接到

① 《民立报》1913年7月21日。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第54页。

③ 《临时政府公报》第1115号，1914年6月15日。

④ 《孙中山在日活动实录》，第718页。

谭人凤报告后，立即致电谭延闿要求将张尧卿“拿捕讯实，以军法惩治”。^①

招降纳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是袁世凯与革命党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也使他尝到了一些甜头，占了一些便宜。同样一件事情，革命党做了就是违法，他自己干了就不要紧。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将国家的法律、法令（有些还是他亲自指定的）玩弄于股掌之间，如此行事给民国的统治者不遵法纪开了一个首恶的先例，流毒甚广。

七

如果说，袁世凯在民国以前对秘密帮会接触不多、知之不详的话，那么他在晚清担任山东巡抚血腥镇压义和团时，对于当时极为流行的秘密教门至少是有一定了解的。1900年1月13日，他在奏折中认定义和团是“匪类”、“邪教”。^②6月间，他对抗朝廷要求招抚团民的指令，强调山东义和拳“游手好闲者概系游勇、盐枭、马贼、土匪”，根本不能召集成团。^③8月，他进一步张贴告示，宣称义和团是：“黄巾红巾，左道惑人，张角余孽，粤匪同伦，教本白莲，演拳称神……害及京津，……现饬剿办，格杀勿论。”^④他在大肆屠杀义和团时，对于秘密教门潜在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巨大的社会活动能量肯定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当他掌握了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后，北京政府一开始就对会道门采取查禁的政策，认为这些邪教的存在对其统治不

① 《近代史资料》第50期，第141页。

② 《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二，第1页。义和团自然不是邪教，但其中包含大刀会、八卦教等会道门组织则是不争的事实。

③ 《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五，第3—4页。

④ 《寿张县志》卷九，第12页。

利。1914年，黑龙江省民政长公署向内务部报告：“东三省之混元门、在理教、黄天教、哼哼教、六门神教……于世道人心大有障害，似宜一律禁绝。”内务部明确批示：“各省向来奉行各教，种种分歧，性质驳杂，虽未尽与东三省情形悉同，而与原呈所称之混无门等教类似者，正复不少，率由无赖莠民，搜奇索隐，藉势招摇，假神仙符咒之名，为诱惑乡愚之计，甚且秘密结社，蕴伏萑苻。穷其弊害，小则败坏风俗，大则逸事治安，若概任其自由信仰，殊非约法保护宗教之意。……除有系统、有经典、有历史之宗教应加保护外，其他如上所指招摇诱惑，秘密结社各种邪教，亟当予查禁。”^①

1914年，袁世凯应四川城口县知事罗本持之请，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查禁在四川流传的少林教。

但因北洋军阀政府内部的一些军阀政客实力人物出于政治的需要，拉拢利用会道门，北京政府对会道门采取的查禁政策并没有全面落实。

例如，1913年李毓如等人联合北京各理门领众，组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并获北京政府内务部准予立案。李毓如被推为总会会长，会址设在京西挂甲屯。总会成立后，湖北、天津和东北各地分会相继建立。总分各会积极参加了一些慈善救济活动。总会还办有《理铎》杂志，向全国发行，另外印行《理门须知》一书分发全国各分支机构。

又如1914年段正元赴北京筹设道德学社。道德学社内流传的《尊师重道歌》叙述了段正元创建该社的经过：“我们贞师段师尊，幼遇龙元祖，峨嵋亲传薪。转青城，得全贞，见性又明心。秉受太师命，大声唱亲民。设坛说大法，传道给门人。三我一贯黄通理，万教

^① 《内政年鉴》。

归儒门。上天与大地，惟我师独尊。讲人道，行天伦，太上一元仁。道法与天齐，笃恭化灾氛。天下立学社，中外渡缘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救世贞主仁。”^①

1916年，段正元伙同北京政府陆军参谋总长王士珍、步兵总监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发起成立道德学社，以王士珍为社长，段正元为社师。该社鼓吹“统一全球，协和万邦，大道三千年开花，五千年结果，普渡众生，政圆了道”。^②宣称“实行道德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保全性命之真学问，以无种族、无国界，万国共和，大同统一为宗旨”，故又名“大同民主党”。

要说袁世凯对上述会道门在北京的活动一无所知是解释不过去的，但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与这些会道门究竟是什么关系，目前由于史料的缺乏，尚需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由于袁世凯对会道门总体上采取了明禁暗纵、小禁大纵的暧昧态度，给相当一部分的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空前发展与袁世凯的放纵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综上所述，袁世凯对秘密社会查禁的重点是与革命党合作、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包括哥老会在内的洪门帮会，而与革命党基本无关的青帮则全然无事。同时为了战胜革命党人，他也在查禁帮会的同时一再出尔反尔，利用帮会，招降纳叛，各个击破。对于已经和孙中山产生隔阂与怨恨的海外致公堂，袁世凯也是网开一面，批准其在国内的立案请求。毫无疑问，孙中山和加拿大致公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的加深，有助于袁世凯夺取海外华侨的人力和财力的资源。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导向决定了秘密社会各个分支在民国社会中的发展

^① 《正阳文史资料》第2辑，第184页。

^② 《沔阳县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页。

与不发展。大体而言是洪帮受压，青帮有所发展，而会道门有大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中国走向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袁世凯充任国家元首后，将国家的法律、法令（有些还是他亲自指定的）随意化，有时光做不说，有时光说₆不做，继续玩弄自清末以来的阴谋与权术，这种不良行政给民国的统治者不遵法纪开了一个首恶的先例。因此后来人们遗憾地看到，进入民国不久流氓政治很快占了上风，发展民主政治的大好历史机遇被无情地错过了。

袁世凯与禁赌

霍晓玲

(河南大学)

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袁世凯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他以小站练兵崛起于晚清政坛，步步攀升，后以清末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总统，旋又一变而为八十三日之洪宪皇帝，被沈云龙目为“政坛怪杰”。^①这一“政坛怪杰”在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对晚清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有切身体会，面对这样一个垂垂老矣、亟待变革的社会，他不能不有所回应。在禁止缠足、废停科举方面，袁世凯一马当先、态度激进。在禁赌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为推行新政、革除社会陋俗作出了贡献。过去的研究大都以某一社会问题为主线，间或涉及袁世凯的态度，而鲜有以袁世凯为主体探讨他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认识及作为。本文拟以袁世凯一生为主线，评述他在小站练兵时期、督抚时期（任山东巡抚及直隶总督时期）以及民国初年兼及其家庭生活方面的禁赌，同时理清袁世凯对赌博这一社会问题由激愤趋向于理性的认识过程，并试图探讨禁赌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②冀有望深化对袁世凯的研究及禁赌这一社会问题的认识。

① 沈云龙：《现代政治人物述评·谈袁世凯》，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9页。

② 笔者尚未见到相关论著，有知见者恳请惠告。

一、嗜赌受骗——禁赌之肇因

袁世凯与赌博的渊源关系，最早当溯自其青少年时代，袁氏家庭累世勋阀，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都为清廷大吏。童年的袁世凯生活优裕，后来他随嗣父袁保庆相继迁居济南和南京。都市的繁华深深感染了少年时代的袁世凯，他于圣贤典章的学习不甚用功，骑马、打拳、饮酒、下棋、赌博却样样皆爱，^①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少年家居，行为佻达，颇为乡里侧目”，^②“终以事积连族里，众欲苦之”。^③袁世凯不为族人所欢迎的原因就在于他豪饮嗜赌。饮酒本不应为人所诟，但袁世凯嗜饮常醉就逾于规矩之外，近乎浮荡；而赌博则决不为乡里社会所容，不仅是不务正业的表现，更是盗匪渊藪和耗资散财的最快速径。清官员即指出“赌者荒弃本业，荡废家资”，“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风俗之害，不可悉数”。^④在清代，赌博同乱民、盗贼、娼妓一道被官方列为“四大恶习”，赌则被列为首恶。^⑤由是，袁世凯“为乡里所侧目”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受累世勋阀的家庭文化氛围和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不好圣贤典章的袁世凯孜孜以求的仍是科举致仕，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取步入统治阶层的通行证。而玩耍无度必然荒废学业，

① 参见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2—123页；吴闿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卷一，1913年版，第1页。

② 沈云龙：《现代政治人物述评·谈袁世凯》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3页。

③ 张謇：《张季子九录·专录》卷六，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5页。

④ 刚毅辑：《牧令须知·赌博》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1页。

⑤ 清朝认为“民间恶习，无过于博戏”。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九三九。

科举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1876年、1879年两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使得年少气盛的袁世凯又羞又愤，断绝了科举致仕的念头转向另一条殊途同归的捷径，即捐纳实缺。1880年在家人的资助下，袁世凯进京谋职，到了北京之后袁世凯旧态复萌，一味地讲吃喝玩乐，被一些设赌局骗钱的人盯上，合伙引诱他去赌博。在当时的大都市，这种设赌局骗人的把戏非常常见，一些游惰闲民“设陷阱以倾人之博，京师、天津皆有”，他们“党羽众多，见有外来多金之侗父，群起而诱之”。^①《津门杂记》也有言：“帮嫖看赌随着逛，崩骗是寻常。”^②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未能识透其中奥秘，落入了他们的圈套，结果官没捐成，钱又输个净尽，可谓狼狈之极，若非遇见徐世昌（时已考中进士做了京官），恐怕只得流浪京城了。

这一经历对时年二十一岁的袁世凯影响很大。嗜赌酿苦果，给他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痕，使其对赌博的罪恶有了初步认识并从感情上深恶赌博、行动上抵制赌博。他是否发下誓言，终生不赌，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以后的生活中，袁世凯确实再未涉足赌场，而且严禁家人和下人们在平时赌钱^③，甚至对赌博者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有一次其九姨太刘氏与人赌博，就被他停发了两个月月钱。^④

科举落第，捐官无果，处于人生低谷的袁世凯激愤于赌博对他人生第二条求仕之路的封杀，切肤之痛使其由嗜赌转向戒赌。这时他对赌博的抵制还只是出于上当受骗羞辱经历的激愤，对于赌博的社会危害认识得还不够深刻、全面，还不可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去认识这种

① 徐珂：《清稗类钞·赌博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76页。

② 张焘辑：《津门杂记》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33页。

③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前引书，第125页。

④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社会现象。但正是这一经历为袁世凯后来禁赌奠定了感情基础，成为其厉行禁赌的肇因。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和思想认识的成熟，袁世凯对赌博的社会危害逐渐深化。认识到赌博是当时社会的一大腐蚀剂，它不仅丧人心志，贻误正事，而且赌博的蔓延会蚀空一切事业的根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对赌博这一看似只关社会风尚的事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他不仅严格责己，矢志不赌，还开展了一系列禁赌活动，采取严厉的措施惩治赌博，禁赌范围涉及到军队、学校、社会、官场。厉行禁赌，使袁世凯练兵生面别开，奠定了政治崛起的军事资本；从政，风纪肃然，为其赢得了较高的政治声誉。而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良好的政治口碑又是袁世凯政治地位不断巩固，一步步攀上权力巅峰的两大柱石。可以说，袁世凯禁赌的肇因虽然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但他后来的禁赌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并对他个人事业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

二、小站练兵，禁赌铸新军

甲午战争失败后，时人感愤于清军的腐败，纷纷要求编练新军，一时内外诸臣交章纷奏，指出如今事势，“练兵为第一大政”。^①时袁世凯已从朝鲜归来，舆论有“知兵”之称。他也积极上书，陈述练兵之策，蒙光绪皇帝召见，饬派为练兵大臣，接替胡燏芬在小站练兵。由此，袁世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不但他本人从此扶摇直上，而且影响中国政局数十年，盘根错节的北洋集团的势力也由此开始奠基”。^②袁世凯按照德国方法操练新军，在军队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十八，第9656页。

② 郭剑林、纪能文：《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编制、武器装备、官弁服装上都进行了改革，揭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序幕。《纽约时报》后来称赞他是清国所有官员里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①可谓中肯。但袁世凯的高明之处不止于此，他深知现代化的装备要有效发挥作用，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必须重视军队的政治灌输和道德教育，革除士兵身上沾染的不良习气，提高士兵的综合素质，这样，精神境界的刷新才能与物质上的更新相一致，也才能更有效、更持久地发挥现代化军事装备的作用。

袁世凯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内容除了宣讲《圣谕广训》以及传统的忠孝思想以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军队中流行的不良习气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化，严禁赌博即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点。赌博在社会上危害甚大，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史不绝书，而赌博在军队中的蔓延不仅会涣散军心、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更严重的是影响军队的内部团结，甚至引发争斗和冲突。嘉庆年间就曾发生护军营兵丁因赌博纠纷而持刀杀人的事件。这一点袁世凯也有切身体会，他在登州庆军军营时，发生了士兵因聚赌争吵，最后酿成双方各有几十人参与的互相开枪射击事件，袁世凯假传吴长庆命令，将为首肇事之人就地正法，才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②。因此在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非常重视在军队中禁止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前十八条为斩罪，后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为了使军中法令真正起到约束士兵行为的作用，特别

① 托马斯·F·米拉德：《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纽约时报》1908年6月14日。见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6页。

②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前引书，第126页。

③ 《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转引自赫治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地利用谐音将军纪编成《劝兵歌》，把循循善诱的说教融进朗朗上口的歌谣，通过反复唱颂使士兵对法令谙熟于心，潜移默化地扫除士兵身上的不良习气。在《劝兵歌》里，他除了要求士兵用心操练爱待百姓外，第七条即是禁止赌博“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①如果说袁世凯此前的抵制赌博只是出于一时的激愤，那么此时的禁赌则更多地出于理性的认识，此前的“律己”发展到此时的“律他”。

在袁世凯的治理下，军队中的赌博现象基本肃清，士兵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军队内部团结的增强直接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军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严整气派的军容，显示了袁世凯卓越的练兵治军才能。陈夔龙评价：“较之淮练各军，壁垒一新”，“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②其“生面独开”的背后，除了“参用西法”外，与袁世凯重视军队思想道德教育，特别是严禁烟赌陋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③而小站练兵的成功则直接奠定了袁世凯崛起的军事资本，这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此不赘言。

三、督抚禁赌，变革风尚赢政声

1900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旋又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朝野。这一时期袁世凯对赌博的认识更加广泛深刻，而且由于位高权重，他的禁赌活动不再局限于军队，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社会，以

①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1898年刊本，第26页。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

②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52页。

③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对吸烟者责罚极重，在《简明军律二十条》中规定：在营吸食洋烟者斩。

巡警相配合探索禁赌的制度性保障，并贯穿到所创办的新政事业中，而这一时期袁世凯所办新政着力最多、最具社会意义的是新式学堂。兹将这一时期的禁赌分为学校和社会两方面进行阐述。

袁世凯非常重视教育，认为“五洲之强弱，视其教育之重轻，经图要图，莫此为巨”，^①培养人才“突为图治根本”，^②因此他在教育改革上的热情决不亚于军事。在山东巡抚任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级大学堂——山东省大学堂，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并配有讲授外国知识的课程，成为各省创设大学堂的典范。升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又相继创设了直隶省城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等一大批学校。同治军一样，袁世凯极其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而在当时社会戒绝赌害，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关键。尽管清朝入关后即颁布了严格的禁赌法令，但清末赌风之盛，为他朝所不能及，社会各阶层皆受沾染。卒于1844年的钱泳曾记述了当时赌风盛行的状况，“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乡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③1884年法越构兵，广东沿海戒备，需饷甚急，清政府为筹集海防经费，弛开赌禁，在广东公开招商承办番摊闹姓赌博，抽取赌税，“奉旨开赌”更刺激了赌博的恶性蔓延。“赌禁既弛以来，政府认许之矣，官吏护奖之矣，则赴赌者自为民生之正业，父不能禁其子，兄不能禁其弟也。且上自省会，下至村落，各赌棋布”。^④一时，全国皆赌，赌博与鸦片成为晚清社会两大陋习，王国维即指出“古人之疾饮酒田猎，今人之疾鸦片赌博”。^⑤甚至有人说“吾国之好赌者，竟居全国民十分之五”。^⑥社会风

-
- ① 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7页。
② 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③ 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8页。
④ 《东方杂志》第2卷第7号，第202页。
⑤ 《东方杂志》第3卷第10号，第202页。
⑥ 《东方杂志》第3卷第11号，第216页。

气江河日下，社会和家庭中赌博都很常见，相当一部分青年流连赌场，常涉赌局“染嗜好爱冶游皆学生界之大障碍也”，^①以致志气昏惰，贻误学业。时人就指出赌博有“害于修学”，“好赌者举其与黄金同价之韶华，消磨于斗牌掷色之事，虽有慧质，亦无暇从事于高等之学问”。并把赌博放在关乎民族存亡的高度加以看待，认为“今日欲保种，必自禁赌始”。^②袁世凯在清末有“头脑总督”^③之誉，他敏感地认识到要想保证新式教育的成效，必须重视禁赌，革除学生从社会家庭中带来的陋习，否则新式人才身上沾染的旧恶习将使教育之功毁于一旦，学而无所成，因赌虚掷光阴而难有建树。因此在学堂条规里，袁世凯明令禁止赌博，“禁止酗酒、赌博违者分别责罚”（山东省城大学堂）、“本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罚开革”（直隶师范学堂、小学堂）、“平时不许饮酒及食大烟、赌博等事”（法政学堂）。^④如此明确地申令禁赌，这在其他督抚上奏的学堂章程中是很少见到的，可见并不是所有督抚都认识到禁赌的重要性，时人对新式教育的抨击也说明了这一点：“今之言教育者，莫不曰德育、德育，然赌风不去，则虽日日言德育，庸有济乎。”并指出当时乞丐、棍骗、罪囚之多无一不与赌风日炽有关。^⑤

对赌博的严禁，使袁世凯所办新式学堂风纪凛然，表率当时，成为各省效仿的榜样，所招收、培养的大批近代化人才，为推动清末民初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① 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四，第9页。

② 《东方杂志》第3卷第11号，第216页。

③ 清末有“四大总督”之说，即“头脑总督”袁世凯、“肝胆总督”岑春煊、“思想总督”端方、“文章总督”张之洞。见《京话实报》1906年12月10日。

④ 分别见《袁世凯奏议》上册第329页、中册第591页、下册第1367页。

⑤ 《东方杂志》第3卷第11号，第218页。

当然要想巩固学校禁赌的成果，最根本的还在于打击社会上的种种赌博活动，真正扭转社会风气。在抚鲁期间，袁世凯将1898年发生在登州府招远县的聚赌受贿案，察明详情，具禀皇上。在奏折内袁世凯反复申明清朝的禁赌法令：赌博不分兵民，枷号两个月，杖一百，^①可见已很重视对赌博的打击。但由于任职时间短，更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袁世凯主要致力于扑灭农民运动，对社会上的赌博活动无暇打击，对社会上赌风的肃清主要在督直期间，其重大兴措之一即为停办直隶义赈彩票。

清末（1899—1910年）兴起彩票狂潮，各省皆以救灾、善后、筹款为旗号（1901年以后主要是以筹款赔付摊派给各省的庚子赔款为旗号），发行彩票，各州县的私彩也是遍地开花，彩票与“国赌”麻将并列为清末两种最主要的赌博方式。^②直隶自不甘落后，1901年4月，由时任直督的李鸿章上奏准办直隶义赈彩票，名义是为八国联军蹂躏的北方兵灾地区筹饷。但事实证明顺直义赈彩票同其他各省彩票一样，并未真正起到善后、救灾的作用，而只不过是督抚和彩票发行公司手中的一棵摇钱树而已。因此升任直隶总督后不久，袁世凯就上奏皇帝停办直隶彩票，袁世凯的理由有二：一为“导民以赌”坐以收利，伤风化乖政体，且国家正办新政，中外引观，更有洩中国之声望（于名无益）。二为欠解款项无裨赈需。（于实无所取）。^③总之，彩票不是正当的筹资手段，一个政治上想要有所作为的国家就不应当纵容赌博自毁政声民风，反映了袁世凯对这种巧立名目、敛聚民财的手段不屑一顾的务实态度，也与他一贯的禁赌作

① 《袁世凯奏议》前引书，上册第263—268页。

② 闵杰《论清末彩票》对此有很详尽的论述。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上海普济公司承办顺直义赈彩票》，《申报》1901年4月19日。

③ 天津《大公报》1913年1月1日。

风相一致。^①

袁世凯此举与当时督抚争相发行彩票形成鲜明对比，与其后督抚们对待禁止彩票这一问题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袁树勋即为明证。1909年两广总督袁树勋迫于咨议局的压力，奉旨开始筹划禁赌，在谈到彩票时，袁树勋始则说彩票“激饷无多”欲予禁绝，继又以“本省彩票禁而外省之彩票来”难以服众为由要求各省一体行动。^②他的说法不无道理，但他所优先考虑的乃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相比袁世凯的态度则坚决得多，终清之世，袁世凯是各省督抚中唯一主动禁绝彩票者，且雷厉风行，仅三个月（1903年年初至3月份）就扫荡了直隶地区的一切私家彩票，成为中国自办彩票以来官方实施的一次很有成效的取缔彩票的行动。直到袁世凯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直隶地区除他不便干涉的天津租界内的奥地利宝元彩票^③及京师一地外，很少再有滥发彩票一事。

除了禁止“导民以赌”的彩票发行外，袁世凯又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各类赌博活动进行打击。还在暂驻保定时，袁世凯就派

- ① 闵杰《论清末彩票》里认为，袁世凯此举主要是因为普济公司不受他约束，拖欠报销。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失之片面，是纯粹从经济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没有考虑到袁世凯对赌博的一贯禁止态度。如果仅仅是因为不能控制普济而冲冠一怒将其取缔的话，袁世凯完全可以在此之后，再择人选，另设彩票。（正如作者文中所论：“手中有彩票者，可以凭其权力地位维护这种利益；手中无彩票者，可以寻找机会办彩票。”）袁世凯以直隶总督之权高势重完全有能力改头换面重新发行彩票，从而将彩票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在山东巡抚或是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都没有倡发彩票，反映了他对这种“导民以赌”的筹款方式的抵制。
- ② 《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奏复陈粤省赌饷遵旨筹办情形折》，《东方杂志》第6卷第11号，第97页。
- ③ 针对奥商拟在租界外设立分局销售宝元彩票一事，袁世凯援引上海英法领事不准上海义赈彩票在租界内售卖的前例，以“未便准行”为由加以拒绝。见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卷十三（交涉），第14页。

兵丁在城厢内外昼夜梭巡，“清理街道，盘詰奸宄”，使治安大为好转，百姓称颂。^①移驻天津后，袁世凯“远稽汉代乡亭之职，近师日本町村之法”，进一步规范巡警制度，将天津城郊划为四区，挑选巡警巡逻，纠察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内容之一即为抓捕开场聚赌者^②。巡警本身自是不能赌博，这在巡警禁则、巡兵职守章程中均有明令，违者或革或罚。在天津南段巡警局制定的一百二十五条违警罪目中有两条是关于赌博的：“赌博偶尔聚会，输赢无多者”，“在街市摆摊叫卖迹近各项赌博及沿街小卖赌签者”，^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赌博的界定是很宽泛的，娱乐性的赌博和小型抽彩活动均在禁止之列。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具体的赌博管理办法，大致为以下内容：一、抄拿赌博以能获赌具为要，查明惯犯和聚赌窝主。二、对以赌博为业、设局抽头、无事聚赌、结党聚赌者均拘局从重惩治。三、对显恃护符聚众开赌者拘局从严究办。四、赌徒之仆从亦要密查。五、对街市小卖夹带签筒，公然以抽签为业者一律严行禁止。六、对居民铺商因喜、寿、丧事聚众赌博者概行禁止。^④另外在旅店管理办法中规定，在店客人聚赌，店主负有劝阻举报责任，否则究罚店主，^⑤而对于载有流氓博徒的船只河巡队则有扣留的权利，^⑥可以说对赌博开展了全面的打击，巡警制度的完善使禁赌活动有了经常性的制度保障，避免了赌徒们官来则散、官去复聚的现象，再加上执法认真，处罚严格，赌博活动大大减少，社会效果显著。

而几乎与此同时，两广总督岑春煊亦在广东筹议禁赌，此议一开立即博得舆论好评，有人欢欣鼓舞道：“续广东数百万人垂绝之生命

① 天津《大公报》1902年7月1日。

② 《袁世凯奏议》下册，第1170—1173页。

③ 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卷九，第4页。

④⑤⑥ 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卷八，第25、11、16页。

而苏其生机，起广东数十年枯疾之沉痾而复其元气，全国家之政体而免外人之胜笑，其在粤督斯举乎！其在粤督斯举乎！”并勉励岑春煊“粤民生死悬于此举……岑督其努力以为之矣”。^①可惜岑春煊虽以为政严猛、不讲情面著称，但面对广东赌风嚣张禁不胜禁的现象却束手无策，结果其禁赌雷声大雨点小，无果而终，只顺便敲了承办番摊的赌商一笔大竹杠而已。^②因此对赌博的禁止不仅要有严格的法令，还要有经常性的制度保障，以及严谨的执法队伍，否则禁赌只能等同于扫赌，扫而不除，扫而不净。

教育实业的成就以及社会风气的整肃，使直隶在清末新政中负全国模范之名，“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③厉行禁赌对改良社会风气革除陋俗起了关键作用，而后者对保证教育成效促进实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袁世凯个人来说则博得了舆论好评，赢得了民心政声。戊戌政变后人皆把维新失败归罪于袁世凯，《申报》对袁世凯的评论中有“罪大恶极”之语，他是《申报》在评述清末人物时最被贬低的人。^④而稍后时期的《大公报》则承认，“论袁世凯于戊戌之际则袁之罪不容诛，而论袁世凯于近年之顷，则袁之功又不可没”；“袁世凯者举办新政之最有魄力人也”。赞为“开明之巨手”、“新政之枢纽”。^⑤由此袁世凯获得了其政治生涯中重要性决不亚于军事实力的另一资本——政治声誉，其声名隆隆日上，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鼓吹非袁无法收拾残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态度。

① 《东方杂志》第2卷第7号，第100、104页。

② 卫恭：《广州赌害》，《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第64页。

③ 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卷十一，第2—3页。

④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⑤ 天津《大公报》（言论），1909年1月16日。

四、民国初年，全面禁赌挽颓势

1912年3月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继之被选为正式大总统，攀到权力顶峰。除了进行政治上的集权和财政经济上的改革外，袁世凯在整顿社会风气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继续厉行禁赌，并有所推进。纵观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禁赌，具有以下特点：

一、以法令为保障屡次申令禁赌 1912年6月袁世凯颁发《暂行新刑律》，对于一般赌博者、以赌博为常业者、开设赌场者、发行或贩卖彩票者规定了不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对于未实施上述行为或虽实施但未获利的未遂犯，也规定应定罪处罚。^①上述法令实与《大清新刑律》（宣统二年制订）对赌博罪内容的规定完全一致，这一则是因为民国肇始万端待理，无暇斟酌制定新的禁赌法令；二则因为《大清新刑律》对禁赌的立法已很成熟，也与民初社会状况相适应，故照旧沿用。除此之外，袁世凯还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禁赌法令，内容涉及到京城禁赌、全国禁赌、禁止官吏赌博及禁赌没收钱财及罚金的分配等。

如此频繁地推出禁赌法令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民国的建立并没有阻断前清赌风的蔓延，赌博依然盛行。“中人以下所赖以消遣之资者，狭邪游耳，猪奴戏耳”，^②“人民大众普通之慰藉物……曰赌博而已，曰娼妓而已”，而且竟至于每宴必赌，“主非是（指赌博娼妓——引者注）不欢，客非是不乐”。^③社会之腐败堕落实与前清无异，这与当时社会精英们所构画的民国蓝图相去甚远，引起

① 法令内容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② 《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内外时报），第35页。

③ 《东方杂志》第10卷第12号（内外时报），第6页。

人民的不满，而同时期日本报纸对中国贿赂公行、赌博势盛的现象也发表了评论。^①面对国内人民的不满和国际舆论的抨击，打击赌博势在必行。主观上袁世凯政府对晚清颓败有切身体验，作为新政权迫切需要刷新政治整顿社会风气，“去矜去惰”、“挽回气运”，^②树立新政府励精图治的良好形象，而禁赌则是挽回颓风革故鼎新的关键一着。

二、惩治官吏赌博成为重点 晚清吏治腐败，官吏沉溺赌博是表现之一，时人作“十字令”讥讽当时的官场习气，有“六曰围墙马钧中中”，即是指官场热衷于各种赌博游戏的情形。^③袁世凯督直期间，虽对社会上的赌博予以打击，但官场上赌风依旧盛行，时人记载“奈何官场竟作赌场，卜昼又兼卜夜……膺要差者，公事有无，不暇与闻；居现任者，属吏谒见，难谋一面”，“禁赌而不自禁”，^④官场赌风之盛可见一斑。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官僚队伍的主体仍是旧官僚，晚清官场的腐败也同样表现在民初政坛，嗜赌即是其一。这与百废待兴的社会要求不相适应，和与民休养生息所要求的清明吏治相违背，也不符合政府振衰救弊、共济时局的主观愿望。因此袁世凯多次发布命令，勉励各级官僚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并督责各级行政长官、肃政史随时访查，据实弹劾。针对官场赌风盛行的现象更是多次严令申责，先是在官吏服务令里申令官吏不得狎妓聚赌。继之在1914年8月下令严禁官吏牌赌、冶游、淫佚骄奢，对这种纵欲败度自毁行检的行为严加斥责。“长官有率属之责，律己不谨，将何以整顿群僚；京师为首善之区，相习成风，更何以昭示国内”，^⑤治

①② 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初版，第148页。

③ 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转引自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④ 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四，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8页。

⑤ 《临时政府公报》第833号，1914年8月29日。

理的重点主要是京师官僚。1915年3月，袁世凯再次下令告诫官吏戒除偷惰、瞻徇、奢靡、嬉游，其中嬉游即是指赌博而言。这一次治理的重点是京外官吏，“赌博之禁，迭申严令，而京外官吏竟有明知故犯者”。^①袁世凯劝谕官吏戒赌的出发点有三：一、官长嗜赌，无法表率群僚。二、国家图治方殷，各级官吏自应励精图治，不可舍业以嬉。三、官吏戒赌可转移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各部门内部也展开禁赌。1915年3月，司法总长章宗祥即飭令检查厅各长官，督率僚属严禁赌博。^②以弹劾不法官吏为任的肃政史更是多次指名参揭聚赌官吏。

中央和各部门内部开展的禁赌活动，遏制了民初官场赌风的恶性蔓延，肃政史的多次具名参揭使嗜赌之人心有畏惧，赌博活动大为敛迹，北京的社会风气日益好转。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说到就连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也束手不赌，不敢违背禁令，^③足见力度之大。

三、对彩票的态度有所松动 袁世凯在督直期间曾严禁彩票，斥为“导民以赌”，表现出对这种变相敛聚民财的筹资手段的不屑一顾。^④但在1914年10月，袁世凯却相继批准财政部发行储蓄票（设有奖额，定以抽签，以利息移作中签奖金，未中者三年后仍还原本，目的在于鼓励民众储蓄）和广东省发行彩票赈济水灾。^⑤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实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民国初年财政奇绌，入不敷出。根据1913年财政部的预算，岁出六亿四千余万元，岁入五亿五千余

① 《临时政府公报》第1039号，1915年3月31日。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1022号，1915年3月14日。

③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63章，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彩票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财富，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筹资手段，但彩票发行要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和监管，否则会沦为纯粹的赌博手段。本文不拟对文中彩票作定性的分析。

⑤ 详见《东方杂志》第11卷第5号第7页、第11卷第6号第2页（中国大事记）。

万元，若除去二亿二千万的外债收入，则财政亏空高达“三亿余万元之巨”，而1914年一战的爆发使世界经济大受影响，外债无处可募，财政“几濒于破产”。^①另一方面中国内部自然灾害频繁，山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十多个省遭受水旱、蝗灾，亟需赈济，同时还要对各国在辛亥革命时遭受的损失进行赔付，财政支出大大增加。为支撑危局，筹集款项，才不得不为“饮鸩止渴”之举，重新发行彩票。彩票的发行被时人视为重开赌禁，立即遭到各界反对，肃政史孟锡珏等请令从速停止广东彩票发行，^②粤省士绅梁敦彦也与同乡京官上书请严饬禁绝粤省白鸽票、番摊以及任何巧立名目弛开赌禁的行为。^③袁世凯毕竟也不愿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因此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粤省彩票及储蓄票不久即告停止（后来护国军政府攻击袁世凯复弛赌禁，抽取赌博恶税即是指的这件事）。

综上所述，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禁赌活动，政治意味更加明显，把禁赌与刷新政治挽回颓运相联系，以避免重蹈前清覆辙，颁布了一系列禁赌的法律、命令，把惩治官吏赌博作为重点，措施强硬，禁赌广泛彻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虽曾批准发行彩票但终因各方反对，旋即告停。

五、结 语

袁世凯驰骋清末民初政坛，其禁赌无论是出于主观上的注意还是客观需要，都一以贯之，并兼及其家庭生活方面，可谓是彻底的禁赌

①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4年11月28日，台湾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年版。

② 《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中国大事记），第3页。

③ 《临时政府公报》第1050号，1915年4月11日。

者，但当时赌博盛行似成积重难返之势，他一人之力并不能扭转整个社会赌风日炽的状况。在家庭方面，社会赌风的沾染使袁世凯构筑的家庭禁赌的小堡垒不攻自破，其儿子们照样在外赌钱，二子袁克文更是吃喝嫖赌抽样样皆来。在社会方面，就社会影响较大的直隶禁赌而言，也存在着地域上不彻底、社会阶层间不平衡的弊端。而民国初年的颇有声势的禁赌则随着袁世凯生命的结束，影响化为乌有。就整体而言，赌博从清末到民初呈蔓延发展趋势，说明赌博这一社会毒瘤有其发生学原理，晚清以至民国赌风日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腐败、社会控制式微，以及经济发展停滞、民生日艰是主要原因，不进行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铲除滋生赌徒的社会土壤，仅仅就赌治赌，治表不治里，并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这也是制约袁世凯禁赌成效的主要原因所在。

莫理循与袁世凯

——读《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

侯宜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澳大利亚人乔·厄·莫理循（1862—1920）在清末长期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报道中国的消息，颇有名气。1912年8月1日受聘于中华民国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10月中旬正式到北京任职。《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收录的是民国时期他与中外人士来往的书信。

莫理循非常喜爱政治顾问这项工作，对自己能够在中国施展才干，充满了信心。他比较直爽，不像其他外国顾问那样“总爱说中国人喜欢听的话”，而是对袁世凯讲“真话，并向他指出采取某些行动方针所遇到的困难”。^①任职期间，他在外交、内政方面对袁世凯和中国政府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仅从内政方面略加论述。

莫理循既然受雇于中国政府，就不能不忠于雇主，维护袁世凯和中国的荣誉与信用。在这一点上，他的确做了许多努力。

他极其注意外国舆论，一旦发现有损于袁世凯和中国的信用、名声时，就及时提醒有关方面，予以纠正和挽回。这里仅举数例：1913

^①〔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年3月27日，他向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日电讯报》记者向该报所发的电讯，“已构成对中国现政府和对中国高级当局，特别是袁世凯总统的品德和信誉有系统的攻击。而且，这些电讯内所用的字句，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我建议外交总长提请英国公使馆注意某个英国臣民的行动。因为他在公众中有失体面，而且目的在于破坏中英两国之间的和谐关系”。^①同年10月，他发现英国某些报纸攻击中国迟迟未能制定宪法，马上告知有关人士，“有必要对这些责难加以驳斥”，并将声明的副本送上^②。再如，1914年5月他看到天津一家受日本津贴的《论坛报》（英文）发表了旨在破坏中外友好关系的文章，即让蔡廷干务必提请袁世凯注意，命令外交总长立刻采取行动。

他不仅告知中国有关方面注意，还亲自出马向外国人辟谣。1914年5月，他请假前往英国探亲，同时也是“为了看看，能做些什么来消除欧洲报纸对中国和总统的政策散布不正确言论所造成的错误印象”。^③在英伦逗留的短暂时间内，他会见记者发表公开谈话，在各种集会上演说，还通过个人关系和接触影响舆论，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改善袁世凯的形象。7月9日，他把在一次盛大集会上所做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发言和驳斥对中国信用造谣中伤的情况函告了袁世凯，并得意地说：“许多人为这次发言所起的良好效果向我祝贺。”^④

莫理循之所以极力维护袁世凯，主要是因为袁世凯当时的真实面目尚未彻底暴露，在他看来，袁世凯是中华民国难得的领袖，没有当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18页。

② 同上书，第241页。

③ 同上书，第336—337页。

④ 同上书，第362页。

皇帝的野心，国民党不应该反对。1913年，袁世凯因为刺杀宋教仁和善后大借款而遭到各界人士激烈抨击，外国使馆广泛传说袁世凯快辞职了。他却认为，“总统正在这里拯救国家，这就是他目前面临国民党反对的时候所要做的。”^①肯定袁世凯所做的一切。他还致函外国朋友说：“我们正经历着一段艰难时刻，不过前景却日见明朗，总统的威望也一天比一天高。他正在一贯地以温和而又坚定的方式行事。他经常鼓舞他的追随者为事业献身，他所办的好事，即使连那些早些时曾经以疑忌眼光看待他，怕他怀有野心、打算攫取帝位或独裁权力的人们，现在也都一致公认了。在袁世凯为答复威尔逊总统而做出的声明里，他毫不含糊地申述他对共和国政府的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那些同他作对的人们提出的指责。”^②同年6月，他在英国接见记者时又声明，把袁世凯的施政形容为反动的独夫专制是不公正的。袁世凯并没有割断同青年中国党派的关系，也无意为自己的家族建立一个王朝。正是青年中国党派把事情搞得太过分了，企图一步就从最古老的专制政体跃进到全世界所知的最先进的代议制政体，他们的冒进使袁世凯不得不出面干涉。

正因如此，他在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前，认为袁世凯罢免广东都督胡汉民是个明智的行动。

其后袁世凯发现上海是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指挥中心，公共租界已成为国民党人的避难所，日本人尤其大力支持，极力主张改变公共租界现有的状况，以免中国的政治犯在租界中受到庇护。他不知如何才能达到目的，1913年7月2日特地与莫理循认真讨论了上海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② 同上，第147页。

的局势，询问了包括会审公廨在内的许多问题。莫理循对所提的问题不大了解，回答说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禄士是其朋友，最有资格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和意见。袁世凯令其以私人的名义加以探询、请教。莫理循很快从卜禄士那里取得了情报。袁世凯派人与驻京公使团交涉，上海公共租界终于将国民党人驱逐出去。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开始后，莫理循不仅赞成袁世凯取消孙中山的筹办铁路全权，而且提出应当立悬重赏缉捕孙中山。1913年8月5日，他致函蔡廷干说：“政府悬重赏缉捕黄兴、陈其美和其他人，而迄今还没有提到孙中山的名字。……那岂不是使孙中山显得非常滑稽？……我一听到他动身去香港，当即写信给外交总长，敦促他立刻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不准孙中山在香港登陆，因为他公开从事叛乱，反对一个同英国友好的国家。”^①

1913年10月20日，国民党在上海法租界办的《民国西报》登载了一篇题为《袁的独夫统治》社论。莫理循阅后，认为“最近这场酿成如此广泛祸乱的反叛，大部分应当归因于这家邪恶报纸的煽惑”，建议外交部立刻采取步骤封闭^②。上海法租界当局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将该报封闭，驱逐发行人出境。

袁世凯刚刚当选为正式总统，即提出增修约法案，企图扼杀天坛宪法草案，加强集权，实行独裁统治。对此，莫理循同样大力支持。1913年10月29日，袁世凯派人征求莫理循关于宪法起草委员会限制总统权力的意见。莫理循同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德诺作了长谈之后提出：“明智的办法是由总统亲自请古德诺教授草拟一个说帖，并用有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220页。

② 同上，第243页。

力论据加以支持，竭力赞成总统，指出在宪法草案下，他的权力受到极其危险的限制。”^①他的意见被采纳。古德诺遂写了一篇文章，声称如果采用天坛宪法草案，中华民国总统势必处于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的地位。莫理循马上将此文交英文《北京时报》发表，并建议发给各中文报纸登载。

以后，袁世凯通知莫理循，请他简明地写一篇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怎样做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什么是当前最需要、最迫切的事情，以及国内略见安定之后还应当做些什么，实际上是请他提出一个逐步发展的政策。令人遗憾的是，莫理循提出的方案无法查到。

对莫理循的忠实效劳，袁世凯极为满意，为了表彰其功勋，1913年5月25日授予他二等嘉禾章，1914年6月又授予他一等嘉禾章。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的许多品质表示钦佩，可是，袁世凯对外国人特别不信任，不吐露真情，一次也没有向他提供过全部的资料，以致使他无法提供有效服务的困难情况，这让他大为不满，对袁世凯能够拯救国家的满怀信心也逐渐失去。1915年5月26日，他丧气地写道：“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在口头上说说。”^②待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表筹安会宣言后，他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基本上完全改变了。

筹安会的出现，标志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公开化。在此之前，古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② 同上，第438页。

德诺曾应袁世凯之请写了一篇文章，鼓吹君主制较之共和制更适宜于中国。8月17日，蔡廷干将此文送交莫理循，希望他从理论上就这一问题的利弊得失加以阐述，确保中国的稳定，还请他当日下午到总统办公室面谈。莫理循是怎么和袁世凯谈的，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断言，他赞成中国实行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

1913年9月，与国内清室复辟言论相配合，日本人佐原笃介曾致函莫理循，提出中国应当让宣统皇帝复位的荒谬主张。莫理循答复说：“你的建议真是惊人，我不知道你主张使宣统皇帝复位是当真，还是开玩笑。”^①

莫理循赞成加强袁世凯的权力，目的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并不是支持其称帝。1915年5月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过后，他发觉袁世凯对日本害怕得要死，显然是因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在苦恼，指望能用某种戏剧性的事情来挽回他的威信”^②，但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帝制公开后，他警告袁世凯说，搞帝制得不到列强的支持。并递交了一份与古德诺不同的备忘录，“提出了推迟举行这一重大变革的主张”^③。

8月20日，莫理循将古德诺所写的文章送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并致函说：“你可以在第十四页找到成为筹安会宣言内容的那一段文字。我认为开始搞这种令人担忧的鼓动是特别不幸的。总统稳坐在他的座位上。他正应当使自己投身于工作，以报人民的推选。如果他干了几年，他是有权得到支持的。”“我在星期二见到总统，在我看来他好似病了。他患了哮喘，并正在埋怨，我看他在闷闷不乐。他略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页。

② 同上，第487页。

③ 同上，第490页。

带叹息地说道：他当总督时的权力比现在当总统的权力还大”。“我很发愁，因为我妻深为暑热所苦，战争消息又那么坏，现在再加上这个已使全中国骚动起来的疯狂计划，都是非常令人焦虑的。”^①

其后，他写信告诉友人：“我是不同情这一运动（指帝制）的。我认为他（指袁世凯）是不智的，而且做得不是时候，还可能把中国卷入严重国际纠纷之中。我坚决主张应当把这个运动推迟到欧洲战争结束之后。”^②

由此可见，莫理循并不同意袁世凯称帝，至少认为称帝为时尚早，要等到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看情况再定。

而袁世凯一心想登上皇位，对劝告根本听不进去，欺骗莫理循说，他已下定决心不接受皇帝宝座。

朱尔典也赞成莫理循的观点，致函答复说：“这种帝制鼓动是一派胡言乱语，自然，它是利己主义者发动的纯属虚幻的运动。”^③不过，英国与日本有同盟关系，当日本鼓励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朱尔典便不再表示反对。

然而，日本的鼓励完全是别有用心。至1915年10月，日本的态度突然转变。15日，外相石井菊次郎告知英国驻日公使：“在中国南方，反对袁世凯之宣传正在扩大。故很清楚，倘试图恢复帝制，则将爆发起义，英日两国蒙受之损失将比其他国家更大。无论如何，至少要劝告中国放弃帝制之打算，以防远东发生动乱。”^④英国表示采取一致行动。俄国虽不愿干涉中国内政，也对袁世凯改变国体甚感怀疑。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90—491页。

② 同上，第507页。

③ 同上，第492页。

④ 《帝国主义列强与袁世凯帝制》，《近代史资料》总106号，第63页。

28日，国体投票刚刚在一些省区开始，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约同朱尔典和俄国公使库朋斯齐会晤外交总长陆征祥，指出中国实行帝制，势必引起内乱，产生危险后果，劝告暂缓改变国体。

袁世凯未把此事放在心上。其党羽均以为这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不可宽恕的举动，群情激昂。

莫理循则认为三国的劝告是正当而又及时的，并且正是把袁世凯党羽们的愤怒情绪转化为有利于协约国，敦促中国参加协约国的最好时机。于是他在10月29日致函蔡廷干说：“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在目前时刻提出这个照会，它是最不祥的。它表明趋势已经多么明显，正在从事欧洲那场大斗争的英俄两国政府，已把他们的远东政策完全交给日本指导了。依我看，现在似乎已是中国重新考虑对世界态度的时候。”^①

袁世凯得到蔡廷干的报告，30日召见莫理循。莫理循提出中国应当加入协约国一边作战。不久，袁世凯又令其写一份备忘录呈进。

11月1日，莫理循将备忘录送交蔡廷干。在备忘录中，他写道：“中国已到了她的历史上的一个危急时刻，”“做出决断的时刻已经到了。”“中国能够收复她的大部分损失，并能够为将来树立自己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中国必须与英、法、俄、日与意大利联盟，并对德宣战。”他列举了采取这一步骤的“最强烈理由”十二条，如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避免侵略、将来在媾和会议上得到一个席位、摆脱财政困难，等等。为了促使中国加入协约国，他还提出一条最能耸动袁世凯的理由：“中国将在承认她的帝制政体这件事上，能够有把握地获得同她结成联盟的各大强国的支持。”^②在此，他把加入协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98页。

② 同上，第499—502页。

约国看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以致不再强调袁世凯称帝是否“疯狂”了。

袁世凯承认莫理循所提的论据极有说服力，期望有朝一日中国的代表在和平会议上得到一个席位，更期望称帝能够得到列强支持，答应只要不再像1914年8月那样他提出这个问题时遭到拒绝，就十分赞成加入。他准备按三项条件参加，即保证将来不受德国报复；中国占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以及奥地利在天津的租界；安排从上海引渡政治犯。只是德国是积极支持他称帝的，他又不愿主动与德国失和，提出最好是迫使德国对中国宣战，而不要由中国对德国宣战。

英、法、俄三个强国目前所着重考虑的是，“协约国在华最重要之政治目的在于切断中国同德国之联系。为此，使中国同德国断交及驱逐德国臣民实为上策。协约国，首先是日本将从德国得到好处。至于袁世凯是当总统，或是当皇帝，对协约国无关紧要。”^①因此，正式要求日本政府和他们一起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而因日本敌视袁世凯，正在准备把中国搞乱，以便从中渔利，便断然拒绝了。中国遂未能加入协约国。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背叛民国，接受帝位，日、英、俄、法、意公使立即声明五国政府对于中国将来形势的发展仍持静观态度。同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袁世凯野心不死，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1916年元旦悍然将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年号纪年，接受百官朝贺，做起皇帝来了。

日本政府以云南独立为口实，1916年1月20日召开御前会议，

^① 《帝国主义列强与袁世凯帝制》，《近代史资料》总106号，第78页。

决定再严词警告袁世凯“延缓帝制；如不听，则出自由行动，派兵驻中国要地。一面认云南为交战团体，一面宣告中国现政府妨害东亚和平”。^①

袁世凯接阅驻日公使陆宗輿发来的情报，惊惧异常，赶快令外交部密告各国驻京公使，2月9日登极之举作罢。然而，1月24日中国同俄国和外蒙古签署在外蒙古安装电报线路的专约时，却书写了洪宪元年。莫理循气愤地写道：这个专约“看来特别有害。它的唯一的，但被当时主管这事的政府认为是特别重大的好处，就是它签订于洪宪元年。为了把洪宪年号用这种方式填进去，中国不惜出让要求于她的任何权利。她认为填进这个日期就等于插进楔子的尖端，从而可以取得俄国对帝制的默许，也就是走向正式承认的第一步”。^②

此后，袁世凯一方面下令进剿云南护国军，一方面令莫理循到长江一带了解情况。

莫理循遵照袁世凯的愿望，从京汉铁路南下，访问了汉口、南京和上海等地，由津浦铁路返回，2月7日抵达北京。当天下午袁世凯接见了她。

2月9日，莫理循向袁世凯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

备忘录首先写道：“此次访问所得极其令人担心。”“我遇到的每个人，一谈起这个问题，都十分痛惜中国目前的局势，并强烈非难那个酿成目前动乱的帝制政策。我遇到的每个忠于中国利益的人，谈到阁下的政府，不顾一切逆耳忠言，强制推行那项使国家陷入混乱境地的行动时，无不义愤填膺。”

①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0页。

②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43页。

接着列举了许许多多事实，用以说明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辜负了人们的委托，没有改善国家状况，革新行政机构，推动中国向前，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看齐，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继而写道：“日本的干预几乎是招来的，用日本的情况对比中国，从事鼓动的日本煽动者或中国的革命党人，得到不少的热心追随者。叛乱是有传染性的，人民情况得到改善之前，叛乱必然继续传染。”

“我遇见的那些人，认为轻率而不合时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选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

列强的劝告不失体面，“但是未被采纳，发生了人们担心会发生的事。这个国家被革命弄得四分五裂，列强虎视眈眈，伺机从动乱中谋利”。

“在中国的每个人，久已知道那些来自各省吁请阁下登极的函电，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系由北京的一小撮顾问准备好，发交各省，再发回北京的。”“外国报刊发表的各省通讯，向全世界暴露了运动的虚妄。向全世界宣告因为尊重人民的一致愿望而重建帝制，是有损阁下美名和声望的一桩笑柄。1月14日阁下似乎听信人言，以为云南叛乱二十天内可以镇压下去。武力可以镇压，但引起的叛乱情绪，武力却镇压不下去。这种情绪得到中国大部分人民，甚至北京消息最灵通的官员们的同情，即使不是得到支持的话。”

最后又断然写道：“国家正处于严重危难之中。扭转险境的唯一途径，只有明白宣示放弃复辟帝制。待目前战争一告结束，确实查知民意之后，立即建立宪政议会，召开国会，并组成由一位认真负责的人担任总理的责任内阁。”^①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22—526页。

在备忘录中，莫理循详细阐述了复辟帝制所遇到的深刻危机，竭力主张立即放弃帝制，以便扭转险境。

袁世凯阅后尽管惊惧异常，然而并没有立即放弃帝制，又征求其他顾问的意见。其他顾问主张采取比较间接的行动，首先试试延期的办法。“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分阶段放弃——先延期，后取消——似乎可以少丢一点面子。”^①袁世凯采纳了后者，拖到2月23日，宣布从缓办理帝制。

莫理循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不幸的了。要是放弃的敕令随着延期敕令颁布，总统在全国面前的形象会好得多。”^②延期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③

继云南、贵州之后，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同一天，袁世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忽然派人送给莫理循一千元。莫理循通过蔡廷干向袁世凯表达了谢意，还指出：“我诚挚希望总统阁下接受最高智慧的指导，采取那种挽救国家脱离危险的和解措施。这个国家目前面临内战恐怖的扩大，以及外国干涉不断增长的危险。”^④

事实确实如此，连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一部分北洋军将领也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袁世凯害怕取消帝制后当不上总统，极为忧惧。

正在此时，3月21日莫理循又向袁世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写道：

“向可靠方面所作的咨询，证实了我持有的见解，即是局势的严重性在迅速增加。据信广东即将脱离；对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全省怀

①③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59页。

② 同上，第544页。

④ 同上，第534页。

着最强烈、最普遍的不满。一旦广东分离出去，湖南、江西和南方其他各省也会仿效。他们将正式要求各外国承认脱离了的省份为交战的一方。日本肯定会给予这种承认。

“外国的可靠报道，把云南军队的守纪律和人道行为，同北方军队的残酷蛮横作风做了对比。……”

“如果总统立即发布一道有力、明确的命令，放弃帝制，并宽宏大度地承担起筹安会一切陷国家于内战的活动的责任，那就可能防止更大的危险。这条命令的措词应该毫不含糊或毫无保留。

“继最近宣布延期建立帝制，并拒不接受主张帝制的新条陈之后，又紧接着发生颁布许多新命令，设立勋贵品级，继续筹备帝制，不断使用皇帝仪式和尊号的事。这一切使目前危险的局势严重恶化。这种显见缺乏诚意的做法，为人们深恶痛绝。”^①

袁世凯深感帝制成为泡影，不得不于次日宣布撤销帝制。

袁世凯虽然撤销了帝制，仍然恬不知耻地以总统自居。莫理循目睹全国反对的情绪十分强烈，估计袁世凯要保住总统职位会遇到极大的困难。4月5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这里的局势是严重的。我怀疑袁世凯是否能保住他的职位。最近的事件使他深受震动。”^②

同日，莫理循又致函庄士敦说：“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我的合同1922年9月30日才满期，我真不愿和失败联系在一起。我初与中国人一同工作，对未来有很大信心，但是过去这一

①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34—535页。

② 同上，第544页。

年多，每天都看到倒退，我即使想对此最低限度地加以制止也办不到。现在太迟了。”^①至此，莫理循对袁世凯彻底绝望了。

一个月后的5月8日，莫理循痛心而又愤怒地写道：“袁世凯想穿龙袍的疯狂野心，毁了他自己的前途，也严重地连累了他的国家。各方面都警告过他。”“可是家庭影响和他自己的野心太强烈”，“现在很难看出这位总统如何保持他的帝位”。^②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讨伐声中病死。莫理循认为：导致袁世凯倒台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去年初夏开始把总统抬上皇帝宝座的疯狂运动”^③。

由上述可知，在1915年8月之前，莫理循对袁世凯极力效劳，袁世凯对他也倍加赏识。此后，莫理循反对袁世凯称帝，至少也认为称帝尚非其时，主张推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看情形再定。只是在他认为加入协约国对中国有许多重大利益时，才以称帝会得到列强承认为理由之一，加以耸动。袁世凯之所以延缓、撤销帝制，南方护国军的武装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固为主要因素，其次与列强的警告特别是日本的恐吓有关。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在关键时刻二上备忘录，指出再不放弃帝制，立将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使袁世凯大为震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容忽视。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50—551页。

② 同上，第554—555页。

③ 同上，第605页。

袁世凯及其政治顾问 莫理循与《二十一条》

奚 坤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始而出兵侵占青岛，继而企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它的控制之下。1915年1月18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未经外交部，直接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根据这个秘密条款，日本人的势力不但从满洲扩展到蒙古、河南、山西，而且福建、山东也将沦为和满洲一样的境地。尤其是第5号七项要求，危及到中国的主权。日本公使威胁中国政府，不得泄露条款的内容。日本政府并以换防的名义，增兵南满，向山东、天津、福州等地调派陆海军，以武力支持日本公使，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袁世凯政府虽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和无理要求并实施了一些对抗措施，但是，在国际大环境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袁世凯在争取舆论时由于存在惧怕日本报复的心态导致措施失当，最终还是一再让步，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最后修正案。本文以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赠给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文件中有关备忘录、日记为主要资料，从袁世凯及其政治顾问莫理循^①

^① 关于莫理循的生平介绍，可参阅拙文《评珀尔〈北京的莫理循〉》，《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和《北京的莫理循》中译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在争取舆论、希望得到列强干涉的角度，阐述中华民国政府在处理中日交涉时利用舆论的得失，同时说明正是袁世凯本人通过莫理循向英、美等国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全文内容，也是他经蔡廷干通过莫理循向英国等驻华使馆以及相关记者发出日本交给中国的全文文本，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袁世凯把阻止日本的侵略野心建筑在外界的同情心和列强的干涉上，没有也不敢从国内吸取力量，一旦得不到支持，他便只有让步。莫理循虽然有为英国利益考虑的目的，但作为中国的雇员，他全心辅助袁世凯，在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将《二十一条》完整内容公诸于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一、泄露二十一条内容，争取舆论支持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苛刻的条件，袁世凯是反对的，认为不能接受，“所要求太无理，令人愤恨”。^①也曾对莫理循表示决不接受的决心，甚至说“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②尤其是对第5号七项要求，他认为是把中国当成了第二个朝鲜，“各条约多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③袁世凯的这些言论不乏惺惺作态，也有试探日本的意图，但还是反映了他当时真实的心态。

袁世凯采取了多种措施处理这一重大外交问题，如更换外交总长，由陆征祥接任孙宝琦，目的是拖延谈判时间；请宪法顾问有贺长

① 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第280页。载《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莫理循文件 REEL 839/备忘录。莫理循文件藏于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在笔者的倡议下，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购得其中部分缩微胶卷。

③ 风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版，第225页。

雄回国探询日本元老松方正义和山县有朋的意图，寄希望于元老们的反对；派遣农商部次长金邦平赴日结纳日本要人；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反对日本的要求，以增强谈判的力量，等等。除此之外，袁世凯还试图通过对外泄露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如日本对长江流域利益的要求等，期望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以其中影响到其他列强在华利益的内容引起英、美、俄等列强对日本的干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写出了袁世凯的这一心态：“中国人信赖舆论。中国人非常希望的是，正如他们常对我说的，虽然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不能给我们提供物质援助，但美国政府应该了解中国的自由受到攻击的情况；因为他们认为，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是最终要取得胜利的力量。连当权的袁世凯也抱有这个希望。”^①

中国政府要向外界泄露要求的内容，并不是明白公布或直接交给各有关使馆，其原因在于日本对中国的蛮横威胁，而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不得向外界泄露二十一条内容的蛮横要求，只能软弱地予以保证。正是这一保证导致中国在争取有关列强干涉上拖延了时间，与此同时，日本则捷足先登，把经过删减的文本通知有关国家，致使中国发出的消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不到信任。

中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如陆征祥、蔡廷干、顾维钧等首先不同程度、不讲具体内容地将《二十一条》的恶劣后果和性质泄露给英、美、俄等国使馆或记者，而且均采取比较隐讳的方式。芮恩施说：“中国人害怕引起更大的祸事，因而尽力保守住这个秘密。然而，他们无法让那些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人一点也不知道。”^②如总统府秘书顾维钧就建议：“北京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

① [美]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12 页。

② 同上，第 103 页。

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我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根据世界的形势，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我看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告知伦敦。”^①在得到袁世凯和外交总长的首肯后，他和英美使馆保持接触。每次外交部开会后，他就尽快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财政总长周自齐曾向《泰晤士报》记者端纳发电报，希望他从上海“速归”，并以十分隐讳的方式使端纳了解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曾告诉你正要发生某种卑鄙事情，但到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内容，我只能说的是，日本人正在要求某种东西。”^②1月22日，一位总长向美国公使芮恩施透露了《二十一条》的严重性，“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是接受的话，那将断送中国的独立，使它沦为附庸”。^③1月29日，陆征祥访问俄国公使，说明日本所提要求的严重性，并请公使严守秘密。^④

报界很快得到消息。1月22日，日本《朝日新闻》印发号外，刊载日本对华四条要求，即：（1）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九十九年；（2）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3）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4）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⑤同日，中文《亚细亚日报》、英文《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之间的外交新动向。31日，《亚细亚日报》译载了《朝日新闻》的号外全文。但当时还没有更加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② 端纳口述、泽勒记录：《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台北1994年版，第114页。

③ 风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版，第104页。

④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52页。

⑤ 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309页。

具体的内容。在京外国记者端纳、普特南·威尔、文纳、摩尔等也向国外报纸或通讯社发了电讯。^①当时国内反日舆论声浪四起。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商民、学生和海外华侨，纷纷致电或投书报刊，一致抗议日本，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希望政府宣布二十一条内容与交涉情形。虽然英美等国报纸对其真实性抱怀疑态度而不予刊登，但仍然对日本表示了猜忌；英、法、俄驻华公使向日本使馆质询。日本政府不得已，于1月25日由加藤外相约见英国驻东京大使，将二十一条要求中1—4号内容通告英使。^②当时的形势对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有利的。

二、袁世凯、莫理循合作揭露日本的阴谋

莫理循在这场危机中，既不是记者，也非中国政府要员，作为对中国生死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国政府对顾问们极为保密，即使让日本人、宪法顾问有贺长雄向日本有关方面了解情况，也是有所隐瞒。^③因而莫理循无从知晓内情。但他十分关心局势，希望了解《二十一条》的实质内容。20日，他谒见袁世凯，但袁世凯丝毫未提此事，然而，莫理循得到一个印象：日本人使他十分忧伤。^④

虽然几个外国记者都在根据自己得到的尚不十分完全的消息发出电报，国内报界也议论纷纷。但在1月底，无论是莫理循，还是那几

① 莫理循文件 REEL 249/日记，“1月26日，端纳告诉我二十一条的事。威尔两天前发了电报。1月29日，端纳来访，发了二百八十字的电报。”

② 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0页。

③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

④ 莫理循文件 REEL 249/日记。

个记者，并不知道《二十一条》的全文内容。莫理循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向全世界公布真相，澄清人们的猜疑，从而达到遏止日本侵略野心的目的。他于1月28日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有关日本所提要求，不幸至今仍保守秘密，如果完全保持住了秘密，那也不坏。可是，它已经泄露。其结果使真相混淆。如今流传着最高奇的谣言：传说日本进行侵略；传说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传说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真相究竟如何，我不知道。”“我认为准许把日本照会内提出的确定条件在报上发表是明智的……如果把日本的真实要求公布，一定可以加强中国的地位。”^①实际上，当时的舆论对中国是比较有利的。但袁世凯政府并未、或者说没有也不敢想到抓住这个时机，以回击日本。芮恩施说：“中国政府被日本这一着打得晕头转向，因而使它错过了最好的良机。它本可以将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立即通知与中国缔约的各友好列强，因为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不仅影响中国政府的行政独立，而且影响它们在华的平等权利。”^②

面对有利于己的时机，袁世凯仍然不公开地泄露日本的阴谋，继续采取私下透露的方式以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和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不同的是，到2月初，他亲自出马，通过他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向国外报纸透露真相。可以肯定地说，端纳在2月10日发出的报道的真正来源就是袁世凯本人。

2月4日是莫理循五十三岁生日。蔡廷干照例表示祝贺。而这一天莫理循的日记告诉我们：蔡廷干不仅告诉了莫理循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而且申明是依照袁世凯的意思行事的。下面记录了三部分内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93—394页。

② [美]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6页。

容，即（1）铁路，特别提到龙口至潍县这条山东境内的铁路（山东中部偏东，胶济铁路经过境内——笔者注），而且说附加了军事权利，其性质与日本在满洲的状况相同。（2）控制中国沿海。（3）要求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利益。第二天，2月5日，蔡廷干给莫理循发出了短柬，“总统要在今天下午4点见你。咱们3点半在那儿会面。我有许多话告诉你。”^①当天下午，莫理循谒见了袁世凯。回家后他立即整理了一份备忘录。前面部分显然是蔡廷干在两人会面时说的，说明日本的要求有二十一条，并且没经外交部而是直接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申明应与外交部交涉。蔡廷干并把当天中国与日本第二次会谈情况做了简要介绍。之后便是袁世凯与他的谈话内容（括号为笔者所加）：

日置益（日驻华公使）对总长、次长的态度傲慢。他坚持（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二十一条》）。但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

备忘录下面的顺序是我自己安排的。我被告知不可记录。我这里所写的是根据记忆整理的，是我与总统一小时会见的内容。

总统说，有消息说日本已给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三十万日元，以通过这些革命党攻打中国军队，这种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他进一步说，中国驻日公使报告，俄国驻日大使告诉他，他已向英国大使询问日本要求的事，英国大使表示一无所知，并向日本外交部询问，后者允诺以后告诉他，但至今未有任何消息。

日本的要求：

中国中央政府应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

① 莫理循文件 REEL 839/通信。

中日合办警察机关。

中国政府期望由日本保证中国的完整。

日本有权在中国任何地方布教。

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及各岛屿，无论任何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日本将有权修造四条从南昌起始的铁路，即南昌至潮州、九江、武昌、杭州。（总统强调，这样建造的是日本人的铁路，而不是日本人为中国人建造的铁路。）

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

(1) 长春至吉林（即吉长铁路）的铁路期限展期至九十九年。

(2) 安东—奉天铁路期限展期至九十九年。

(3) 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展至九十九年。

(4)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有经商、居住、耕作及其他权利。

(5) 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中国不得允准他国人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

(6) 日本国臣民在东部内蒙古具有开矿权。

长江流域：

日本国与中国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日本国允准，该公司铁矿、煤矿均不得开采。

（总统解释说，这意味着所有长江流域煤矿、铁矿的开采都受制于日本。）

山东：

将德国在山东所有权益让与日本。龙口或烟台至潍县的铁路

由日本建造。

(总统认真地指出,这与外国在中国建造铁路的条件不符,而是在中国境内的一套日本铁路。)

福建:

不经日本允准,不得在福建境内建造船厂、铁路或开采矿山。

中国所有军械均从日本购买,中国如设立军械厂,日本有权帮助中国建立。^①

在这个备忘录中,莫理循首先记下了日本不敢对外公布的第5号的其七项内容,第1—4号大部分内容也做了记录。

得到真相后,莫理循试图通过记者对外公布。2月7日,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文纳(Albert E. Wearne)到莫理循处,莫理循“给他一些暗示说明日本的要求”。2月9日,莫理循主动与《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络。2月10日,端纳来到他的住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尽可能地写好消息,他将在《泰晤士报》上发表。”^②端纳于2月11日发出了报道,《泰晤士报》于12日刊出。莫理循认为,这“准定会起一种抑制作用”。他在11日致蔡廷干,“昨晚(《泰晤士报》显示,端纳的电文是11日发出的——笔者注)端纳向《泰晤士报》发了三百十八字的电讯,这是他从没有发出过的最长的电文。”他说端纳强调中国至今仍不公开发布日本的要求,但他向《泰晤士报》保证,他们提供的消息是可靠的。^③而且,他们还把同样的消息送给《字林西报》和美联社。之后莫理循写道,“我在这里已经

① 莫理循文件 REEL 839/备忘录。

② 莫理循文件 REEL 249/日记。

③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页。

没有什么更多的工作可做”，希望到汉口和上海一行。他如此轻松的口气，反映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探询，终于有了结果之后的欢畅。但是，他并没有在日记里说明他是如何将备忘录交给端纳的，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袁世凯的一个卫士向我透露了此事。我历尽周折说服袁世凯让我看到文件的原文。”^①5月24日致《泰晤士报》记者斯蒂德时，也是一笔带过，“自然，我早先为了协助他（指端纳），已经给他一个副本”。^②端纳的回忆录却以一种小说式的笔触详细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当端纳去拜访莫理循时，莫理循没多说什么，很快地站了起来，别有深意地望着端纳说，“对不起，我到书房去一下就来。”端纳观察到，莫理循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时，他的一只手长久地搁在中间那堆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端纳抓住时机，迅即向那张办公桌走去，伸手摸出莫理循似乎作过暗示的那些文件。大厅里传来脚步声，端纳赶紧把文件塞进外套里面。莫理循走过来：“对不起，老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乔治，我该走了。”他会意地对视了一下……端纳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打开文件，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二十一条》的译文。他立即给《泰晤士报》发出特稿。此后，“真相大白于天下，北京的消息成了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③

端纳自述在时间上不甚清楚。根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莫理循文件和《泰晤士报》的有关内容，笔者认为端纳此段叙述的时间应是2月11日他发出电报之前。《泰晤士报》从1915年1月30日开始刊登有关中日交涉的消息，2月12日和20日分别刊有《二十一条》的内容，

① 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页。

②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

③ 端纳口述、泽勒记录：《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台北1994年版，第118、120页。

其余则为中日交涉状况和美国、德国的反映。从12日起，北京发出的消息除了交涉状况再无《二十一条》的内容。20日的电文来自美国纽约。因此，基本可以断定，2月10日，莫理循确实将《二十一条》内容告知了端纳，但采取了何种方式，现在只有端纳的这段叙述，或者只能是千古之谜了。那么，电文与莫理循得到的消息是否吻合呢？下面把端纳的电文和莫理循得到的消息做一比较：

端纳的电文如下：

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内容尚未正式公布，但其内容如下：——

日本要求中国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下列为对指明各地区的特殊要求：——

东部内蒙古——日本将拥有采矿权；未经日本允准，不得建造任何铁路；日本国臣民有经商、居住、耕作、购地及其他权利。

南满洲：——旅顺、大连租期展至九十九年，安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租期展至九十九年；日本国臣民有经商、居住、耕作、购地之权。

山东：——将德国在山东所有权益让与日本，龙口至潍县的铁路由日本建造。

福建：——不经日本允准，外国资本不得开矿、筑路或投资。

长江流域：——日本与中国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日本国允准，该公司铁矿、煤矿，他国均不得开采。

到目前为止，中日两国的谈判只进行过两次。第二次谈判时，日本公使表示将收回一些要求，但三天后，他宣称东京指示，坚持要求所有条款。^①

^① 《泰晤士报》1915年2月12日。

从以上内容可知，电文对日本向英、美等国公布的东蒙和南满以及英国所关心的长江流域的情况报道得较为详细，但对于中国危害最大，也是各国列强所关心、而日本不敢对外公布的第5号内容，并未明确、完全地反映出来。之所以没有反映出来，不是他们没有报道，而是由于《泰晤士报》删节了。原因在于《泰晤士报》认为这并非官方消息，从而听信日本驻英大使的搪塞之词。端纳在接受《字林西报》的采访时披露了这一内情。《泰晤士报》编辑斯蒂德接到端纳的电报后，看到与日本政府通知英国政府的内容不符，特向日本驻英大使询问，大使竟矢口否认电文的真实性，当斯蒂德念出电文后，“日使方承认，关于满洲之权利，日本大概曾向中国提出普通要求数条，此外一无所有。《泰晤士报》聆悉日使之声明后，将余电删节登出，并电余，须证明此项消息。盖总社对于北京方面所传，认为或系夸大之宣传也。”^①

消息的公布，引起两种结果。一是得到国外新闻界的支持，美、俄、英三国乃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乃将其较为普遍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但仍然隐瞒第5号内容。虽然日本仍在掩饰，但袁世凯政府和莫理循等人的努力在争取舆论方面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顾维钧回忆：“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中国已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②电文对英国一些议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致电外交部称：“议员摩尔登诺在下议院演说……引用《泰晤士报》二月十二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85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124页。

日所载之条款全文，又引用纽约报界联合会二月二十一日所载之条款全文，以资考证。”^①施肇基还在另外的电文中援引《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报道，说明美国“报纸舆论对于日本之政策，极加驳斥”。^②俄国驻京公使则说：“所有远东英国报刊和所有有势力的英国在华商界都不无根据地认为日本的要求对自己的利益有很大危害，对日本的要求俱表示最强烈的反对，而对中国人则公开表示同情。”^③

二是由于消息不是中国政府发出的，英美两国对非官方发布的消息表示怀疑。端纳早在1月底第一次发布消息时，《泰晤士报》将消息扣押两星期未发。当他于2月11日第二次发出电报后，《泰晤士报》虽在翌日即刊登，但在端纳的电文前，刊登的是《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福来萨发自日本的报道。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要求“或许没有一点真正影响中国的完整”，报社第二天的社论明显同意这一论点。社论指出：“要紧的是应当注意传到我们这里的详细情节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完全从北京发出的。中国人讲出来的消息常是靠不住的。目前，更有特殊理由必须极其谨慎对待这些消息，不管是从什么渠道传到欧洲的。”^④他们存有偏见地认为“来自那方面的一切消息，一切意见都早已在来源地染上颜色了……即使就我们昨天发表的北京版的要求内容而论，这些要求从原则上看不像是苛刻的，或者不讲道理的……它们看来既没有以任何方式危害中国的完整，也不违背迄今为止一直为其他国家接受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

① 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

②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页。

③ 同上，第863页。

④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页注2。

的原则。”社论在按语中说：“据我们了解，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已经在上个月内通知英国外交部，而且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政府也都已知道……在得到关于日本要求的详细而确实的说明之前，必须暂不对要求的范围和性质作出判断。”^①这说明了端纳和莫理循的工作一方面的确给日本以压力，但另一方面，并没有立即引起英美两国的积极响应。

《泰晤士报》对端纳电报所持态度表明，袁世凯政府在新闻宣传方面措施失当。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以威胁的方式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保守机密。中国政府慑于日本的淫威，软弱地保证接受了这一要求。正是这一保证束缚了中国，使之在争取舆论支持和列强干涉方面打了折扣。虽然中国政府采取私下向新闻记者和有关驻华公使泄露消息的方法，以争取舆论界的支持和英、美等列强的干涉，但实际上已经处于劣势。日本政府将不完整的对华要求通知英、法、美、俄等使馆及其政府，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因为这毕竟是官方的通知。而此后从北京发出的消息，虽然属实，却因为有日本通知在先，致使各国不敢轻易相信。因此，虽然这一新闻攻势取得一定效果，但其程度是不够的，通过私下透露而非公开正式公布《二十一条》，降低了其内容的可信度，与中国政府光明正大地公开宣示是完全两样的。《泰晤士报》删节端纳发出的电文就是明证。但中国政府既已软弱地同意保密，尽管有莫理循、芮恩施等敦促中国明白宣布，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退一步说，如果中国真的公布，是不是就一定取得完全效果呢？这也很难说。莫理循后来向梁士诒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出现。列强之

①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页注2。

间为了占有中国，他们之间或许出现一场流血斗争。然而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列强之间的友好谅解。”^①对于袁世凯政府的作为，莫理循牢骚满腹。他在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以袁世凯的方式行事，就像在旧体制下一样，没有什么变化。”^②

莫理循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不能不说有他为英国利益考虑的一面。2月15日，他把文件译本交给英国公使朱尔典时，特别指出，“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英国人将从此永远被排挤出长江流域、南满、东蒙、山东和福建境内的任何采矿事业。”“若干年来，我们一直为反对德国在山东的独占局面而斗争，现在，那些独占权都要移交给日本了。如若这些要求取得同意，东亚的全部局势必然发生深刻变化。”^③显然，他希望英国政府干涉从而保护其在华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由于消息的透露，中国政府能够得到世界的同情与支持，从而打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

三、揭露日本的欺瞒手段，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

由于报刊舆论对英、美、俄等国政府产生的影响没有达到袁世凯政府所希望的效果，袁世凯与莫理循又采取新的方式，这就是将《二十一条》全部文本交与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馆，试图继续引起列强的重视。芮恩施评论说：“在北京，人们的理解是，《泰晤士报》赞同的是《二十一条》的摘要文本，而不是它的正式文本。但是，中国官

①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

② 莫理循文件 REEL 249/日记。

③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页。

员则忧心忡忡，深恐公众舆论默然同意这个受到较少谴责的文本，从而鼓励日本更强烈地迫使中国接受全部要求。”^①为了打消这一影响，蔡廷干于2月13日一早给莫理循打电话，说 he 已从中南海得到《二十一条》文本，之后将与莫理循联系。莫理循一直等到下午4点半，但没有任何消息。直到15日，蔡廷干终于将《二十一条》全文英文译本交给了莫理循。^②莫氏随即向一些英国人士说明日本前后两种文本的不一致，争取中国得到英国的同情。在得到文本的当天，他即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泰晤士报》已经听信日本政府所说日本的要求是无害的，也不致与任何有关门户开放与在华机会均等的条约规定相违背……有鉴于这种说法，我秘密送上日本照会全文的审慎译本。”^③2月17日，他分别将文本交给端纳，寄给《泰晤士报》记者斯蒂德，并致函说：“日本人仅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内容，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骗人的虚假印象，结果是北京记者发电报的要求全文竟被认为是故意夸张。”“我了解，英国外交部被告知日本政府提出十一条要求，而中国一直同意讨论这十一条。然而日本人却从一开始便坚决要求中国必须全盘接受包括在照会内的二十一条，在对这一点表示正式接受之前，不许逐条分别谈判。”“这些要求如果予以同意，其影响比允许公众所知道的还要深远得多。你也可以看到，英国人除非得到日本同意，将不能在南满、东蒙、山东、长江流域和福建参与任何采矿事业。”^④25日，他又致函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把日本递交给中国政府的《二十一条》文件副本与日本政府通知英美使馆时开列

① [美]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8页。

② 莫理循文件 REEL 249/日记。

③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404页。

④ 同上，第404页。

的要求同时寄给他，揭露日本在撒谎，“日本政府说这些就是它于1月18日提交中国的全部要求”，但“当把两份文件放在一起阅读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里所表明的是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丢脸的外交上的奸诈事例”。^①莫理循的努力得到他们的赞扬，熙礼尔高度评价了他，说他的工作“削弱了日本的地位，同时加强了中国的地位”。但他看到了整个国际局势并不利于中国，阻止不了日本“趁此良机，坚决想从中国得到它能够敲诈出来的一切”。^②

关于向驻外公使透露《二十一条》译本的问题，记者端纳有一说法，他在接受《字林西报》采访时说明是他向中国政府提议的：

当余接《泰晤士报》电讯后，曾经访余熟识之中国阁员，谓日本显然欲以一手遮蔽全世界耳目。故中国即应有抵制办法。请立时以日本要求全文译本付余。此时华官仍慑于日本之恫吓，不敢以消息直接授余。于是余乃代为设策，将译本交袁氏顾问莫理逊博士转交，如日本有所诘责时，即称系余乘莫氏不在，从莫氏案头所取得。^③

此说与端纳回忆录有所混淆。回忆录中，此方法用在2月11日发去电报那一次，正如前文所引的那样。从莫理循日记中看到，2月10日，端纳到莫理循住处，莫理循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将尽可能地写好消息，他将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而2月17日则只写将“《二十一条》文本交给端纳”，但均未有任何细节描写。端纳17日在得到英文译本后，又向伦敦发了长电，但《泰晤士报》“谓此电尚待研究，一时不能发表”。^④端纳或许有他所说的提议，但由于此电文没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

② 同上，第410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86页。

④ 同上，第385页。

有发表，而2月11日电文虽被删节，但发表了。因此，端纳在回忆录中将此次手法移植于前次，使二者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了回忆录中那段生动的描述。

在莫理循2月份的日记中，外国驻华记者端纳（W. H. Donald）、文纳（A. E. Wearne）、摩尔（F. Moore）和纪乐士（W. R. Giles）等均与他有所接触。如在2月15日这天他记道：“端纳来。接到《泰晤士报》电报，说‘要小心谨慎’”，“摩尔已接到斯通电报，不能刊登”。17日，他写道：“端纳说他……准备把消息发给《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在记述端纳一行文字中，他写道：“我把要求的全文交给他。”而在19日时，他写道：“昨天（或今天），纪乐士向芝加哥发了全部消息。”^①在这些记述中，莫理循只有一次准确地说明他将《二十一条》交与了端纳。对其他记者，他虽然提到他们的名字及其活动，但没有清楚地写有他交给他们全部文本的文字。而根据端纳的回忆，端纳将电报稿交给了美国《芝加哥日报》（Chicago Daily News）记者纪乐士，《芝加哥日报》全文刊登了此电。端纳称“这是世界上首次披露日本《二十一条》的独家新闻”。^②

那么，端纳是何时将电报稿交给纪乐士的呢？他的回忆录在时间上记述得并不清楚。但根据他接受《字林西报》采访时所说，应在17日他得到莫理循的文本之后。前面已经提到，他向伦敦发出长电后，《泰晤士报》称暂时不能刊登。紧接着他说：“在《泰晤士报》踌躇期间，而《二十一条》之全文已刊载于英之《曼彻斯特卫报》、美之《芝加哥讲坛报》（应为日报）。即北京之英字

① 莫理循文件 REEL 249/日记。

② 端纳口述、泽勒记录：《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台北1994年版，第118页。

报，亦予以发表矣。经时间之证明，日本否认，完全系属于虚，余之电文则均属真确。”^①《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作者王芸生称，“闻某重要关系者言，《二十一条》要求之泄露，系由莫理循博士转交与美记者摩尔（Frederick Moore，根据端纳的回忆和莫理循的日记，应为纪乐士）者，其言极可信。”^②由于目前尚未看到所述英文报纸，无法确知具体日期。而且，记者们的信息途径不可能只有莫理循这一条，北京政府的其他官员尤其是外交官员也在不同程度地向他们透露《二十一条》的内容。但可以断言，在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舆论取得支持的活动中，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和新闻记者之间的桥梁，在把日本灭亡中国的全部要求公诸于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莫理循在帮助袁世凯揭露日本卑鄙行径的同时，表现出比袁世凯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度。《二十一条》要求被曝光后，日本指责中国不信守诺言，同时仍企图欺瞒欧美各国，另一方面，日本报纸对莫理循予以攻击。4月9日，莫理循致函蔡廷干：“日本人在继续攻击我。他们似乎认为我应该为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负责；那就是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支持中国抗拒日本所提的要求。”“日本主要的党派之一，前领导人犬石正已正在竭力主张把我在中国的所任职务解除，而代之以一个日本人。”^③但莫理循并未停止对日本人的揭露。他不仅不畏惧日本报界的攻击，反而更加积极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最突出的一点是提出了一份由官方拍照复制《二十一条》全部文本的备忘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86页。

② 同上。根据《泰晤士报》所载电文，从2月12日刊登端纳发来的电文后，再无端纳关于《二十一条》具体内容的报道。2月20日转载了从纽约发来的报道，明确说明了日本对华有《二十一条》要求，并摘要刊登了其中日本不敢对外宣示的第五条内容。

③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23--424页。

录，从而保留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确凿证据。中国政府马上采纳。在得到备忘录的第二天，蔡廷干就给他复信，“载有《二十一条》要求的原件已经拍照。”^①

尽管莫理循一再努力，但鉴于英美等国无暇东顾的国际大环境，鉴于中国政府争取援助的措施有误以及日、英、美等国对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等等原因，中国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面对如此结局，莫理循还在为中国政府做最后一搏，那就是“呼吁立即公开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政府1915年5月10日向全世界公布的声明的详细声明”。他指出：“鉴于日本方面的声明业已向全世界发布，如再对发表一项针锋相对的声明上有任何耽搁，我相信将是最不幸的。”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他呼吁中国政府“毫不迟疑地写出谈判的全部经过”^②。顾维钧也认为“政府应发表一份详细说明，说明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所持立场以及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况”^③。中国外交部终于于5月13日向各国公布了中国与日本交涉的始末。

结 语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但将中国完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它也担心引起列强的不满，因而急于结束谈判。袁世凯对此十分清楚，因此改换外交总长拖延谈判时间，同时采取从舆论上寻找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等措施。莫理循为袁世凯的舆论攻势而奔走，无论是向报界透露内容，还是向有

①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12页。

② 同上，第428—429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6页。

关人士揭露日本制造两个文本以欺瞒世界的卑鄙行为，他都竭尽全力，而且还主动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提出积极可行的措施与办法。他们的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英、美等国对于日本政府的质询，使日本驻外人员和日本政府感到难堪和窘迫。莫理循甚至表现出比袁世凯更强硬的态度，但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他的所作所为也只能服从他所为之服务的国家。

但是袁世凯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依赖大于自立、乞求列强干涉大于自身的力争。这种认识和措施的结果，虽然暂时得到舆论的同情，但最终仍然是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将中国抛弃。在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对外交总长陆征祥劝告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①虽然袁世凯政府有所抗争，由于害怕日本报复而出现的措施失当，使这种抗争显得分外软弱和无力，一旦列强施加压力，便只有让步。

^① 风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版，第256页。

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

张学继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民国初年，在袁世凯走向独裁、乃至最后复辟帝制的过程中，他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本文对此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有贺长雄的生平

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东京（一说大阪）人。188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86年起，先后留学德、奥，获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回日本后任枢密院书记官。先后担任陆军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及《外交评论》主编，并在东京私立法政大学任过教。在1894—1895年的日中甲午战争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有贺长雄均担任日本陆军大本营的法律顾问。^①

有贺长雄著述很多，有《日清战役国际法论》（日本陆军大学校1896年）、《国法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近时外交史》（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最近三十年外交史》（东京

^① 曹履贞为有贺长雄著、张知本翻译的《局外中立》一书所作的“叙”称有贺长雄为“前敌之参谋顾问官”。湖北政治俱乐部1905年正月印行。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14 年) 等。有贺长雄是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及宪法学家, 中国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学生称他是“东邦法学之泰斗”^①。英国人莫理循称他“在国际法学领域中被公认为具有与从前的俄国法学家德·马尔滕斯相同的地位”^②。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 8 月 2 日, 清政府学部侍郎达寿充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大臣。达寿是亲贵, 到日本的目的是学习日本的宪政经验与相关政治理论。达寿自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至三十四年五月, 前后在日本考察六个月, 由日本大学法科学长穗积八束、法学博士有贺长雄、贵族院书记官长太田峰三郎, 分类为他讲论日本宪法历史、比较各国宪法、议院法三项。可见有贺长雄与中国的宪政有很长的渊源。

二、有贺长雄应聘来华的背景

1913 年 3 月 8 日, 有贺长雄来到北京, 担任袁世凯总统的宪法及附属法律顾问, 专门帮助政府起草宪法。

关于有贺长雄来华的背景, 必须从 1912 年底的制宪权之争说起。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 自约法施行之日起十个月内, 由临时大总统召集正式国会, 制订宪法, 并选举正式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还规定, 宪法由国会制订。袁世凯鉴于国会是其政治反对派国民党占多数的机关, 因而于 1912 年 12 月授意其亲信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会同无党无派的前清官僚出身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各省都督倡议: “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

① 有贺长雄著、张知本译:《局外中立·叙》, 湖北政治俱乐部 1905 年正月印行。

②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 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01 页。

由各省都督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富之士二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具体进行办法是，先“由大总统提出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修正案，并同时提出宪法起草委员会法案，要求参议院通过”^①。袁世凯企图以此来攫夺国会的制宪权。

制宪权控制在谁的手中，是关系到未来的宪法按照谁的意志制订、对谁有利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深知，制宪权“一旦为袁氏党所攘夺”，则将来制成的宪法必将成为“袁氏之宪法”。因此，如“欲得巩固之民国宪法，必力争其制订之权，使隶属于议会”。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国民党表示要坚决拥护国会的制宪权。1913年3月3日，参议院开会审议袁世凯交议的《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要》时，国民党议员根本反对将这一违法的提案交付审议^②。由于国民党议员占多数，表决结果，赞成交付审查者占少数，袁世凯的提案遂成废案。

袁世凯对于自己精心策划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被国会轻而易举地否决，显然心有不甘，于是，他一方面将宪法起草委员会改为宪法研究会，原封不动地保存原班人马；另一方面，袁世凯又提出设立宪法顾问。他的这些行动，得到了梁启超等拥袁派支持^③。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经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推荐，袁世凯先后聘请有贺长雄和古德诺为宪法及法律顾问。袁世凯此举仍是“劫夺国会起草宪法（权）之故智，易其名而不其实”，“袁世凯欲得宪法之提案，又欲

① 《张镇芳存电》，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② 国民党议员覃振发言说：“起草宪法本是国会之职权，载在约法，今政府竟拟自行起草，本是违背约法，当然不成议案，即应取消，万不应付审查。”参见《参议院竟然开会》，《民立报》1913年3月8日。

③ 梁启超且在《庸言》上撰文，公开鼓吹“聘请东西公法学大家数人为顾问，以收集思广益之效”。梁启超：《专设宪法起草机关议》，《庸言》第1卷第3号。

得宪法之裁可权”，因而同样遭到了国民党的反对。

袁世凯虽然身为共和国的总统，却一心想学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皇帝。因此，一开始就想从日本早稻田大学聘请一位学者担任他的宪法顾问，最后选中了有贺长雄。当时有贺长雄正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本想“一意专心于此，雅不愿另就他事”。因此，几次拒绝了中国驻日公使的聘请。袁世凯又亲自打电报给驻日公使汪大燮，请求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敦促有贺长雄应聘。大隈重信告诉有贺长雄：担任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关系于将来者颇重”。在这种情况下，有贺长雄终于应允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统却要聘请一位君主制国家专门讲授帝制问题的大学教授做顾问，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国民党极力反对，但袁世凯不为所动。有贺长雄于1913年3月来华就职，从此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制宪斗争的激烈漩涡之中。

三、有贺长雄所设计的中华民国宪法

有贺长雄到达北京不久，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在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贺长雄当年的学生。这批留日学生出身的议员及政府官吏为他们的这位老师举行过一次欢迎会。因为有这么层历史关系，有贺长雄便以师长自居。有贺长雄来华后，受到袁世凯及其法律助手们的尊重。据徐世昌说，“吾国法律家几奉有贺为导师”^①，对其言听计从。

有贺长雄来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袁世凯撰一宪法草案，供其参考。

有贺长雄所撰宪草名为《民国宪法评估》。有贺氏开宗明义即提

① 张国淦著：《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出，制订宪法必须首先充分考虑这样一个前提，即：“无论何国宪法一律不得与历史相离，现在国家权利之关系乃从已过之关系自然发展而来者也。……若将本国之过去置而不问，仅观外国之现在操切从事宪法之编纂，深恐法理上无须采用的规条亦一并采用，致遗后日莫大之祸源，亦未可知也。”这段议论显然是针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模仿外国共和宪法而发的。

有贺长雄接着指出，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与外国历史大有所异，因而民国将次编制之宪法亦与他共和国之宪法不能强同”。那么，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与法、美先进共和国成立有何不同之点呢？有贺长雄认为，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由于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与先进共和国全然不同，因此，中华民国宪法就“不必取法先进共和国宪法”，而应当“求新旧思想之联络”，制订“合乎民国情形特独之立法”。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关于人民权力。有贺氏认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南北统一前所拟订，故“其条文中未免有以纯然民立之共和政体为标准者”，为“防范社会党之跋扈于未萌”，“凡近似预约普及选举之条款以概行删除或改正为要”。具体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条，中华民国立法权属于国民全体之规定，容易使人误解为“最下级赤贫如洗之人民亦有参与政治之权”，这一点“危险尤大”，而且“主权”二字，“务避而不用”，所以，应将约法第二条改为“中华民国所有权力出于国民”。又约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此一条或者“全体删除”，或者改正如下：“人民合法律所定资格者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第二，关于政体组织。有贺氏认为，中国如果采用美国式共和政体，一定会造成南北“分裂”；如果采用法国式议院共和政体，“于新

创富国强兵诸事殊多窒碍”；美国式与法国式共和政体，中国“均未足以取法”。因此，中华民国只有采用“适于民国国情之特别共和组织”，即“超然内阁共和政体”。其特点是：“大总统先行决定政治方针，不问国会内外之人，但有愿依此方针行其政治者则举之，组织国务院。至其方针之当否，一归国务员负责任，虽有时出于不得已更选内阁，然未必因国会失多数之赞成而以之为辞职之准绳，考其政治方针之成绩何如，征诸国内舆论向背何如，大总统独断特行，而使内阁更选……”在此种超然内阁政体情况下，大总统与国务员的关系应“与德意志皇帝与宰相之关系同”。如果“大总统为人活泼有为”，“则可自行筹划立定方针，将此教示国务总理”；反之，如果“大总统为人敦厚”，“则凡百政事委任国务总理，但垂拱以治而已”。

第三，关于大总统职权。有贺氏认为，大总统应有总揽政务之权、公布及执行法律之权、拒否法律及决议之权、提出法律案之权、发交教书于国会之权、发布紧急命令权、特赦减刑权、复议之权、宣告戒严之权、制订官制官规权，任免文武官之权，大总统不负政治及刑事上之责任，但大逆罪不在此限，大总统负责民国外交、大总统统帅民国陆海军。

有贺长雄所设计的中华民国宪法，其特点是主张修改临时约法，扩大总统权力。按照他所拟的宪草，民国大总统的权力超过了任何一国的总统。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制宪法，实际上更多地带有君主制的特点。换句话说，就是在共和制的形式下，采用君主专制的内容。如有贺氏宪草关于大总统与国务员的关系，是按照德意志帝国宪法中德意志皇帝与宰相的关系而设计的。而关于大总统对于陆海军的统帅权及外交权，则又是按照日本1899年颁布的宪法设计的，按照有贺氏之宪草，大总统之权集中了德意志帝国皇帝与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全部权力，大总统权力之大，可以说无与伦比。可见，有贺氏所拟之宪法是

共和制其名，君主制其实。

据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指证，袁世凯平生最服膺、钦慕的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及称霸全欧的德皇威廉二世，袁世凯常对人说：“中国要在东亚图强必须学这两个强国。”^①有贺长雄所设计的宪草，赋予袁世凯以德意志皇帝和日本天皇所拥有的权力，这自然是正中袁世凯的下怀，因而也最为袁氏所青睐。后来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就是以有贺氏的方案为蓝本而炮制出来的。

四、干涉国会的制宪工作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正式国会成立。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国民党都占明显优势，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种形势引起袁世凯的极大忧虑。

为改变不利的处境，袁世凯开始玩弄政治阴谋手段，干扰和破坏国会正常的制宪工作。有贺长雄与袁世凯紧密配合，对国会的制宪工作横加指责和攻击，成为袁世凯破坏国会制宪的策划者和理论指导者。

第一，附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

1913年5月2日，袁世凯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袁氏此举的目的在于先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以便取得对制宪的发言权。

袁氏咨文一出，立即在国会内外引发一轮新的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有贺长雄以权威的姿态发表谈话，附和袁世凯的主张：“此项重大问题，万不可专据学理以为衡，极须审度中国现在之大势，折

^①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衷拟订，庶与法理事实均无妨碍，仍以先定宪法关于选举总统之一部，即将总统选出，实为救时之要义。”^①有贺氏并以权威的口吻告诫国民党说：“无论党派为何，亦当一致共喻此义，方能达利国福民之目的。至诸友邦承认问题，刻正视此问题为进止。”^②

在袁世凯及拥袁派的坚持下，国会被迫妥协，同意先选总统。袁世凯干扰制宪的第一步首先得逞。

第二，对《天坛宪法草案》横加攻击

1913年6月底，国会按照《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由参、众两院各自选取出三十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准备制宪。

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不久，袁世凯在有贺长雄等人的指导下于8月19日将一个宪法草案大纲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共二十四条，除在形式上“采用内阁制”外，其主旨在扩大总统权力。大纲要求赋予总统以下权力：（一）大总统对于两院之议决有复议权及拒绝权；（二）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三）大总统有发布紧急命令权；（四）大总统有议会停会权；（五）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六）行政最高权委任之于大总统，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辅助，等^③。袁世凯企图强迫宪法起草委员会按照他的意志制订宪法。

对于袁世凯专制独裁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未予理睬。10月16日，《天坛宪法草案》脱稿，并在报上公布以征求社会各方面之意见。

《天坛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迫于袁世凯及其北洋派党徒的强大压力，对袁世凯作了某些让步，如宪草规定：大总统有紧急命令权、停止两院会议以及解散众议院等权力。尽管如此，宪草仍基本上

^{①②} 《有贺博士对于选举总统之建议》，《民国新闻》第3期。

^③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1—123页。

体现了国民党议院政府制的主张。由于天坛宪草未能满足袁世凯强烈的独裁欲望，因而引起他的强烈敌视。在这种局面下，有贺长雄与古德诺在报上相继发表文章，对《天坛宪法草案》横加指责。

有贺氏认为，“国会议员利用其制订宪法全权，务扩张国会权力，显违三权分立之旨，偏向二权分立主义（即国会政府制）”。他进而指出，天坛宪草在四个方面，立法权侵犯了行政权独立：（一）大总统任命国务总理须经众议院之同意；（二）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三）以行政诉讼为审判之一部，使隶于法院；（四）国会闭会期内设置国会委员会。其结果使大总统行政权独立有名无实，“国务员之地位随时摇动，朝不保夕”，而“政府地位决无强固之望”^①。

有贺长雄的上述言论，对于袁世凯最后下决心扼杀《天坛宪法草案》无疑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自宪法草案披露以来，非难之声遍于全国……而不信任投票尤为众矢之的……反对不信任投票，其最力者，首推日人有贺长雄。有贺氏发其炎炎大言，而著为不信任投票危险之伟论……”^②

第三，为袁世凯参与制宪寻找理论依据

大总统有无参与制宪权，这是袁世凯与国会争论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有贺长雄是“主总统有对于宪法表示意见之权最力”^③之人。有贺氏诡辩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无明文规定大总统有参与制宪之权，但“《临时约法》之精神实许大总统参与制订宪法事业”。有贺氏并用美国、法国两国制宪时总统参与的先例，说明袁世凯应有权参与制宪。有贺氏最后说：袁世凯“本为满清皇帝让出统治权改为共和政体时，委

① [日]有贺长雄：《论不信任投票之危险》，《时报》1913年11月5日。

② 储亚心：《论不信任投票与责任内阁之关系》，《庸言》第1卷第21号。

③ 《专电》，《申报》1913年10月24日。

任以组织共和统一南北全权之人，又为曾任临时大总统一年有余，亲尝甘苦，为民国行政最有经验之人，又为将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总揽民国政务，对于民国国民之幸福发展负大责任之人，此人既已被选就职，而于制订宪法之大业不使与闻，其事无论何人皆有不公平之慨”。

有了有贺长雄等人理论上的支持，袁世凯便理直气壮地表示：“无论发生如何之波折，势非将参预之举完全办到不可，决不能默受束缚，使将来一切政务无进行之余地。”^①在有贺长雄等人的指点下，袁世凯开始肆无忌惮地干扰和破坏制宪工作。首先，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提出所谓“增修约法案”要求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限制大总统职权的种种规定予以修正。袁氏此举自然“不在约法而在宪法”^②。对此，国会以“宪法

之人，也非全旧之士，而正是如袁世凯这样新旧杂伴的有力人物，“故余信袁之为入，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不知者致疑袁总统有帝制自为之意，此种思想，且非一省有然。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①

象征与实质：《临时约法》问题

如果上述分析不误的话，我们相信，正是由于袁世凯适时地转变为有限的共和主义者，才使他较为顺利地接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起初，袁世凯的转变，使他获得了革命党人的部分信任和有限的支持，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完成政治革命之时，确曾一度相信稳定大局、组织建设、实现重建中国的宏伟大业，非有袁世凯这样的人出来支撑局面不可。孙中山说：“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社会革命比诸政治上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②而“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

①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

② 孙中山：《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2页。

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致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①

但是，实在说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自愿，而有一种形势所迫不得不然的意味。因此，当袁世凯即将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孙中山与大多数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实际上深存戒心，担心袁世凯一旦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出尔反尔。为此，孙中山“想出了两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办法：一个是颁布约法，想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一个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凯调离北京这个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窠”^②。

建都南京的方案，由于当时某些特殊的原因并没有能够实现。而第一个方案，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南京的参议院根据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经过整整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对于已公布的《临时约法》，孙中山并非完全满意。他在多年之后回忆说：“兄弟在南京的时候，想要参议院立一个五权宪法，谁知他们各位议员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权宪法。后来立了一个宪法，兄弟也不理它。我以为这个只有一年的事情，也不要紧，且待随后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吧。”^③孙中山所不满意的核心，从表面上看是五权宪法与三权分立的原则，但其实质则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因为按照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设想，立法是国会，行政是大总统，司法是裁

① 孙中山：《与某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0页。

②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58页。

③ 孙中山：《五权宪法》，《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页。

判官，此外还有负责弹劾与考选检察机关和考试机关。而临时约法确定的三权分立，又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公布命令时，须副署之”。^①换言之，如果没有国务员的副署，总统便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一规定不仅使国务员分割了大总统的一部分权力，而且使大总统公布法律、法案及法令的权力受到国务员的制约。很显然，这一重要规定的主观意图无疑是善良的，那就是革命党人出于对袁世凯不完全的信任，而期望以《临时约法》来制约袁世凯的行动，束缚其手脚，防止袁世凯背弃共和，走向个人独裁。

《临时约法》的出现，对于革命党人和中华民国来说，都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因此尽管它可能有种种的不完善，但革命党人依然将之视为中华民国存在的象征。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孙中山既然对《临时约法》有如此的不满，却又在后来起而拥护之的根本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夫余对于《临时约法》之不满，已如前述，则余对此与革命方略相背驰之《约法》，又何为起而拥护之，此必读者所亟欲问者也。余请郑重以说明之。辛亥之役，余格于群议，不获之革命方略而见之实行，而北方将士，以袁世凯为首领，与余议和。夫北方将士与革命军相距于汉阳，明明为反对民国者，今虽曰服从民国，安能保其心之无他。故余奉《临时约法》而使之服从，盖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余犹虑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贰，然后许其议和。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②

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第1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83页。

②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70页。

对于革命党人的这一矛盾心理，袁世凯不能不有所同情与理解，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建都问题上的让步，更使他必须承诺遵守《临时约法》。因此，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说：“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候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①

如果我们不带有先入为主的意见的话，揆诸情理与事实，我们应当承认袁世凯此时对于《临时约法》所作的承诺是真诚的，因为最明显的事实是，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袁世凯的种种言论与作为虽然并不能使南方革命党人全部满意，但毕竟还能说得过去。他确实信守他所作过的承诺，即或《约法》对他有什么不便，他依然期望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内，依据《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在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制订正式宪法时一并解决。因此，尽管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年里出现了一些风波，但南方革命党人对他并没有太多的怨言，相反，如孙中山还反复为袁开脱，对袁的难为之处给予一定的理解与同情。孙中山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②“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总统为恶。”^③

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第一年里，日子确实不太好过。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负责内外，但由于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1978年版，第280页。

② 孙中山：《致黄兴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0页。

③ 孙中山：《与某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2—413页。

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阁能与总统保持一致，国会也尽量与政府达成共识，那样问题可能要好些。然而，由于民主共和初行于中国，各方面的经验尚不完备，因此不必否认在民国元年所发生的政府与内阁的冲突、政府与参议院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取决于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带有一种浓厚的政党偏见，甚至是私人成见。即使从《临时约法》的观点看，“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①如果理解不错的话，内阁是在总统的领导下，负行政责任。内阁不应该与政府闹独立，自成系统。但从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看，第一届内阁就开始与总统闹独立，内阁总理唐绍仪不仅于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而且在执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时，更多的不是考虑国家利益，而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②这在实际上不能不妨碍政府政策的执行效果。

平心而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尚不完全具备的时候，也就是说，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尚不能也不愿意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时候，责任内阁、政党政治等形式都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无法改变少数人政治的本质。如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最高权力的多元化结构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但在中国急需恢复秩序与稳定之际，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使政府的权威大部分抵消，并不利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繁荣。极而言之，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面对这种情况，激进者主张取消国会和内阁，由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如章太炎等人曾呼吁：“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

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第1卷，第683页。

② 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10页。

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已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任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金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倾，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①这虽然不免有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的嫌疑，但它也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中国自民主共和以来所暴露出来的窘态。在制订中华民国正式宪法时修改《临时约法》责任内阁的有关规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但是，《临时约法》及其核心内容责任内阁制，毕竟是中华民国存在与否的象征与基本标志，特别是革命党人在颁布《临时约法》时曾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因此，依据已经变化的情况对《约法》进行实质性的修改，无疑是对革命党人的重大打击。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围绕着《约法》问题所展开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适度与自足：选择帝制的错误之由

由于《临时约法》对大总统的约束太多，使政府的政策往往难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这其中的甘苦自然只有袁世凯最为清楚。他在一份文件中说：“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

^① 黄远庸：《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远庸遗著》卷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2页。

此不待国民督责，即返诸本大总统之良知，亦岂能一日即安者。虽然政象不振之原因，由于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者固半，由于各方面形格势禁者亦半。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议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济，则物色一国最高之才，使荷一国最重之任。善后之业，或尚惧难；乃自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①内心的苦闷与烦恼跃然纸上。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袁世凯的这些理由也未尚全无是处。正式国会在召集之后不久，便修改先制宪，后选总统的既定程序，实行先选总统，后制宪法的办法。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便是对袁世凯的苦闷与烦恼的善意回应。既使袁世凯有正式大总统的名义对内对外，从实质上肯定了大总统所负的正式责任，又为袁世凯将来拥有公布宪法的权力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机会。按理说，袁世凯对国会的理解与同情应该满足，特别是当国家元首非袁莫属的趋势如此明朗之际，更不应该去做那些唆使所谓“公民团”之类的人去围攻国会的蠢事。这不仅为反对者留下了口实，而且实在有损于作为国家元首的公众形象。

当然，袁世凯毕竟来自旧的官僚阶层，他不可能完全按照民主共和的理想程序去行事，尤其是当“二次革命”刚刚结束，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大为削弱的时候，袁世凯觉得正是扩展自己势力的时机，于是不择手段地去做自己要做的一切事情。

① 《时报》1913年7月27日；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3辑，第47—49页。

如前所述,《临时约法》中责任内阁制原则,并不是民主共和的唯一形式,也不是不可讨论、不可更改的问题。正式国会在制定正式宪法时对此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所有议员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整体考量,提出公平意见,恐怕也不难解决。事实上,国会在1913年10月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即《天坛宪法案》)便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相当多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袁世凯从公从私考虑都应该对此感到满足。

然而,袁世凯对《天坛宪法案》并不满意。他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重申先前所提出的各种理由,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以便“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①从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内对外。

当袁世凯的这一要求被国会置之不理之后,依据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他的正确选择应当是一面向国会再次提出,一面听从国会的裁决。只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会与袁世凯两个方面都未能真正遵循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从国会方面看,将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余地,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政府方面的陈述,这种做法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法律依据,但毕竟过于无视《临时约法》规定的临时大总统向议会咨询的权力。这不仅不能收到国会方面以一纸宪法约束总统的行为的客观效果,而且处理不慎,“过于牵制”,反而使袁世凯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绝足而驰,逸出常轨”。^②

事情发展的结局往往与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也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袁世凯在向国会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被全部堵塞之后,并不愿

① 《袁大总统文牍类编》,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29年版,第29页。

②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249页。

甘心坐观其果。于是，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根本意见，以期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他呼吁：“草案内谬点甚多，一面已约集中外法家，公开讨论，仍当随时续告。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①欲凭借社会舆论迫使国会就范。这种做法虽然很难说有什么违宪问题，但它势必使问题更加复杂，双方的矛盾更加深化。

各省军民长官多为旧式官僚，他们或对民主共和素无好感，或因各省议员掣肘行政而内心充满着怨言，因此他们在“条陈电复”中均附和袁世凯的意见，主张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及《天坛宪法草案》。于是，袁世凯遂以“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为由，^②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制定宪法的工作实际上陷入停顿状态。

袁世凯既已当上正式大总统，也深知在维护共和形式的前提下，不能没有咨询机关。于是，他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同时，又下令召开政治会议，以期以政治会议来缓解国会危机。但是，由于政治会议的代表不经民选产生，特别是当国民党被宣布为“乱党”之后，政治会议代表的基本成分差不多全是清末官僚和旧式学者，他们对袁世凯除了随声附和之外，已很难起到其他任何特殊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袁世凯适可而止，以实际上的独裁统治善自调理度过这一非常时期，问题或许不致如后来那样复杂。然而，袁世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人心，以为没有了议会中的制约因素，便有利于他实

①② 《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1913年12月1日。

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有利于他从事实上、形式上负起国家的全部行政责任。

清一色的政治会议成了袁世凯的御用机关，袁世凯的任何提案都可在政治会议上顺利通过。这虽然减少乃至根本消除了议会和内阁对总统权力的掣肘，使政府的决策易于贯彻执行，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因素全部消除，总统已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即使此时的总统能有超凡的智慧和清醒，也只能说失误较少，而无法保证最高决策的准确无误。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说，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会民主并不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制度，如果运用不当，它是比较容易导致“人民滥用民主自由，民意舆论全失真意”的流弊，也容易使一些人“托共和政治之名，行暴民政治之实”。^①但是，民主政治毕竟是人类发展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一种政治制度形式，它毕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以多数人的智慧弥补独裁政治的不足。

很显然，袁世凯只看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某些不足，而无视或者说忽略了这一制度的绝大优点，因此，他在利用政治会议召集约法会议，并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制定出《中华民国约法》之后，满以为解决了当时引起国内外人士普遍关注的权威丧失问题，殊不知，恰恰是这一“名为隆大总统之权，实以重大总统之责”的“袁记约法”从根本上葬送了袁世凯的政治前程，奏响了他政治上必然死亡的序曲。他在公布这一约法时曾乐观地预测：“今者《约法》改订，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②似乎政治问题已彻底解决，剩下的只是建设问题了。

“袁记约法”的最大特点，是完全废除责任内阁制度，“行政已达

① 《白话捷报》1913年12月16日。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3辑，第95页。

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参议院亦仅仅成为大总统“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的装饰性机构。^①但新的约法对大总统的产生与任期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以较为含糊的方式肯定了总统终身制的可能。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做法，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似乎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不得已的行为。因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民主自由思想传遍中国，旧的制度几乎彻底破坏，而新的规则尚未确立，一些“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流弊无穷”^②。政府权威丧失殆尽，社会信仰混乱不堪。当此时，加强政府权威，重塑社会信仰，甚至采用强人政治强化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无疑都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政治体制的变革既要循序渐进，又要适时而止，太慢了必然滞后于社会生活，太快了则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力，引起社会动荡与混乱，过犹不及，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作为最高决策者，不仅要认识到变革、发展的必然性，更要知足而适时而止，既不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也不为一时的顺利得手而陶醉。准于此，我们看到，袁世凯在排斥了国民党这一重要的制衡力量之后，自以为得心应手，为所欲为，大肆变更政治体制，显然犯了盲目乐观的大忌。更有甚者，袁世凯将总统变为至高无上且可终身的地位，这一做法本身势必导致两个重要后果，一来和民主共和体制下的社会心理不合，即便那些原本想辅助他使政治走上轨道，做些建设事业的人如梁启超等也因为这一举措而疑心却步。^③二来毕竟迎合了旧势力，使旧派人物很自然地联

① 《中华民国约法》，《北洋军阀》第1卷，第726—727页。

② 《黄兴致袁世凯电》，《袁大总统文牍类编》，第64页。

③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8页。

想到，既然共和国的总统可以实行终身制，那又与帝制有什么不同呢？而且，由于帝制更加强调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此，帝制复辟可能更有助于政府权威的重建。“今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①这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袁世凯新约法的一般性看法。

不过，从袁世凯此时的心情来说，似乎还没有帝制自为的迫切需要和迹象，他不仅向他的心腹如冯国璋等人反复陈说变更国体实不必要：“以事实论，民国总统既无异人任，且今日行总统责任制，权利无所不足，何故为此？”^②“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计耳，……余对于诸子，纵以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主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也！”^③这些话可能有些不实的成分，但我们对此也不应一概视为欺人之谈，它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世凯此时的矛盾心理。而且当有人倡言帝制复辟的时候，袁世凯批令内务部严厉查办，并要求内务部“痛告若辈……以明共和政体之真意，而正全国之人心”，声称“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④态度不可谓不鲜明、不坚决。

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一味加强个人独裁的种种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地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他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而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他既在临终时抱怨“杨度误我”，^⑤也曾在帝制失

① 《论中国政局之将来》，《申报》1914年4月12日。

② 《申报》1915年7月6日。

③ 《申报》1915年7月9日。

④ 《申报》1914年11月26日；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3辑，第118—120页。

⑤ 《杨度集》，第615页。

败后坦然地承认“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①。这种貌似矛盾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袁世凯选择帝制的错误之由，那就是本可以成为一代优秀政治家的袁世凯，由于不知适度与自足，一念之差铸成千古之罪。冤乎？悲乎？恐怕二者兼而有之！这种现象不只是袁世凯的个人评价问题，而实际上关涉到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试验与前途，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走向问题。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3辑，第234页。

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特点初探

赵 虎 岳 琰

(西北大学)

1915年12月，袁世凯决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通常被史学界称为“袁世凯复辟”。然而，这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复辟”^①，而是清王朝的统治秩序被推翻后中国出现的又一次重建社会秩序的活动。

袁世凯的重建帝制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出现的。一方面，辛亥革命后，虽然民主共和思想愈益影响民众，但是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可能在此短时期内完全消除的。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社会秩序的重建，既寻求民主政治，又怀恋旧有的制度，因而在探索救国救民的方式上不可避免的多元化。所以既有孙中山等一批积极向西方学习、提倡民主共和的人物，又有康有为、赵尔巽等一批主张以封建纲常来维系社会秩序的人物。另一方面，旧有清政府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民国政府正处于草创阶段，民主政治的希望已经被“二次革命”的失败打得粉碎，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新秩序，社会处于严重失范状态中，中国当时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复辟思潮的影响，重建秩

^① 传统观点称之为“复辟”，然而根据“复辟”一词的意义来判断，袁世凯在称帝前并未作过皇帝，所以，袁世凯的活动只能算是对封建帝制的一种重建。

序的途径自然就回到了封建帝制的老路上。同时，列强各国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强人”以便控制中国，尤其是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袁世凯的重建帝制正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严重失范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重建帝制的活动较之其他恢复秩序活动，就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一 重建社会秩序的派别冲突

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尤其表现在政治上，政党林立，国会内部混乱和各地独立倾向日益加剧。这一时期，政党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但是大多数政党既无明确纲领，又无固定组织，更谈不上什么民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那些不甘寂寞的官僚政客欲在新立的民国舞台上分一杯羹的工具”。^①故由此而产生的国会，其作用也大打折扣。虽然宋教仁为国会选举奔走呼告，使得国民党在众参两院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但是宋教仁的遇刺使得民主政治昙花一现。在缺乏政党政治的物质基础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归于失败。正如时人批评道：“中国第一次之国会，徒有躯壳而精神已亡矣。”此外，北京政府只是形式上统一了政权，对于南方为国民党人所控制的省份鞭长莫及。在财政上，“中央与地方之财源，混而不分，名义上为中央集权，实则一切财源皆为各省截留”。1911年至1913年间，中央政府支出平均每月需二千四百万，而收入仅一千万。1912、1913两年之中央财政，几乎全赖外债以维持。一方面，中央财政亏空，靠借债度日，“其时

^① 纪能文：《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袁世凯洪宪复辟的历史透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最著名的外债，有瑞记借款三次，奥国借款三次，华比借款一百万镑，克利斯浦借款五百万镑，五国善后借款二千五百万镑”^①；另一方面，地方截留中央款项，仍“思分中央所借外债之余沥以自活”^②。1913年，北京政府试图划分中央、省和地方的税收来源，但未能有所成效。所以说，“尽管名称和官僚主义的结构很快改变了，但共和政府比起它的被取代者来甚至更不能控制中国的税收来源”。^③同时，资产阶级在这样一个无序的环境下，渴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实现其利益和充当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忍痛付出代价换来的共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所以他们反对“二次革命”。^④民主政治的愿望已经被“二次革命”的失败打得粉碎，也动摇了通过民主政治重建新秩序的物质基础。所以，“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黄兴等人重又流亡海外。这不能说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方向走向帝制老路的一个因素。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主要存在着两种复辟势力，一是以康有为、劳乃宣为首的拥清复辟派，二是以袁克定、杨度为首的拥袁复辟派。这两派势力都主张帝制而反对共和，但其根本的政治利益是对立的，拥护袁世凯重建帝制和拥护清逊帝复辟的活动也错综复杂。^⑤

辛亥革命后，拥清复辟派就开始活动。“清室复辟派内大致有四股势力，其一是以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为首的亲贵集团……其二是一批清朝遗老名宿，如直隶提学使劳乃宣、礼部侍郎于式枚……其

① 潘公展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第117页。

② 北京《顺天时报》1913年11月20日。

③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④ 徐宗勉：《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

⑤ 唐宝林、郑师渠：《共和与专制的较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三是清末保皇党康有为等人……其四是长江巡阅使张勋。”^①但是他们要求复辟帝制的表现形式却大相径庭。宗社党广招党徒，试图借助日俄等国的势力，武力复辟。而康、劳等则鼓吹还政于清。《优待条约》规定，宣统皇帝仍留居内廷，保留尊号，民国政府待之如外国君主，使得清朝的遗老遗少们有了复辟的精神图腾，尤以为袁世凯有不可告人之苦心，“特限于约法不能昌言复辟”。^②1913年成立的孔教会是康有为、劳乃宣等人的主阵地。相继写成《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论》大肆宣扬“夫总统不过为国民之代理而已……则反不如君主而不乱之良法也”^③。

康有为等人的宣传使得复辟之风盛行一时，尤其在1913年与1914年之交，北京城内流传一种说法：“共和不适于国情，证诸元、二年俶扰之象，可以概见；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④但是，该派的主张与时局远远相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被袁世凯所利用，成了袁世凯复辟称帝前的理论鼓吹者，有的甚至加入革命者的行列。实际上，拥清的遗老们只是拥袁复辟派的附庸，他们无意识地袁世凯复辟帝制做好了理论铺垫。直到1914年袁世凯发布“申禁复辟邪说”令，这一派的活动才有所收敛。当袁世凯看到时机成熟时一道禁令将他们的口封了起来，遗老们也作鸟兽散。

袁克定和杨度等人的鼓吹复辟活动是通过筹安会大造舆论而达到目的的。袁克定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必定站在重建活动的最前列。1913年9月，袁克定赴德就医。抵德不久便会见了德皇威廉二世。威

①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0—541页。

② 《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一。

③ 康有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论》，《不忍》第7册，1913年8月。

④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303页。

廉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自强”的观点，并表示德国将在外交上全力支持袁世凯称帝。因此，袁克定更坚定了帮助父亲重建帝制的决心。“在某种程度上，在称帝一事中，他的态度要比袁世凯更坚决。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的个人终身荣耀问题，长子即皇储，对此他是十分清楚的。”^①1915年，杨度、孙毓筠等人正式成立筹安会，网络了大批“名流”，以研究学理为借口，伪造民意，联络各省人士，积极鼓吹复辟。

杨度等人并不是一直以来的帝制鼓吹者，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甘愿争做袁世凯的“开国元勋”。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在袁世凯父子的授意下为推行帝制制造“合乎民意”的假象。他们把康有为等人营造的“恢复帝制”的思想空气继承下来，并使之从下而上地通过“请愿团”，以请愿的方式表达出来，为袁世凯的重建帝制做好铺垫。

平心而论，所谓的复辟思潮从根本上来讲是封建的旧思想，然而它的目的却很明了，即在当前新秩序不稳定甚至濒临崩溃的时候，把旧秩序恢复起来，以稳定社会。正如康有为所说：“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②复辟思潮的鼓吹者们的确看到了社会现实，即“旧的皇帝推翻了，新的权威建立不起来，一般国民如丧考妣，社会精英一筹莫展”，“中华民国仅仅剩下一幅空招牌，社会秩序甚至远远不如革命前平静、安宁”。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时代的主流，即“革命意识的日益普遍”^③。袁世凯作为保守派中的先进分子，既不可能完全抛弃“皇权”思想，又不可能完全接受“民主共和”。这样一个矛盾的

① 杨树标、王国水：《袁世凯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② 康有为：《请袁世凯退位电》，《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3页。

③ 马勇：《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人，在社会秩序混乱、政治不安定、民主政治的实践又告失败的情况下，希望建立起一个由他掌权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故而把国民党人的活动斥之为“捣乱”。袁世凯忽视了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仅仅看到旧体制下给人们思想留下的阴影和严重失范状态下的社会现实，因此走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

二 袁世凯重建帝制程序的“合法化”

袁世凯重建帝制是通过所谓“合法”方式实现的，使“洪宪帝制”的建立过程呈现出“合法化”。辛亥革命不久，袁世凯就被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推戴为临时大总统，这本身就使袁世凯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使他能“合法”地、名正言顺地利用法律、国家机器（军队）、甚至民主的形式，实现其重建帝制的目的。

首先，袁世凯以加强武力作为重建帝制的保障。辛亥革命之时，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北洋新军的军事大权，与革命军在武昌一带周旋。凭借军事力量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最终达到胁迫清帝退位，自己登上临时大总统的目的。1913年的“二次革命”表面上是中央同地方的一次武力争斗，而实质上是共和势力与专制势力在军事上的一次较量。袁世凯俨然一副正统的面目，声称：“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①然而革命党人并未真正统一起来，袁世凯所控制的八万具有持续凝聚力和机动性的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但分散的革命力量。至此，“旧革命党在国内的根据地盘，完全丧失，军队中的基本势力完全破坏，中华革命党活动的困难，却比辛亥革命以前更甚”^②。此后，

① 《上海时报》1913年5月24日。

②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344页。

袁世凯的势力伸展到没有参加起义的省份，其势力更加扩张。军事上的胜利使袁世凯的集权活动有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

其次，袁世凯以通过修订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其重建帝制活动的“合法化”。1913年10月4日，众、参两院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违反常规先后通过选举总统案，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职。当选为大总统后的袁世凯仍感到国会和《临时约法》碍手碍脚，便于11月26日召集政治会议，决定停止国会两院议员职务。1914年1月10日，正式宣布解散国会，2月撤销各地自治会和各省议会。此后，袁世凯于5月1日宣布废除《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这部袁氏《约法》实际上使得总统拥有了与封建帝王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在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把内阁总理“改革”成了总统的“承启处”。^①12月29日，袁氏又公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不限，其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至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立法、民意、监督机关全被取消”。^②袁世凯为称帝铺好了道路，正如当时一位在华的美国历史学家所讲：“袁世凯现在已成为独裁者，回到君主政权显然只是迟早更换一下名义的问题而已。”^③

再次，袁世凯采用“民主”的形式作为称帝和专制制度的建立手段。袁世凯千方百计使国会在《宪法》之前先通过《大总统选举法》。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议员们在经过十四个小时、三轮投票选举之后，袁世凯终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当选并出任首任大总

①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1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00页。

② 吴文灿：《试论袁世凯的封建帝王思想和活动》，《齐鲁学刊》1987年第2期。

③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31页。

统。据当时报刊载：“七时二分投票毕，斯时在场议员共剩七百零三人，袁世凯得五百零七票，黎元洪得一百九十六票，袁以过半数当选。”^①然而，真正促成袁世凯当选总统的并不是这些投票的议员们，而是场外那些由便衣军警充任的所谓“请愿”的“公民团”。他们严密包围会场，威胁议员，声称不选出心目中的总统就不罢休。袁世凯就这样“合法”地当选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自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②同时电邀各省代表齐集北京共商国体，掀起一股必速至帝制的势头。与此同时，交通系的梁士诒等人筹集巨款，组织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刹那间，北京出现了‘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五颜六色的‘民意组织’。”1915年10月25日，全国各地开始选举国民代表，28日起相继举行国体投票。至12月11日，“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③。梁启超在得知这一结果时，感叹道：“昔法国拿破仑一世之为帝，赞成者虽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三百二十九票，反对者仍有二千五百六十九票。拿破仑三世之为帝，赞成者七百八十三万九千票，反对者二十五万三千票……何以此次所谓国民代表者，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而赞成君主者恰为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无有一票之反对。”^④就这样，袁世凯顺应“民意”，登上了帝位。

古往今来，“复辟”活动往往是通过复辟者手中的兵权来实现，

① 《选举正式总统投票之详数》，天津《大公报》1913年10月8日。

② 李佩等著：《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36页。

③ 白蕉：《袁世凯和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④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饮冰室合集》第4册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

而袁世凯的重建帝制虽然也以军事作为后盾，但最终实现的形式竟然是通过民主投票，这不能说不是重建帝制活动的一大特点。袁世凯深知民国初年的情况已远非清末能比，武力征服已经不足以服众。早在国会选举结果出来之后，袁世凯就忧心忡忡地告诉杨度说：“我不怕国民党用暴力来夺取政权，我只怕他们以合法手段赢得政权。”^①要想实现重建帝制，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推戴，再经民主投票决定的方式。甚至到了全国一片反对时，袁世凯仍大言不惭地说：“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辞推戴。”“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事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②在民主形式的掩护下，袁世凯实现了其重建帝制的目的。这一政治史上的怪胎，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粉墨登场。袁世凯之所以能采取“合法”的形式来实现其目的，一方面与其自身手握大权有关，所以他能够使军警包围国会，使各省通电拥护帝制。而另一方面应归咎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幼稚和软弱。所以袁世凯一边拉拢国民党人，一边又打击国民党人，把国会变成袁氏国会，把《约法》变成袁氏《约法》。当国民党极盛之时，进步党极力扶助袁世凯以抑制国民党。而当国民党被袁世凯摧毁之后，进步党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在各党各派被袁世凯分化、收买、各个击破或踢开的时候，独裁政权‘合法化’的步骤就着着进行了。”^③它既反映了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广泛的传播已深深地影响到政治领域，就连

①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1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97页。

② 《政府公报·命令》1916年3月23日。

③ 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8页。

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采取民主的形式；又反映了中国旧势力的强大，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实现政治目的。所以，在矛盾重重的社会环境下，袁世凯的重建帝制表现出“合法化”。

三 袁世凯重建帝制形式上的复古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处于旧制度虽被推翻，而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旧的文化仍旧起着作用和影响。袁世凯的重建帝制活动表现出各种复古的形式，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为尊孔和祭天。

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局的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主要原因在于人民追求挣脱封建纲常礼教的桎梏。^①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封建帝制溃崩，使得在短促的时间内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伴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中国急需重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现实却与之相左，故“建立秩序便往往表现为在孔子的学说之下恢复秩序”。^②这便是尊孔复古思潮出现的原因。当时以“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的尊孔团体大量涌现，如上海的孔教会、北京孔社、山东孔道会、山西洗心社等等，孔教会是尊孔的主要场所，它一成立便得到教育部的批准。

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目的”，正中袁世凯的下怀。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明令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地由省长官致祭，并亲自到北京的孔庙祭祀。

另外，祭天又是袁世凯重建帝制中复古形式的集中表现。封建帝

①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4页。

② 胡传胜：《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历史沉思——从袁世凯复辟到“五四”运动》，《学海》1993年第5期。

王为了显示“君权神授”而每年都必须进行这项活动。而袁世凯进行这一活动的目的则可谓不言而喻了。1914年12月20日，他在“祭天告令”中说：“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视之有赫，示临保之，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23日，袁世凯前往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此外，袁世凯在总统的名义下，进行了皇帝排场的官制改革。“废止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长，置左右两丞。”“把朝中百官，分列九等，名目是：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观察使改称‘道尹’。各省都督府改称‘将军府’，都督改称‘将军’，有上将军、将军、左将军、右将军。”^①袁世凯政府又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清朝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能担任民政长，并多次表示“优容前清耆旧”。^②

那么，袁世凯重建帝制为什么会有复古性呢？尊孔和祭天是封建集权制的表现，袁世凯之所以要复古，正是要集权。民初的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处于失范状态，思想界极其混乱。正如中山先生所说：“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③虽然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但面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人们总渴望稳定制度下的正常秩序。孔子正好是维护秩序的杰出代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了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④对于袁世凯来说，复古只不过是

① 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0页。

②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2页。

③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5页。

④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3页。

建立新秩序所要凭借的工具。封建帝王作为专制的标志已经被打倒，而专制的思想代表还在。一方面，袁世凯要用孔子这面旗帜来攻击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使他的集权理论合法化；另一方面，他要用孔子的思想禁锢广大人民的思想，使广大人民服从他的专制统治。这就是袁世凯复古的原因。

资产阶级革命派宣扬的是“新”，即革新，打破中国的旧有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掌权的新政权，开议会，民选总统，宣传新文化、新生活。这是他们重建秩序的指导思想。而袁世凯重建秩序所看重的是“旧”，他认为“新”是“捣乱”。但是他想凭借的形式却又已经被彻底否定了。怎样才能重建旧的秩序，只有把孔子搬出来，把“三纲五常”的大旗重新举起来，把封建的那一套再树起来，才能使他的重建帝制“名正言顺”。尊孔是树立精神偶像，祭天是树立政治偶像，加上选拔官吏过程中注重前清的官吏，使得人们有一种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只有帝制才能使中国稳定的假象。袁世凯在一系列复古活动的背后，营造出重建帝制的氛围。

四 各路军阀对重建帝制的不同态度

二十世纪初，中国各路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在重建帝制的前前后后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为袁世凯强大后盾的北洋军阀，由于其内部矛盾重重，使得袁世凯在决定建立帝制之时“犹豫不决及深为情绪的冲突所苦”^①。

袁世凯在重建帝制活动之初就对各地的军事实力作了反复的思考

^①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民初政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81页。

和安排。“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热察绥三区（今内蒙古及河北、辽宁一部分）都是北洋旧部，或已变为北洋系。山西阎锡山虽革命出身，但无实力。”“新疆杨增新地处边远，只能听命中央。东北三省关键在张作霖，早由段芝贵极力拉拢。”“南方各省，江苏、江西、安徽、湖北都是袁的亲信，又有曹錕第三师驻岳州，威震西南。广东龙济光和龙觐光兄弟，早已俯首中央。广西、云南、贵州兵力都差不多，并有北洋官吏王祖同、龙建章等监视之。”^①袁世凯满以为万无一失，却没料到问题正出在他们身上。

对袁世凯重建帝制及其称帝，各路军阀都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因而在重建帝制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摇摆。

一是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他们作为北洋军阀的元老，或名位颇高，或手握重兵。袁世凯一旦称帝，他们的“总统梦”便随之破灭，而且地位也会随之下降，况且他们之间的矛盾早已复杂化。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没有过多的精力放在军队的建设上，而此时段祺瑞却在北洋军队里大量培植自己的亲信。段祺瑞在任陆军总长期间，北洋军队里的中下级军官已十之八九是段祺瑞的人了。袁世凯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其成立统率办事处的原因，说是为了集中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统筹军事，而实则借以削弱段祺瑞的实力。段祺瑞对统率办事处的成立，早已公开表示不满。在对帝制的问题上，段祺瑞又大力反对，病退居西山，拒不劝进。段祺瑞与袁世凯的矛盾已经很深了。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虽表面上无反对之词，实则认为袁世凯“传子不传贤”，像袁克定这样的继承人是无法侍候的。所以，他在回复梁士诒等人联名要求各省将军拥戴帝制的电文时，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故作推诿，并与张勋

^①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4页。

等人一起致电政事堂及统率办事处，说：“何敢率行附和，致蹈越职违法之嫌。”^①可以说，这一部分人属于北洋人物里握有实权的一部分。他们害怕因为帝制而失去或削弱已得的利益，故而不赞同袁世凯复辟称帝，但又无可奈何。因此，他们在袁世凯称帝前后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二是陈宦、龙济光等人。他们大多是袁世凯的心腹干将，被袁世凯派到各地镇压护国军。他们先是极力怂恿袁世凯登基称帝，并通电各省要求各地支持。但是随着护国军的节节胜利，其态度发生了变化。陈宦在被袁世凯派往四川之时，曾于袁世凯面前痛哭流涕，希望袁世凯早日登基，以正国体，并于1915年12月30日和1916年1月13日两次电请袁世凯早正大位。然而到2月10日，在全国一片讨袁的形势下，陈宦也不得不派其秘书胡鄂公赴湖南、江苏，联络汤芑铭、冯国璋等计谋反袁。^②这一部分人与段祺瑞等人不一样，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既得利益，而且实力弱小，他们需要袁世凯的提携才能壮大自己，因而他们本着“大哥作了皇帝，兄弟们也挣个将军”的想法，极力赞同袁世凯的重建帝制。但是随着军事上的失败，他们眼见袁世凯自身已是强弩之末，为求自保，他们调转枪头也是自然而然的。

近代中国社会的形势和各路军阀自身的利益决定了军阀们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摇摆，也正是由于各路军阀力量的分散—聚集—分散，加速了袁世凯重建帝制的失败。

五 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

西方各国的支持与否也是袁世凯重建帝制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①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3页。

② 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6页。

袁世凯重建帝制的过程中，各列强国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从支持到反对，甚至扬言武装干涉。

日本在“洪宪帝制”中饰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隐含深意地向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①袁世凯为了迫切寻求日本的支持，还是在5月9日签字承认了《二十一条》。此后，袁世凯满以为有了日本为靠山，加紧了复辟的活动。然而到了12月15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后，日本公使忽然又联合英、俄、法、意等四国公使到袁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声称对改变国体持静观态度。日公使说：“日本及其他四国……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持监视之态度。”^②19日，日本阁议严重警告中国延缓帝制，否则武力干涉。1916年2月19日，英日开始对南北交战双方持公平态度。3月1日，日本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会晤梁启超，商量讨袁事宜。7日，日本阁议决定建立在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民间援助南军。日本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无疑给了袁世凯沉重的打击，也意味着日袁关系的破裂。

自“门户开放”以来，美日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袁世凯时期更加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美国虽未参战，但对于彼岸的中国也是鞭长莫及。故日本成为这一时期在华建立统治的最强有力的国家。袁世凯宣布称帝后，黄兴曾电请美国驻华公使，请勿赞成袁世凯称帝，但并没有得到答复。美国公使也未参加12月15日由日本邀请的共同对袁世凯政府的责问，这

①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页。

② 白蕉：《袁世凯和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是美国不愿追随日本之后的表现。相反的是，就在日本阁议再次警告延缓帝制的同时，美国公使芮恩施正谒见袁世凯商讨行政改革及聘用外国专门人才的事。即便是当袁世凯政府外交部通告各国驻华公使暂缓登机之时，芮恩施电请美国国务院立即承认中国帝制政府。可以说，美国是袁世凯重建帝制的积极拥护者。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等列强忙于欧战，根本顾不上与日美两国相争。大战开始后，德国的在华利益被日本夺取，英、法、俄为把中国拖入战争，以支持日本在山东的要求作为日本牵引中国参战的报酬。

列强的态度在袁世凯重建帝制过程中缘何呈现多元性呢？实际上取决于各国的对华政策。《二十一条》的提出是日本想从速独霸中国的一个表现。与其说当时其他列强国家忙于欧战无力干涉中国而使日本得逞，倒不如说是日本借此契机一举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并不友好，相反是矛盾重重。“这种矛盾，既反映了袁世凯早先投靠的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矛盾，也与日本帝国主义两面三刀的对华政策有关。”^①袁世凯看到了日本独霸中国的迫切希望，日本也看到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两者一拍即合。故而当筹安会的负责人问及外交事宜时，袁世凯满怀信心地说：“外交上没有问题，我已有把握，汝为之可也。”^②然而，正是袁世凯有信心的盟友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这一点也不奇怪，日本政府对袁世凯复辟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显然是受日本的元老派、民间人士以及军阀们的牵制所致。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内部帝制派与反帝制派力量消长互

① 庄洪铸：《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②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卷下，第66—67页。转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3页。

变着的事实。^①当时，日本阴谋团体黑龙会在致日本政府的备忘录中指出：“考虑到军事同盟方面的效果，日本必须估计中国现在统治者袁世凯地位稳固否。”^②可见，一方面日本怂恿袁世凯帝制自为，以便在瓜分中国的竞争中占先机，确立独霸的地位；一方面时刻注意中国国内的情况，一旦袁世凯无法应对国内的混乱局面，日本准备随时踢开袁世凯。

美国与日本在瓜分中国的立场上有相同之处，也想趁世界大战之乱在中国分一杯羹。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 J. Goodnow）的意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据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头等参赞马克谟在给国务卿的函件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态度将取决于当时客观的形势，特别要考虑新政府为中国人民接受的程度和保护外国利益的能力，以及在中国享有利害关系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公民的信任和同情的程度。”可见，美国政府在对待袁世凯帝制的问题上跟日本有相似的立场，所不同的是美国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其原因在于美国错误地估计了袁世凯的实力，认为“政府完全控制了局势，可以保证没有一次革命运动可能会取得成功”^③，故而美国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实际上，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在民主外貌下的专制政府，或者说是一个披着立宪外衣的君主政府。^④

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建立与美、日、英等国的怂恿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各国为了实现他们的侵略目的在袁世凯重建帝制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多元化的态度，正是国内外政治局势的体现。

① 梁义群：《袁世凯与日本》，《历史教学》，1991年第7期。

② 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5页。

③ 张素平译、杨立强校注：《美国与洪宪帝制——〈1915年美国外交文件〉选译》，《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4期。

④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页。

袁世凯重建帝制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必然产物。“清朝政府的推倒，民国的成立，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快。许多人对眼前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无法立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对它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缺乏应付的经验。”^①所以，失范状态下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促成了新时期重建了旧制度。在袁世凯重建帝制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特点，正是各种矛盾的具体体现。同样还是这些矛盾，又造成袁世凯帝制的迅速流产。这正反映了袁世凯重建帝制的时代特征。虽然袁世凯的重建帝制是在自由主义政策——共和政治——失败后才实行的，但并不能证明重建帝制的合理性。在近代中国社会如此严重失范的历史时期，袁世凯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也就注定了“洪宪帝制”失败的命运。

^①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

石源华

(复旦大学)

袁世凯在中国政坛的崛起，主要依靠北洋武力为后盾，也与他的外交生涯有关。袁世凯驻防朝鲜十年，不仅积累了处理外交事务的丰富经验，而且与近代中国外交的奠基者李鸿章和后来成为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正是李鸿章对他外交才干的欣赏和对他的庇护和推崇，使袁世凯在晚清政坛上平步青云。而袁世凯之所以能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本身就有外国势力支持背景。

袁世凯执政后，十分清楚在当时中国的特殊背景下，他的荣辱存亡与列强对于他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他视“外交”为其命根，不容他人插足。他的经历与他所面临的外交难题，使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和必要实施“元首外交”，亲自主持处理各种外交活动，其事必躬亲的程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空前的。袁世凯对于外交事务的处置方式与他的后继者徐世昌、冯国璋、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以及“敌强我弱”的外交态势之下，作为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主持北洋政府初期外交的思路和做法，具有其特殊的特征，对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处理北洋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维持外交”，其重要内涵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维持”晚清形成的以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特征的中外关系体系，袁世凯主动向列强表示将全部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案件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不仅如此，袁世凯还颁发临时大总统令，命令各省都督及地方长官“督率所属文武军民，讲究约章，切实遵守，勿得稍有违犯，致失大信于天下，而陷国家于危险之途”，并要求国人“履薄临深，互相告诫”等，以妥协退让的办法换取列强支持中国稳定。

其二是“维持”晚清形成的中国疆域，由于中国发生革命，新旧政权进行更迭，全国政局动荡，外来势力乘虚而入，中国边疆西藏、新疆、外蒙古、满蒙（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等均面临严峻挑战，袁世凯无力改变晚清丢地失土的局面，但在敌强我弱、军事上无力抵抗、政治上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却以妥协的方式勉力维持晚清领土原状，如以与沙俄、外蒙妥协签约方式确保了中国的宗主权、以不承认英藏签署的《西姆拉条约》将西藏问题搁置、以外交斗争和争取国际支持的方式避免“满蒙独立”的出现等，渡过了此次难关，至少在名义上使中国的疆土未受进一步损失。

其三是“维持”晚清形成的列强在华“均势”。几个列强国家共同统治中国是近代中国外交面临的最重要的背景，导致了中国外交的错综复杂局面，决定着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走向及其实施的重

点。晚清，经过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已形成了列强华约组织共同统治中国的相对“均势”格局。袁世凯继续晚清李鸿章执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维持”列强在华的这种“均势”，在列强的隙缝中求取中国的生存。

袁世凯的“维持”外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曾经掀起反帝运动的高潮，导致广州、武汉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却在实际上回复到袁世凯的“维持外交”。袁世凯推行的“维持外交”的基本内容都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二

袁世凯处理北洋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外交服务于内政，外交上的一切措置都必须有利于保证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主座地位的稳固，是后来国民政府在强敌面前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始创者。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仅边疆外交问题严重，而且在国内也面临众多严峻挑战。袁世凯在处理资产阶级革命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与外交问题的关系上，是实施了典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了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不惜牺牲国家蒙受高利盘剥的重大经济利益和盐税落入外人之手的政治利益，签署《善后借款合同》，靠列强的输血，稳定了北洋政府的统治。

袁世凯为了实现称帝的目的，亦与德、日、英、美诸国进行秘密交涉，在确信实行帝制不会招致列强反对后，加快了实行帝制的步伐。日本政府曾经决定把支持袁氏称帝作为引诱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重要手段。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曾对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袁世凯在

日本的压力下，很快同意开议“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但在帝制问题上中了日本“欲擒故纵”之计，在众叛亲离中死去。

三

袁世凯处理北洋外交的基本策略是“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既是中国历代王朝对付边境少数或内部民族的传统思想的继续，又是近代西方力量均衡理论影响中国的反映，更是近代中国为挽救外交危局、在列强隙缝中求取生存的应付之道。袁世凯在北洋外交中全盘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即“认别列强之间的矛盾，并试图使之转为对中国有利”。最典型的案例即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袁世凯一方面屈服于日本的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允诺与之进行秘密交涉，另一方面又有意将消息泄露给英、美驻华公使，利用英美的抗议来压迫日本作出让步。虽然交涉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迫下，以北洋政府的屈辱签约告终，但英、美的干涉也迫使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第5号各款内容，使北洋政府初见“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效果，逐步形成了联合欧美国家、抵御日本侵华的外交方针。

一次大战爆发后，由于日本在远东崛起，成为中国的主要敌国，自“二十一条交涉”后，中日关系长期恶化，远东局势动荡不安，因此，袁世凯推行的“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方针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后北洋政府在袁氏之后的巴黎—华盛顿会议以及后期奉系张作霖政权在东北事务上大都推行这一方针，甚至不惜主动引进欧美资本来阻挡日本的政治经济扩张。这一方针同样也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方针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初期正处于“共和”取代“帝制”之际，袁世凯作为从旧政治阵营中转向新政府的封建保守派领袖，其外交措

置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和影响，带来消极的和负面的作用，这是主要的方面。然而，亦不能简单否定袁世凯主政的北洋外交。其一是应该注意袁世凯的外交思想和理念对于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如“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方针等；其二是要客观评价袁世凯实施的若干外交政策，如在西藏问题交涉中，采取搁置的方式，以待时机，就有可圈点之处。

关于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

曾景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

袁世凯改共和为帝制，本是中国内部政制的变更，却受到列强的干涉，而且列强的干涉对洪宪帝制的进程和结局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虽然以往的著述对此已有大致的论述，但列强干涉的许多具体情节，特别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日本在列强中的突出作用等尚待作进一步揭示。本文拟参考《近代史资料》新近译载的一组档案资料^①，对此论题作补充论述。

一、帝制策动之初列强提出警告

洪宪帝制策动之初，袁世凯颇重视列强的态度。袁世凯曾派其政治顾问、日人有贺长雄赴东京了解日本政府的态度，又找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征询意见。有贺传回之信息和朱尔典的回答似均为支持，袁世凯以为帝制可取得英日两强国的承认，外交上自有把握。^②实际情况是：有关帝制问题，大隈首相只对中国驻日公使表示：日本不想干

① 陈春华译：《帝国主义列强与袁世凯帝制——俄国外交档案选译》，《近代史资料》2003年第4辑（总第106号，以下简称《资料》）。

②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8—329页。

涉中国内政，中国人应自行解决本国政府之问题。而中国驻日公使以为这就是对中国帝制运动的鼓励。^①而朱尔典先曾对中国改行帝制表示“甚不赞成”。^②朱尔典还问过中国外交总长，是否有把握防止动乱（这本是对改行帝制持保留态度的一种委婉表示），而中国方面对此却感到高兴，认为这是一种友好的暗示：只要不发生动乱，一切都将很顺利。^③当外交总长、次长担心改行帝制在外交上会出现难题时，袁世凯却声言：“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汝等不必管。”^④

1915年夏，经过“筹安会”鼓吹、参议院操作，帝制复辟渐进入高潮。10月上旬，参议院决定以选举国民会议代表投票决定国体。正当袁氏帝制活动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列强开始进行干预，而为首者恰恰是袁世凯误信以为支持他称帝的日本。

10月11日，大隈首相电示日本代理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日本无法容忍袁氏称帝事态之自然发展。15日，日本阁议决定，邀英、俄、法、美共同对袁世凯提出警告。^⑤从1915年10月起，日本就观察到：中国南方反对恢复帝制十分强烈，不仅革命党人公开宣传反对，连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之所作所为亦十分可疑”。“倘试图恢复帝制，则将爆发起义”。日本与英国紧急磋商，“劝告中国放弃恢复帝制之打算，以防远东发生动乱”，这种动乱发生，“英、日两国蒙受之损失比

-
- ①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5年11月4日），《资料》，第70页。
- ② 《袁世凯传》，第327页。
- ③ [美] 保罗·S. 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0页。
- ④ 《密谋帝制之渊源》，《中华新报》1915年12月13日，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页。
- ⑤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5页。

其他国家更大”。英国也感到，“局势甚至可能对英日同盟之宗旨产生影响”。^①英国同意日本提出的向中国政府提出忠告之建议，“问明中国能否向两国政府保证，中国对实现这一计划在国内不会引起麻烦有充分把握”。日本并向美、法、俄征询同意。各国态度不一。美国认为：这种“友好之忠告”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②法国与俄国协商是否可向袁世凯表示：“四国协约方面不会阻止他称帝”。俄国主张：国体问题是中国人的内政，倘未觉得有足够力量克服可能发生的内乱，则请袁世凯对困难之严重程度作出重新估价；倘袁世凯确能证实自己有力量，“我们不会阻碍承认他为皇帝”。^③

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实行帝制可能发生动乱，后果危险，劝告暂缓改变政体。外交总长陆征祥答允将意见转告总统，但同时解释说：“帝制运动乃来自民意，政府不便制止。”“政府有可能保障不发生任何动乱。”11月3日，法国也追随三国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似乎袁世凯政府预料日本将发起这一干涉活动，事先向驻英、法、美、日、俄公使发出致驻在国政府关于恢复帝制的通告。^④

11月1日，中国外交次长曹汝霖分别拜访日、英、俄三国驻华公使，对10月28日警告答复：帝制运动系服从民意，各省当局将

① 《日本驻伦敦大使井上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1915年10月17日、1915年10月16日），《资料》，第63页及同页注[3]。

② 《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馆致俄国外交大臣备忘录》（1915年10月28日）、《俄国驻美国大使巴赫麦捷夫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0月30日），《资料》，第65页及同页注[2]。

③ 《俄国外交大臣致俄国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5年10月21日）、《法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致俄国政府备忘录》（1915年10月25日），《资料》第64页及同页注[1]。

④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0月28日），《资料》，第66页。

保障安宁。俄国公使对曹汝霖进言：存在着日本间谍挑起动乱之危险，日本可能借动乱之机派军队在中国登陆，故劝告中国尽可能延缓帝制。^①

11月3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访日本外务省，只谈中国政治局势，未触及帝制问题。日外务大臣对中国不听从日本劝告表示遗憾。^②4日，日本代理驻华公使小幡撤开英、法、俄使节，单独向外交总长陆征祥询问，中国是否延缓帝制。^③同日，中国驻日公使馆一等秘书代表公使先后向俄、英驻日大使递交了照会，表示袁世凯同意延缓一段时间称帝。^④

11月7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致电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指示他按11月1日对曹汝霖所言面告袁世凯：“他若称帝，则可能遭致危险后果（指日本乘乱派军队登陆），西方国家均表示反对。”^⑤库朋斯齐遵照指示，再三向中国主要官员并通过可靠人士向袁世凯本人劝告：目前变更国体尚不合时宜，建议推迟到更合适的时候，并强调，“以防日本方面进一步采取对中国更加有害之行动”。很快，他得到了以袁世凯、外交总长和梁士诒名义所作的保证，完全赞同他的劝告，中国政府将按他的劝告行事。在列强干涉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以延缓帝制应付。11日，陆征祥会见日、英、俄、法四国使节时，又秘密告知，帝制大典待筹备就绪后才举行，故不得不推迟。但四国代表

①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1日），《资料》，第67页。

② 《日本驻伦敦大使井上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1915年11月4日），《资料》，第69页。

③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5日），《资料》，第74页。

④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5年11月4日），《资料》，第71页。

⑤ 《俄国外交大臣致俄国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5年11月7日），《资料》，第75页。

对袁世凯政府仍将推行帝制“留下不快印象”。^①同日，日本外务大臣接到中国书面照会：“本年不宣布帝制。”^②11月12日，意大利驻华代办向中国政府提出照会，告知意大利将参加各国劝阻袁氏帝制之行动。^③而11月17日，俄国公使库朋斯齐见袁世凯时，袁对列强劝告不要称帝事表示：权威人士要求他立刻俯允民意，他甚感为难。^④这是袁世凯对列强的干预初次让步后，又不甘心完全放弃的心理表露。

对袁世凯并未放弃称帝，日本建议日、俄、英、法四国向中国表示：四国将保留全部权利，静观事件（态）之进一步发展。倘袁称帝，在确信不会引起内乱和大战结束之前，四国将不予承认。但俄国对日本颇有顾忌，态度亦不似日本强烈。俄国认为：协约国在华最重要目的是切断中国同德国的联系，故要使中国与德断交，驱逐德国国民，协约国首先是日本将从中得到好处。至于袁世凯是当总统还是当皇帝，无关紧要。因此，协约国不要向袁世凯提供钱款，亦不要承认他为皇帝。俄国外交大臣指示其驻英、法大使向英、法外交大臣、外交部长提出上述建议，但勿告日本。^⑤可见，俄、英、法与日本对劝阻袁氏称帝同床异梦。

在协约国对袁世凯帝制活动提出警告期间，北京政府向外国银行团要求借款一千万两，以盐税余款作抵。对此事各国反应亦不同。日本表示原则上同意此项借款，但必须在中国改变政体问题解决之后方可签署合同，否则此款项可能用于恢复帝制。而英国不赞成此刻向中

①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11日），《资料》，第76页。

② 《马列夫斯基（俄国驻日大使）致国内电报》（1915年11月13日），《资料》，第77页注[1]。

③ 《资料》，第77页注[3]。

④ 《库朋斯齐11月17日报告》，《资料》，第77页注[2]。

⑤ 《俄国外交大臣致俄国驻巴黎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及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电》（1915年11月23日），《资料》，第77—78页。

国提供借款。俄愿与英、法协调行动。^①与英国对借款持完全否定态度不同，法国担心：倘协约国拒绝贷款，德国财团可能单独提供贷款，使中国政府屈从于其影响，故主张：对中国作模棱两可之答复，在恢复帝制问题谈判结束前，切勿提供贷款，但不能容许德国财团参加此项业务。由法国财团驻北京代表将此意告知中国。英国得知法国意见后，改采法国之观点。俄国亦是既担心断然拒绝中国贷款要求，会造成不良政治后果，又不能容许德国参加贷款，故取与法国同一态度。^②

二、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列强不予承认

尽管有列强干预，袁世凯还是一意孤行要称帝。1915年12月，参议院充当“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向袁世凯呈递劝进的推戴书。袁世凯还假惺惺作态，将推戴书退参议院，待参议院再上推戴书后才表示接受。12日，他通告在“国民责备”“期望”之下“无可倭避”地当皇帝了，并将次年改元“洪宪”。

对于袁氏称帝准备登极，除德、奥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祝贺信（并请求晋见袁氏，袁氏借身体不适推托^③）外，协约国列强虽然意见并不完全相同，但对袁世凯帝制不予承认。

1915年12月15日，日、英、德、法、意五国公使向袁世凯政府表示：“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的态度。”^④

①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2日），《资料》，第68页及同页注[2]。

② 《俄国外交大臣致俄国财政大臣巴尔克函》（1915年11月26日），《资料》，第79页。

③ 《库朋斯齐致俄国国内电》（1915年12月24日），《资料》，第84页注[4]。

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李宗一书引黄毅：《袁氏盗国记》，作“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态度”。

北京政府以只有协约国列强承认袁氏帝制，中国才能与德国断交相要挟。

其实，当时积极干预袁世凯帝制的主要是日本，其他各国为拉拢日本加入协约国共同对德，故追随日本参加劝告，这几国并不反对袁氏称帝。据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12 月 21 日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我们（指日本之外的几国驻华公使）都感到自己是日本牵线的一群木偶。^①英国方面主张，“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同意中国有关帝制之建议”，希望日本政府赞同。^②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指示其驻中国公使库朋斯齐，对中国外交总长表示：俄国并无推迟承认袁氏帝制的理由，但须与日本等协约国达成协议才能作出决定。袁不要按同德国的协议称帝，德国的承认丝毫不能巩固其帝位。沙查诺夫甚至以私人意见告知库朋斯齐：他个人认为，应当抢先承认袁氏帝制，切勿使德国抢在我们前面。^③库朋斯齐遵照沙查诺夫的指示告知中国外交总长，同时征求英、法驻华公使意向，英、法公使均认为不宜推迟承认帝制。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持不同观点。^④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男爵认为，“宣布帝制与承认帝制是两回事”。德、奥先予承认，并不影响协约国威信，相反，可能更加提高协约国之作用。^⑤

俄国人看出，日本人正利用承认袁世凯帝制问题提高自己的地位，显示出“协约国承认帝制与否，仅仅取决于日本之善意”；日本要求在中国与协约国之间调停，倘协约国赞同这一要求，则可能导致

① 陈志让：《袁世凯传》。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2 卷，第 485 页注 [2]。

② 《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致俄国外交大臣备忘录》，《资料》，第 84 页及注 [3]。

③ 《俄国外交大臣致俄国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5 年 12 月 24 日），《资料》，第 85 页及注 [1]。

④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 年 12 月 27 日），《资料》，第 86 页。

⑤ 《俄国驻东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6 年 1 月 1 日），《资料》，第 87 页。

承认日本在远东事务方面居领导地位。对于俄国驻中国公使的这一分析，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御笔亲批：“朕完全同意库朋斯齐之意见。”^①俄国认为：日本想借袁世凯帝制，获取某些实际好处；并欲使中国意识到，若不征得日本同意，中国改变国体便不能实现。^②俄国对日本之警觉和嫉恨，于此可见。此时，俄国认为：没有充分理由拒绝承认帝制，拒绝承认不仅对袁世凯造成许多困难，而且这种抵制可给反袁世凯的“革命分子”以有力支持，并有利德国在华影响。^③

意大利也认为：在承认帝制问题上，德、奥抢在前头，对协约国未必有益。承认帝制并不需要协约国为帝制担保，倘因恢复帝制而发生内乱，亦无需协约国给予中国政府支持。因此在承认帝制问题上，难以找到为推迟辩解的理由。^④

正当各国对是否承认袁世凯帝制意见分歧之时，由云南发起的护国运动给了列强考虑和决策以非常重大的影响。1915年12月25日，护国反袁起义在云南爆发了。这给袁世凯称帝当头棒喝。面对着中国爆发强烈的反对帝制的护国运动和武装起义，列强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袁氏帝制的态度。1916年1月初，英国政府认为：云南骚乱尚在继续，现在承认中国帝制不适宜。包括日本在内之各国在该问题上要联合行动。^⑤

但协约国内部意见仍然存在分歧。日本态度最为强硬，坚持将宣布帝制与承认帝制分开的观点。1916年1月9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

①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2月29日）及沙皇1916年1月6日批注，《资料》，第86—87页。

② 《俄国驻东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6年1月1日），《资料》，第87页。

③ 《俄国外交大臣致俄国驻英、法、意、日大使和驻华公使电》（1916年1月5日），《资料》，第88页。

④ 《日本驻罗马大使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电》（1916年1月8日），《资料》，第89页。

⑤ 《俄国驻英国大使本肯多夫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6年1月10日），《资料》，第89页注[1]。

益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交换意见时，提出最好各国再次共同向中国交涉，劝告将宣布帝制推迟更长一些时间。库朋斯齐提出，以前向中国政府保证过不干涉中国内政，倘五国联合就暂缓变更国体再次提出劝告，中国人可能不予接受，这将使五国十分尴尬。同时中国外交总长派员告知库朋斯齐，延迟恢复帝制极为有害，这会鼓励革命党挑起新的骚乱。中国政府请求俄国对在公历2月宣布帝制时给予襄助。^①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库朋斯齐报告上述情况的电报上批示：“我们不能处处被日本牵着鼻子走。俄国应该承认中国为君主国家。”^②俄国外交大臣尽管不敢拂逆沙皇，但还是于1月16日上奏意见：虽然俄国对袁世凯在中国恢复帝制自始即持同情态度，但“为巩固袁世凯之地位计，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对此事的看法，因为俄国一个国家承认帝制只能导致局势更加混乱，俄国同协约国分歧，而同德奥一致，其影响对俄国不利。因此，尽力在不违反协约国一致的原则下，利用一切合适机会尽快承认中国新制度”。^③

就在沙查诺夫呈交奏折的前一天，1月15日，梁士诒秘密告知俄、英驻中国公使：中国“或于公历2月6日，或于公历2月9日宣布帝制，可能于1月底正式将此事通知外国使节”^④。日本对此反应强烈。1月16日^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本国电训，照会中国外交

①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6年1月9日），《资料》，第90页。

② 《尼古拉二世对俄国驻北京公使1916年1月9日致俄国外交大臣电的批示》（1月13日），《资料》，第91页注[2]。

③ 《俄国外交大臣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奏折》（1916年1月16日），《资料》，第91页。

④ 《库朋斯齐致沙查诺夫电》（1916年1月15日），《资料》，第91页注[3]。

⑤ 据李宗一《袁世凯传》（第354—355页）说：“在周（自齐）临行的前一天，即1916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袁政府说：‘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但据当时记载：“1月16日，日使照会外交部，谓奉本国电训，赴日周特使偶待接待，暂缓启行。”引自《大中华》第2卷第1期，时事日志。

部，拒绝接待（用语是暂缓启行）袁世凯特派前往日本为补庆天皇加冕、并赠授勋章的中国专使、农商总长周自齐。这不啻对袁世凯泼了一盆冷水。日本外相石井解释说：“倘我们接待政界认为追求政治目的（显然指要求日本支持中国改行帝制）的大（特）使，则将大大加强对承认中国为帝国持反对态度的我国反对党，并可能引起种种误解，这极非所愿。况且，我们亦不能断言不存在危害使团官员之图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两国产生极为严重之后果。”^①虽然石井是从日本国内的角度加以解释，但承认此事与袁氏帝制有关，这分明是拒绝承认袁世凯称帝的一种明确表态。

这时，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令在袁世凯处任军事顾问的坂西利一郎转告袁世凯，如行帝制，日本将采取强硬态度。1月21日，日本外相石井通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輿，日本希望袁世凯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它将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宣告袁政府妨碍东亚和平，派兵“自由”进驻各要地。^②22日，中国吉长道尹因事与日领交涉，文件用了“洪宪”年号。日领事当即将文件退回，略谓：改用年号，虽属中国自由，然日政府尚未承认新帝国，对于年号即无默认之理。^③

袁世凯面对着国内强烈的反对和声讨、外国的警告和干涉，日益陷入进退两难的狼狈境地。他原已确定于1916年2月3日（阴历新年初一，一说2月9日）正式登基，至1月中旬中不得不改变主意，决定暂缓帝制。袁世凯政府外交部于1月21日照会各国公使，略谓南方乱事未平，国体虽改，登极时日尚需延期，且报载2月登极之说正确。^④这是袁世凯政府对列强干涉帝制的第二次退让。

① 《石井致日本驻俄大使电》（1916年1月18日），《资料》，第92页注[2]。

②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页。

③ 《新中华》第2卷第1期，时事日志（1月22日）。

④ 《大中华》第2卷第1期，时事日志（1月21日）。

三、日本两面三刀，唯恐中国不乱

列强干涉袁世凯帝制过程中，日本一马当先，而且充作协约国列强之谋主。日本先是故设陷阱，以含糊态度怂恿诱骗袁世凯改行帝制。待袁世凯帝制丑剧上演后，又变脸显出原形，串通协约国列强一再干涉，警告袁世凯政府，不能恢复帝制；对袁世凯改行帝制，不予承认。日本认为袁世凯是确立日本在华优势地位方针的障碍，必欲使之退出中国的当政集团。

1916年1月20日^①，日本内阁举行会议，就中国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后到3月7日内阁会议正式作出决议。其要点是：一、确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使该国国民意识到日本之强大势力，以创造“日中亲善”之基础。二、袁世凯仍在中国掌权，确为妨碍日本推行上述政策之障碍。无论何人掌权都比袁更符合日本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故必须使袁世凯退出中国的政坛。三、使袁氏退出中国政坛，以靠中国自身形势的发展为得策，这要视中国国民民心将来的归向而定。日本密切关注中国的形势发展，以决定对华方针。四、上述如若不能实现，因为排袁会与袁世凯直接冲突，要求其中止帝制或退位，反而会为已陷入进退窘境的袁世凯开出一条活路，并且要为救出陷入窘境的袁世凯之善后承担责任。日本以与欧美协调为得策。若干涉中国内政，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五、等待适当的时机承认南军（南方反袁护国起义军）为交战团体。六、日本民间志士对以驱逐袁

^① 日期据《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6年1月26日），《资料》，第95页。《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册第777页引《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载，这次日本内阁会议日期为1月19日。

世凯为目的之中国人寄予同情，彼等拟资助中国人金钱武器，政府虽不便负起责任公开鼓励此等人士，但将予默许。^①

日本一面干涉袁世凯帝制，一面支持各种反袁势力，乘中国政局混乱之际，制造中国分裂。日本早就通过民间（政府暗中支持），有时也由官方出面，帮助和资助南方和北方反对袁世凯的势力。蔡锷从天津逃出就是先到日本，再转道赴云南参加护国起义的。1915年11月初，曾先后任蔡锷云南都督府秘书长、滇中观察使、滇中道尹、北京政府经界局局长的周钟岳，逃出袁世凯政府的监视，微服离京，逃至天津，后来也是在日本宪警保护和指引下，易名周溢化装商人，才从奉天经釜山逃往日本的。^②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参谋部附中山大尉入渝领事署，并派日人山口赴成都、宜宾活动。日本通过云南接济四川反袁势力步枪及大炮，四川方面乃发动攻泸。^③护国起义策划者组织者之一梁启超离沪赴广西，经过香港、越南，全系日本武官青木中将安排其属员松井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潜乘日轮昼伏夜动，“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梁启超冒充日人，躲过港英当局和海防法国当局之检查，其“偷渡之举”，“全托诸日本人”，都是在日本政府指挥下进行的。^④

1916年1月，日本前驻华武官青木中将奉命来华“考察”。青木与反对袁世凯的各派势力均有联系。北京外交界看出，此举对袁世凯政府有更大的恐吓作用。^⑤据报，青木宣布：日本愿以大宗军火及巨

① 《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1916年3月7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第46页。

② 周钟岳：《赴日经过》，《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192页。

③ 《周骏致统率办事处等电》（1916年2月2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195—196页。

④ 梁启超：《从军日记》。转引自《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198—203页。

⑤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6年1月26日），《资料》，第95页。

款接济反袁革命党人，准备在长江发动起义。2月下旬，青木中将从上海到天津。3月2日到达北京，住在日本军营，活动五日再经武汉返沪。日人谎称，青木此来别无政治意味。但日本已对派遣来华军队发出动员令，且2月底有十一艘日舰开赴青岛。^①

据吴景濂记载：日本派青木为驻沪总代表，与唐绍仪联络，凡各省讨袁往返密商电报，皆由各地日本领事馆转递。日本内阁密议，对中国内地十八省讨袁军队，皆予援助，而对东三省则拟乘机攫取政权。吴氏靠日人神田正雄保护，秘密离京反袁，并接家眷，于1916年4月9日移居天津日租界。袁世凯下令通缉吴景濂，他在津不得不借重日人保护。后吴景濂与日本驻屯军和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协商，由其派人保护他赴大连活动。吴景濂至上海，青木向吴景濂表示：如能在东北举兵讨袁，彼可告日本参谋本部援助一切。后青木又告吴景濂：参谋本部回电，可借南满租界练兵，练兵器械与款项均由日本借给。对张作霖，如其听调遣则留之，不听则去之。青木还将参谋本部复电相示，并要求吴景濂派员至旅顺与日本“关东都督”接洽。^②

日本运送武器弹药支持反袁护国军，由越南境内转运军用品。1916年4月2日，梁启超致唐继尧：“速运所购得之械至北海。”^③日本通过半官方的商人竹内维彦与护国军政府代表岑春煊、张耀昌签订了一百万日元的借款合同，久原房之助接济孙中山六十万元，黄兴、陈其美各十万元。日本不断加强与各派反袁势力联络，给予帮

① 《杨善德致统率办事处电》（1916年4月11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06页；《新中华》第2卷第1期，时事日志（3月2日）。

② 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近代史资料》总第107号，第34—35页。

③ 《张南生致唐继尧函》（1916年3月30日）、《梁启超致唐继尧电》（1916年4月2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04—205页。

助，派山屈之和太田分任驻滇和驻肇庆领事，派嘉悦大佐和今井嘉新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派萱野长知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顾问，并以驻鲁日军为其后盾。^①

日本除支持南方反袁势力外，还支持东北、内蒙古的满蒙亲贵和宗社党暴动，策动在南满东蒙建立特别独立国，以在大连的逊清肃亲王善耆为皇帝。然后，日本帮助将这一地区的独立变为自治。有传言谓：日本策划以呼伦贝尔盟总管胜福之权力，在俄国努力下，将向整个北满伸展，使处于俄国影响之下。日本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出渊胜次与六等文官格拉卫私下谈话时对这些传言不加批驳，而持同情态度。^②这正好是日俄划分南满东蒙和北满势力范围之格局。日本大仓喜八郎贷与前清肃亲王一百万元。日本派土井市之进为总指挥，策应川岛浪速和宗社党人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③日本政府和经由日本政府同意之日本私人企业家，经大连向中国出售了大批旧式武器，以武装北方各省，并签密约：“日本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条件是北方诸省向日本提供完全的行动自由。”^④

日本还分化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与对袁世凯推行帝制不满的冯国璋暗中联系。

总之，日本两面三刀，以反对袁氏称帝之名义，支持中国各种反

①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第778页。

②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6年3月29日），《资料》，第102—103页。

③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第778页；《俄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罗斯波波夫向外交部紧急报告》（1916年3月13日），《资料》，第98页注[2]。

④ 以上见《新中华》第2卷第1期，时事日志（1916年1月22日、1月26日、2月6日、2月17日、2月19日、2月23日）。

袁势力，造成中国四分五裂，以便它进一步支配和宰割中国。

四、列强促袁世凯取消帝制和退位

1916年1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交逼下再次延迟登基日期，实际上是在向取消帝制的道路上退让。列强对帝制和护国战争密切关注。外交风云骤紧。1月22日，外国驻京使节组成的外交使团开会，讨论袁世凯帝制问题。据载，英国公使朱尔典提议，承认帝制与否，以袁政府“平乱能力为断”，各使咸表赞同，分电向本国报告。

自云南护国起义发动后，列强非常注意南方情势。连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也因办理某项“要事”，于1月25日出京赴津，声言勾留数日，即行赴滇。英文《京报》则称美领事于迺日（24日）赴滇，调查情形。德文报称，英领事曾为政府居间调停党人，劝令停止用兵。

2月上旬，北京外交界传出消息：英日近有新协约发生，其内容不外认明日本在极东（远东）之优先权，并确定英国所享受之条件。据《字林西报》消息，日本在云南府派领事一员，建设领署，并有一日本陆军少将新到该处，调查军情。外交部亦接到日本公使馆正式公文，派书记生大和久氏赴四川调查事件。

2月17日，外交团向北京政府提出“平乱”期限。陆征祥国务卿答复，预期不出六个月。19日，英、法、俄三国公使同往日本公使馆举行会议，以西南起义为主题，并讨论盐税善后问题。列强对于南北两方持公平态度，不取何等干涉。关于日本对华措施，外交界发生种种猜测：1. 予北京政府以重大之刺激；2. 发最后之警告；3. 发生外交上疑难问题。2月下旬，参战之协约国使节又举行会议，针对陆征祥答应六个月内能“平乱”的说法，决定：如中国政府不能在六个月内弭平滇乱，则各国为保护商务起见，不能不正式承认滇黔为

交战团体。针对日本派兵来华，参议院参政李盛铎等会进“滇路战事期内预防列强军事行动”说帖，指定长江警备地点苏省三处，皖省八处，赣、鄂各五处。^①

护国军起义1915年12月下旬从云南开始后，贵州响应，护国军进入四川、湘西，与北京政府军激战。本属袁世凯手下的冯国璋等也对袁世凯称帝不满，暗中反对。在护国战争声势不断扩大和列强质询干预下，袁世凯复辟帝制骑虎难下，不得不作退缩。3月1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5日，袁世凯命总统府内史监阮忠枢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讨论“国体大计”。袁世凯又与李经羲、赵尔巽密议，同时向各省军政长官征询是否取消帝制的意见，各省意见不一。有的外国公使、外国顾问建议，自云南起义，政府专办军事，未免失坠内外信用。袁世凯函询徐世昌意见。徐世昌函复：“终须从基本上着手。”袁氏御用团体“政治研究会”3月10日开会，除部分政府大员外，并有莫理循、有贺长雄、韦罗贝（美国人）三位外国顾问参加。该研究会声称“在集有经验之人，以研究改良政治，消弭西南乱事为要点”。^②

3月13日，日本公使又向外交部提交质询国体书。外交部立即送袁世凯阅。同日，英、美两国公使亲诣日本使馆会晤，下午复诣外交部迎宾馆，陆征祥总长、曹汝霖次长，传与日本提出新外交意见极有关系。当日下午，袁世凯即召陆征祥等大员密议对策。陆征祥密令驻外使节了解各驻在国对于南方护国军之评论和中国现状之态度，详为具报。一面将政事堂密议准备取消帝制宗旨，通电各省。这一时期，外交团日、英、俄、法、意各国使节连日密议。^③

至3月15日，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反袁战争大有扩大之势。就

①② 《新中华》第2卷第1期，时事日志（3月10日）。

③ 同上书（3月13日）。

在广西独立之际，袁世凯的北洋军骨干人物冯国璋联合李纯等南方五省督军发出通电，要求取消帝制。3月21日，袁氏政治顾问莫理逊给袁世凯一封便函，说：“除非总统立即发布明确的训令，取消帝制，宽宏地接受对陷国家于内战的筹安会灾难性活动的谴责，才有可能免除更大的危险。”^①当日，袁世凯召集会议，立即决定取消帝制。

3月22日，袁世凯设便宴为即将离任的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饯行时，告知库氏：他当晚将颁布总统令。他承认各省对帝制不满，他在帝制问题上“被引入迷途”。他现在要将接到的劝进推戴书退给参政院，重新审议，他同意保留共和制度。此项总统令，将由接替陆征祥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副署。^②大概这是袁世凯废除洪宪帝制最早的对外宣告。

当3月22日袁世凯决定将推戴书退参政院时，北京政府方面主张保留袁世凯总统职位。但这时，袁世凯仅仅宣布取消帝制，已经不能满足全国的要求。国内无论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还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原进步党人，各种反袁势力连同许多原属袁世凯系统的将军等人，无不要求袁世凯退位。根据袁世凯训令，北京政府欲同起义领导人就达成妥协进行秘密谈判。然而，连冯国璋也已主张袁世凯下台了。在推动冯国璋坚决站到逼袁世凯下台的一边时，政界人士也曾以警惕东邻干涉相劝说。唐绍仪、赵凤昌在致冯国璋函中说：“近日外界消息更恶，干预主权即在目前。惟有立刻发表退位，悉照约法处理，使其无辞干涉，（否则）不能渡此难关。”^③

① Memorandum re Abandonment of Monarchy to Yuan shih-Kai, 21 March 1916, 莫理逊便函, Lo Hui M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莫理逊通信集》,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8, V. 2, p. 497.

②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电》（1916年3月22日），《资料》，第100页。

③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07页。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密切关注外国的反应。3月29日，陆征祥电令各驻外使节调查驻在国外交使团对中国政局的态度。对袁世凯颁布的废除帝制令，外交界反应不一：或以为此令可使脱离中央政府的南方各省立即归服北京；或认为总统令颁布得太晚了，起义军可能认为这是袁世凯软弱的表现。^①袁世凯政府曾请英使帮助维持现有政权，英使亦允赞助。^②护国起义初起时，英国驻昆明领事曾为袁世凯政府向护国军进行调解，曾试探两次，经严词拒驳，未敢再来。至袁世凯取消帝制，大势已去，仍求英保护，更无济于事。^③而日本早就决定利用反袁斗争彻底逼袁下台，认定：“无论何人掌权，都比袁更符合日本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故必须使袁世凯退出中国政坛。”^④日本准备与英国进行秘密磋商，阻止南北方谈判。^⑤4月5日，日本公使馆参赞小幡到京，特派前驻牛庄领事天田喜平为驻广西领事，前往南宁设署办公。^⑥这表明，日本开始要承认南方反袁的护国军。

4月20日，北京外交使团接到驻粤领事电：南方独立军送到唐继尧等联名公电，谓袁世凯已失去民国大总统资格，按民国临时约法，请副总统黎元洪代理。袁世凯政府政事堂奉令致电各国，阻止承认南方政府。陆征祥造访各国公使，声明中央政府对于外交种种确切

①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6年3月29日），《资料》，第101—110页。

② 《张謇未刊信稿》，《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03页。

③ 《唐继尧复谢东发吴永珊李汝哲信》（1916年5月），《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08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第45—46页。

⑤ 《日本驻英国大使井上致驻俄国大使本野电》（1916年3月18日），《资料》，第102页注[1]。

⑥ 《新中华》第2卷第1期，时事日志（4月5日）。

责任，南方关于国际上各种条件不生效力。但5月1日，北京外交团发出照会，质问南北现势，停战期满后能否不再发生战事？^①这无疑给袁世凯政府外交压力。5月8日，南方军务院成立。宣布独立省份渐多。18日，南方非独立省份会议亦不能保袁世凯权位。袁世凯亦担心列强对其保位的态度。6月1日，袁召见蔡廷干，问：“听说整个外交使团都认为我应该或将会辞职？”蔡廷干回答说：“大家都认为您应当进行休养，这是亟需要的。政府财政前景暗淡，困难非但未减少，而是在增加。所有的人都为您的健康担忧。”^②袁世凯之病情与日加重。经过反复的较量，袁世凯的权力终难保持。在内外压力下，袁世凯6月6日在忧郁愤懑中病亡。

五、列强干涉洪宪帝制简析

袁世凯洪宪帝制之所以尚未正式告成即迅速夭折，除了由于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违反民心，护国反袁势力的坚决斗争，袁氏的亲信势力的众叛亲离等原因外，列强的干涉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袁世凯开始误以为改行帝制列强不会干涉，才放手进行。在复辟帝制的过程中，日本联合协约国列强一再警告干预，给了袁世凯相当大的外交压力。直至宣布取消帝制后，他到生命垂危之际，仍关注列强是否认为他应该辞职。

袁世凯复辟帝制，本是中国内部政治制度从帝制转变为共和制过程中的一次反复，属于中国内政。但中国是受列强欺凌的弱国，列强

① 《新中华》第2卷第1期，时事日志（4月20日、5月3日）。

② Tsai Ting Kan to Morrison, 蔡廷干致莫理逊函，1 June 1916,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p. 527.

对于中国内政往往随意干涉。当然，列强对袁世凯帝制的干预，绝非为了阻止中国政治制度的后退。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各国对于中国是行共和还是行帝制的态度，如出于其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的动机，应因其本国实行共和或帝制而取舍认同，如德、奥、日、俄（甚至包括英国），因其本身的政制应趋向赞同袁世凯改行帝制，美、法因其共和制而应加反对。但情况并非如此。列强各国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干涉与否，其立场完全以维护其在华权益之考量为转移。俄国本心并不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为协约国一致对德，乃与英、法共同追随日本而干涉洪宪帝制。英国、日本亦未因其本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支持中国复辟帝制，它们害怕袁世凯称帝会引发中国内乱，而影响其在华权益，故而干涉。尤其日本，乘西方列强专注于欧战而建立其在华优势地位，经历了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的反日风暴之后，更加害怕袁氏称帝再次出现动乱，对它不利，并且认定袁世凯为建立日本在华优势地位之障碍，故干涉袁世凯帝制最为起劲，充当了谋主。

虽然，列强干涉洪宪帝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攫取的权益，但客观上有助于阻止帝制在中国的复辟，这也是事实。这是历史发展呈现复杂性的一种表现。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革命势力和反政府势力往往暂时利用列强与中国统治者的矛盾来进行革命和反政府的活动，争取列强之同情，甚至寻求和接受外国政府（民间的就更不用说了）的支持和接济。反袁护国斗争中，孙中山、梁启超和护国军方面都曾寻求和利用了日本的支持和帮助。1915年12月，黄兴曾致函电美国驻华公使和北京外交团等处，表示人民反对帝制到底的决心，“愿其好意扶助吾国之共和”。^①云

^① 《黄兴致美国驻华公使电》（1915年12月14日）、《黄兴致友人书》（1915年12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70、71页。

南护国军政府成立后，唐继尧发送照会，申明军政府保护各国官商人等，与缅、越共维边界治安，前清和民国政府与各国之条约继续有效，“愿各友邦共守善意之中立”，亦为争取各国之同情。^①梁启超获悉袁世凯欲派周自齐赴日为补贺日皇加冕赠礼授勋，藉以争取日本对帝制的承认时，就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运动日本政府拒绝周自齐赴日。^②

协约国列强为了共同反德，在干涉袁世凯洪宪帝制过程中，表面上协调一致，但因各自利害，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列强对是否承认袁世凯帝制，实际上同床异梦。有些国家感到袁世凯是当总统还是做皇帝并无紧要，关键是会不会影响到其在华利益。而日本必欲将袁世凯驱除出中国政坛。俄国与日本之间更充满矛盾。俄国公使感到：日本利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活动，“可能导致承认日本在远东事务方面居领导地位，和几乎确立日本对中国之保护地位，这绝不可能符合我们的意图”。沙皇甚至亲自批示意见，表示赞同。^③俄国驻华公使甚至向中国方面提醒，要防止日本派军队在中国登陆，进一步采取对中国有害之行动等。^④

在列强中，日本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是最为横蛮的，其攫取中国权益的贪欲亦最无止境。因袁世凯复辟帝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俄、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占取在华优势地位，亦暂且忍让。日本采取两面三刀手段，惟恐中国不乱，必欲达到驱袁下台的目的。俄国人都看出：“内乱在中国蔓延，可能符合日本政府之意图。”^⑤

① 《唐继尧照会各国领事文》（1915年12月18日）、《云南将军行署巡按使署照会》（1915年12月31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132、133页。

② 《唐继尧复李宗黄函》。转引自《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册，第715页。

③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2月29日），《资料》，第87页。

④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11日），《资料》，第75页。

⑤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2月17日），《资料》，第86页。

连受到日本帮助才得以到达西南参加护国运动的梁启超也深感日本的可怕。梁启超记述了他在赴广西途中，全靠日本人安排照应的感受：“就中所最感叹者，则日本人之恳切而致密，各种各色人，咸动于其政府默示指挥之下，如身使臂，臂使指，条理井然，而乐于趋功，无倦容，无强态。虽一事也，可以喻大。如此之国民，安往而不优胜者？彼今固无所为而为之，至竟有所为耶，无所为耶？念此益滋栗也。”^①梁启超不愧是深邃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敏感到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控制能力和日本人的组织程度和办事作风，如果他日谋我，岂能不寒而栗！

^① 梁启超：《从军日记》。转引自《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03页。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

苏全有

(华中师范大学)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对此，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他称帝心切所致，袁世凯被称为“卖国贼”，多源于此。其实，袁世凯并不心甘情愿签订《二十一条》，并且进行了相当的抵抗。

对于《二十一条》出笼过程记载最为详尽的是《山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梁士诒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经理，是袁世凯的“财神”与心腹，直接参与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全过程，故该书的内容比较可信。

1914年11月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国，外相加藤高明于12月3日训令他再度来华，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说帖。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借口英日联盟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此时欧战方酣，列强无暇顾及，于是日本拟乘此千载难逢之机，控制中国，《二十一条》的提出就是行动。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以新归任为词，要求进见大总统袁世凯，并于1915年1月18日得以入见，将《二十一条》说帖面呈袁世凯，袁当时表示：“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除了控制中国的企图之外，还有打击袁世凯的目的。袁世凯自朝鲜甲申政变以来，对日本十分敏感，甚而仇视，日本也以袁不利己，视为劲敌。此时袁世凯欲称帝自为，依西方各国为外援，而摈弃日本，日本担心袁世凯巩固统治后于己不利，于是蓄谋推翻袁世凯政权，与冯国璋、段祺瑞、张勋、孙中山等各方势力多有接触。《二十一条》的提出，无论袁世凯允与不允，都将被置于无可回旋之地，“袁之失败，殆半由于此”。许多人认为袁世凯与日本妥协，才有《二十一条》的出笼，其实事实恰恰相反。

袁世凯接到日置益所递《二十一条》说帖后，当晚即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及梁士诒等人总统府密议，磋商了整整一夜，袁世凯将《二十一条》原文，逐条逐节，以朱笔批注，分别驳议，作为交涉依据。

但是，日本不断对袁世凯进行威胁，并利用国民党势力作为反袁世凯政府的打击力量，甚至《二十一条》说帖所用的纸上有无畏舰、机关枪的水印。

1月27日，袁世凯调整外交阵势，孙宝琦改任审计院院长，而以陆征祥代孙宝琦为外长。2月2日，中日代表举行第一次交涉会议，列席人员中方代表为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是日置益公使、小幡参赞、高尾参赞。从2月2日至4月17日，举行正式会议共二十五次，2月9日，中国提出修正案一次，4月24日，日本提出修正案一次，袁世凯在幕后不断设计应对措施，尽力折冲。5月1日，中国外交部回绝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修正案。5月7日，日置益向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①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9页。

袁世凯接到此哀的美敦书后，于5月8日午后召集会议讨论中日问题，而在正午时分，英公使朱尔典会见外长陆征祥，劝说中国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以避危机。午后国事会议上，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议院议长、外交次长、参政次长、秘书长等列席，会上，外长陆征祥汇报了会见朱尔典的情况，经过讨论后，袁世凯作结论性发言：“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国“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曰：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要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①袁世凯讲话时，悲愤填胸，涕泪满面，与会者或怨愤，或危殆。讲话完毕后，大会即在沉痛气氛中结束。

5月9日上午，外交部以电话通知日本使馆允诺《二十一条》，下午3时致送复书。袁世凯于5月14日又密谕百官：“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中，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②之后的“5·9纪念日”形成，并一直延续多年才渐渐淡化乃至消失。

从以上《山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所记《二十一条》交涉过程可以看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乃是迫不得已，属弱国无外交。那种认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因为称帝心切的传统看法^③，似

① 凤冈及门弟子：《山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第256页。

② 同上，第26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5—176页。

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

前文梁士诒提到的日本对袁世凯的仇视政策，力图除之而后快，这可从当时日本的外交活动记载中知晓，将有助于我们对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认识。

日本仇袁可以追溯到袁世凯在朝鲜时期。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政府“以执政亲中国，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殊怨袁”^①。“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②。1885年，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提出惩办袁世凯问题，成为十年后甲午战争的伏计^③。日人佐藤铁治郎在《袁世凯》一书中所说：“袁久驻韩终必为患”，“袁世凯历年在韩扶植清之势力，夺我利权，我国当日虽渐退缩，然未尝须臾忘也”。^④

袁世凯担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日本一些民间人士和军人中的强硬派，甚至参与反袁阵营，而不久发生的“北军”侮辱日本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国内掀起反袁热潮。^⑤

袁世凯联合英国搞南北议和，日本人十分不满，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给伊集院训令中说：“袁的居心诚属费解，若袁果真有意疏远我，竟想利用我，或从中操纵，我自有对付之策。”伊集院认为：“至于我对袁世凯之态度，似宜暂时持旁观不干涉，使彼感到忐忑，然后徐图报复，是为上策。”^⑥

①③ 庄洪铸：《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46页。

② 梁义群：《袁世凯与日本》，《历史教学》1991年第7期，第47页。

④ 佐藤铁治郎：《袁世凯》，时闻报馆1910年版，第25、74页。

⑤ 梁义群：《袁世凯与日本》，《历史教学》1991年第7期，第48页。

⑥ 周彦：《日本与洪宪帝制》，《求是学刊》1994年第2期，第113页。

日本参战前夕，内阁就决定设法拉拢、控制袁世凯政权，《二十一条》中第五号要求就是这一决定的体现。^①

1914年10月29日黑龙会备忘录（《黑龙会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中，有一段经典的日本对袁世凯态度的说明：“……袁世凯是否会迅速同意日本政府的建议而与我们订立同盟条约。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彻底的考虑。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单举他从帝国政府对德宣战以来对我们的行为作为例证，大家对他将来的行动就会了了。”“袁世凯属于喜欢玩弄权术的那一类政客。他一时可以对我们表示友好，但当欧战将结束时他就一定会抛弃我们而与其他列强友善了。从他的过去来判断，将来他会搞些什么，我们是一点怀疑也没有的。”“我们与其一支持一个既不能长久保持政权，也不能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中国政府，倒不如支持四亿中国人民革新其腐败政府，改变政府的现有形式。”^②

1914年12月3日前，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致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关于对中国提出要求之拙见》，中称：“袁为从困境中拯救自己，利用其惯用手段新闻政策进行排斥运动以及挑起极端排日热潮，甚至或向美国乞求援助，或唆使德国人制造障碍，两国关系及国民感情发生纠纷，甚至可能造成进退维谷不可收拾局面。”^③

① 郎维成：《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第68页。

② 龚古今、恽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9页。

③ 《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2期。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称：“日本人民类皆反对袁总统，彼等相信总统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亦采远交近攻之政策。”^①

日本政界不仅仇袁，而且渐渐由暗到明走向反袁。由政友、国民、同志以及中正等各政党议员，加上国民外交同盟会、对支联合会与浪人会等各种团体发起组织“有志大会”（其中有不少企业界人士、新闻记者及其他“有志”人士参加），在日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倒袁运动。“有志大会”决议指出：中国“各省为了诛除袁世凯之僭窃帝位而举兵，乃中国国民之正当行动，务期尽速迫袁引咎而退”。^②

为了打击袁世凯政府，日本极力支持中国国内的反袁势力。日本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成立。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还派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与在越南的日本商人协助梁启超从上海经海防潜入广西转赴云南领导护国运动。日本寺内内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扰乱支那全国之策，卷起支那各地抗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③

对于日本阻止北京特使周自齐访日，陆宗輿于1916年1月16日致电外交部：“其欲倒我政府，计划已非一日。”^④

由上可知，日本的仇袁由来已久，且一以贯之，《二十一条》的出笼，日本既有侵华的用意，也有去袁的打算。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1页。

② 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94页。

③ 庄洪铸：《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52页。

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3—34页。

三

天津市历史档案馆存有一批袁世凯的档案材料，其中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①最为重要。

关于《二十一条》中“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一条，袁世凯批道：此项应候大会讨论后再议。

对于“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袁世凯批道：只可依据条约，之外应不在内，青岛声明交还中国应不在内。并将“或其他关系”五字删除。后袁世凯对这一条内容再次批道：关系太含糊，应“加一条：一、日后政府协商让与等项倘或未能确定，此项预约作为无效”。

关于“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袁世凯批道：由我自造，如借款俟第一条实行后可先尽日本商议。

对于“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一条，袁世凯批道：现在财政困难，经费支绌，东省已开有济南、龙口，某某若干处，无庸再加，如不得已，可在东路再添一二处。

关于“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一条，袁世凯批道：无此“向认”。

对于“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

^① 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6—333 页。

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袁世凯批道：“因俄原定期无九十九年之久，展期至多照原订之期不能超越。”

关于“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地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一条，袁世凯批道：“东部内蒙古”应不在其内；“耕作”超出范围，不行；所有土地有关领土；应删去“或所有权”四字。后日本提出修正案中将这一条改为：“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经营农业可得租赁或购买其须其地亩。”袁世凯将“或购买”三字圈去，批道：购买有碍完全领土。

对于“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意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袁世凯批道：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

关于“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采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一条，袁世凯批道：范围太大，应指明矿区地数矿章，并将“商订”改为“商办”。

对于“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袁世凯批道：违背条约。

关于“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所有属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一条，袁世凯批道：这属商贸之事，并不同意“相当机会”、不得“自行处分”、“任意处分”之类的规定。

对于“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引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或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先经该公司同意”一条，袁世凯批道：“附近”二字“近强”，并对“有影响之举”的提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许中国另开矿也”，“此件应召集股董会讨论”。

关于“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一条，袁世凯批道：“保全中国领土”的提法，独立之国不能承认。

对于“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袁世凯将“他国”改为“外国”，认为“此当然之事”。

关于“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一条，袁世凯对“政治、财政、军事”六字加以圈点，认为这是“握政权”。

对于“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袁世凯将“所有权”三字重笔点出，表示异议。

关于日本提出的“合办警察”、“整顿福建海口”等事，袁世凯也加了重笔，不予认可。

对于“前两款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由日本国领事官承认之警察法令及课税，至民刑诉讼，其日本人被告者，归日本国领事官，其中国人被告者，归中国官吏，各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人，与中国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惯习，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俟将来该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袁世凯将“由日本国领事官承认”改为“中国政府所颁”，“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改为“由中国官员审判”。“如不得已可加一语，日本领事官亦得派员旁听”。

关于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道：“办不到。”

在《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袁世凯还另文批示说：“欧战相持不下，法比各有失地，将来大会支配，殊难预计，胶澳能否由强人让交，此时尚无十分把握，订此

预约，尤足招强人之恶，他西人亦未必同意，殊属吾谓纵能预交日人交还青岛，亦是空人情。”

从以上天津市历史档案馆所藏原件中所列内容可知，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他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而袁世凯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与俄国

景东升 苏全有

(华中师范大学)

袁世凯与列强的关系，史学界向来关注的是与日本、英国等国的关系，而对于近代侵华元凶的俄国，则涉猎无多。其实，袁世凯无论是在朝鲜时期、日俄战争时期还是在辛亥革命后等不同时期都与俄国有密切联系，这是我们全面解析、诠释袁世凯外交思想的重要视角。

—

袁世凯与俄国的接触肇始于袁世凯在朝鲜时。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李氏王朝求援于清政府，借此机缘，8月袁世凯随吴长庆淮军六营东渡赴朝，并很快“削平朝鲜内乱，执大院君而囚之”^①。在平定这场内乱中，袁世凯表现得很勇敢，因而得到吴长庆赏识，经上奏请奖，他得以由中书科中书提升为同知。之后，袁世凯一再迁升直至出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在朝鲜先后长达十二年，而此时正值俄国推行其远东政策，袁世凯对俄国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沙俄在远东的扩张。在这场较量中，袁世凯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①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1884年9月，袁世凯以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身份赴朝，李鸿章为此致函朝鲜国王：“袁守忠亮明敏，心地诚笃。两次带队扶危定倾，为贵邦人所信重，鄙人亦契许。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鸿章已据情奏闻，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从中可知，袁世凯已经拥有参与朝鲜“内治外交”一切事务的全权。^①

清廷竭力维系中朝宗藩关系，实施全面干涉政策，这一做法使朝鲜国内的开化派与保守派斗争异常激烈，离华而倾向欧美日益明显，其中近在咫尺的俄国成了首要目标。

朝鲜寻求俄国的保护，先后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光绪十一年底，第二次在十二年仲夏。第一次俄朝密约暗中进行期间，袁世凯虽已离朝，惟对朝事仍极关心。及再度赴朝，更密切注视朝鲜亲俄的意向，最后逼迫首谋者穆麟德出境，以消除祸根。至于朝鲜的第二次联俄，袁氏始终与闻其事，几经折冲，始得以和平方式解决。

朝俄密约活动立即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宗主国自不待言，日、英等国亦感不安。英国为防制俄势南下，遂有光绪十一年三月占领巨文岛之举。日本深恐朝鲜落入俄人之手，必然失去进窥朝鲜半岛的机会，且将危及日本本土，因此在对马岛等地加强防务，并作应变准备。然以本身力有不逮，力求避免与俄国作正面冲突，并暂时放弃其传统排华政策，改取联华制俄之策，鼓励中国干预朝鲜内政外交。^②

光绪十二年，朝鲜政府因英国占领巨文岛，同时受内部亲日派的威胁，加上袁世凯的专横和干涉，以闵泳焕、闵应植等为首的亲俄派异常活跃，俄使韦贝之妻，颇擅长交际，经常出入宫廷，拉拢闵妃。

① 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②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0年版，第258—259页。

巨文岛事件发生后，亲俄派力言“宗主国不力，并倡言俄国强盛，足恃为有力奥援”。于是俄、朝之间再度密商保护问题。袁世凯了解到情况后，向李鸿章连发数电，他分析俄国的意图并针对事态发展作如下建议：“惟韩廷谬妄，至死不必悔，忠言难入，乞早筹备，以免落俄之后”；“先派水师稍载陆军，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重兵继渡，俄见我先入韩，已易新君，或可息事。若待俄兵先入，恐难措手”；“俄久欲在亚洲觅一水师出路，韩有此举，俄喜出望外，而不能甘心者，英与倭耳。可否乞速派大员核办？并密商英使，派水师帮巡洋面，囑倭不可因华动而妄动”。^①

李鸿章则因北洋兵船不足，饷力艰困，复惧各国疑忌，不敢接纳袁氏派兵建议。一面电令驻俄公使刘瑞芬，向俄政府要求勿接受朝鲜请求保护的文件，尤不可派兵赴朝，一面函约驻华俄使拉达仁来津晤商一切，同时致书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筹议应付之策。^②

袁世凯一方面向天津请求速派水师来朝，一方面逼迫朝鲜交出与俄国之间的密函，朝廷虽极力否认，而袁则毫不放松，以握有真凭实据之姿态，不断要挟。在袁世凯看来，“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③

袁世凯的种种做法，令俄伤透脑筋，恨之入骨。恰在此时，一英人拟受聘为朝鲜国顾问官，由于袁世凯的阻止而无果，异常愤恨，于是俄使怂恿他回国，由英廷诘问清政府，和他一道控告袁世凯的还有袁世凯的英文通事姚某及朝鲜亲华派首领闵泳翊。但结果以失败而告

① 佐藤铁治郎：《袁世凯》，时闻报馆1910年版，第39—41页。

②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0年版，第263页。

③ 佐藤铁治郎：《袁世凯》，第27页。

终。“俄使知此举无效，其谋驱袁之志更切”。一时间袁世凯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其原因“皆由俄使。俄使之意，是恨袁破坏其密谋，势非使袁离韩不能达其目的，时韩依赖俄亦甚笃，俄使与袁各欲增势力范围于韩，其势自难两立。在俄使出此全力，意可逐袁离韩，与韩人重申密约”^①。

从袁世凯的对朝谋略及对抗俄国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强烈的宗藩观念，洋务派的“以夷制夷”思想也有些许的流露。同时，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还与他立功于异域的打算有关。由此可知，这一时期袁世凯的外交思想还处于传统封建外交的阶段。

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论，从我国自身安全的角度考虑，袁世凯的计划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分析也是中肯的。日本人佐藤铁治郎在其《袁世凯》一书中对袁世凯有如下评论：“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迅，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强悍之手腕哉。”还认为“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迩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②。

二

二十世纪初，袁世凯与俄国的关系继续延续着朝鲜时期那种对抗的态势，究其原因，则与俄国的侵华政策、活动有关。

俄国对华侵略分两方面，其一是经济侵略，即向中国进行资本输

① 佐藤铁治郎：《袁世凯》，第52—53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出。对此，袁世凯进行了积极的抗争。

1902年，袁世凯兼任督办山海关内外大臣，接收内外铁路，特向俄国重申，并对英国发出严正声明，“京张铁路归中国政府自造，止用中国资本，外人不得干涉”^①。他还于1903年11月16日致徐世昌电曰：“闻有人请造京张铁路，先报效廿万，惟此事大有来头。闻借俄人资本，关系甚巨，请详细考校，先验资本，用华资造则可，借洋资则万万不可。”^②商部由此决定官办京张铁路，由袁世凯督办。经过袁世凯的努力，1909年10月4日，京张铁路告成，袁世凯对京张铁路得以杜俄国等列强资本侵夺并顺利建成，功不可没。^③

袁世凯与东三省关系密切，当时曾有“直督兼东三省总督消息……某贝子密奏，谓东三省‘改建行省，创办各项新政，不惟财力困难，而人才亦觉缺乏，势必诸事仰给于北洋’”。^④对于漠河金矿，“黑省漠河金矿总办刘道，电禀直督，谓漠河观音山金矿，经外务部与俄使璞科第商妥，给还俄国银若干，已于客腊将此项金矿交收，倘能筹巨款，整顿一切，即不难复还旧观”。^⑤由于袁世凯的支持，“黑龙江漠河及观音山金矿，已由俄人交还，先时俄欲不许两矿之货物，由铁路运送，现已言明，准如常运送矣”。^⑥

经济领域当中的抗争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除此之外，则是军事

① 沈云龙：《袁世凯史料丛刊续编·容庵弟子记》（9），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34页。

② 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北洋军阀档案史料》（袁世凯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页。

③ 苏全有：《论袁世凯的对外理性抗争思想》，《河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第34—38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日报》（2），台湾1969年6月1日影印，第158页。

⑤ 同上书，第82页。

⑥ 同上书，第102页。

上的抵抗。

沙俄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侵占中国和朝鲜是其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沙俄先是扮演渔翁的角色，导演“三国干涉还辽”，从中渔利，到二十世纪初则一改而为亲自出马，出兵东北，露出了凶恶面目。1900年7月，俄国以镇压义和团为由，悍然派军十多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由于中国朝野的激烈反对，加之列强之间的矛盾，俄国被迫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分期撤退。1902年，俄国在第一批撤军后，又拒不按照条约规定撤军，这引起了同样怀有侵华野心、推行大陆政策的日本的极为不满，双方剑拔弩张，战争随即发生。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的不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采取了所谓的“局外中立”方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了这一方针的倡导者和执行者。

1903年11月2日，清廷急召袁世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晋京，谋求对策。袁世凯“密陈”东三省事宜“自保”之策，也就是“局外中立”。^①12月27日，袁世凯向清廷建议道：“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②1904年1月19日，袁世凯在向西太后的“密陈”中以与直隶毗邻的东北、蒙古的地理形势和日俄侵华意图予以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③以

① 廖一中：《袁世凯与日俄战争》，《历史教学》1985年第2期，第9页。

② 王彦威、王亮著：《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九，台湾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第4页。

③ 袁世凯：《密陈遵照传统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养寿园奏议》卷二十六，天津图书馆藏本。

佐证自己的中立主张。

应该承认，袁世凯表面上的中立立场，就其实质而论则是假中立，这从很多方面都可看出端倪。

1903年夏，袁世凯与日本前驻华公使青木和日本驻天津领事伊集院吉就日俄关系问题进行了“秘密接洽”^①。次年1月19日，袁世凯又说：“日前日本使臣内田康哉遣其驻津领事伊集院吉来告，以中国应担负责任各事，大要本于局外公法。”^②可知中立是应日本的要求而提出的，符合日本的愿望。袁世凯还声称：“近日情况，日本已许我守局外中立，各国亦无异言。惟俄国阴鸷性成，未必肯定，纵使迫于各国公议，不得不许，而战在我境，处处得有藉口，乘机挑衅，恐所不免。然无论俄人意向如何，在我先从守局入手。”^③于此可见，袁世凯对俄国是有戒心的。

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8月18日，有一艘俄国军舰因机器损毁而驶入“中立”的烟台港后，仍被两艘日本鱼雷艇追击，数名俄国官兵被击落海，海军总兵萨镇冰为了保卫我国领土不受蹂躏，毅然以国际公法据理力争，抵抗日本军舰的胡作非为，但没有成功。袁世凯为维护其假中立的面目，大做表面文章，请旨将为自己向所赏识的海军总兵萨镇冰“交兵部议处，以示惩儆”。^④

此外，袁世凯还与日本联合成立了守田情报班，派遣以段芝贵为首的十六名情报军官对俄军后方情报进行收集，随时了解其军事动向，以便采取必要对策，并为日本服务。^⑤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51页。

②③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卷二十六，天津图书馆藏本。

④ 袁世凯：《请将代统北洋海军总兵萨镇冰交部议处折》，《养寿园奏议》卷二十九，天津图书馆藏本。

⑤ 廖一中：《袁世凯与日俄战争》，《历史教学》1985年第2期，第9—10页。

袁世凯在日俄战争中的假中立立场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他为什么会在此期间持倾向日本的立场？很显然，当时俄国对我国的威胁最大，领土野心也最为露骨，因此，在助俄还是助日问题上，袁世凯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持助日立场也就可以理解了。再加上当时我国舆论界普遍认为日本与俄国之战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是立宪国与专制国之战，这无疑对袁世凯产生了影响，所以到了日俄战争之后，他力主立宪，并成为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健将。^①当然，日俄两国在战后以妥协的形式相互承认各自在华利益，我国主权大受损失，这标志着袁世凯所推行的“以夷制夷”政策最终难逃破产的命运。

三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取得全国的最高统治权。自从他重新执掌政柄的那一天起，袁世凯就对日本抱有极大的戒心，正如1911年11月2日俄驻北京公使库罗斯托维支在其密函中所称：“关于北方所发生的事变，有这样的印象，满洲皇朝所以仍在北京支撑，是因为忧虑到革命军要在京城和天津引起屠杀，主要是害怕日本占领直隶省。袁世凯尤其担心后一着。”^②基于此，在1912—1916年袁世凯政府统治时期，袁世凯对俄国主要采取拉拢、利用方针，而把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了日本，这在《二十一条》的交涉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晰。

1914年11月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国，外相加藤高明

① 张华腾、苏全有著：《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7页。

② 张蓉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50页。

于12月3日训令他再度来华，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说帖。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借口英日联盟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此时欧战方酣，列强无暇顾及，于是日本拟乘此千载难逢之机，控制中国，《二十一条》的提出就是行动。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以新归任为词，要求进见大总统袁世凯，并于1915年1月18日得以入见，将《二十一条》说帖面呈袁世凯。此后直到5月9日，中日交涉逐渐白热化。

为了集中对付日本，袁世凯对俄国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方针，不惜代价，以分化日俄关系。

1915年2月18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在致俄国外交大臣函中称：“总统立刻派其代理人曼德将军前来敝处，询问关于俄日同盟的可靠程度如何，并奉命转告我，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和驻东京公使均认为俄日同盟具有重要的意义。无疑，最近，特别是不久前日本向中国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进行公开威胁以后，中国人才开始希望向我们寻求庇护，以防他们的东方邻国对他们的进一步施展侵略阴谋。当年李鸿章同俄国签订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表明了那时俄中两国的亲密友谊。袁世凯和中国的其他要员甚至幻想回到那一时期。”^①

袁世凯为联俄而向俄国通报了自己抗日的决心。2月18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在致俄国外交大臣的电文中说：“总统派人前来告诉我，他不太相信关于日本最后通牒之传闻，不过，他已毅然决定，对那些他认为蓄意侵犯中国主权的日本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日本人诉诸武力，他也决不让步。”^②

① 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373页。

② 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第321页。

2月20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在致俄国外交大臣的电文中：“我对正在进行的谈判竭力不予任何干涉，对此中国人甚为高兴；我亦竭力不给中国人出任何主意，尽管他们私下请我出谋。”^①

3月17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在致俄国外交大臣的紧急报告中称：“中国政府十分愿意俄国对东清铁路享有现今日本对南满和安奉铁路所享有的特权。”^②

日本驻华陆军武官森义在4月8日第115号报告中推测说，在总统身边供职的曼德将军转交俄使的文件是“中国人自己伪造的，其目的是挑动俄国政府反对日本对华要求”，因为“内中所引日本参谋本部对华意图对俄国亦是威胁，中国政府竭力利用这种威胁，挑动俄国阻挠日本的要求，尤其是在英美方面对日本要求阻挠不力之后”^③。

5月13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在致俄国外交大臣的紧急报告中说：“在整个日中交涉期间，我对谈判始终谨慎行事，这一点得到帝国政府赞许。我在适当时候向中国人表示同情以及将我所获得的情报转告他们，得到他们的特别好评，总统和外交总长为这些微小的帮助再三诚挚地向我致谢，让我随时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我可以肯定地说，此刻，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比俄日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友好。”^④

袁世凯为抗日而联俄，但俄国自从袁世凯担任民国总统之后对中国则持联日侵华方针。俄国着意于利用袁世凯在外交上竭力寻求帮助，意欲牵制日本的形势，企图攫取更多的在华权益。

1912年1月10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上奏沙皇道：列强中以俄国和日本对袁世凯特别重要，它们是中国邻国，在中国有政治利

① 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第322页。

② 同上书，第336页。

③ 同上书，第346页。

④ 同上书，第354页。

益，以重要性而论，远较其他列强的政治利益为优越。因此，俄国和日本应特别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以便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并消灭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所追求的政策。^①

在袁世凯政府担任工商总长的张謇在和美国工商总长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日本正对中国采取以强力推行的前进政策，而且得到俄国的鼓励和支持。他们表示相信日俄已达成一项谅解：外蒙古作为俄国控制的地区，应不受阻碍；反过来，日本不但在南满，而且在内蒙古东部可以自由行动。^②

1912年1月23日，俄外交大臣为利用“承认”袁世凯政府问题进行新勒索上奏沙皇称：“我国所注意的中国政治问题中，满洲问题占第一位。中国政府特别积极和我国在满洲所占地位这方面作斗争。我们应首先利用时机在满洲保卫自己不使中国人能对我们作敌视活动。而且因为我国在满洲的利益与日本的利益符合，并且我国与日本关于满洲在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〇年订有政治协定，那么在此一问题上我们应和日本政府共同行动，这样显然可以使我们的任务要容易得多。并且还应注意，袁世凯及革命党都曾对我国驻北京公使暗示可能承认我国在满洲的地位。”^③

1915年3月15日俄国外交大臣在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和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函中道：“倘若中国政府满足那些涉及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势力范围内的要求，我们亦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使我们在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权利和特惠。此时特别引起我们关注者，是日本

① 张謇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66页。

② [美] 保罗·S·芮恩斯著、李抱宏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

③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5页。

政府正力求在南满获得任意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倘若日本政府获得上述权利，则这种权利不只是扩大到日本人，亦要扩大到俄国人和所有外国人。”^①

由此可见，日俄两国在侵华问题上的合作，将直接导致袁世凯联俄抗日方针的破产。

总的说来，袁世凯与俄国的关系在朝鲜时期、日俄战争时期处于对立状态，而到了一战爆发后《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则是相互利用，这种变化是基于当时的形势而定的。袁世凯在朝鲜时期与日俄战争时期，俄国对华威胁最大，中俄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所以袁世凯极力主张对抗俄国；而到了《二十一条》交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袁世凯当然要联俄抗日。

从以上袁世凯与俄国的关系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的早期外交思想没有脱出洋务派“以夷制夷”的窠臼，而到后期则逐步萌生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

^① 黄纪连：《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第334页。

从“壬午兵变”到甲午战争

——评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活动

杨 涛

(安阳师范学院)

从“壬午兵变”到甲午战争，袁世凯通过办理朝鲜的外交事务，开始为世人瞩目。纵观其在朝十余年外交活动，可谓是有得有失，功过相参。但总体而言，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其外交活动的结果是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征韩侵华的战略未被遏制，并最终导致甲午战争爆发。这种结果的出现，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于其中，但也须承认，袁世凯的个人行为，他的个人品质的外现也是一重要原因，这种品质主要受到其在朝外交活动初期成功因素的影响。而其外交活动的最后失败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后他的政治行为与心理特点。关于袁世凯在朝外交活动涉及近代人物评价和近代国际关系两个研究领域。本文在吸取这两个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阐述袁世凯的外交活动对中朝、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其在朝外交活动对其以后的政治行为与思想的影响。

—

自《江华条约》签订和薛斐尔再度来朝后，朝鲜已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局势渐趋恶化。初出茅庐的袁世凯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而严

峻的时局下，在朝鲜走上了自己的政治舞台，并凭其非同寻常的胆识、气魄建立了一定的功绩。

平定“壬午兵变”是其建立的第一个功勋。袁世凯表现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仅统领部下率先及时在朝登陆，且严整军纪，助吴长庆、丁汝昌软禁大院君，诛杀其余党几十人。吴长庆对袁世凯甚为嘉许，言其：“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①兵变平定实现了清政府通过维护国王李熙的地位，稳定朝鲜局势和清政府在朝地位的战略。后李鸿章据此上报，袁世凯遂由一不入品的前敌营务处小吏而一跃为五品同知。在朝鲜的初步成功不仅一扫他早年连续两次乡试落第的郁闷，也使他的功名欲望有了膨胀，看到了实现青少年时代立志“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的可能。

1884年末，朝鲜又爆发“甲申政变”。日驻朝公使竹添率三队兵力入据王宫，挟持李熙，支持开化党改革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由于袁世凯事先查得消息，在不及向朝廷禀报的情况下，处乱不惊，断然采取措施，率清军攻入王宫，救出李熙，使竹添被迫出走仁川。政变平定可谓是对日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固然与日本侵略力量尚弱、战略决策不统一有关，但袁世凯的气魄与胆略也不容否定。李鸿章称其“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厥功甚伟……”^②。次年袁世凯就在李鸿章的保举下，擢升为三品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平定“甲申政变”后，袁世凯积极贯彻李鸿章的对朝方略，使朝鲜局势一度牢牢被中方掌握。但“甲申政变”后，日、俄、英、美等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特别是1885年4月，英国因俄强租

① 沈祖宪、吴闳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2册，卷六十一，第1104页。

永兴湾，又在海参崴成立舰队，出兵巨文岛，更使朝鲜与远东地区的局势空前紧张。而此时闵妃与国王李熙先是期望通过亲俄外交，后是期望与各国的独立外交使朝鲜免遭亡国之灾，这使得朝鲜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俄国是当时最大威胁，袁世凯的许多努力便集中于防俄上。为牵制握有实权、且有投俄倾向的闵妃，李鸿章与马建忠等商议将大院君送回朝鲜，当时袁世凯也竭力消除闵妃与大院君的隔阂并作为牵制。李鸿章还计划“在朝鲜国王身边安置一个外国顾问，想使这位外国顾问之于朝鲜就像赫德之于中国那样。……他选择了穆麟德。”^①但穆麟德到朝后，“并不以中国的代表自居”，不仅在开办海关，成立外务署等事上，“运筹决策，身预其事”，还力图干涉朝鲜工商、财政、交通等事业的改良，削弱清政府在朝鲜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他与俄驻朝公使唆使李熙与闵妃派员到俄，请为朝鲜练兵，由是朝鲜当局出现了亲俄倾向，并出现亲俄势力。^②1886年8月，李熙与闵妃更是秘密致信俄国，企求保护。这令袁世凯甚为恼怒，一度计划废黜李熙。在他的干涉下，李熙将几名亲俄派官员革职，穆麟德也被驱逐出朝鲜，朝俄秘密协约谈判最终不了了之。“此后八年间，经袁世凯发布的宗主国清政府的命令，就成了绝对权威了”^③。朝俄秘密协约谈判的被粉碎还为解决巨文岛问题提供了条件。当时李鸿章又采用“联英制俄策略”，认为：“朝鲜近患在俄与日，而俄日畏英水师之强，断不敢逼视，得英船梗于其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④袁世凯也积极联络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并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关系。1887年2月，

① [美] 马士·必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373—374页。

② 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05页。

③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1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7卷，第19页。

在袁世凯和李鸿章的交涉下，俄国向中、英保证不占领朝鲜，加之美国等国的压力，英国从巨文岛撤兵。这样一度紧张的远东地区的局势得到缓和。此后，俄国又阴谋立订朝俄陆路通商条约，并欲在图们江通商通航。袁世凯得知后，致函朝鲜政府认为“亦迭次派员商请于北洋，并闻及于鄙人，此又屡屡行所份内矣。他如巨文岛之偿还，担保俄罗斯之不利韩土，均行所份内”^①。坚决反对双方的秘密外交。对于俄国这一对当时朝鲜独立与主权的最大威胁，袁世凯的这些措施出发点固然是维护清王朝的宗主地位，但客观上对朝鲜局势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对抵御西方国家侵略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袁世凯的功绩还在于他竭力反对日本及西方国家以尊重朝鲜主权为名，煽动李熙，废除中朝宗藩关系，使朝鲜统治者幻想依赖日本、西方国家能独立发展，而客观上有利于西方国家和日本侵略朝鲜的阴谋。先是1886年底曾任美驻朝公使的福久“勾结韩小人，……以其自谓可以挟制中国，建立公议，可使韩邦自立。并劝韩王多养兵，多置军火机器，以期自强，使中国不敢以属邦相待”。“世凯曾面折数次，厥后不敢妄谈，惟私自喟喟。”^②次年又有亲日派郑秉夏等人，煽动李熙“引倭自卫”，派员到日本并欲在日本设置使馆。袁世凯探知消息后，当面质问郑秉夏等人，使其无法抵赖，并将出访官员召回。又次年（1888年）接替穆麟德任韩王顾问的美国人德尼又在所著《中国朝鲜论》中，大肆诋毁两国间的宗藩关系。袁世凯据理力争，认为中朝两国中国有“保护戡乱，扶危定倾之案。有属邦求恩、谢恩、请示、请允之案，又有征调、贡员、惩罚、治罪之案，又有合

① 《致朝鲜政府函》（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函牍选辑》，《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

② 同上，《为报朝鲜近日情形事呈李鸿章密折》（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兵、协饷、献物伏辛之案。今如此书所言，皆相反背，岂欲以此册之妄议而夺中韩数百年所存之案乎！”“若夫中韩之政治国势本不同于西国，而德尼乃援据公法约章津津驳论，是全未知亚洲之国势，岂不大相参差。”^① 事后不久，在袁世凯的强力反对下，德尼也被革职。

也正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俄使韦贝）的挑拨、欺骗下，1887年朝鲜欲向各国派驻大使，谋求“永不受他国辖制”，“与天下各国一律平等”的地位。^② 随后朴定阳等授命出访美、英、法、德、意等国。这次出访在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强烈反对下，草草而终，力主此举的几名大臣被革职。后清政府与朝鲜政府订三条协定，其中明确指出朝鲜出访大臣到达出访国后，应先拜会中国驻该国公使，并由其引领去往该国外交部。袁世凯在此事中的是与非，史学同仁的意见并不统一。^③ 笔者以为此举无疑是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沦亡和中国沦胥的趋势。但结合袁世凯的个人品识，结合当时的国际关系实际状况，袁世凯坚守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并非完全不可取，他毕竟将朝鲜的沦亡和中国的沦胥结为一体，而且最大限度地延缓了它的速度，因而客观作用上并非是民族主义的；可以讲他把维持两国间的宗藩关系视为其神圣的职责，一丝不苟地加以遵守，尽到了他应尽的责任。

还需肯定的是，袁世凯虽致力于外交，但他还是认识到需帮助朝鲜整理内政，以提高其抗御外侵的能力。如他为维护李熙的地位与权

-
- ① 《书韩王教师德尼所著“中国朝鲜论”后》（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函牍选辑》，《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
 - ② 《袁道来电》，《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卷，第7页。
 - ③ 参见金在善：《袁世凯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纪能文：《关于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历史考察》，《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威，曾帮助李熙编练新建亲军一营，这也为其以后在晚清军事改革中的活动积累了经验。再如他积极帮助朝鲜发展电讯业务，开辟朝鲜到上海等地的商业航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90年李仙得当总税务司后，欲“以海关作抵押”，举外债二百万元，拟“赴日商办贷款”，又拟“韩准租开煤矿”以向美银行“贷百万元”。^①袁世凯让李鸿章阻之，并让在朝中国银号垫拨资金，以弥补朝鲜的财政危机。同时还积极鼓励朝鲜商民开采本国的矿藏，以积蓄财富。对中国商人在朝鲜从事商贸等活动，他也积极鼓励、支持。这些举措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二

当然，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外交失误也不容否定。这首先主观上和袁世凯的个人品行有极大关系。早在“壬午兵变”平定后，袁世凯即对张謇讲：“李王懦弱不足扶持，吴帅胆小也难图大事”，企图“取韩王而代之”^②。不仅如此，年少得志的袁世凯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对恩人吴长庆、旧友张謇均不放在眼里，态度骄横，张謇愤而与之断绝关系。但袁世凯的态度非但无收敛，反而在“甲申政变”后更加骄横，这种宗主国的优越心理与胜利者的骄狂心态使其外交活动必然出现偏差。特别体现在对朝鲜君臣的蛮横、霸道，不讲平等。甲申后袁世凯上书李鸿章，言：“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国，即特派代员，设立监国，统帅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③实际上以后袁世凯也处处以监国自居，并僵守、深化传统的宗藩关

① 《袁道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海军函稿，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2卷，第6、20页。

②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1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卷五十，第31—32页。

系，他过于自信地认为，只要朝鲜恪守宗藩关系，清王朝完全有能力保护之。当然朝鲜统治者并不认同，因而双方之间，必然出现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与斗争。1887年的出访事件使矛盾达到极点。李熙、闵妃都曾要求清政府撤换袁世凯。袁世凯自感朝鲜君臣对他的不满与反感，认为自己身处苦海，进退两难。但实际上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对朝鲜的政治态度、行为并无调整。当时一名朝鲜官员邀请袁世凯撤回在朝中国军队，袁世凯竟对其大骂，甚至向其脸上吐口水。其品行、修养可见一斑，而其带来的消极影响自可想像。

当然，袁世凯的最终失败也有无法抗御的客观原因。他在朝十余年，正逢列强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期，也是他们掀起新一轮瓜分世界狂潮之时，而当时朝鲜已成为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确立了“大陆政策”的侵略方针；俄国则以“亚细亚使命”为其目标；美国要朝鲜自由通商，以行侵略；而英国为抗衡俄国也在朝鲜谋求扩张。可以说形势逼人。其次，清统治者特别是李鸿章的一些政策失误也是其败因。一者如梁启超言：“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图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千古之遗恨也。”这是指同治十一年日朝交涉时，回答日使“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可与理论可也”^①。壬午兵变前后，李鸿章迫不得已允朝鲜与美、英、俄、德、意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实际上已为列强打开侵略的缺口，而袁世凯在其后的努力实际等同于亡羊补牢，宗主国地位岌岌可危。再者，李鸿章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应对西方列强，虽对日本予以警惕，但认为日本军事尚弱，财政上陷于危机，一时难对大清构成威胁。他坚决不同意壬午兵变以后，清流派张佩纶将日本

^①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列为第一威胁的主张。直到甲午战前仍以为仅凭恫吓便可遏制日本的侵略企图。^①李鸿章前期对日的轻视、麻痹和对袁世凯的过于信赖，（当时张佩纶批评袁“侈然目光”，“于朝鲜则操之过戏，于日本则漠不加意见”时，李鸿章却认为他“通品难求”，“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②）加之两次对日斗争的胜利，使袁世凯在对日外交中不免显得过于自负，因而对日本征韩侵华战略自然不能觉察到，对日本的军事势力产生麻痹思想，其失误也就难免了。如东学党起义后，袁世凯对于日本浪人组织“天佑侠团”混乱其中，对日本欲以此为机挑动战争的阴谋仍无深刻认识。他电告李鸿章只要增兵朝鲜，“若使余划策，期以十日，不难讨灭之”。又讲“杉（日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它意”^③。当时日本竭力怂恿袁电告朝廷出兵，袁世凯不能洞察其奸，且当时农民军已与朝廷讲和，以杜中日出兵借口，而“袁世凯屡电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奈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朝乱之无待剿明矣。……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蹶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己之私，遂至毒数十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姑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④。可以讲出兵决策是袁世凯与李鸿章的一大失误。中日共同出兵后，袁世凯认识到“倭来甚锐，似非有得，不肯遽去”，于是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与日使大鸟圭“约定彼此同时撤兵”，并依驻日公使汪凤藻主张向日方建议“中

①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95 页。

② 转引自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 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台湾文海出版社，第 15 卷，第 34 页。

④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47 页。

倭皆不干涉韩内政，惟劝韩自行清厘”^①。可见李鸿章、袁世凯此时对日、对朝策略明显变化，幻想通过撤兵、不干涉朝鲜内政这些让步，来避免战争。李鸿章认为只要中方做到这一点，不给日本以任何口实、机会，日本未必会发动一场大战，因而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力争勿怖”^②。而大鸟早已接受陆奥宗光“表里不一，包含两个主义”的指示，佯允撤兵。而袁竟然信之，电告李鸿章可不必增兵，从而使日军战前在人数上处于优势。^③可见，袁世凯在李鸿章的政策影响下，加上其个人错误判断导致中方战前的被动、弱势，对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导致袁世凯在朝外交活动以失败而告终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从三方面总结。其一，僵守传统的宗藩关系并加以深化。宗藩制度是前近代的“一种自然的、不成文、不具法律效力的国际关系”。“彼此是通过一种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不利用属国的土地和人民，不干涉属国内政，没有对属国的骚扰，相反地，当属国遇到内乱和外患时，她还要帮助属国，以尽保护属国的权利和义务。”^④但清王朝自身的沦胥，使它与各国的宗藩关系必然要被以殖民主义为特色的近代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所代替。袁世凯要通过保持原来意义的宗藩制度来抵御西方国家的渗透无疑是不现实的，这就使得他必然要改变这一制度的基础，特别是干涉朝鲜内政与外交方面。原本中朝间以“礼节仪式”为内容的国家关系开始为强权、干涉所代替。袁世凯在朝期间，正是元朝以来，中国对周边国家干涉最剧烈时，清政府曾向李鸿章表达过担心“非独朝鲜政乱可忧，而袁之轻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1930年版，第15—16、20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5卷，第49页。

③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1—262页。

④ 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躁易动亦殊可虑”^①。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十九世纪的封建统治者，他也不可能接受进步的国际关系理念。即便依照近代国际法的原则，将中朝间宗藩制度成文、具有法律效力，既保持朝鲜领土、主权完整，又能密切中朝两国间的关系，提高中国参预远东地区国际事务的能力，进一步稳定本地区国际秩序，他也做不到。因而结果是朝鲜非但不亲近，反倒有分离倾向；对于日、俄、英、美等国僵守宗藩制度只能激化其加快侵略，并想方设法破坏这一制度。列强在朝鲜的利益争夺上必然有矛盾，但这一点上却往往联合起来，从而使清政府在外交上实际陷于孤立。

其二，由上一点，自然形成这一状况，袁世凯反对将朝鲜问题国际化，反对朝鲜的自主外交。其实在清统治者内部关于朝鲜问题的策略有四种。除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干涉、监国主张为主流派外，1883年马相伯向李鸿章建议朝鲜独立与中国无关，由各国共保；1885年驻德公使杨儒、驻法公使刘瑞芬主各国担保，而后渐至中立化。本来甲申政变前，清政府曾用“以毒攻毒”之法支持朝鲜与各国订立通商条约，自主外交。但甲申政变后，形势的骤然严峻，使袁世凯的外交活动日趋强硬，实际以监国自居，处处对朝鲜外交、内政加以干涉。袁世凯公然讲：“朝鲜自君其国，自子其民，与各国立约互称己为自主，不过受辖于中国耳！如以不臣于人为人主，是图取文字之体面，而不顾宗社之沦亡，贾虚名，受实祸，朝始称帝，夕已破灭。……方今上下解体，国弱民贫，欲求一至近、至大、至公之国庇荫之，舍中国其谁与归？谨依中国以图自存犹有他虑，况背中国乎？”^② 他不能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0卷，1930年版，第27页。

② 《上清廷“朝鲜大局论”后》（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函牍选辑》，《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

充分灵活运用各国间矛盾，看不到均势外交的可能，公法对列强有约束一面，结果造成外交活动的孤立和被动。

其三，马建忠曾提出“外交之际，内政为先”，主张在朝鲜“开港设关置官，大去禁防工商业”，“翻然变计，除厥苛政”，“使民得自主”。认为改革内政，提高朝鲜自身力量，是抵御侵略的根本。^①前文指出袁世凯虽也认识到改革朝鲜内政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内政改革即为“任大臣”、“屏细臣”、“慎听问”、“明赏罚”。而且在朝币制、海关、邮政改革，举办近代军队、航运，开采矿藏中，对朝鲜外债举借上，过多体现了大国主义，对朝鲜的利益并未完全尊重。因而其对朝鲜改革力度十分有限，而且对朝鲜的保守派给予过多支持，这就使得他在朝鲜的外交活动的实际效果大受影响。

三

总之，袁世凯在朝十余年外交活动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事实上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列强在远东地区的扩张，稳定了朝鲜和中国的安全。特别是对俄国侵略的遏制应该讲是成功的，对日本侵略的遏制，若以《江华条约》算起，推迟了近二十年，这应该作为评价其功绩的标志。袁世凯在朝外交活动期间的功绩，和其强烈的个人功名欲是分不开的，但也和他对朝鲜外交问题的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分不开。袁世凯认识到“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根本盛京之地，西则控扼津烟咽喉之冲，无朝鲜是无东壁，……而朝鲜断不可失”^②。这就

① 张岂之、刘厚祐校点：《适可斋纪言纪行》第5卷，《东行续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 《上清廷“朝鲜大局论”后》（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函牍选辑》，《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

使他在外交活动中以中国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自居，必然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尚属落后的国际关系理念、无可奈何的国际形势、当时尚不开阔的政治视野。因而当他看到曾为其击败并为其轻视的日本陡然崛起，反倒击败中国，对他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冲击不仅使他早期战胜日本的自信心消失，也逼迫袁世凯以更为开放的眼光，更主动的态度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甲午战后，他痛定思痛，在奏折中讲：“即如甲午之役，我以数十万众，不能挡日本一旅之师，尤前鉴之至近者也。……窃恐横逆之来，日益滋甚，蚕食鲸吞，不堪设想。臣诚虑之，臣诚痛之。……合无仰皇太后、皇上，垂念时艰，宸衷独断，飭下统兵大臣，参仿各国戎政，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直省军营，一体遵照，认真训练，既不得有名无实，尤不可稍参成见。”^①他不光积极参预编练新军，也积极参预清末新政，成为统治阶级中有一定进步思想的开明官员。可以讲其在政治实践与思想上，战后都发生质的变化。这种质变使他迎合了近代化变革的历史趋势，也使他积累了新的政治资本。这样他始终保持的政治野心和政治行为的调整、趋新、积极为其以后的政治生涯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这是他其后的成功因素。但另一方面，在对帝国主义国家态度上，朝鲜的经历在其思想深处打下深刻的烙印，使他以前的从容已荡然全无，对日本更由轻视变为恐惧。而战前战后帝国主义在华干涉力量的继续存在，当他感觉到在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其个人政治利益得失时，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特别是日本的行为常使其所有的努力无法抗衡，并常常受到制约时，他完全是屈辱且消极地忍受，思想上形成了惯势，这也是形成

^① 《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廖一中、罗真容主编：《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9页。

他的悲剧和失败的因素。如在《二十一条》谈判中，开始他尚设法让总统府顾问有贺长雄与政事堂参议金邦平活动日本元老派，以抵制大隈内阁的计划。又请朱尔典活动英国政府，并表示在满洲以外的问题坚决与日拒谈。^①而在日本以取消对袁世凯称帝的支持并提出最后通牒的威胁，英、美又主张中国“忍让”的情况下，转而被迫无奈且辛酸地接受之。可以讲是这种思想起了重要影响。从袁世凯的兴衰历程看，某种意义上可谓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

^① 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袁世凯全集》介绍

骆宝善 刘路生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一、缘起与立意

袁世凯无遗集传世，学术界引为憾事。袁氏生前死后，其文字辑印问世者，仅清末排印的兵书二部和《北洋公牍汇纂》、《直隶工艺志》，民初排印的《袁大总统书牍类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辑印的《养寿园奏议辑要》，六十年代以后先后影印的《袁世凯奏折专辑》和排印的《袁世凯奏议》等数种而已。距袁氏传世文字的全部辑印甚远，即使前后三次辑印的奏疏，也仍然存在许多遗漏。

有鉴于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几位同仁决意收集整理《袁世凯全集》，以为当代学术史的建设尽一份力量。原打算只编为《袁世凯集》，后来想，既然动手做了，就希望尽力罗掘袁氏遗文，汇总成书，不留遗憾，就定名为《袁世凯全集》，也有自我鞭策、不可懈怠、不留后路、不可半途而废的意思。

二、凡 例

我们为整理《袁世凯全集》拟订了几条凡例，其要点如下：

1. 收录范围

《袁世凯全集》在现有许可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搜集海内外公私收藏、已刊未刊的，举凡署名袁世凯、或以袁世凯名义公布的文字，包括奏折、各种体裁的公牍、电报、函札、命令、任命、照会、谈话、诗、文、题词以及其他各种文体的文字。一些具体的取舍原则如下：

报章刊登的同题异文的文字，同时收录；异题同文者，酌取其一；答问、谈话，意思完整和内容关乎社会、政治实际者收录，一般寒暄，无实际内容者不收。

批牍，无论文字长短，表明具体意思者收录，必要时附录批件或批件摘要。批语与批件密不可分者，一并列入主文。仅批“阅”或“○”“√”者，不收。

时人记录、当事人事后追忆记述袁氏言论，根据准确、意思完整者收录。后人根据回忆的记述、辗转传闻者不收。经过考订辨明为伪文者不收。

2. 编排形式

以竖排繁体字编排印刷。

不论文体形式、文字长短，以编年体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无日期者置旬末、月末，无月份者置季末、年末。无年代可考者，置适当的年末或本书末。

每篇文末均注准确、详细底本出处，注明原编者、书刊名、页码、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日期、版次。不用简称或省略形式。

3. 整理校勘原则

全文照录，不做任何增删。

对收录的每篇文献，用新式标点句读、分段。使用统一的符号，进行必要的整理校勘。不做系统的知识性笺注。只对文中涉及的人或事，做与本文有关的必要的考释性、提示性注释（例如，有些篇目年

月日期的考定与辨正)。

无日期的文献，尽量厘定其日期；无题目的文献，酌拟中性题目。

这都是编集子的通则。兹做几点说明。编集子收全，求全责备，这是反映集主面貌的最佳办法，也是利用者的最高要求，选编、节录，弊多利少。编排，不外编年和分类编年两种形式。我们之所以选择前者，其一，是认为这样自然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最易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倘有各种文体的文字互相参证，更易于帮助读者检阅和利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二，是各种文体的文字时间跨度很大，且又间隔而不连贯；又因袁氏身份前后的变化，以公牍而论，前后内容性质亦均各不同。除了奏折可自成一块，其余勉强凑在一起，不惟分类不易，且亦达不到按文字类别分编眉目清楚的目的。

我们曾经想过，公文、函电兼收对方来文，批牍附来文。这对于利用当然方便，但计算了一下，工程量实在太太大，做不下来，只有放弃了。

三、文献的收集

由于袁氏没有现成的集子为根据进行补编，基本上是普遍张网，从头做起。十余年来，我们在海内外对袁氏传世文字，进行较为广泛的罗掘。当然祖国大陆的收藏最为丰实。

1. 祖国大陆各方面的收集

第一，是袁氏生前死后各种已刊的著述、单编文字。如前面提及的几种。

第二，已刊的各种档案资料、各种史料集及公私收藏。例如：

甲、各种综合性的史料。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立宪运动等等。

乙、各专题、专门史料。例如义和团档案史料、立宪运动档案史料、护国运动史料、铁路史资料，教育史资料、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白朗起义史料、盛宣怀档案史料、赵尔巽专档史料、天津档案馆藏袁氏档案史料、天津博物馆藏袁世凯等人史料、天津图书馆藏袁氏信稿等等。

丙、《近代史资料》以及各档案杂志、人文杂志、报刊发表的专题及单篇文字。

丁、同时期历史人物集中收录的文献，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的专集，梁启超年谱长编等著录的袁氏文字，以及许多相关著述的零星著录。

第三，当时报刊、杂志的刊载。如北洋官报、政府公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重要大报的刊载。

第四，未刊档案。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奏折、各部专档、个人专档等）、辽宁档案馆以及若干专业图书馆的未刊收藏。

2. 台湾、香港地区的收集

查阅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整理刊布的总理衙门、外交部档，如《中日韩关系史料》等，《袁世凯家书》，盛宣怀档案史料，以及各种人文杂志的零星刊布。

3. 韩国、日本方面

查阅了韩国刊印的旧韩国档案史料、袁氏使韩时期的交涉公函，收集了若干种未刊文献。日本方面刊布的若干种大型档案中的袁氏文献、静嘉堂收藏的袁氏文献，正在查阅中。

承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也感谢各种出版渠道的刊布，十余年来袁集共收集到手一千万字以上的文献，待正在查阅者全部收齐，总计在一千二二百万字之数。其中未刊档案不下三四百万字。袁氏传世文字可算大备了。

四、成绩和发现

下面按历史顺序对所收集到的各个时期的文献做一简介。

1. 使韩十年

袁世凯这一方面的史料，主要是致北洋大臣和总署的公文、同韩方当局交涉以及日本驻韩使节交涉的公文，已有一个轮廓。还有若干种韩国未刊文献、国内已刊未刊的家书等等。存世的文献，可以说已经基本齐备了。

2. 小站练兵时期

这包括了从甲午战争到受命抚鲁之间的六年时间，史籍叙及此一时期的袁氏，不外投机维新运动、出卖六君子二句。袁集文献的收集虽仍有许多不及之处，但许多发现，足可填补历史空白。甲午战争时期，袁氏电存有数百通。上光绪帝万言书及有关变法的论说的发现，未刊的练兵的条令之获得，都是弥足珍贵的。袁氏主修的二部兵书——《兵略录存》、《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当时已经刊布，但其编纂和经营，则可从袁氏几则短笺窥见其一斑。袁氏致言敦源（《图说》主稿人）函谓：

其一：

中段训练操法，请仲兄按全书要义酌改，务期数字足以包括为妥。

其二：

第二册次序排就，惟嫌太多，然亦无法移隔。《筹备》、《侦察》两说，意尚多，且为行军根本，故移前。惟今日书太多，无暇详校。凡未加大点者，均草草一看，恐多未周通。此册各篇，

请阅一通，按项检查，有字句不妥、文理不顺、语涉重复、意相矛盾者，请酌改。但须一气看去，方可易见其弊。

其三：

此说另折附奏。字句须详明，不必求深意奥妙，只求文理通顺，事理明白即可矣。改其字句极费事，较自做百幅为难。请仲兄再修并发抄，掷下以便再酌。

言氏的题记说：

以下各叶，皆光绪己亥夏秋之交督办新建陆军时幕僚给事之作。商榷文字，以徐公为首，而合肥段公、正定王公、河间冯公皆在给事之列。

惜乎戊戌政变告密之说，袁氏本人没有新的文字发现。但相关档案、相关人士的私人记述，已足可证明事实真相，只是不在本文的论列范围。

3. 抚鲁时期

袁氏抚鲁仅一年半的时间，但由于公私档案的大量刊布及未刊文献的收集，收获堪称丰富，总计不下二百万字。大要说来，除了早年的刊布以外，晚近二十年来公布的档案史料、大陆及香港关于盛宣怀档案的刊布；未刊刑部档、张之洞未刊文献的发现和利用，均为袁氏文献的大块增加，但此一时期袁氏同荣禄等人的重要信函缺如，实乃一大遗憾。

4. 直督时期

这一时期是袁氏晚清仕途的高峰期，活动最多，且是最为关键的承前启后时期。这一时期的文献由原来专书的刊布为基础，有大量档

案可挖掘，有重要报刊可查阅，所以内容也相应丰富了许多。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其他档案馆的收藏，我们做了较为详细的查阅，排查了奏折档案和各部专档、各人专档。还收集了辽宁档案馆、天津档案馆的已刊未刊收藏。

这个时期，报刊已普遍发行，大大增加了当时袁氏文献刊布的渠道以及流传的范围，报刊某种程度上可谓袁氏文字的资料库，只是能查阅多少、查到多少而已。我们翻查了近年影印的当年的几种大报和原版的《顺天时报》等报纸、杂志。此外，十分着意收集了《北洋官报》，这是中外研究者们迄今尚未注意到、更未见征引的一种史料，还有其他各省的一些官报的刊载。

这些档案的收藏、报章的刊载，不论它是已刊未刊，都没有哪一件文字是十分惊天动地的发现，但它们却是袁氏和晚清十年新政实施的具体史料。

试举一例：

天津自治局稟试办地方自治章程请核示由。批：据稟及章程均悉。此次开办期成会，由该督理暨局员、会员先后会议至十九次，发端详慎，当无遗议。惟第十八条：“董事会之议决，有越其权限或违背法令，或妨碍地方公益者，会长、副会长得以合意说明理由”等情。应将“副会长”字样删去，改为“会长得说明理由”，以免临时牵掣。第九十八条，县自治之监督官厅一节，应改为“县自治之监督官，初级为本府知府，最高级为本省总督。其属于各司道主管之事务，各该司道亦得监督之”较为完密。仰即先行试办筹设议事会及选举课等事宜，仍照章由议事会随时修改呈夺。其未经修改之前，不得稍有出入，以昭大信。

从删“副会长”一词，可以看出袁世凯论事之严密；从加上“自治之监督官”，可以看出新政对自治的限制。傅斯年所说：有一分史料出一分货，有十分史料出十分货。在这里可证不诬。

5. 隐居与辛亥时期

这是袁氏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时期，新的史料发现更具说明意义。袁氏三年彰德养病，实在是塞翁失马，成就他辛亥出山的资本与条件。彰德养病时期有书信稿数百封刊布，从多个方面反映了袁氏的隐居生活，而尤以若干封亲笔书信史料价值为高，反映了他们兴办新政、实行干线铁路国有的初衷。有宣统三年六月致端方的信说：

日前奉廿一日惠函，拜悉。感慰。两日遣人往车站候驾，未遇。想因近日稍生风潮，须在京商定应付之略，乃可就道，以期内外协力，一线到底。此次朝廷一再宣布，洵可谓仁至义尽，而仍然无理取闹，亦足见人民程度之太低也。

兄曾有四愿：一、收管海关，总税司改用华员。一、收管邮政，不可附在税政。一、收管干路，以便国防交通。一、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此四事经营数稔，迄无一成。而杏老任事数月，已举其三，才略高下，判然可见。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早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复承此老坚守初衷，殷勤期望，尤令人惭服无地。但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志气颓靡，此可概见，不足再言功名事业。惟有将杏老三大举笔之于书，藏诸名山，以志景佩而示后人。惟望当道诸公，才略魄力多得如此老者，东、北两大，何足畏哉。兄亦得长作治世老农，何幸如之。

6. 辛亥革命时期

除当时报纸的刊载外，新增加的文献，仅只近年以来刊布的若干通电报。数量并不多，但可说明一些重要历史过节的真相，纠正史籍多年以来的误解和定评。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驰赴前线镇压革命，史籍均谓袁氏乘机伙同徐世昌开出出山六条件，要挟清廷，揽取大权。其实袁氏奉诏出山并无多少曲折，他提出的是八项条件，但并非为揽取中央大权的政治条件。八月廿七日，即武昌起义一周后，袁氏拜折应诏出山之第四天，有复张镇芳的一封信：

顷奉手书，具悉一一。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宸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

前夕午楼过彰晤谈，兴致颇为踊跃。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鄂军全变，各路援军极少，非自成一军，不足济事。想卓见必以为然也。

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逐渐从清廷手里揽取清政府的大权，但其手段并非传统所说利用手中的军权和革命形势进展威逼清廷交出的，而是以向清廷效忠，获取了清廷的信用，自动授予的。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即在袁世凯初五日电奏清廷决定于初九日起程南下督

师之前一日，有致清政府密电说：

兵机贵乎迅速，运筹要在缜密。现中央筹办军务衙门计有数处，遇事辗转咨商，恐涉迟缓。尤虑各署员司稍杂，难防泄漏。鄂匪党伏各处，不可不防。查昔年遇有兵事，历设军务处为中央统一机关，似宜援成案设督办军务处，或会议军务处，在大内借公所办事，内阁、军咨、海陆军、度支诸大臣会办其事，各署慎选可信之员司一二人，附同阁员，随办文牍，不但机关统一，事可迅决，亦可不至泄漏事机，贻误大局。我邸、相与国共休戚，有力任艰难，无可瞻顾。但事关中央大政，非外臣所敢妄议，祈由邸、相酌量请旨，以挽危局。至切盼祷。

7. 民初时期

除了政府公报、报刊的检阅整理，以及民国史档案的刊布和其他零星发表以外，这一时期无甚重大发现，档案史料、北洋政要的个人档案、函电簿册奇少无比，只有袁氏手批廿一条文本的刊布，为研究者提供了透视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第一手资料。近代史距现在社会不远，但由于媒体的发达，由于人们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又由于观念的不同，口述、回忆的记载出入太大，水分太多，历史需要据第一手史料来书写。客观条件如此，亦无可奈何了。已经刊布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史料有一些新发现，我们期待日文档案资料检索完毕后，能有较多的收获。

五、满意和缺憾

《袁世凯全集》文献收集至今，基本完成。纵观全部内容，差强

人意者有两块。

其一，是使韩时期的公文基本齐备了。这主要得力于总理衙门、外务部档案及韩国档案的较完整保存和整理。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增补余地了。参以其他史料，研究袁氏使韩十年乃至此一时期中韩关系，史料方面已无太大缺憾。人们的研究，见仁见智，自可做出不同的阐释。

其二，是袁氏奏折基本齐备了。这主要也是得力于档案馆的保存和检索。袁氏奏折的收集，也有较好的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袁氏后人根据保存的袁氏奏折底稿，辑印了《养寿园奏议辑要》。“辑要”，顾名思义是选辑本，选印了约二百件折片。八十年代，《辑要》的底本被整理为《袁世凯奏议》，排印出版，共收入袁氏折片八百件，篇目为《辑要》的四倍。《奏议》在大陆出版之前，台湾方面的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了所收藏的袁氏朱批奏折《袁世凯奏折专辑》（这仍然是从光绪朝朱批折全宗里辑印的），共收折片篇目一千三百余件。这是袁氏奏折历年来的刊布情况。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类似收到文件目录）提示，查阅了该馆的朱批折、录副折档，又辑出《奏议》和《专辑》所未收的六百个折片。此外，我们还从其他部门专档，如兵部陆军部（含练兵处）档、顺天府衙门档等，辑出一批袁氏参与的会衔折（如练兵会衔折，是由奕劻领衔，实际上是袁氏在主持办事），这两部分折片的篇目亦差不多与《奏议》相等了。

剔除重复互见，《袁世凯全集》收集到袁氏折片共在二千篇目以上。核对《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登记，可谓基本包罗无遗。未收集到的袁氏折片，已经不多了。

综观袁氏文献的全部收集，要数袁氏抚鲁、督直期间的八年，化

的气力最大，收获也最为丰富，共在六百万字上下，约占《袁世凯全集》全部的一半。

缺憾之处，最大者亦有二。

其一，是信函收集的缺口很大，包括家书和与其他人的通信。《袁世凯全集》收集到信函一千封左右，但却过于集中，彰德养病时期，不足三年，占了七八百封，此外亦仅两种家书和致盛宣怀、徐世昌等人的信，其余许多年份收集不到信函，致许多政要的信函（相关文献多有提及者），均无从收集到手。仅从现在能收集到的这部分信函，即可帮助说明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小站练兵、丁未政潮、择居豫北与东山再起的关系、辛亥出山的初意等等。投军以前的青年时代袁氏的行藏，也只有数封家书保存了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没有更广泛地收集袁氏信函的渠道，信函的保存与否，在收信一方，像盛宣怀那样有完整家藏档案的人不少，但延及后世能够有幸保存下来者则不多。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客观情况。

其二，是民初数年的公私档案所能提供的文献甚少。迄今为止，北洋政要们的私人档案少见整理刊布，史料刊物上的零星登载，价值与意义都不大。民国以来社会的剧烈动荡，有关人物兴衰、升沉、存亡的剧烈变化，也没有为个人档案史料的保存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档案得不到充分利用，这是又一个客观原因。

从《袁世凯全集》文献收集的具体情况来说，所谓“全集”者也，是不敢懈怠、努力收集齐全之意也，并非已经收集齐全之谓也，旧时，纂辑历史人物的全集，限于篇幅、取舍体例等原因，已经是经过筛选，有意割弃部分文字不收，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全集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全集。后世所编的全集或集子，大概都是处在一种努力齐全的状态，已经收集齐全者，可以说迄今鲜见。

六、困难和呼吁

学力不足之困难。从中外历史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能力，到文献句读、文字辨识、日期的考定、真伪的辨析等等，编者都深感自身学识不足，知识匮乏，越做越有胆怯之感。

文献收集之困难，往往国内比海外还难，利用的门槛和索费标准越来越高。

工作条件之困难。经费短缺，人力有限，合作者难求。

诚恳呼吁各位专家学者、各方同仁提供资料或提示资料线索，《袁世凯全集》尚未编定，尚有充分增补余地。又由于篇幅甚大，整理编定尚需时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盟整理工作。

清练兵处及其档案

丁进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一、练兵处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掌

练兵处是清末负责调整全国军制和编练新军的领导机关，它的设置有较深的社会背景。

十九世纪末，清统治者面对人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改良派的跃跃欲试，尤其是经历了“庚子事变”之后，深感自身之危机。为了形成对人民镇压的优势和增强国防力量，巩固政权，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年9月12日），清廷下达编练新军谕令，命各省裁汰绿营，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全国编练新军正式开始。

然而在实际练兵中，各省情形很不统一，其中较大的有北洋的新建陆军、武毅军，江南的自强军，董福祥的甘军等等，皆聘请洋教习，练洋枪、洋操；但也有督抚对朝廷谕旨应付塞责，所练新军，或由绿营、防军、练兵改头换面，或临时募集，聊充其数，不但领导不一，训练不力，装备不一，与朝廷原拟改革武备的目的格格不入，更为严重的是，渐已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清统治者为了统一兵权，多次颁谕，“飭各省督抚整顿兵制，期归一律”，但各省“仍多空言搪塞，绝少切实办法，殊难望有成效”。清廷遂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

六日（1903年12月4日）在中央设立练兵处。

清统治者设立练兵处的上谕中说：“前因各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经降旨饬下各省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划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著铁良襄同办理。”

练兵处以划一全国新兵训练之名而设，实则成为军令所出、综揽全国军政的总汇之地，为清统治者集中兵权，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以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有权势的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又命地方实力派之魁、当时实操练兵大权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已说明了练兵处这一机构地位之崇、权势之大。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拟订了办事简要章程，初六日奉朱批“依议”。在章程中，首先将全国督、抚、提、镇以下的文武官员在练兵中的考核、奖惩的大权，集中在练兵处。《章程》内指出：“令出惟行，为兵家第一要义，稍有藐玩，必至事故。法令之严，无过于军政，近来武备废弛已久，将骄兵惰，相习成风，弊窦丛生，几至不可究诘。”“嗣后，提镇以下各武职，遇有顽抗号令、训练不力或徇于积习、纪律不严者，由臣处查明先行撤差，一面奏参惩办。其有缺额蚀饷者，尤其从重治罪。至关于练兵各项处分，均请由臣处核议。”在《章程》内还指出：“各省练兵，其自筹饷造械以及招募卒伍，购运粮食”，所以它规定：“倘地方督抚以下各文员遇事掣肘，迁延贻误或别有意见，有意阻挠，均是败坏戎政”，由练兵处“据实奏参”；表现好的，亦由它奏请奖励。

其次，练兵处还集中了人事任免权。凡军队将才，练兵处可以将他认为“才具出众堪资任使各人员”，“不拘阶途，奏请破格擢用”。同时，《章程》内规定了“新练各军办理兵事人员，一律改为实缺”，

凡武职除提镇、副将大员考拟正陪请旨简补外，其守备以上各缺则由练兵处“考查才具资格，分别奏请升调补署”。千总以下，练兵处即有权直接“酌量叙补”。

再次，凡原拨练兵之军饷以及续筹专饷，统由该处“督催经理”，并均解归该处饷局收存。所有各项支发，均由该处核销，“无庸由各部核销”。同时在《章程》内还将各省原设制造军械的各局、厂，因为是“专供军实，为各军命脉”，所以“统由臣处督饬妥办”，而且“随时委员考查整顿”，并“明定赏罚，分别奏请惩劝”。

此外，各省新练各军，由练兵处随时派员前往考查督练，凡遇会操或届秋操，均由该处遴选人员，奏请钦派。

通过奏定的这项章程，确立了练兵处作为掌握全国军政的首要机构的地位。将全国的新练各军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尤其是在《章程》内还规定了该处所设各司、科“均在曾历营务人员中选补，各营遇有将领缺出亦可在司科中酌选接替”。这样，上下盘结，连成一气，便于控制。

练兵处由皇帝钦命总理、会办、襄办大臣三人，均为兼差。统辖三司，督练各军。并特简练兵处提调一员，掌管庶务，综理文牍。

练兵处分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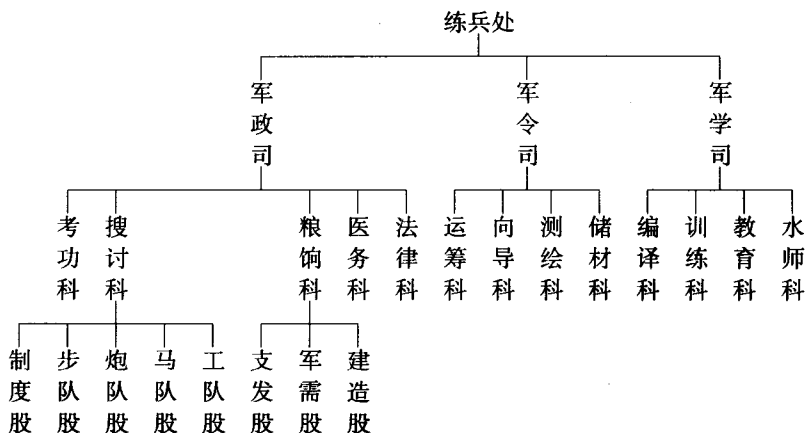
军政司：设正、副使各一员，由皇帝特简。统辖所属各科，考查官兵，筹备军需，凡各司例行公事，径咨各军主要事件，禀请本大臣核饬。下设五科：考功科、搜讨科、粮饷科、医务科、法律科。

军令司：设正、副使各一员，由皇帝特简。统辖所属各科，运筹机宜，策划防守，赞佐练兵处之出纳号令以及用兵机密事务。下设四科：运筹科、向导科、测绘科、储材科。

军学司：设正、副使各一员，由皇帝简派。统辖所属各科，负责训练各军操练，整饬武备学堂，定期呈请派员至各处校阅队伍，考查

学堂等事。下设四科：编译科、训练科、教育科、水师科。

练兵处机构一览表



练兵处虽为一特设机构，权重位崇，但是，时处清王朝已趋土崩瓦解之际，地方实力派官僚在帝国主义分割政策的支持下，军阀割据势力渐成，清政府这一挽危集权的措施，已难著收实效。随着国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清统治者力挽危局，频繁地调整统治机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1月）宣布改革官制，在中央废兵部，成立陆军部，遂将练兵处之军政、军学二司并入，又将军令司之权另设军咨府，练兵处遂即撤销。练兵处仅仅存在了三年。

二、练兵处档案情况及内容

（一）档案情况。

练兵处档案，由于历史的原因分两部分，一是原存本馆，由本馆整理编目，共八十二卷，计一千七百八十五件；一是由南京史料整理处编目后移交本馆的，共六十七卷。

两部分档案都是按机构——问题原则整理编目，各有案卷目录。档案起迄时间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至三十三年六月。主要文件有咨呈、奏稿、说帖、申文、知照、清册、军机处抄交折片及部分函、电等。

（二）档案内容。

馆藏练兵处档案已不完整，大部分是军政司形成的，军令司、军学司的档案很少，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官制职官。

① 有关机构章制方面。

有奕劻等奏订练兵处办事简要章程、分设司科职掌章程，有练兵处提调、三司正使、税务处、政治馆、厘定官制王大臣、北洋行营军官学堂、总理学务大臣等奏请刊刻和使用关防日期及礼部知照承领练兵处关防并准开用日期的文件。兵部、户部等关于兵部例章，领受、保存标旗章程、改编防营章制，常备军退伍办法，陆军官制及练兵处并入陆军部的文件。

② 有关练兵处及各镇人员的升迁调补方面。

有简派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委段祺瑞兼常备军翼长。各省提、镇、标、协等官员的升迁调补。遴赵国贤署理陆军第六镇统制。军政司、直隶、两江、奉天、闽浙等关于陆军军官将弁员司的升调奖恤。遴员分别补署练兵处提调及三司正、副使及各科监督。电调留日学生唐在礼、蓝天蔚、龚光明、舒清阿、敖正邦回京差委。调湖北学生吴禄贞等到处差委。

练兵处控制全国军队人员的任免稽核之权，有关官长升调、功过、操法、领用军械等项应由各镇随时径报，有陆军第二、三、四、五、六各镇统制官等关于各镇陆军官长升迁调补及陆军第一镇应补军官总数的文件。有光绪三十二年三、四月安徽巡抚、青州副都统更换

管带的文件。

③ 有关练兵处及各镇、协官长员弁履历职衔名单。

有王士珍、张怀芝、马龙标、吴凤岭、段祺瑞、王英楷、何宗莲、田中玉、王占元、鲍贵明、卢永祥、杨善德、王宾、王金镜、朱泮藻、王德芳、何丰杯、王懋赏、王怀庆等人履历。出使各国大臣随带武官的履历清册，练兵处各司、科官员名单及陆军第二、三、四镇全镇官佐职名清折。

④ 有关官员的考绩、恤赏方面。

考勤方面：有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奉宪谕飭令三司及各学堂自监督以至委员、文案每月到署若干日、所办事件及其分数，据实列表呈报，以凭稽核。有陆军考核章程，军政司、军学司，陆军第二、三、四镇及贵胄学堂、京师陆军小学呈送光绪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各员司考绩表并武卫左军各官衔名、年岁、才略、性情等方面考语。

奖励方面：练兵处奏定章程内载，平时操练，将弁之勤奋卓著者，由各将军督抚详叙劳绩，年终奏请练兵处、兵部制发各等勋章，分别赏给。其兵丁技艺娴熟、打靶较优者，由练兵处、兵部酌定银牌、功牌式样，颁发各省自制赏发。有练兵处拟定陆军勋章、记章图式、功牌式样并颁发章程等文件。有直隶总督袁世凯、青州副都统、宁夏将军、绥远城将军等奏保练兵处各军官将弁等奖赏记功，校阅第二镇良弼等六员记功。

对官员参处方面：有军政司关于咨查镇江常备军教练韩树荣因公被人谋毙，江鄂两省制造局等废弛，行令参处在事各员。军令司三等委员色清图行止不端，呈请撤去其差使。具奏访闻江苏省陆军互斗情节与抚臣奏报颇有差异，请旨派员查办。参奏督臣侵蚀云南防营军餉等文件。

2. 军务。

① 有关练兵章程及条陈方面。

其中有练兵处奏议变通武备章程的咨稿。关于陆军官弁衣制，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练兵处会同陆军部具奏陆军官弁服帽章记一折，本日奉旨：“依议。”有制备军服价值单。有标旗章程。有练兵处核议商部左侍郎伍廷芳奏请认真练兵的文件。有江宁将军永隆及御史等官员奏陈练兵事宜的文件。

② 有关调查各省军务方面。

为了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练兵处电各省咨呈军务情形，军政司考功科拟定简明表式，将各省新军官兵人数、薪饷、驻扎处所、所用武器等按每年春秋两季造报。内有练兵处咨催各省造报的电稿，袁世凯咨报北洋陆军第二、三、四镇炮辎队骑马册籍。

③ 有关编练新军方面。

有直隶、河南、两广、两江、盛京、山东、四川、黑龙江、热河、山西、陕西、绥远、库伦、青州、湖广、安徽、江西、云南、贵州等省常备军情形及截并绿营、改练新军、酌改营制饷章等文件。有北洋常备军第二、三、四镇成军起饷日期，遴委各镇翼长等官衔名单。有关改续备军为巡防队，查奏定陆军新制续备军制略载：常备军训练三年期满，发给凭照资遣回籍，列为续备军，月给减饷银一两。有练兵处飭各省续备军一律改为巡防队的文件。

④ 有关各省设立督练公所方面。

练兵处新定营制饷章载：各省新军练及一协以上者，应于省会设立督练公所。有吉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遵照练兵新章，设立督练公所，委员经理及练兵处酌拟各省督练公所暂行官制等方面的文件。

⑤ 有关校阅北洋新军方面。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七日练兵处会同兵部具奏北洋三镇改编新制，请派大员前往考验。本日奉朱笔圈出兵部尚书长庚、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为校阅北洋大臣。内有长庚考验北洋情形的文件，考验北洋三镇军官暨陆军学堂各员择优记功，考验北洋三镇日记，练兵处议复编定北洋陆军镇、协、标号数。另有校阅凉州新操，凉州副督统玉崑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奏请简派大员来凉校阅。奉朱批：著升允认真校阅。有升允具奏校阅凉州满营新操情形的文件。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北洋陆军拟在河间秋操，钦定袁世凯、铁良为校阅大臣。有拟办秋操、筹备款项、领取和咨缴阅兵大臣旗帜等，闽浙、直隶、福州、察哈尔、绥远以及外国使馆派员观操。光绪三十二年陕西春操，内有陕西巡抚具奏校阅春操情形的文件。

⑥ 有关防务方面。

光绪二十九年武卫左军奉调出关，练兵处奏调湖北常备军八营填扎通州，以拱卫京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练兵处奏调撤回，内有呈报鄂军由通州撤防日期，并有五月十三日练兵处提调寿勋赴通州颁发湖北陆军恩饷银牌等文件。

光绪三十年广西军务吃紧，湘边戒严，奉旨饬派江南常备军左军六营前往湖南永州驻扎，后因广西肃清，奉旨撤回江南遣散。有两江总督周馥请将江南防军分别留、遣折。还有锦州副都统具奏俄人交换锦州地方，请设兵防守，顺天募兵拨归直隶，河南新军一营交南阳镇调遣，勘定南苑营基等处屯驻兵队。另外，还有光绪三十二年镇压河南西平县起事会首苗金声和江西萍乡会党情形文件。

⑦ 有关军火和移建制械局厂方面。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练兵处具奏拟订陆军枪炮口径等项程式，奉旨：“依议。”有通行各省咨文。有练兵处核议直隶、热河、贵州、河南等购买枪炮子弹文件。铁良赴江南考查江鄂各局制械情形。

练兵处筹划上海制造局内迁，分建南、北、中三厂办法，筹拨建厂经费，遣派张士珩接任总办并管理金陵制造局及上海船坞。有练兵处议复湖广总督端方筹请鄂湘两省会建枪炮厂，川督锡良请派员出洋购办机器，扩充四川制械厂。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扩充制造局。河南订购德国克鲁伯快炮价目等。

⑧ 有关军需方面。

关于军服：有商部咨呈天津硝皮厂军装文件，请转行各省订购并品名、价目清单。奉省由津购备军装，留京河南陆军请领兵丁军衣犒赏银两，福州将军咨呈捷胜营制办三十年夏冬两季分操衣裤，搜讨科监督沈尚濂呈报制办军服等项式样。

关于军马：骑兵作战、官弁乘骑、运载枪炮弹药均需用马，因此，军马为军队所必需。有练兵处核办江苏、安徽、山东、青州、湖南、河南、两江、京旗陆军购办马匹，赴张家口采购战马的文件。练兵处奏定军制额设随营车骡行军时准加倍添设，日俄战争后，时局渐定，袁世凯奏请将陆军第二、三、四镇加添行军车骡拟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起一律裁撤。

⑨ 有关外事方面。

有军机处抄发溥伦具奏赴美参加博览会，道经东、西各国访查军政情形。派员陪同美国武官参观东、南各省军事机关。派员赴法、德观操。练兵处赞同闽督崇善限制英船测量闽海道范围。有直督袁世凯密陈日俄战争军势暨派兵布防等情形文件。清廷按照西法整顿军务，拟设军乐，有外务部咨送英使函送该国军乐局地址，请代为举荐。1907年美国设立海陆军赛会，外务部咨送请派人赴会等文件。

3. 财政经费。

① 筹解练兵经费方面。

自鸦片战争后，我国多次遭受外国侵略，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尤其是中日甲午之战后，赔款激增，清朝财政窘迫，练兵经费十分困难。因此，从多方面筹备练兵经费。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户部奏准飭各省筹解练兵经费，依限解部。有直隶、山西、河南、江苏、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安徽、福建、湖广、浙江等省汇解练兵经费各省原派、认派练兵经费银数。户部关于各省筹解练兵经费给练兵处的咨呈。两江、直隶、河南、黑龙江、山西、浙江、山东等省添练新军筹拨常备、续备军经费，薪饷银两。直督奏抽收烟酒税筹备练兵经费及筹办边防。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练兵处奏准各海关仍征税厘，均按关平收入，关平较库平每千两加十六两四钱二分，海关所放各款，惟新案赔款及税务司经费系用关平，其余均用库平，拟请飭令各关除解关平银两仍照旧办理外，其余解支库平各款，应扣平余银两，按季报解练兵处，为一切公费之需。有江海关、江汉关、津海关、重庆关、闽海关、粤海关、蒙自关呈缴练兵处平余银两文件。

江北添练新军，奏准以徐州加征膏捐，淮南课厘、淮安关税三款为练兵经费。有江北提督刘永庆咨报收到徐州膏捐局、两淮盐运使司、淮安关解到练兵经费银两数目、日期和练兵处请户部查照的文件。还有报效练兵经费，如绥远城将军咨呈汇解垦务公司员商、伊克昭盟杭锦贝子、汉口商务总董黄训典、张鸣岐之母张李氏等报效练兵经费及练兵处为其请奖的文件。有贝子溥伦奏整顿鸦片税收、增强海军意见的文件。

② 有关筹解、领取军饷方面。

有承领北洋常备军及南洋自强军饷杂银两、练兵处请户部垫发北洋陆军第二、三、四镇饷银的文件。陆军暂编第十三协由直隶移驻江北训练，有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飭户部筹拨陆军十三协饷和江北提督刘永庆咨呈十三协由江北起饷日期文件。山东巡抚咨核袁世凯武卫中

军放支饷银杂款、清江卫队官兵薪饷。山西筹改陆军停解忠毅军饷，北洋陆军逃兵扣饷的文件。

有关练兵处人员薪水和川资银两，直督关于调京留练兵处差委各员停支薪水、文案处各员增减薪水清单。长庚、徐世昌奉旨考验北洋三军用银账单，铁良、姚锡光、卢敖远赴江南、喀拉沁、保定等处考查奉拨川资的文件。

③ 有关练兵处办公经费和购备器物方面。

有移解提拨军政司办公经费、收支清册，军政司正使刘永庆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简命署理江北提督，以王士珍接任，有刘永庆移交结余银两及印信文件。

法律科采购书籍收支银两报销，军政司购买器具什物动用银两数目。练兵处至军政、军学、军令三司及挂甲屯安设电线所用工料银两。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至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底练兵处所收各款及开销、薪工杂费并三司请领经费银两数目账单。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十日至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年终账目。江南制造局收支清册。上海铜元局挪用萍、沪新厂款项文件，晋省旗营用款。上海户部银行关于财务经费问题给军政司函电。

4. 会办军事学堂及留学。

清末把兴办军事学堂作为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各省纷纷兴办各类军事学堂。

① 有关兴办学校方面。

有江宁将军永隆、使美大臣梁诚等奏陈练兵兴学，请设陆军大学、省学堂，王公子弟入学及练兵处议复稿。练兵处议复御史杨圣清请飭各省创设将弁学堂，盛京、热河、直隶、察哈尔、四川、江西、江北、河南、安徽、广东、贵州、闽浙、山东、吉林奏请设立陆军各级学堂文件。河南巡抚奏设测绘学堂及兴建贵胄学堂、陆军小学堂。

陆军贵胄学堂听讲试办章程。贵胄学堂、京师陆军小学堂、保定陆军小学堂刊刻关防、开用日期并总办、教员的升调，段祺瑞督理武备学堂并报到差日期。练兵处电查各省武备学堂学生暨常年经费数目，各省开办陆军小学情形及江北改设学兵营的文件。

② 关于学务方面。

提用江海关积存武卫军余饷为陆军小学堂办学经费。核发陆军小学堂、陆军速成学堂等添建校舍、搭盖凉棚、购置学习物品。新疆、江西、山西、察哈尔开办陆军学堂经费。张家口监督将查罚漏私银两二千两全数捐给陆军小学堂。京师陆军小学、陆军师范学堂、测绘学堂员生夫役薪饷杂费清册。陆军师范学堂办公经费。河南省咨送北洋学习弁兵衔名薪饷清册。

③ 关于陆军毕业生、见习生的考试、发给执照、补官等方面。

有陆军毕业学生考试授官章程，山西、福建、江西陆军毕业生照章补官奏稿。军政司申送陆军师范学堂、陆军学堂、绥远城武备学堂、直隶陆军学堂、福建陆军学堂、山东武备学堂及江西、山西、河南、察哈尔、安徽、山东陆军毕业生、见习生花名、年籍、三代履历册，照章补官的呈文及发给陆军毕业生执照的文件。有北洋大臣奏设训练各省将弁学堂学员毕业咨请练兵处派员莅堂考试、评定分数等文件。有练兵处发给北洋将弁学堂二、三班毕业学员，直隶陆军学堂速成班见习生，测绘学堂头班毕业生执照的文件。

④ 关于陆军学堂员生的奖惩方面。

有会办练兵大臣袁世凯、军学司关于将弁学堂出力各员及毕业生请奖的咨呈。有对福建武备学堂、北洋将弁学堂、陕西武备学堂优等毕业生、日本教习及驻杭日领事请奖及滋事惩办的文件。

⑤ 关于留学方面。

有游学生章程，练兵处拟行陆军学生留学日本自费章程及自费生

赴外洋陆海军学堂肄业暂行章程。议复御史王步瀛奏推广官送学生出洋学习武备并酌送自费生的文件。考选赴日学生、留日学生花名册、委派监督。直隶提督马玉昆呈解遴派昆源赴日留学文件。军政司等关于汇解赴日、英、法留学生学费、川资、津贴等文件。在对外留学中，留日人数最多，日本振武学堂因中国留学生多，校舍不足，由中国出资建造校舍，专为中国留学生居住，内有练兵处汇寄驻日大使杨枢款项的函电文稿。

练兵处虽然为时不长，但它是清末总揽全国军事的总汇机构。本馆所存的这批档案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当时练兵兴学等方面的情形，对研究清末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于晚清政治权力 结构的一种新的解释

——《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述评

崔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以下简称《晚清权力与政治》)是一部出版于1980年的英文著作,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Stephen R. Mackinnon)。该书系由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历经十余年,共七章,着重探讨1901—1908年间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政治的关系^①。虽然这是

① 该书的具体章节结构如下：第一章、袁世凯权力的兴起：1. 早年经历；2. 外国列强的影响；3. 1901年袁世凯的军事权力；4. 朝廷政治和慈禧太后。第二章、稳定直隶：袁世凯任总督的最初几年（1901—1903）：1. 谈判外国撤军；2. 军事对抗和镇压农民起义；3. 财政困难。第三章、袁世凯对朝廷政治和北京外交事务的控制（1903—1907）：1. 袁与慈禧太后和庆亲王的三角关系；2. 袁世凯与列强；3. 作为中央政府官员的袁世凯；4. 军机处的阴谋活动和1907年对袁和庆亲王权力的挑战。第四章、袁世凯与北洋军（1901—1907）：1. 北洋军的演变和组织结构；2. 北京对北洋军的财政和行政控制；3. 北洋官员和个人忠诚问题。第五章、直隶的改革与权力的实施（1901—1907）：1. 教育改革；2. 警察改革；3. 经济改革。第六章、作为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大臣的袁世凯（1907—1908）：1. 袁与列强；2. 袁对北京和中国北方政治和官僚机构的继续控制；3. 袁的军事影响力和他与北洋军的关系。第七章、尾声：袁世凯权力的倒台。结语。

一部出版于二十多年前的著作，但无论对袁世凯研究来说，还是对研究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来说，《晚清权力与政治》都是值得一读的著作^①。

在有关袁世凯和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研究中，此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自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以来，随着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的崛起，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尾大不掉之势，其中，袁世凯便是地方督抚分离主义势力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所创立的北洋新军，既是湘、淮军的继承者，也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前身。《晚清权力与政治》首先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重新检讨晚清中央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关系，认为袁世凯在清末与张之洞一样，都属于政府官僚，袁世凯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近代军阀的前身，他在清末军事或政治权力的扩大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

其理由之一是，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后的快速提升，从直隶总督到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并非以地方军事权力为基础，也与华北的地方精英的支持无关，主要在于他本人具有操纵和取悦朝廷和官僚政治的才能。为此，作者在书中对袁世凯如何取悦慈禧太后、军机大臣荣禄和后来的亲庆王奕劻，以及袁世凯如何在朝廷中培植势力和关系网做了详尽的描述，说明袁世凯权力的兴起系出于他在朝廷中的影响

① 该书的英文书评见 Mary. Backus. Ranki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44, Issue1 (Nov. 1984), pp185—187.

力，因此不具有地方分离主义性质。

其理由之二是，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的新政改革有着密切关系，而他在直隶实行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也在他在北京的影响力。作者指出，袁世凯在直隶的改革和他对北京宪政的坚定支持和他在天津率先推行的自治等改革通过像诸如上海的《东方杂志》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从而为袁世凯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获得全国范围的地方精英分子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其理由之三是，作为袁世凯政治权力重要来源和象征的北洋军，并非人们所说是他的私人 and 地方部队，军阀的前身。作者指出，首先，从北洋军的产生来看，与湘军和淮军不同，建立新军最初并不是地方上为对付国内叛乱所引起的危机，而是由于外部对国家和朝廷的安全构成威胁，最主要的是1904—1905年发生在满洲的日俄战争促使慈禧拨巨款在中国北方筹建新军。新军在财政和行政方面都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北洋军的常经费，除一部分由袁世凯从地方筹得之外，三分之二来自中央的拨款^①。袁世凯对北洋军的控制主要也是依赖其在北京的影响力，特别是其对慈禧太后和亲庆王的影响力，以及通过他的同党和门生在北京两个关键部门——练兵处和陆军部中的地位。因此，当1906年底和1907年初袁世凯在朝廷中遭攻击，他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处于最低点时，铁良就曾一度从他手中拿走北洋六镇中四镇的控制权。再者，新军的组织和运作也与湘军、淮军不同，它遵循的是专业化的路线。新军的组织经过刻意的设计，以近代日本的军队为模式。在北洋军内，衡量军官和士兵的标准突出教育

^① 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107.

和专业军事训练重于个人和地域关系。而北洋新军的各级指挥官经常变动，又限制了部队和指挥官之间发展起主要的忠诚关系。虽然这一做法无疑会加强北洋军官对袁世凯个人的依赖，但由于他在录用军官中强调教育和专业军事培训，北洋军官对袁世凯的个人忠诚度分三个派别，依次不同：一是像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忠诚的高低级官员；二是像姜桂题、张勋那样的忠诚程度稍差的前准军军官；三是许多受日本训练的低级官员，他们与袁世凯的联系很少。所有这三类军官对袁世凯的忠诚度都取决于他能否满足他们的职业和政治目标，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袁世凯在北京的影响力。但所有这些军官对袁世凯的忠诚都没有达到足以将北洋军说成为袁世凯个人军队的程度。

二

除了透过袁世凯权力的兴起研究晚清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关系外，《晚清权力与政治》还通过对他在直隶农村县一级所实行的教育、警察和经济改革的考察，揭示晚清县一级的政权建设以及袁世凯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的关系。

首先，作者指出，袁世凯比同时代的任何督抚都更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并使农村产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在教育改革方面。但同时他在直隶的改革又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县，教育、警察和经济三者的改革很少都得到执行，大多只是对其中的一项或两项进行了改革。重大的改革活动发生在相对比较富裕的直隶南部地区，但并不一定在最繁华和人口最多的县里。在保定府、冀州（Jizhou）、定州（Dingzhou）、深州（Shenzhou）等地，地方士绅对教育和经济改革有极大的兴趣，而对警察的改革兴趣不大。在定州和束鹿（Shulu）县，改革似乎完全集中在教育上。比较平衡和全面的改革则发生在像赵州

和广亨府这样比较贫穷和偏远的地区。直隶县一级的改革活动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1. 这些改革在每一个县里一般都是由那些富有活力的地方官负责发起。2. 改革能够取得长期成功的往往有赖于、取决于地方精英的合作。3. 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一群新的精英和商人群体，他们不像在湖南和湖北的精英那样与县官对立，而是与县官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社区发挥权力，牺牲他们群体之外的农民、商人和其他阶层的利益。4. 在直隶，改革没有导致城市和农村分裂，没有像当时的湖南和湖北那样出现一个独立的新的城市改革派精英群体。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认为袁世凯在直隶县一级实行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提高了县官的管理能力，从而扩大了袁世凯本人在省内的权力。同时，袁世凯在扩大政府在县一级权力的过程中，并没有牺牲地方精英分子。袁世凯和他的县官们主动接纳精英分子在地方上的领导权和他们的事业活动，并使之合法化。在近代化的名义下，他们解散或取缔像联庄会、保甲和团练这样一些非正规的警察和军事组织，而以近代的警察和北洋新军取而代之。那些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的地方精英分子们既满意这一改革所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满意袁世凯为他们子女提供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因此，袁世凯的社会控制得到直隶地方精英的支持，他们愿意想方设法为他的社会控制付出代价。这样，袁世凯便将他的督抚权力与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紧密地连在一起。

作者指出，与袁世凯对士绅采取争取他们合作与支持相反的是，袁世凯对商人和农民则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如他并不愿天津商会的地位过于扩大；除高阳、保定和一些像天津商人宁世福创办的企业之外，直隶的近代企业被周学熙、李士伟和孙多森这样一些官僚资本家所控制。在直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袁世凯比李鸿章更倾向于采取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而商人往往被忽视。在改革过程中，直隶农民

的利益更是被损害。袁世凯的改革使直隶的男性农民不但承担北洋新军的强制性征兵并承受它的所谓的“近代”式训练的梦魇，而且还承担深重的额外赋税和地租，支付袁世凯在农村所推行的各项改革的大部分的费用。并且，农民稍有反抗，即遭袁世凯的残暴镇压。总之，商人和农民受各种新的和旧的方式的统治和剥削，他们为新的改革活动付出代价，但他们很少从中得益。在作者看来，袁世凯对商人群体的态度从长远来看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经济改革的成效，袁世凯在直隶推行的经济改革只有在高阳和宝坻由商人组织和发动的地区才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①。

根据对袁世凯在直隶县一级所实行的各项改革的考察，麦金农认为晚清北方地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模式与丹尼斯（Daniel H. Bays）在《迈入二十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 Ann Arbor, 1978）^②一书中所说的情况稍有不同：在北方地区并没有出现像南方那样与政府正式权力相抗衡的地方士绅精英势力；北方地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模式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以及县级以下的地方精英三者之间的权力同时扩大并交错重叠，并且与人们通常想像的不一样，这三大权力中心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而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共同面临来自西方和日本这个共同敌人不断增强的压力；如果说这三种政治权力的扩大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的话，那就是被政府和地方精英严密控制的农民。

① 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p178.

② 有关该书的内容可参见拙文《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三

在研究晚清中国政治权力的变化时，麦金农还十分重视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十年里，列强对北京和地方政府决策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不仅对新政改革运动施加了重大影响，而且列强的支持还成为一些重要地方督抚维护其政治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晚清权力与政治》一书中作者除了探讨袁世凯政治权力与中央政府和地方士绅精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对袁世凯政治权力的兴起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根据有关英文档案资料，作者认为，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列强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1900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得以继任直隶总督，便与有关列强的支持分不开，尤其英、德两国起了重要作用。而袁世凯在出任直隶总督之后，利用与列强打交道的机会，通过一系列交易，有意与列强中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1902年与英国友好地解决京奉铁路协定问题和中英商约问题，随后又接受英国的劝告，在日俄战争中奉行“中立”政策，实际支持英国的同盟国日本。作为回报，英国则介入清朝内部政治权力的斗争，支持袁世凯。1902年当袁世凯因解决京奉铁路问题遭到攻击时，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便出面进行直接干涉，替袁世凯说话。1903年4月荣禄去世，袁世凯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请求英国公使的帮助。英国公使便又照会亲庆王和外务部，表达英国政府对袁世凯的关切。一些英国军官和外交官甚至讨论如果袁世凯失去直隶总督职务，有必要增援部队，重新占领天津和北京。在1907年“丁未政潮”中，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战胜他的政敌军机大臣瞿鸿禨和

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将后者挤出政界，也与列强的态度有关。新任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便站在袁世凯一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将瞿鸿禨看作一个“心胸狭窄的迂夫子”，^①对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表示欢迎。1909年1月当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的事情发生后，朱尔典又出面予以保护，要求载沣确保袁世凯的人身安全^②。

同时，作者认为，袁世凯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他之所以能够始终得到北京外交团的青睐，原因在于他们尊敬袁世凯是一位进步的、具有坚定思想的人，他能在诸如开平煤矿，关税自主或有关满洲的主权等事情上对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作斗争。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袁世凯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清楚中国国际地位的弱点，也认识到中国政府财政的拮据；他们对袁世凯所做的允许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和同意签订新的铁路合同感到满意。因此，他们都愿意与袁世凯谈判，并让清政府知道这一点。

而对慈禧太后来讲，她之所以在政治和人事上依赖袁世凯，原因也就在于袁世凯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帮她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义和团运动之后，袁世凯和他的同党如唐绍仪处理了一系列重大交涉，诸如结束八国联军对天津的占领，签订商约，1904—1906年就西藏问题与英国谈判，日俄战争之后与日签订条约，以及大量的路矿合同。在慈禧太后看来，袁世凯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一方面坚定地捍卫朝廷的主权免遭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犯，另一方面又能表面安抚列强，避免清政府与列强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因此，袁世凯也就

① 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p88.

② *Ibid.*, p207.

成了慈禧太后不可缺少的人物。

作者认为，袁世凯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也曾对其政治权力产生一些负面影响。1907—1908年间，袁世凯在东三省采取以夷制夷传统策略，试图以与美国结盟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但由于美国无意在东三省问题上与日本发生对抗，结果导致严重后果，使得中国在外交上变得更加孤立，也更易受日本的侵略，并加速了袁世凯本人的下台。再者，袁世凯主持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相互抵触。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目标是稳定与列强的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出一些让步，而这又会引起那些民族主义精英分子发动骚乱，最后颠覆满清王朝。

四

在考察袁世凯权力兴起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变动之余，作者在该书的结语部分还对袁世凯的政治风格、阶级属性，以及他追求政治权力的动机，做了简要的分析。

作者认为，就政治风格来说，袁世凯与中国传统士绅、官僚精英相一致，他的合法性也来自于他们。袁世凯本人就出生在河南地主官僚之家。虽然他没有科举功名，但在他周围的都是一些令人敬畏的有功名的士大夫，他的幕僚和同党都是有上层阶级背景的务实的儒学之士，如徐世昌、严修等。因此，袁世凯本人固然很难说是一位学者，但他却有着坚实的知识分子的背景，这一事实经常被对袁世凯军事生涯的先人之见所忽视。他的同党和门生当中虽然也有像唐绍仪、梁敦彦和梁如浩这样一些有买办背景的爱西式教育的人物，但他们几乎都只活动在与外交有关的领域。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专家，但袁世凯依靠的是像周学熙、孙多森和杨士琦这样一些来自名门望族、接受过传

统教育的士绅官僚。对北洋新军的高级官员来说，袁世凯也更优先选择像冯国璋、段祺瑞和吴佩孚这样一些同时受过传统和近代专业训练的人物。在直隶的改革中，袁世凯也是依赖和照顾城市和农村精英阶层的利益，牺牲商人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得出与大陆学者基本相同的结论，指出袁世凯是中国传统上下层精英分子利益的代表，特别是那些与地方督抚和国家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地主的利益的代表。

至于袁世凯毕生追求权力的动因，作者认为是他要拯救中国国家，创立一个与外国并驾齐驱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的，袁世凯愿意采取尽可能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甚至导致他有时向外国列强作出耻辱的妥协，袁世凯将自己看作是创造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强权人物。因此，他虽然与同时期抱有改革思想的张之洞和张謇都持同一种阶级意识观点，但袁世凯又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可能比他们更了解中国和世界政治权力的现实，特别是清楚军事力量的需要和外国影响所起的作用。但在其他方面，袁世凯与两张相比也存在一些根本缺陷。与张之洞一样，袁世凯也是一位官僚型的民族主义者，但原则性和坚定性却远为逊色。与张謇一样，袁世凯也支持立宪和自治，但仅仅将它们当作扩大中央集权和增强国家力量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实现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积极目的。袁世凯深深地被他的实用主义所束缚，一味追求个人权力的最大化，在袁世凯看来这两者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前提条件。

最后，根据该书所做的研究，作者还对整个晚清政治权力的演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虽然存在传统王朝循环衰败的迹象，诸如晚清官僚的腐败，但正如本研究所力图证明的，延续的趋势更加明显，晚清最后十年的权力政治并不适合王朝衰败的演算模式，慈禧太后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衰败瓦解，它不

仅更强大，而且开始通过改革，把中央对县级以下的影响力扩大到几世纪来前所未闻的程度。通过对晚清最后十年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袁世凯权力的考察以及丹尼斯（Daniel Bays）对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政治人物张之洞生涯的研究，中国国家严重依赖外国列强维持的事实从短期来看，在中国国内是增强了它的力量，而不是削弱了它的力量。虽然地方权力的集中以及广泛的农民骚动一直延续至1911年，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威胁到朝廷的统治。这一时期地方上的重要人物，如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的主要的政治联系和效忠都在北京。同样，北京的新式军队和西式武器也足以对付农民的起义和暴动，这些农民起义从没有表现出失控迹象。最后，地方精英的权力在1911年之前无疑继续增长扩大，但至少在中国的北方并不一定就牺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中华帝国晚期政治权力结构，特别是在北方，不是随着1912年清朝的覆灭而瓦解，而是随着1916年袁世凯的灭亡而崩溃。

五

《晚清权力与政治》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关晚清朝廷政治方面的内情，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其对袁世凯直隶改革和他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关系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则丰富和深化了以往国外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这些都是国内袁世凯人物研究所不能企及的。但《晚清权力与政治》推导出的有关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不具有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以及关于袁世凯并非近代军阀前身的论述，则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先入为主地将袁世凯个人的集权等同于中央的集权，忽视他在集权和改革过程中与清朝中央政权之间存在

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得出袁世凯在晚清权力的扩大丝毫没有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不但没有削弱中央政权，反而增强了中央政权的结论。事实上，晚清袁世凯个人权力的扩大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1906年袁世凯在河南彰德会操后被削去北洋四镇兵权，次年调离北洋，1909年1月遭罢黜，不只是朝廷不同派系斗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袁世凯个人集权与当时清朝中央政权产生冲突的产物。而袁世凯在一些改革问题上与中央政府的分歧也折射出袁世凯个人集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冲突。如在官制改革中，他支持立宪，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并非如作者所说，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央权力，更主要的是为了个人集权，企图藉责任内阁控制中央，袁世凯的这一意图在当时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那位一心一意想扩大中央集权同时又十分青睐袁世凯能力的慈禧太后最后之所以否定责任内阁制，也正是看破了这一点。反之，为了个人集权，在改革过程中袁世凯对清政府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则加以反对和抵制。如对于邮传部颁布《路务议员章程》，试图将各省铁路置于邮传部的统一管理之下，袁世凯就毫不掩饰地加以反对，认为路务议员损害了地方督抚的权力^①。至于袁世凯在直隶的经济改革采取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也非为了扩大国家权力，而是为了他个人控制财源。并且，袁世凯在直隶经济改革中所实行的官办政策一定程度上与当时清朝中央政府业已宣布的振兴实业政策也是有所抵忤的。可以说，袁世凯在清末所作的改革中，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权势，并不是从扩大中央权力出发的。当然，这并不完全否定袁世凯的某些改革，诸如推行近代警察制度，既扩大了他个人的权力，同时也扩大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但总的来说，袁世凯在晚清权力的扩大，并不一定就意味

^① 参见拙文《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着中央权力的扩大。这是我们在讨论袁世凯权力性质时须加区别的。

其次，作者一再强调袁世凯的权力的扩大都是通过他在北京的影响来实现的，以此来论证袁世凯在晚清的军事或政治权力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的性质，这也是缺乏说服力的。袁世凯的军事或政治权力通过北京中央政府实现，它本身并不能就说明他没有近代军阀主义的性质，就像汉代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样。并且，在清朝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完全崩溃之前，尤其是清朝中央政府还掌握一切大小官员的任免权和大部分财权的时候，任何官员要培植地方势力，或多或少都要通过中央政府。而袁世凯在晚清的情况就是如此。一方面，他利用他所掌握的权力和外国列强的支持扩大他在中央的权力和威信，使自己成为清朝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另一方面则利用他本人的影响力，以及贿赂等手段，在中央培植同党，然后又通过其在中央的关系，利用中央的资源，培植个人地方势力。对于袁世凯在中央和地方如何一步步精心编织的权力关系网，作者在书中作了详尽的分析描述，指出1907—1908年袁世凯调离北洋出任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大臣期间，他自1902年任直隶总督以来所编织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中央的关键几个部，诸如外务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和民政部都在袁世凯势力的控制之下，同时，直隶、山东等中国北方各省及东三省基本上也处在袁世凯的影响之下，这些省的督抚大多为袁世凯的同党和亲信。此外，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也继续保持着他的影响力，在陆军部除尚书铁良外，其他的一些重要官员大多属于亲袁派；此时袁世凯虽不能再直接控制北洋各镇的兵权，但北洋四镇的兵权仍在袁世凯最亲信的军官控制之下，并且袁世凯还进一步掌握了毅军和新建陆军第七镇的兵权。在笔者看来，麦金农先生所揭示的这些事实刚好说明了袁世凯权力扩张的分离主义性质，展现了袁世凯个人权力对晚清中央权力构成何等重大的威胁。

最后，麦金农先生认为列强的干涉加强了晚清中央权力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列强的支持的确是袁世凯权力在晚清得以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列强干预清朝官员的任命，则是对中央权力的一个重大打击，使清朝中央政府丧失了维护中央权威的一个重要法宝——独立的官员任免权。而它所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导致有些地方督抚可以“挟洋自重”，催生地方分离主义。依赖和投靠列强，正是近代中国军阀得以滋生的条件和特征。因此，作者对袁世凯权力兴起与列强关系所做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正好论证了袁世凯权力兴起对清朝中央权力的挑战和削弱及其军阀本质。

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

傅德华

(复旦大学)

十余年前，在编纂《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时，笔者即已注意到台湾学术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从未停止过对袁世凯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7月4日台湾《公论报》上发表刘生焱撰写的第一篇《清廷信任袁世凯》，迄2000年止，已出版研究专著二十六部、袁世凯史料汇编二十二部，发表论文近三百篇。^①上述有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袁世凯一生的研究

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一生，包括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仅这一方面的成果就有专著十四部，论文近五十篇，出版传记资料集十七册。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对袁世凯一生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1988年由天元出版社出版的韩天著《袁世凯评传》，翌年由国际书局出版的霍必烈著《袁世凯传》和天义出版公司出版的杜英穆著《吴三

^① 上述研究成果中包含少量大陆学者撰写的、由台湾出版界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以及大陆1949年以前出版、后由台湾重新影印的部分。

桂 袁世凯 张宗昌》合传，1997年由克宁出版社出版的谢本书（大陆学者）著《总统皇帝袁世凯》，以及1998年由立绪文化公司出版的侯宜杰（大陆学者）著《百年家族：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翻云覆雨的政治人物》。对袁世凯进行阶段性的研究的专著有：1954年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袁世凯窃国记》，1964年由文星出版社出版的刘凤翰著《袁世凯与戊戌变法》，1970年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1977年由池在运撰写并印行的《袁世凯与中日甲午战争》，199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仁元（大陆学者）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1995年由普金文化公司出版的陈鑫波等著《前所未闻的民国趣事——袁世凯与皖系军阀》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台湾影印出版的大陆1949年以前出版的对袁氏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黄毅《袁氏盗国记》，佚名《袁世凯全传》，袁克文《洹上私乘记》；影印出版阶段性研究成果有：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云南政报》辑印《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等。

在出版对袁世凯一生综合性和阶段性研究专著的同时，台湾学术界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对其一生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章君谷《袁世凯的枭雄面目》（《联合时报》1970年6月26日），耕农《谈袁世凯》（上、中、下）（《新中国评论》1956年第11卷第2—4期），左舜生《民国叛徒》（1—3）（《民主潮》1964年第14卷第10、11、13期），王成圣《风云际会袁世凯》（《中外杂志》1975年第18卷第6期），美国焯《袁世凯》（《传记文学》1976年第29卷第2期），袁世凯的女儿袁淑祯《我的父亲袁世凯》（《大成》1984年第126期）和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外杂志》1990年第47卷第4—6期、第48卷第1期）。收入台湾各种学术论文集中的有：林怀卿《袁世凯》（《中国风云人物》第30页），杨格《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中国

现代史论集》第4辑，第71页），吴相湘《“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民国百人传》第3册，第327页）等。

阶段性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陆权《武昌起义前后的袁世凯》（《联合报》1961年10月10日），陆啸剑《袁世凯与戊戌变法》（《文星》1963年第12卷第3、4期），田布衣《袁世凯称帝始末》（《春秋》1966年第4卷第1期），张玉法《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抗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5期），刘路生（大陆学者）《袁世凯在朝鲜》（《韩国学报》1992年第11期），刘凤翰《袁世凯获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经过》（《近代中国》1991年第86期）等。

仅从上列部分专著的书名及论文的篇名用词看，如“袁氏窃国”、“一代枭雄”、“中国近代史上翻云覆雨的政治人物”、“民国叛徒”、“现代化的保守人物”等，不难发现台湾的学术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除此以外，台湾学界还在著作和论文中用了“空言欺世官僚嘴脸”、“不择手段迅速转向”、“假版《顺天时报》穿梆”等小标题，^①具体地论证袁氏一生所作所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章君谷著《袁世凯传——一代枭雄》，全传用了八十六个类似的小标题，写了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他一生关键最重大的一段时期”，颇具说服力。

台湾学术界对袁氏一生评价的文字，并非一刀切。笔者发现也有文章写了袁氏一生中还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代表作有刘凤翰的《清末袁世凯治兵之道——现代军事传承与创新》（《近代中国》1995年第103期），独孤白的《袁世凯的一件功绩：文官保障法案》（《春秋》1997年第27期），以及“驻戍朝鲜严整军纪”、“山东剿匪保境安民”等^②。这些与大陆学者对袁氏的评价是相近的。

^{①②} 参见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外杂志》1990年第46卷第1—2期。

有的文章在袁氏获取大总统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上提出了与岛内大多数学者截然不同的看法。台湾《传记文学》1996年第68卷第3期上发表的唐德刚的《袁世凯史传再发掘——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一文，曾这样写道：“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的‘法统’（Legitimacy）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作者不认为袁世凯是在各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笔者翻阅台湾学者的大部分论文，结果未发现有人持此看法。由此可见，唐德刚的上述看法仅一家之言而已。

二、袁世凯的人际关系研究

袁世凯从光绪年间加入庆军从征朝鲜，历经训练新建陆军、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要历史时期，在其一生与近代史上诸多著名人物，包括国外来华大臣和使节有过交往。台湾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已出版发表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其中有关袁世凯与满清贵族关系研究的文章有：龙宝麟的《慈禧 袁世凯 康有为》（《中外杂志》1969年第5卷第6期），林熙《袁世凯给端方的一封信——瞿鸿禨与丁未政潮》（《大成》杂志1988年第174期），庄练《袁世凯与庆亲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75页），《荣禄与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集》第3册），《醇亲王与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集》第10册，第839页）等。其次，袁世凯与清朝官吏关系研究的文章有：宋希尚《张謇与袁世凯》（《畅流》1963年第37卷第5期），陈亨德《岑春煊与袁世凯半世恩怨》（《春秋》1967年第6卷第5期），笱园《岑春煊与袁世凯》

(《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5册,第163页)。再次,与革命阵营人物关系研究的专著有:1993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国父研究会编印《国父与袁世凯》;代表性文章有:林斌《袁世凯与汪精卫的因缘》(《畅流》1969年第39卷第9期),刘震岚《黎元洪 袁世凯谋杀张振武的内幕》(《历史》月刊1995年第52期)等。袁世凯与名士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章有:姚渔湘《章炳麟与袁世凯》(《台湾新生报》1956年10月22日),陈兰荪《袁世凯与康有为》(《畅流》1968年第38卷第3期),阮玉成《王云五与袁世凯》(《传记文学》1999年第74卷第5期)等。袁世凯与外国大臣及使节关系的研究文章有:姚崧龄《芮恩施所认识的袁世凯》(《传记文学》1970年第7卷第1期),唐德刚的《记一次失足的帝王梦——兼为古德诺教授喊冤》(《传记文学》1998年第73卷第5期)和《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袁世凯传记资料》第2册,第538页)等。

从上述台湾有关研究袁世凯的人际关系取得的成果分析,笔者以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一步步高升,最后做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乃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过一把皇帝瘾,除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外,似与他所接触的四个方面的人物不无关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袁世凯提供了达到要想实现的目标所必备的条件。如他与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劻、醇亲王奕譞、端方、荣禄等一批当时掌握清朝实权的人交往,目的是千方百计取得他们的信任,以获取更大权力。他与已经取得清政府信任的官员岑春煊、张謇、张之洞等人接触,目的是取得他们支持;他与孙中山、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的往来,目的是想通过他们赢得更多的票数,最后取而代之;他与文人墨客康有为、王云五等的交往,则是利用他们为自己的政绩及主张制造舆论。我们从在华顾问芮恩施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回忆,即不难看出袁世凯给芮恩施的印象是很糟糕的。用芮恩施自己的话说:“我第一次见此(指袁世凯),

只注意他的外貌，已深深感到他的横强与毅力。他是民主其表，独裁其里”，“袁氏处处在为本人打算，尽量想法造成独裁局面”。“他确系只老虎”，“袁氏并未深得民心”。“他之所以能取得权势，由于他能忍耐期待，有相当知人之明和了解政治内幕，尤能不择手段，巧于趋避。这便是他的成功要诀。至于如何治理民主国家，固一无所知”。这就是外国人对袁世凯所作的评价。但所有这些交往与接触，归结到一点，就是以谋取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此，他曾不择手段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以换取满清贵族的信任。他表面上从不向孙中山提任何要求，百依百顺，使孙中山错误地认为袁世凯的一切并不如传言那样恶劣，孙中山甚至拟吸收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且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与张謇有一份“师徒关系”，开始对张謇较为“畏惮”，^①但一旦他大权在握，就不是那回事了。台湾学术界曾专门有人以《袁世凯对张季直三易称呼》予以证实。文章这样写道：“袁世凯在朝鲜吴长庆幕府时，曾奉吴命，师事张謇。袁时时以文呈张，张督之严，然颇奇其才，时袁称张为‘季直师’，或‘张老夫子’。不久，袁为大总统，函电均罢除师号，改称‘季直先生’或‘张老先生’。筹安会起，袁任张为农商总长，张虽辞而未就，然袁又改了称呼，以‘季直兄’代替‘季直先生’，居然降师为友。”^②他与文人墨客的关联在于在关键时刻不要唱反调，但其结果却事与愿违，正如有的文章所说：“筹安议起，袁决议称帝，以湘绮（即王闿运）为国老，恐持疑议，乃嘱杨度致书微示以意，湘绮实不赞同，于复杨函中有‘总统为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之语。”^③这说明文人墨客中并非全都

① 参见《张季子叹惜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第3册，第284页。

② 参见《袁世凯传记资料》第3册，第285页。

③ 参见蓝文《王壬秋与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第3册，第237页。

会依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他们中确有一部分人在与袁世凯的交往中表现得毫无主张，一味顺从袁世凯的旨意，袁世凯对这样的人则大加赞赏，其用意则不言而喻。

三、袁氏亲属及其弟子的研究

台湾学术界对于袁世凯亲属及其弟子的研究，包括其子女对其父亲的回忆，在数量上不如前两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版过两部专著，发表过十五篇文章。两部专著为1913年印行、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出版的沈祖宪等著《容庵弟子记》^①，1926年大东书局出版、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出版的袁克文著《洹上私乘记》。文章中所发表的第一篇代表作系署名“退役记者”的《袁世凯三父子》（《公论报》1956年11月18日），另外一些代表性的文章有：袁淑祯《我的父亲袁世凯》（《传记文学》1967年第10卷第3期、《大成》1984年第126期），沈云龙《袁世凯的妻妾子女》，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外杂志》1990年第47卷第4—6期、第48卷第1期），《袁克定克文兄弟》（《袁世凯传记资料》第6册，第456页），《袁克文为父伸冤》（《袁世凯传记资料》第6册，第459页），袁淑祯《我的父亲袁世凯死后》（《袁世凯传记资料》第17册，第1页），以及张守初的《袁世凯子孙的异行》（《中外杂志》××××年第32卷第2期）等。

上述出版和发表的著述，归纳起来涉及三个部分：第一，对袁氏父子三，即袁世凯与袁克定和袁克文，以及其妻妾的研究；第二，袁世凯的几个子女对其父的回忆与“伸冤”；第三，对袁世凯弟子及徒弟的研究。

^① 参见《袁世凯传记资料》第4册，第293页。

关于第一个部分，台湾学术界发表过一篇专文《袁氏三父子》，因资料短缺，笔者无法知道文章的详细内容，但我们可从《袁世凯术医》一文中获悉，袁世凯为了医治长子袁克定的“跛脚”，“为他一共医去了二十多万元”，终使儿子因“跛脚”而引发的“腰受伤，手脚不能动弹”得以转危为安，尽管命保住了，却变成了终身残废。还有人在类似的文章写道：“袁称帝前，就有人把袁克定称为曹丕，袁克文称为曹植。因为克文诗酒风流，自比曹植。有一次兄弟两人口角，袁克文说，‘你要作曹丕，难道不许我作曹植？’这件事传到了袁世凯那里，他把儿子痛骂了一顿，并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怪不得外面有人骂我是曹操，你们自己竟比做曹丕和曹植，这真是荒唐极了。’”^①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的三个儿子的评价是：老大虽已残疾，又先天有口吃，对内他“很能守袁家私法”，“颇能保持长兄的尊严，所以三十一个兄弟和妹妹，对他都非常敬礼”。对外却以储君自居，对北洋旧人竟不假以颜色，甚至对段祺瑞、冯国璋都不理睬。因此有人著文说：他有“曹丕之志，却无曹丕之能，也无曹丕之命”。对老二袁克文的评价是：“虽以名士自居”，“才华横溢”，却不赞同袁世凯做皇帝。据张守初发表的《袁世凯子孙的异行》一文披露，当初曾任袁世凯时期总统府大总管的袁世凯的侄儿袁乃宽，由于思想开明，反对帝制更激烈，并趁机在新华宫投下一枚炸弹，虽未炸死叔祖，但给予图谋帝制者以强烈警告。事后他逃亡上海，改名袁不同，以表示他与袁氏子孙的不同。对老三克良的评价，说他是一个“不识时务”者。^②

① 参见《袁克定袁克文兄弟》，《袁世凯传记资料》第6册，第456页。

② 参见丁中仁：《袁克定袁克文兄弟——北洋军阀史话补遗》，《春秋》1995年第22卷第3期。

除此之外，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的妻妾子女的研究，最有价值的文章是沈云龙撰写的《袁世凯的妻妾子女》一文，作者经过详尽对比考证，认为袁克文编著的《洹上私乘记》中对袁世凯妻妾子女问题所提供的数字是“正确”的，即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十七子，十五女。“以上所述不仅补正若干有关袁氏妻妾子女记载的阙失，并且澄清了不少错误的传说，纵然有不免‘阿私’或‘为亲者讳’之处，究竟是较为可信的直接史料。”^①

有关第二个部分，袁氏后裔对其父的回忆，影印出版过一本袁克文的《洹上私乘记》，内有“先嫡母传”、“家慈母传”、“先生母传”、“诸庶母传”、“大兄传”、“诸弟传”、“诸妹传”以及“自述”。这是迄今为止，袁氏后代对其父及有关的家庭成员所作的最详尽最权威最可靠的记述。其次是前面提到的袁世凯之三女儿袁淑桢（后改名静雪）撰写的三篇文章。她在为什么要写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时，这样写道：“我的父亲袁世凯，生平事迹已有许多书刊记述，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家庭以及他在家中的一些活动，外人或者不易弄清。我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应该在这方面提供情况，以便让世人更全面地认识他。”在她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到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的所谓‘保境安民’”，还有“一妻九妾卅二儿女”，并分析了袁世凯“荒唐生活从他的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她在文章中披露的一些史实，对学术界进一步拓展对袁世凯的研究是有帮助的。但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即袁世凯死后，“只在他的笔筒里找出二十元，因此他的后事都是他的徒弟们拿出钱来办的”。笔者注意到，此说与作者本人1984年8月18日在《联合副刊》上发表的《我的父亲袁世

^① 参见《传记文学》1967年第10卷第3期。

凯死后》一文中的“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以后不久就分了家。大哥袁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四十万（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二十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的股票）在内”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台湾学术界在出版发表袁氏子女的回亿、专著及文章的同时，还对其子袁克文在《洵上私乘记》一书中，对袁世凯命赵秉钧唆使应夔丞、武士英等谋杀宋教仁一案的杀宋之罪，完全归之于赵秉钧的说法，曾发表专文，予以驳斥。指出，“赵秉钧应负此案之重责，乃是当然。而袁项城实亦不能置身于事外，当时论者，皆已明白指出。”此案“早成定狱，实无可疑”。^①

如笔者在前所述，台湾学术界有关对袁世凯亲属及其弟子的研究的成果，则不如前两个问题的另一理由，涉及小站练兵及北洋时期的弟子计七千余人，但已做了研究的人物只有：王成圣的《北洋首要零简——袁世凯徐世昌手札》（《中外杂志》1977年第21卷第3期），黄远庸的《袁总统之徒弟》（《远生遗著》下册，第51页），郑毓秀的《我的革命生涯（七）——行刺袁世凯和良弼的经过》（《春秋》1968年第7卷第4期），游梅原的《徐世昌代表袁乞和谋僭总统护国军拒之》（《袁世凯传记资料》第12册，第256页），王知励的《梁士诒与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第12册，第293页），杨松客的《梁士诒与洪宪帝制》（《读史杂记》1975年第3期）。影印出版的专著涉及的人物寥寥无几，被称之为“北洋四杰”中仅徐世昌一人，台湾学术界有一两篇研究成果，余者王士珍、段祺瑞、张镇芳三人，除《容庵弟子记》中有所记述外，均未进行过个案研究。这说明，台湾

^① 参见《袁世凯传记资料》第6册，第459页。

的学术界对于这一专题的研究，不如对袁氏父子及其子女与袁世凯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多，相反，大陆的学术界对容庵弟子的研究要比台湾好得多。

四、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台湾学术界历来十分注重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对袁世凯的研究也不例外。据不完全统计，已整理影印出版的《袁世凯史料丛刊》有：张镇芳重修的三十三卷《项城县志》，丁振铎编辑的六十五卷《项城袁氏家集》，沈祖宪辑录的五册《养寿园电稿》，袁世凯辑的八卷《新建陆军兵略录存》，段祺瑞等纂校的二十册《训练操法详晰图解》，沈祖宪辑录、袁克桓校刊的四十四卷《北洋公牍类纂续编》，沈祖宪、吴闿生编纂的四卷《容庵弟子记》，袁克文撰的七卷《洹上私乘记》，刘成禺著的二卷《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等 1—11 辑。上述史料丛刊，大部分系民国时期出版物，后由台湾学术界重新整理、由文海出版社出版。其中被影印出版时间最早的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九月排印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其次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出版的《北洋公牍类纂》。主编沈云龙在编纂这套丛刊时曾这样写道：“项城袁世凯（慰廷）为清末民初政坛关键人物，其历史功罪，早有定评。而中外学人之治现代中国史者，对袁氏生平得失之研究，仍极感兴趣。惟坊间出版有关袁氏之资料，往往以民国部分为多，而清末部分，则以屡经战乱，公私藏书散佚者甚多，每苦搜集困难。本社有鉴于此，爰就袁氏乡里方志，先德文集；及其驻韩时期之电稿；小站练兵时期之兵略、操典；出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期之奏议公牍；与夫叙述其个人及家庭之传记；暨洪宪称帝时之纪事诗等，特请沈云龙教授先行选择十一种，俾供学人系统研究，并设法从

美、日各著名图书馆觅得原本、摄制微卷，重新影印。以后搜集如有所获，当再陆续补刊。”^①文海出版社在这篇“编印缘在”中，对编纂这套史料丛刊的目的、意图、指导思想，以及包含的内容，都一一说得十分明确，省了笔者赘述。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就资料价值而言，其中不乏有“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的宝中之宝。如《养寿园电稿》等，该电稿系从海外摄制微型胶卷后再影印的，填补了大陆有关袁氏史料之空缺。

台湾学术界在出版上述汇刊不久，随后又遵循原编纂宗旨，出版了《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内有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牒汇编》，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乱始末记》，黄毅编《袁氏盗国记》，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梁启超著《盾鼻集》，庾恩眙著《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佚名著《袁世凯全传》、《袁世凯轶事》，政事堂印铸局的八册《洪宪公报》（即《政府公报》），黄远庸著的《远生遗著》，张维翰辑的《民初文献一束》，阮忠枢等辑《居仁日览》等12—22辑。

如果说“续篇”与前十一辑有什么不同的话，“续编”的内容宽泛了许多，并增加数部专著。这就使得整个史料丛刊更趋于完臻，既有“清末部分”，又有“民国部分”，既有“汇编”，又有“全传”、“轶事”。这是台湾学术界在袁世凯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的突出贡献，功德无量。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大陆已出版的有关袁世凯史料集。这套史料汇刊不仅为台湾学界，且为大陆学者研究袁世凯带来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台湾学界的上述做法，亦为大陆学界提供了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即要把历史人物的研究深入下去，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从整理资料入手。不占有翔实的资料，历史人物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是很难的。

① 张镇芳重修：《项城县志》（一），台湾文海出版社。

五、有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五十余年来，台湾学术界在袁世凯研究及其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赢得大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然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以为，尚有如下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讨：

第一，台湾学术界至今没有写出一本令两岸学者都认可的权威性的研究袁世凯一生的大传。像袁世凯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如此影响的人物，称他为“枭雄”也好、“窃国大盗”也罢，他毕竟有过那么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要写的东西，尤其值得研究和总结的问题不少。何况有那么多已整理出版的丰富资料。

第二，就袁世凯的人际关系而言，由于其所处地位，经历了满清统治及中华民国两个历史时期，所接触的中外军政要人又如此之多，但从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看，要研究袁世凯与他人之关系，包括他与袁世凯的关系，以及袁世凯与其亲属间的关系，都有待花大力气逐一进行个案研究，才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比如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袁世凯家书》，此书作为该所《史料丛刊》中的一种。其所收家书八十三件，其中《致诚弟有关家务琐事》、《致诚斋有关人事请托事》就有六十三件^①，余者为《致启弟有关裁军暨人事出缺事》等。但查阅有关台湾已有研究成果，找不到一篇与这两人有关的文章。前面提到的“袁世凯与北洋四杰”中，仅有一篇《北洋首要零简——袁世凯与徐世昌手札》，还不是专门的论文。袁世凯在借北洋兵力取得大总统之位后，北洋军阀把握各省民政军政大权者，计有：

^① 《袁世凯家书》，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31、190、181页。

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朱端、李纯、赵倜、陈宦、王占元、阎锡山、汤芑铭、陆建章、孟恩远、张作霖、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錕、王揖唐等数十人。^①其中虽有几个人与袁世凯没有什么香火缘，但其凭借出身的阶梯，仍属北洋系。但上述这批北洋人物中，至今很少有人将他们与袁世凯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由此看来，在袁世凯的人际关系方面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很多。

第三，关于袁世凯军事思想方面的研究，在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中，寥若晨星。已出版专著有：万仁元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陈鑫波等著《前所未闻的民国趣事——袁世凯与皖系军阀》（台湾普金文公司1995年版）；文章有：张玉法《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抗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5期），刘凤翰《清末袁世凯的治兵之道——现代军事传承与创新》（《近代中国》1995年第103期）。在所能见的这么几篇文章中，却没有一篇有关他的军事思想、小站练兵、战略战术、排兵布阵等方面的研究。

第四，台湾学术界尽管在史料整理与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但并非有关袁世凯的资料已全部挖掘殆尽。如台湾一贯倡导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却没有一本与袁世凯有关。再者，袁世凯除上述八十三件《家书》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家书可言？还有1949年以前有一千三百余种报纸，近二万种期刊，除了已整理出版的《政府公报》（即《洪宪公报》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8种）外，其他报刊中有关袁世凯资料尚待进一步开发与整理。更何况还有一百三十余种外文报刊中关于袁世凯的报道评述等资料，尤应重点加以整理与出版，以便两岸学者进一步了解外国舆论界在各个时期对袁

^① 参见《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袁世凯传记资料》第2册，第6页。

世凯的不同看法与评价。

综观上述台湾学术界五十余年来有关袁世凯的研究现状，以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无论在对袁世凯一生的研究、阶段性的研究，以及袁氏的人际关系、亲属回忆、弟子研究，还是资料整理与出版等，都使人感到振奋与鼓舞。但与此同时，笔者仍深深地感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有待开发整理的资料还亟待挖掘。总之，要把袁世凯研究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研究水准，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还需花费很大的气力和更多的时间。我们期待着台湾学术界在这方面能再创辉煌。

袁世凯与袁林

史军红

(安阳市博物馆)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创新军、当总统、做皇帝，一生大起大落，在他的一生中，安阳与他有着不解之缘。

1906年，袁世凯曾组织举行了著名的彰德（安阳）会操，调动南北方新军三四万在彰德、汤阴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09年被清政府罢官后，他选择安阳洹上村隐居。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重新出山，从这里到武昌前线督师。1916年因称帝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羞愤而死，死后又葬在安阳。袁世凯与安阳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如今，洹上村已荡然无存，其墓地及其建筑——袁林却保存完好。

一、袁林及其建筑风格

袁林，全称“袁公林”，位于安阳洹上村东北隅的太平庄，其地南临洹水，仿美国总统格兰特濒河庐墓的形式，修成袁林揽胜之区，陵墓的西北和东北有寿安山与韩陵山遥相对峙，两间原衍形如孔道，成为袁氏堪輿风向的天然冲要。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遵照他“扶柩回籍，葬我洹上”的遗愿，为他精心选择了葬穴。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负责督修茔墓，当即派人来安“慎选堪輿，勘定吉壤，

绘具详图，招商筑墓”。两年之后，一座工程浩大的莹宅森森然出现在洹水河畔。这座陵墓按照明清皇陵的格局，采用中西合集的构筑手法，以我国古典传统形制为体、西洋建筑风貌为用，蔚为古今并组风格殊异的陵地建筑。这组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文化的象征，是我国陵墓建筑的一个创例。

袁林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共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耗银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其中北洋政府出银五十万元，其余部分由同胞捐款，《袁公林墓工报告》曾记载：“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币奇绌难在请求爰兴，段君祺瑞、王君世珍、段君芝贵、张君镇芳、雷君震春、袁君乃宽、阮君忠枢公统筹议，发起微资萃袍泽卅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建成后的袁林敞宏阔大，主要建筑分布在南北神道中轴线上，绵亘长达千余米。

袁林的最南端建筑照壁墙，是袁林标志性建筑之一，硬山顶，绿琉璃瓦。主墙、翼墙连砌，全长60余米。须弥基座，墙面海墁方砖，大墙与左右翼墙正中均嵌以砖雕墓徽黼黻图案，两侧辅嵌对称五福拱寿砖雕图案。它是目前所知我国最大的一座砖雕照壁。沿神道北上越糙石桥、石拱桥便可看到牌楼门，牌楼门原带余塞板栅栏五槽又名“五槽门”。六根方柱拔地而起，柱间由上下额枋联结，构成牌楼的坚实骨架。五间琉璃瓦顶的门楼镶架在额枋之上，由彩绘木斗拱托，楼颠柱顶盘踞六个望天吼，阔口仰面，为这座建筑增添了威慑镇持之力。留意的人会发现，这座建筑的柱枋构架原来并非石质基干，而完全是“铁筋洋灰石子”版筑成制，就连同枋间的雕花、柱顶的望天吼也是用水泥琢成的。这在当时来说，实为罕见。牌楼门过后是袁林石像生，它们位于神道两侧遥遥相对，依次为望柱、石马、石虎、石狮、文武翁仲。线条简练，仪态丰满。其中最为奇异，并能透漏袁林

特色端倪的莫过于文武翁仲形态的绝妙表白，它们的装束：文臣头顶平天冠，体着祭天袍，拱手默然；武爵头戴纓掸帽，身穿将军服，抚刀肃立，酷似袁世凯当年得势时礼仪风貌，如果说它们的形象代表着某一种礼制，那么打开历史，我们只有从袁世凯时代才能发现这样的产物。

石像生之后，大丹陛中央建有歇山单檐四角碑亭一座，红墙碧瓦，四门间通。蹀躞进入碑亭，巨大的石雕贝屨之上耸立着5米多高的墓碑，上写“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端楷九字，为袁世凯好友徐世昌所书。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做过清朝的太傅，当过袁世凯的“顾命大臣”，又曾出任过三年多的大总统，一生浮游宦海，多谋深算，为清廷和袁世凯多所借重。徐世昌为袁世凯写了墓碑之后，又于工程落成的当年以大总统身份亲临袁林查勘，并指示在京汉铁路洹上村车站左近添建了一座神道碑，以示过往敬仰。然而，这座碑碣并未传诸多久，就为北伐洪流所荡涤了。1926年冯玉祥再主豫政，连同袁世凯在洹上村的住宅也充作公产，在原址设立了彰德高级中学，并把袁氏在安阳的田产拨为建校的基金。

绕过碑亭，穿堂院大门可达飨堂。飨堂和东西配房组成三合状，是袁林的主要构成部分。飨堂居中，明间门楣上方悬有“景仁堂”牌额。殿内面阔七间，富丽堂皇，是祭祀袁世凯的地方。明间桌上原置有景泰蓝祭器，两旁陈放袁世凯生前的衣冠剑带。东西配房存储祭器什物，兼作致祭者休息之所。袁世凯的葬身之所在飨堂之后，经大铁门、五供石桌即达袁世凯墓庐。墓台前耸立有三座大铁门，是袁林建筑群中西洋建筑的突出代表。它中大两小，以浑铁铸成，穿围在西洋柱廊式的白石双柱之间，正中双扇铁门的上端各装有徽章图形的八角墓徽，墓徽中央饰以中国传统的帝王十二章，正中大门在左右两侧小门的拱卫下，显得刚健挺拔，雍容庄重。袁世凯的墓庐作圆形，由三

层台阶拥起，宝顶封护土草皮，远远望去，派头十足。整个墓区原有藜寨围护，寨外辟渠注水环绕周遭，寨内松柏梅槐浓阴蔽日，在当年平旷的洹上一带，确是一处景致福地。

据记载，袁林是先建墓室将袁世凯安葬后再建飨堂及其他设施的。袁世凯墓冢营建起初，北洋政府原拟采用钢筋混凝土版筑之法，预构穹室，再修隧道、石门、石墙，略计约三个月的时间方能告竣，由于当时袁氏家人慑于时局动荡，一致主张死者“入土为安”，这才在原来勘定的墓址上先修了一座砖矿，然后择定当年旧历八月二十四日将袁世凯安葬，因为葬期所限致使原来拟定的构筑方案来不及完成，发丧之日，来洹上会葬的袁氏部属们，认为墓室砖质庠薄，不能垂诸久远，乃又由徐世昌首议，会同政府大员决定，仍旧在砖矿的外围加筑了一层钢筋混凝土套墙，并为袁世凯的夫人于氏预留了祔葬墓穴。

袁世凯埋葬以后，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处”秉承北洋政府的旨意，继续磋商墓地大工，特地令人依照大行皇帝陵寝的规制，绘具图册，在北京招标投标，计领标者十七家，最后选定由兴隆木厂实施墓地的全部工程。工程物料由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南阳等地采购，并且必须由工程处核准之后方能转运。据当年为袁世凯筑墓的老人回忆，筑袁世凯墓，征用了洹上村附近几十个村庄的大批民工。袁林建成后，内务部专门成立“袁林董理社”，派专人主持和管理袁林的各项事务。还拟定了每年的祀典祭祀及守护规则。典置十顷祭田，祭田的收入用来充作管理墓地事宜的日常经费。1948年，刘邓大军挥师南下，国民党军队为了阻击，固守安阳，将袁林的大片林木砍伐殆尽，用以构筑工事，“袁林董理社”也早已名存实亡，珍奇异宝被盗劫一空。1949年后，袁世凯墓作为历史的遗迹，受到保护，政府对遭受战争和“文革”破坏的建筑进行了修缮，维持了它的本来面貌。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袁林，指示将这座陵墓留给后人

做反面教材。而后，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博物馆，由文物部门进行就地管理。

袁林是我国民国初期官式建筑的重要代表，是我国唯一的一座中西合璧的帝陵式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现在的袁林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安阳市政府加大了对袁林原貌恢复的投资，袁林规模、设施日趋完备，是安阳对外开放的重要旅游景区之一。

二、袁世凯为何在安阳建造坟茔

凡是到过袁林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为什么要把墓选在安阳？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袁世凯做过总统、当过皇帝，这么大的派势，随葬祖茔有损身价，应当另外立祖。

在袁世凯看来安阳原本就是自己的远祖袁术、袁绍的发祥地。袁世凯自认为是袁绍、袁术之后，此居洹上，回到祖先创业宝地，可以托庇荫泽，效法前世谋兴大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期，袁绍、袁术初据河北屯兵举业，乃至后来胜极一时，正是由这一带发达起来的。因此，选择此地作为坟茔之地既合情又合理。他在未解职之前，就差人在洹上村选购了一座别墅，并且作为永久住宅加以扩充改建，题名“养寿园”，袁世凯罢黜之后，复被起用，他的眷属仍旧大多留居洹上，主要原因就是要维护这块发祥宝地。因此他精心选择这么一个地方驻节，应该说是有着他的韬略寄意的。他曾派人把洹上村“养寿园”的景致拍照成册，亲题跋语，时作观览，足见袁世凯对它的留恋。因此，袁世凯在临终前留下了“扶柩回籍，葬我洹上”的遗愿。

(2) 安阳是他一生隐退出山的韬略要所，他的政治生命正是由这

里得到转机，才重新有了出头之日的，所以袁世凯生前一直对安阳怀有特殊的情感。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即光绪皇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病死。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发布谕旨，解除袁世凯所任各职，令其回籍养病。袁世凯按旨意应返回项城原籍，但袁世凯深知载沣虽然放逐了他，对他仍不会放心，如果回到偏僻的项城，天高皇帝远，很可能还会遭到载沣更复杂的猜疑。所以他故意表示坦白，落脚在安阳洹上村这个紧临京汉铁路、距朝廷不远、众目昭彰的地方，好使清廷相信他确已复命，没有别的后路。袁世凯隐居安阳，坐在这个北京的大门口，窥视清廷，择机而动。后借助辛亥革命爆发的时机重新发迹，从此走向了政治的顶峰。

（3）安阳的交通战略位置比较重要（位于京广线交通要道），袁林又是一块绝好的风水宝地。

安阳是北京的南大门，是豫北重镇，紧临京汉铁路，交通发达，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袁林南临洹水，北靠韩陵山和寿安山，在此建造坟茔可谓头枕山脚蹬水，风水极佳，作为帝王坟茔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4）由于家事原因。

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是项城县著名的地主豪绅，他曾经捐过一个同知，却没有外出做官，一直在家里经营家业。他有子女八人，除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是原夫人所生外，其他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皆系庶出，袁世凯排行第四，七岁时又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为嗣子。

袁世凯做山东巡抚的时候，他的母亲刘氏因病死在济南，他要求开缺回籍，葬母守制。时值义和团事起，形势严峻，西太后要他移孝作忠，给假百日，在巡抚衙门内守制，而不准他回籍葬母。其母亲遗

体久久得不到安葬，直到袁世凯又做了直隶总督、稳定了京津的形势后，清廷才批准他回籍葬母。

位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奉旨回籍葬母，应该是河南地方的一件大事，河南巡抚以下各级官员早早做好了准备，没有想到其家庭内部出现阻力。当时袁世昌早已过世，次兄袁世敦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父亲袁保中合葬，只准附葬在坟所的地角。这本来是符合那个时代的丧葬礼仪的，可是袁世凯认为自己身居总督高位，这样做未免太屈尊荣了，所以执意不从，双方争执了很久。经过亲戚族人说合，最后袁世凯甚至跪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所以他只得又另外采了莹宅。出殡的时候，附近各县县长纷纷前来袁家当差执仪，丧事非常浩大。据说袁世凯为了当众不失体面，竟别出心裁坐上棺头，以朝廷命官总督大人的身份，把自己生母的灵柩带出了袁宅正门。当然，袁世凯这样做也没有能够保全自己的多大体面，相反，如此一来，他的庶出底细却更加昭明于世了。这对于位居显位的袁世凯来说，简直已经“辱没”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此，袁世凯和异母兄长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绝交，从此不再来往。也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袁世凯定居安阳洹上村，就永远没有再回过项城老家。

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 不能成立

刘路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关于戊戌政变以及袁世凯告密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挖掘资料，考释论证，弄清楚了许多过去不甚了了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有袁世凯是否于八月初四日（为叙述方便，下文一般径用阴历，不再换为阳历）告密，存在较大分歧。现仅就与之相关问题为文，请教方家同仁。

初四日袁世凯确无告密之举

政变发生于初六日上午，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从慈禧太后一方来观察。初四日之前，杨崇伊已上奏请训政折，倘若初四日有袁世凯在北京告密之事，按照当时的局势和慈禧太后的性格，政变决不会迟至两天以后的初六日才发生，政变的名目亦决不仅只是康有为“莠言乱政”，并仅表现为逮捕康氏兄弟。而初四日在天津告密，则无任何可能，可以存而不论。

据茅海建先生对清宫档案的研究与排比，初三日，慈禧太后已定下初四日由颐和园还西苑，且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没有关系。初四日凌晨寅初（早晨3时）慈禧太后此行所用的车马已在颐和园宫门外准

备完毕，她本人在“乐寿堂早膳毕”，起程还西苑。途中频繁换轿换船，过寺院烧香游息，于一片悠闲之中，申刻（下午3—5时）才到西苑。光绪帝在得到庆王奕劻报告的消息后，依例在瀛秀园门外跪接，仪制一切没有出错，慈禧太后未现焦躁和不安，态度没有异样。也就是说，一切均在按常规运行，没有告密后果的迹象^①。

从袁世凯一方考察。因为有徐世昌受袁世凯之托，先他进京，并一直同维新党人来往联络，参与他们的某些活动，袁世凯对维新党人的动态与状况，是有所了解的。初三日，谭嗣同的法华寺夜访，不论是徐世昌同来，还是徐世昌先回到法华寺通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谭、袁之晤谈，徐世昌是全程在场的。谭嗣同离去后，他们一定彻夜未眠，对事态的发展进行分析，且取得了共识。袁、徐应该有能力判断出，围园劫后之谋，是维新党人的政治孤注。他们应该知道，光绪帝或有摆脱慈禧太后控制之心，但决无围园劫后的杀伐决断之胆。谭嗣同出示的是墨笔密谕，他们由此可以推想，光绪帝甚至根本不知道维新党人有此密谋。他们不能不进行基本力量对比的估量而决定去取。袁世凯拒绝谭嗣同的游说，清楚表明了他不同维新党人站在一起的立场。康、梁等维新党人当夜在金鼎庙会到访袁而归的谭嗣同后，也立即明白袁世凯无举兵配合他们围园劫后之意^②，所以，康有为连行李都未带，“于天未明出京”，而令弟弟康广仁“带行李，迟日乃出”^③。他非常清楚，只有匆忙如此，才可躲过杀身之祸。

① 参见茅海建：《戊戌政法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之（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35—164页。

② 参见袁世凯：《戊戌纪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毕永年：《诡谋直记》等的记述。

③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袁世凯不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就意味着必定要向后党告密。这在当时，无论是从政治层面或是道德层面考虑，都是唯一的途径。没有第三条道路。替维新党人秘而不宣是不可能的。

但是，袁世凯亦无初四日天明即匆匆忙忙赶着告密的必要与条件。围园劫后之谋，确是惊天大事，但袁世凯心中清楚，只要他本人按兵不动，谭嗣同所说来京的湖南死士，即使来京亦无多大作为。慈禧太后就有惊无险。

有学者提出，袁世凯应该担心维新派利用聂士成、董福祥的兵力，实施他们的围园劫后计划。其实，当时的袁世凯根本不会顾虑此事。姑且不说袁世凯对驻军布局了如指掌，对聂士成、董福祥的政治取向亦非常清楚，只说布置军队长途奔袭，也不是今天说，明天就可以办得到的事。所以，袁世凯拖延一天告密，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担心的。袁世凯的经历表明，他十分功利而善于谋划，以其处事的原则，一贯谋定而后动。更何况，兹事体大，直接危及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乃至性命，决不会急于莽撞地告密。

谭嗣同是打着光绪帝之诏谕说袁起兵图后的，但无朱谕，仅凭空口。即使是为了自身安全，袁世凯自然首先要考虑光绪的真正意图，以计算力量对比、估量事态的发展。袁世凯向光绪请训之日已定于初五日，所以，最佳行动方案也只能是初四日不动声色，乘初五日请训体察光绪帝的心思与动静，哪怕只是察言观色。

当时的北京亦无有袁世凯告密的合适人选与条件。首先，须要辨明的是，袁世凯应召进京，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一日住海淀，准备在颐和园的光绪帝初一日早朝时觐见和初二日谢恩擢升候补侍郎。初二、三、四日住城内法华寺，准备向已移居宫里的光绪帝初五日请训。各方面史料参证，无有舛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所说，袁世凯在海淀与谭嗣同夜谈，可以肯定是误记，没有什么深意可以索解之处。

其次，主张袁世凯初四日到海淀告密的论者所持“若称有紧急事件求见慈禧或后党重臣，他们不会不接见或引见”^①之说，不切实际，亦不符清朝的制度。其时的慈禧太后已经归政光绪帝，她那里唯有皇族“亲贵可以递牌请起”^②。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无资格与可能求见慈禧太后，即使他曾在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亦无可能“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只有奕劻除外，容在后文说明。即使袁世凯不明制度而去恳求后党权臣刚毅等“引见”，他们都住在城内，又何用白费力气再专程返回海淀住下来呢。

第三，袁世凯告密的首要目的是谋求摆脱帝党嫌疑以及同维新党人的干系，摆脱谋叛嫌疑，以求自保。因此，他所选择的告密对象，一是一定要与自己的关系极为亲厚，可以信赖托庇。二是维新党的谋乱涉及皇帝与慈禧太后，接受告密的人必须与慈禧太后有极深厚的关系，有权力、有地位、有能力处理这一极为棘手的问题。三是要合乎清朝制度，在慈禧太后那里有递牌请起的资格。但袁世凯在京师并无此等托靠之人。

袁世凯进京后，谒见过刚毅、王文韶，因为他们是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同他小站练兵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而已，连朋友都谈不上，更遑论托庇。唯有庆王奕劻合于第二、第三个条件。且以后在李鸿章、荣禄死后，袁世凯与奕劻的关系非同一般，此次袁世凯来京亦曾谒见过庆王。所以，研究者们论及袁世凯在京告密的对象，均首推庆王奕劻。但有资料证明，直到两年之后的庚子年间，袁世凯仍不把自己列为与庆王一党，此时庆、袁关系尚不到足以托庇的地步。庚子议款之

① 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第617页“杨崇伊”条。深通清朝制度的邓先生的评论说：“按，太后前，唯亲贵可以递牌请起。近人记荣禄诣颐和园告变，盖不知故事。”

时，有奕劻致西安行在荣禄的信说：

仲华二哥中堂阁下：……此间议款，刻正会商租界、偿款两端。……大纲已定细目，总易商量。惟东三省事关系中外大局，前经两次详细箴达，计邀青览。合肥极盼东约早成，以为他事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各国已有责言。若竟草草画押，必致纷纷效尤。合肥更事之久，谋国之忠，弟夙所钦佩。独中俄定约一事，不免过有成见。即以近日会奏而论，大都于会衔发电后抄稿送阅，弟亦无从置词。其前后电陈不无矛盾，谅在朝廷洞鉴。当此时局岌岌，弟膺兹艰，原不必苟为异同致烦宸廑，惟此事画押与否，关系中国安危，亦何敢随声附和，徇一国而触各国之怒。昨于庚午电奏单衔密陈，惟盼朝廷权衡利害，慎重施行。东约断难遽定，弟惟催促各使早议公约，仍与合肥和衷办理。但恐奉职无状，或此后会衔电奏中，语句稍有未当之处，不妨由执事请旨申饬，庶几知儆惧，不致草率从事，于议款确有裨益。弟虽同受诃谴，所不敢辞。区区愚悃，谅蒙鉴及。专此密布^①。

这封信清楚表明庆、李关系并不十分和谐，迫得奕劻使出苦肉计来。而此时的袁世凯则把自己列为李鸿章的麾下，并不与庆王一党。

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西逃途中，饬令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办理议款，奕劻于八月初四日由宣化府折回京城。此时，李鸿章奉旨北上议和，滞留上海，行程迟缓。袁世凯恐庆王先行与联军议和，乃于八月十五日在济南致电上海的盛宣怀，请李鸿章赶到京师，以防庆王占了先手。电云：“庆邸抵沪说如确，似宜请傅相早往。倘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荣禄存札》。

到在庆邸开议后，似不妥。凯。删。”^①

倘若两年之前，袁世凯就是庆王一党，向庆王托命告密，并因之成为心腹，从而飞黄腾达的话，以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多年老部下，以李鸿章的身份、阅历、政治嗅觉、在朝内外的耳目，恐怕不会不知此事。袁世凯也就不可能再以李鸿章的心腹自居，向李鸿章说这番明显是自家人对付外人的话。倘袁世凯真是这么做，可真是首鼠两端，不但李鸿章所不齿，也为李鸿章的门生故吏所不齿。而观察袁世凯后来和李鸿章北洋一系的人相处，并没有这种迹象。

初四日袁世凯在干什么？我以为，他是在潜心运筹，默计初五日请训时静观光绪帝的言动之后，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如何说词，而能保全自己，并保全光绪帝（在当时的社会和道德伦理环境中，只有保全光绪帝，才能真正保全袁世凯自己）。他在反复衡量和思谋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及得失应对。

只有一天时间，不算很短，但也并不十分充裕。

“徐世昌初四告密说”没有根据

徐世昌是为袁世凯的觐见打前站来京的。徐世昌到京后，同维新党人交往密切，又来往于维新党人与袁世凯之间，参与机要，如跪读光绪密诏，参加初三日晚袁、谭之晤，等等。有鉴于此，以往的论者们往往设想，袁世凯不去告密的话，可由徐世昌去告密。

按常理，这件涉及皇帝、太后和自己命运的大事，袁世凯是会与徐世昌认真商量的，但决不会让身为幕僚的徐世昌出面告密。而且

^① 陈旭麓、顾廷龙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7 页。

《徐世昌日记》、《严修日记》都表明徐世昌已于初四日一大早就离京回津。他在京告密之说失去根据。

据《徐世昌日记》说，徐世昌于初四日返津，这是袁、徐先期预定的^①。这可能是由于只剩下初五日请训这一件事，徐世昌打前站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提前返津了。但由于初三日荣禄以有英兵船进口，电催袁世凯提前返津，及初三日夜谭嗣同访袁两件事的突然发生，徐世昌的返津亦有了新的意义。

谭嗣同离开法华寺到徐世昌返天津前，其间只有短短的五个小时的时间。从刚刚亮相的围园劫后之谋，联系到当时已经甚嚣尘上的政变风传，和袁世凯恰在此时被光绪帝召见，并超擢升任候补侍郎，他们发现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卷进了当时政治漩涡的中心，瞻前顾后，不寒而栗。由于荣禄同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以及坐镇京畿的特殊地位，他们对于荣禄催袁世凯迅速返津的函电究竟用意何在，也自然多长一个心眼去揣摩。他们必定熟筹足以自存之策。返天津窥察动静，成了徐世昌的首要任务。

徐世昌初四日返天津后，直奔了密友严修家，并在严家午饭。据《严修日记》记载，当天下午，严氏还安排了他的夫人只身“回京寓检点，预备退京寓之房，全眷回津”^②。这件看似同政治无关的琐碎家事，连同袁世凯让徐世昌按原计划于初四日返天津之事，一起从侧面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初四日袁世凯不在京寻求告密途径，是袁、徐二人之间议定的，否则袁世凯不会不留徐世昌在京担任臂助，徐世昌也不会坐视严夫人走进政争漩涡之地，而不露口风劝阻严氏的

^① 《徐世昌日记》。转引自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87页。

^② 《严修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条，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决定。因为倘若袁世凯的告密内容一旦传到宫中，谁都很难预知这场政治变动将以什么形式发生。封城、大规模的抓捕和屠杀，历史上的宫廷政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血腥记忆。

徐世昌先于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近两个白天，他在天津还有什么活动，没有史料依据。他的日记也没有提及。在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情况下，笔者做一个如下的推想：他可能在初四日谒见了荣禄，首先向荣禄说明，袁世凯没有依召即刻回津，是由于光绪帝定下初五日请训；然后，报告了他在京的见闻（这自然是在京同袁世凯商定的内容），避开不说谭嗣同夜访，游说袁世凯围园劫后之要害，而只说维新党人首领康有为仍旧在京活动，以及跪读光绪帝密诏之事。这可算是告发维新党人，而不是告密围园劫后之谋。且先把自己洗刷出来，以免事后追究起来，把他划到谋逆一党。

荣禄得此消息，立即电告了慈禧太后，甚或有微服进京晤太后之事。从而成为初六日政变的导火线。这样，可与政变上谕所说的“莠言乱政”对应，也可以应合只逮捕康氏兄弟，而不逮捕谭嗣同的行动，也可以与茅海建先生所说“初五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后，到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的“大胆想像”^①相衔接。康有为滞留在京，知者甚众，而跪读密诏，维新党人圈外，只徐世昌一人与闻了。又可以以为日本使节林权助所说9月19日（初二日），海关官员 H. B. Morse 所说初五日、黄彰建先生所说初四日荣禄来京会晤慈禧太后诸说，提供某些参照系。但这只是悬揣，没有事实根据，亦不知可否证实或证伪。

^① 参见茅海建：《戊戌政法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二），《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76页。

荣禄是最佳告密人选

众所周知，荣禄是慈禧太后最得力的心腹。光绪二十四年初夏，她特地让荣禄卸去兵部尚书、步军统领，以文渊阁大学士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拱卫京畿，为她看守京师大门。

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非同寻常。他投奔荣禄门下的时间并不太久，自结识之后，迅速从知遇而腹心亲信，而政治伙伴。

两人直接交往的开始，是光绪二十一年六月，袁世凯奉旨到督办军务处差委，荣禄交待他“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①。袁世凯即写了《上督办军务处禀》^②，甚得督办军务处的各位督办、会办赏识，于是联名保奏袁世凯督办新建陆军（即小站练兵）。还有以下几件事颇具说明意义。

光绪二十一年夏，袁世凯到军务处不久，即请荣禄代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

光绪二十二年春，袁世凯到小站练兵三个多月后，上书李鸿藻，指名请求朝廷简派荣禄专司练兵，做自己上司^③；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四个月后，御史胡景桂弹劾袁世凯的事件发生，奉旨前去天津查办的荣禄，对袁世凯赏识有加，全力为其回护开脱。随行办事的兵部官员陈夔龙在其所著《梦蕉亭杂记》中有详细记述^④。

① 沈祖宪、吴闿生编纂：《荣庵弟子记》卷二，六页上。

② 参见袁世凯编纂：《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印本。

③ 袁世凯：《上李官保太夫子中堂书》。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402页。

④ 参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3—484页。

光绪二十四年春，荣禄任直督，督办军务处裁撤，袁世凯归荣禄节制。五月，荣禄奉旨保举人才。上谕说：“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尤须举贤任能。其闾茸不职各员弁，严行甄劾，毋稍瞻顾。”^①荣禄上奏了两个保单，袁世凯名列布按以下职十八人名单之第二^②。七月，袁世凯赴天津晋见荣禄后，写信给徐世昌，盛称“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③。

戊戌政变以后，面对社会舆论说袁世凯首鼠两端的纷传，荣禄直认袁世凯是他的人，这是有来由的。

荣禄可谓接受袁世凯告密的最佳人选。以荣、袁之关系，袁世凯可以托庇自保，摆脱乃至洗刷同维新党人的干系与牵连。以荣禄在慈禧太后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来调和慈禧太后与光绪之间的僵局，缓解太后可能对光绪帝施出激烈措施，为光绪帝争取一个自存的环境。后来，光绪二十五年，荣禄果然劝说慈禧太后改变了废光绪帝的主意^④。

按制度，以及荣、袁二人的统属关系，袁世凯亦应向荣禄报告，而不是他人。

袁世凯与光绪帝和维新党人

告密是袁世凯两难处境的唯一选择。熟知袁世凯历史与家事的张

-
- ① 《军机大臣字寄荣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第209页。
- ② 《大学士直隶总督荣禄保》，《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第296页。所保十八员为：凤林、袁世凯、岑春煊、李盛铎、裕庚、蔡钧、黄遵宪、樊增祥、陈夔龙、黄宗炎、陈泽霖、寿山、王凤鸣、田玉广、恩祥、荣和、寿长。另外还有保荐督抚提镇一单十四员，从略。
- ③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I）》，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298页。
- ④ 《清史稿·荣禄传》：“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伯驹（张镇芳之子）说，在帝后之间，告密与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都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大祸。他作为被游说拉拢的对象，出面告密虽不光彩，但也殊难不做^①。这是明白袁世凯处境之言。

论者往往指责袁世凯在得知围园劫后的密谋后，不去设法营救慈禧太后，而是在《戊戌纪略》中喋喋不休地大谈保护光绪帝之办法的虚伪。其实，当时的慈禧太后并无太大危险，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围园劫后的盖子揭开，如何善处光绪帝之事。

保全光绪帝应是他的最佳选择。在封建伦理道德强势的社会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若袁世凯的告密引起帝位变动，就算袁世凯保住了性命，也难保自己以后的前程。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袁世凯也要将光绪帝从这场“谋逆”的罪案中洗刷出来。袁世凯在得悉维新党人劫后密谋之后，不急于初四日告密，确有保全光绪帝之隐衷。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信誓旦旦，在荣禄面前以保全光绪帝为言，近于实情。

袁保全光绪帝的用心，也出于报光绪帝的知遇之恩。

袁世凯曾以他在朝鲜的政绩，赢得了光绪帝的好感与重视。早在光绪帝亲政的第二年，光绪十六年，就面谕李鸿章：袁世凯“甚有才识，我用他事甚多，可令其好好办，不可令其回来”^②。光绪十八年，以海关道记名简放。十九年，补授袁世凯浙江温州道。

甲午战争后，在举国上下要求变法练兵的浪潮中，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颁旨交督办军务处差委，并命他奏陈挽救时局之策。七月初一日，未有奏事之权的袁世凯请督办军务

① 参阅张伯驹：《洪宪纪事诗补注》第二首诗，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294页。

② 袁世凯：《致二姊函》，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I）》，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229页。

处代上了《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这是袁氏的变法维新主张万言书，其见识之广阔、虑事之深远、变法主张之实际，并不在康有为数次上皇帝书之下。

年底，光绪帝钦派袁世凯督率创办天津新建陆军。上谕说：“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覈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懍之，慎之。”^①这是甲午战败后光绪皇帝立图振兴的最重要举措之一。袁世凯可谓身系着光绪帝振兴国运的重寄。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期间，袁世凯又奉上谕将小站练兵的文书编为《新建兵略录存》，成为维新变法的一项实际政绩。

戊戌八月，光绪帝对袁氏的召见乃至擢升候补侍郎，虽出于维新党人的举荐，但说到受知于光绪帝的资格与历史，袁世凯早在康梁师徒和军机四卿之上之前。

至于袁世凯同维新党人的交往，戴逸先生《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一文^②中，已经做了全面的归纳和叙述，那都是史实，不再赘述。我要做的补充是：

其一，青年时期的袁世凯其人，功利而实际，权变而有度。他在奉旨督练新军之后，全力以赴，几近于封闭。在他的家书中，多次提到“日来早晚在操场，人情世故直置诸忘域”^③。光绪二十三年，升

①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己丑谕军机大臣等》，《清德宗实录》卷三七八，第946页。

② 见《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袁世凯：《致袁世承函》，《袁世凯家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192页。

任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并不实任。二十四年百日维新开始后，袁世凯却在专心编修兵书《新建兵略录存》，六月做序，七月成书四卷，九月完成付梓。并没有太多时间过问其他事情。虽然关心新政，但知之不多，只能在致从弟的家书中问一句“津上有新政否”^①。

其二，袁世凯有变法思想，曾向强学会捐银，曾请荣禄代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也曾与维新派人士有所交往。这成了维新派在危难之际孤注一掷地求救于他的思想基础。但袁世凯有变法思想，并不等于他参与了或愿意参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阴谋活动。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中旬，维新派人士徐仁录到小站游说袁世凯。事后，康有为说：“袁倾向我甚，……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② 这只是维新派的错误判断。一个月后，七月中旬，袁世凯到天津晋见上司荣禄，在天津写信给留守小站的徐世昌：“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商农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③ 以袁、徐二人之间的关系，袁世凯说的应该是心里话。明白无误地说明，袁世凯对康有为导演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并不完全赞成。

其三，即使如毕永年的《诡谋直记》中所说，七月底，他在康有为处看到了袁世凯致康有为信表示感谢他的荐引，并说“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从而康有为和毕永年都认为“袁可用矣”，但也并不能表

① 袁世凯：《致袁世承函》，《袁世凯家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169页。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60页。

③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I）》，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298页。

明袁世凯就承诺同他们一起，参与实行宫廷政变的政治阴谋。再从康有为等设谋用群相拥哭、跪读密诏来感动徐世昌，又派谭嗣同夜见袁世凯以衔光绪帝诏谕，游说袁世凯入伙，执行围园劫后之谋等一系列活动来看，都清楚表明袁世凯、徐世昌只是维新党人拉拢、利用的对象，而并非同他们一党。尽管袁世凯有维新思想、对光绪帝怀有浓厚的知遇之感，他也并无义务必须参与维新党人毫无成功可能的政治冒险。

据说，光绪帝弥留之际，慈禧太后征询重臣们立君嗣位的意见，袁世凯表示：“我辈汉臣，惟知国赖长君，其他非所敢言。”^①彼时权倾朝野的袁世凯，出言尚如此谨慎，此时，维新党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将自己和光绪皇帝的命运系在袁世凯一身，一厢情愿地拉他做“谋逆”之事。袁世凯小小一介按察使，避之唯恐不速，是理所当然之事。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人的特点。维新党人利用袁世凯的幻想一旦破灭，产生某种怨怼也是自然的事。事后，维新党人不仅不坦承有“围园劫后”之谋，反说是袁世凯的蓄意制造的谎言，借以“卖友”，“卖主求荣”，则完全属于又一种政治了。

人们或问，何以索解后来光绪帝对袁世凯的那种死难瞩目的深仇大恨。我想，可以这样解释：维新党人策划的“围园劫后”，光绪帝的确不知情；而维新党人却声称受光绪指使。袁世凯告密后，慈禧必然以此穷追严诘光绪。推理起来，不知情的光绪帝自然以为是袁世凯蓄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了奇祸的密谋。谭嗣同被不审而诛，没有留下口供。此后十年，直到辞世，光绪与社会实际是天人之隔，没有条件与可能了解真相，哪怕是其中一部分。误解与误会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历史疙瘩。

① 刘体智撰：《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6页。

余 论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中国政坛发生大变动。杨锐之子交出光绪帝密诏。袁世凯被载沣罢斥，进一步的处罚不明。配合着这个浪头，康有为一改仇视慈禧太后的常态，推波助澜，上书载沣，长达三千余言，备说是袁世凯蓄意制造“围园劫后”谬论，陷慈禧太后于不慈、光绪帝不孝不明。就在这种杀头之灾随时袭来的背景下，袁世凯向他的亲信幕僚张一麀、费树蔚拿出了《戊戌纪略》。选择这个时候发表，实际上即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公开的自我辩白。袁世凯本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虽有的资料集将《戊戌纪略》改名为《戊戌日记》，亦大可不必按“日记”的要求去逐日索解。

还有，论者所说关于袁世凯在告密“事后所受的非常礼遇”问题。其一，袁世凯初五日下午返抵天津，在车站受到大张旗鼓的欢迎，这是官场惯例，决不是因为告密引发政变立功之故。无论如何，即使是初四日袁世凯在北京告了密，初五日还正在政变的紧张关键时刻，此时，荣禄还不至于就发动属下专门欢迎袁世凯，因为远不到庆功的时候。

其二，政变发生后，荣禄奉慈禧太后之命晋京，由袁世凯以前直隶按察使、现候补侍郎的身份短时期护理直督，这是按制度规定行事。虽反映了慈禧太后和荣禄对告密后的袁世凯的信任，但确没有额外奖赏之意。

其三，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发生皇帝谋划联系外臣禁锢太后这样惊天的大事，而最终没有引起社稷变动，没有引起大的流血纷争，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袁世凯作为知情人，所表现的输诚和政治才具，都得到了后党的赏识。这为以后袁世凯的步步高升打下了基础。

但以后袁世凯的每步晋升（如晋升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等），都另有其背景和原因。决不是靠一次告密之功，就可终生平步青云的。慈禧太后不会无知到以封疆大吏、首辅重臣之位来奖赏一次告密。按慈禧太后的驭人术，没有因邀宠而获致高位和重用者。前有奏请垂帘听政的董元醇，后有奏请重新训政的杨崇伊为例。

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

廖大伟

(上海东华大学)

一、问题提出和讨论范围

辛亥以后，新生的共和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着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努力迈进，可是不久，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就因“宋案”而折断。“宋案”突如其来，南北“武斗”便势不可免，^①而“宋案”之发生，关键在于主谋。

谁主使刺杀宋教仁，这个问题似乎早有定论，不容置疑。不管时人还是后人，无论回忆录还是研究论著，一般都确信袁世凯为“刺宋”主谋。此说的依据主要是：1. 有大量电函可证明凶犯应桂馨直接受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其中涉及内阁总理赵秉钧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2. 由客观事态推理袁世凯主谋行刺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已对其构成很大的威胁。3. 案发后袁世凯的所为疑点重重，尤其是应桂馨、赵秉钧接连暴毙京津难以解释。

果真如此？曾经有人提出疑义。1954年有人就认为“宋案”发生有多种可能，其中之一系洪述祖揣摩袁世凯心思“而擅自行动”。^②

① 廖大伟：《刺宋案与民初政治现代化尝试的天折》，《近代中国》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版。

②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04页。

后来又有学者表示，“从法律观点去审视，对一个彻底拒绝感情因素掺入的史家来说，只能有一个结论：此案的真相——是否袁世凯、赵秉钧直接指使这次暗杀，还有待清查有关档案去彻底弄清”^①。一些国外学者对此案的表述很有意思，说“一系列证据表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既然“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那么作为政府首脑袁世凯自然难逃干系，要负责任。^②此说不作袁世凯是否主观故意的判断，没有明确指定事系袁世凯所为，而是强调无论其中有没有袁世凯的个人行为，从法理上讲他都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这个结论谁都能接受，问题是“袁世凯政府”究竟要负怎样的法律责任，前提在于“宋案”与袁世凯的关系，究竟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是主观故意、幕后指使，还是并不知情、督察失职，这之间相差甚远，性质完全不同。这些国外学者作这样推断式的表述，想必他们在袁世凯是否系“刺宋”主谋问题上同样存在怀疑。

数年前，我参与熊月之教授主持的《上海通史》课题，曾经涉略“宋案”，感到“宋案究竟如何，依旧迷雾重重，幕后主使是谁，至今似难确断”。^③当时提出了一些疑义，但缺乏相应的论证和深入的探讨。现试进一步明确观点，就袁世凯是不是“刺宋”主谋这一问题在资料基础上按照事（既存事实）理（一般共识）进行推理和论证。也许就像类似案子一样，根本就没有直接并强有力的证据留存供考，因此，本文推理和论证的依据均为当年报刊公开发表电函和专题资料。至于幕后人究竟是谁，由于缺乏可信资料等原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① 袁伟时：《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②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

③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政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二、袁世凯的地位、身份和信仰

作为当时最大的而且是不可收买的政敌，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确实威胁到了袁世凯，对其政治声望和政治命运已经产生影响。^①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宋教仁的威胁和所产生的影响还不是致命的，还没到袁世凯必须对其下毒手的程度。

袁世凯曾对吴禄贞下毒手，因为吴禄贞是军人，手上握着重兵。军队和武力意味着什么袁世凯是最清楚的，所以他一向信奉“非强不立”^②，他的发迹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宋教仁是位文人，属于温和与理想型的政治家，搞合法斗争，主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对付这种类型的人袁世凯见多识广，也算有经验了，因此不会感到十分可怕。孙中山照样对付过去，唐绍仪责任内阁照样垮台，也算是国民党内阁的赵秉钧内阁他照样一手遮天，至于宋教仁袁世凯同样可以有其他办法。

袁世凯十分自信，这种自信来自自身强大的实力，来自稳固的难以撼动的地位和多年累积起来的声望，来自每争必胜的成功经验。手中重兵在握，国内任何人任何势力无法与之匹敌，身为合法当选的临时大总统，能够掌控和运用国家权力资源。这样的“强人”兼“能人”，被国外列强需要“稳定”捧着，国内一般政党团体政治势力希望“太平”拥着，大多数革命党人觉得“不错”也哄着向着。确实存在的“去袁拥黎”只是宋教仁等少数人的想法和计划，实际上“非袁

① 何泽福：《宋教仁与袁世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② 《袁世凯致张勋函》，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编：《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

不可”才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共鸣和主流意识。当时谁的声望最高，谁的政治地位最牢固，毫无疑问是袁世凯。老百姓和政治家们对他基本上是认可的，去了北京的孙中山表示“绝无可疑之余地”^①。拥有如此地位、声望和军事实力，袁世凯用不着使用对付吴禄贞那样的手段来对付宋教仁。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做事从不鲁莽的袁世凯，会高度重视他的对手，会高度重视由于这位对手而带来的压力、不良政治影响和今后的某些可能，但是相信他会首先考虑自身现有的地位和声望、身份和形象，考虑采取与之相适合的方法手段去处理，相信他会坚持军队的威慑力可以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的信念，当初他同南方打交道成功的关键在此，现在和今后他保持不败的关键依然在此。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那个时候袁世凯不可能对宋教仁采取行刺暗杀的手段，他也有个核算暗杀成本的问题。

三、宋教仁不具真正的威胁

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确实威胁到了袁世凯，对其政治声望和政治命运已经产生影响。作为当时国内最大政党，并已取得国会大选胜利的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对袁世凯构成的威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政党责任内阁，一是酝酿黎元洪当正式大总统。但是，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构成的威胁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先述酝酿黎元洪当正式大总统。

其时，社会上已有传闻宋教仁正在悄悄地酝酿“去袁拥黎”，准

^① 《孙中山致黄兴电》（1912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0页。

备推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报纸上说：“黄、宋屡说黎副总统密陈推戴意”，“宋谓总统一席，非公莫属，公如担任，选黄为副，己则集同志组织内阁”。^①尽管宋教仁公开否认有此事^②，但根据许多圈内人的记载和当时的一些迹象，宋教仁想把袁世凯赶下台，让黎元洪担任没有实权的总统，自己则以内阁总理掌握中央实权，这件事是存在的。^③已故的何泽福教授曾对此作过详实的梳理，结论可信，故本文不再重复一一列举史料。^④只是补充一点，当时黄兴、宋教仁确实先后到过武汉，见过黎元洪，而且自到武汉起，宋教仁的言论明显趋于激烈，开始公开指责袁世凯当局，这前慎后激之变当事出有因，与此有关。

正式大总统位子，袁世凯一向以为非己莫属，志在必得。宋教仁等人的所为，显然触犯其忌。蔡元培曾说过：“先生百计联络，始以同盟会与其他三四政团相结合而组织为国民党，以为有此多数党为大本营，足以操纵袁氏。既而知袁氏终不足与有为，乃舍袁就黎，遂以此触袁氏之忌，而先生死矣。”^⑤

“触袁氏之忌”，未必“先生死矣”，因为此“忌”并非死“忌”，并未对袁世凯造成致命的威胁。

-
- ① 《时事新报》1913年2月19日、22日。当时甚至传说国民党举黄兴为正式大总统。见黄远庸：《政海之一勺》（1913年2月26日），《远生遗著》下册，台湾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60页。
- ② 《答匿名氏驳辞》，《民立报》1913年3月15日。
- ③ 参见黄远庸：《政海之一勺》（1913年2月26日），《远生遗著》下册，第61—62页。另外，黄远庸认为，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时曾以“不争总统”为先决条件，“故国民党今已不争总统而争政党内阁”。一争总统，统一共和党便将退出国民党，国民党只争政党内阁而不争总统缘于此。见同文。
- ④ 何泽福：《宋教仁与袁世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 ⑤ 蔡元培：《〈我之历史〉序》，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9页。

就宋教仁而言，他的这个“去袁拥黎”只是一个设想和计划，处于酝酿阶段，要做到这一点，真是谈何容易。

首先，国会这一关很难通过。其时，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已经竞选产生，专门的总统选举法尚未出台。按照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统选举采取间接选举法，由议员们投票决定，以全体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①同年8月公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宪法制定前，两院同时行使临时参议院职权，宪法由两院会议，“非两院各有总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开会，非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②该法案还规定，参议院由各省、蒙、藏、青、中央学会、华侨等六个方面人选组成，总计参议员二百七十四人，众议院“取人口比例主义”，每八十万人选众议员一人，总计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合计参众两院议员总数为八百七十名。

国会大选结果，国民党获得参众两院的三百九十二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获得二百三十三席。^③国民党取得了国会将近一半的席位，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就总统选举而言，无论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即使全体国民党籍的议员把选票都投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仍不能顺利当选，因为他的得票仍达不到法定的当选票数。按前者“四分之三”中的“三分之二”，当选者须获得四百三十五票以上，按后者“三分之二”中的“四分之三”，当选者仍须获得四百三十五票以上，国民党籍议员的总票数为三百九十二票，因此它并没有绝对把握让谁能当选大总统。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8月10日。

③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还需考虑到国民党是一个多党改组而来的政党，人员庞杂，意志并不完全统一。究竟选举谁当总统，国民党党内能否保持一致，国民党议员能否把选票统一投给一个人，本身就很成问题。我们已知，无论是此前的南京代理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时代，还是此后的北京临时参议院时代，无论是同盟会的议员，还是国民党的议员，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的一致、完全的统一，党内的派系之争，始终存在。时《大自由报》有一篇评论专门谈这个问题，分析和判断比较准确。文章说：“各政党对于大总统选举，黑幕中诡风涌云……前者关于此问题，大别之分为两派：曰举袁派，曰非袁派。所谓举袁派者，实概括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而言，而国民党尚有一部分人亦表决赞同也。”另外国民党中举黄、举孙、举黎“亦各有派别”。^①

其实，大总统舍袁其谁，又有谁比袁世凯更合适。当初为何选择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就是因为他最有能力、最有条件、最能实现和满足人们普遍存在的革命迅速成功、社会从此稳定的渴望心理。而这种社会心理，“宋案”发生时依然存在，人心思定的时代特点没有变。再说袁世凯的优势也没有改变，依旧明显。

1913年1月29日，日本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曾为总统选举问题在上海采访过孙中山，孙中山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应该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

宗问：在此次众议员选举上，属足下领导之国民党占有优势，约得议员之过半数，然则在今春将要召开之议会上，大总统之选举当然可能如贵党之意。由于足下之精力、功绩、威望种种关系，定为众望所归，当选无疑。君能勇承此重担否？

^① 《大总统选举之黑幕》，《大自由报》1913年3月23日。

孙答：议员之选举虽然胜利归于我党，议员数目占有过半数之优势，而于总统之选举，是否选余，尚未可知。惟余断不肯担任总统，拟暂在民间为培养势力之事，要真实的担任民国总统非易事也。

宗问：足下若不欲为总统，则势必推黄兴君，不知黄君有意于此否？

孙微笑答曰：黄君亦可，然当总统实难事也。

宗曰：足下与黄君均不愿当总统，则国民党中别无适当人才，不得已，则至于再举袁世凯乎？

孙曰：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设袁若落选，则军队难于统驭，恐将成为大乱之阶。目前排斥袁世凯者，乃不懂我国事态之所为也。^①

由上可见，酝酿黎元洪当正式大总统，只是一厢情愿，连设想者本身都缺乏足够的信心。否则，当报端披露此事时，宋教仁不会连忙出来否认，说是谣言“使民心惶惑”。^②

再述政党责任内阁主张。

国会大选尘埃落定后，作为多数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非常盼望领衔组阁，组成国民党一党责任内阁。宋教仁到处宣传他的政党责任内阁主张。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财政……紊乱已达极度”，外交则“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不闻有当解决之法”。因此“扶危定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③。他认

① 《就选举大总统问题答宗方小太郎问》，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② 《答匿名氏驳辞》，《民立报》1913年3月15日。

③ 《宋遽初之危言》，《民立报》1913年2月10日。

为，以后的政府权力结构，“总统问题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之良制也。国务院宜以完成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①

对总统问题，宋教仁没有把握，结果不得不“仍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以袁世凯为宜”，^② 公开表示“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者惟一袁”。^③然而，对政党责任内阁，宋教仁则充满信心。

一旦真正实行责任内阁，总统权力必遭削弱。一旦实行政党责任内阁，总统权力更受限制。

可是，政党责任内阁，同样是宋教仁的一厢情愿，可能性并不大。首先，袁世凯不赞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须由总统提名，袁世凯反对，政党责任内阁怎么能产生。其次，没有法律依据。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有过设立政党内阁的规定。相关的只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样也没有规定究竟是混合内阁还政党内阁，只是其中第44条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45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既然法律并无明确规定，那么混合内阁或一党内阁都是合法的，都有可能出现。因此，宋教仁竭力主张、到处宣传的政党责任内阁主张未必就能实现。

如果国民党准备通过国会重新修改法律，补上政党责任内阁一款，那么同样产生一个问题，即国民党籍的议员是否能做到一致，即使做到一致能不能达到法定的票数。

① 《苦口婆心医国手》，《民立报》1913年3月11日。

②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0页。

③ 《宋教仁君之时事谈——驳某当局者》，《民立报》1913年3月12日。

再退一步说，即使国民党责任内阁成立，其又能奈何袁世凯几许？唐绍仪内阁也是责任内阁，其时宋教仁也身在其中，人称“唐宋内阁”，又称“同盟会内阁”，结果不是轻而易举地被袁世凯逼垮了吗？如果袁世凯惧怕责任内阁的话，就不会在唐绍仪内阁垮台后叫宋教仁组阁。

四、上海行刺，许多困难难以逾越

行刺暗杀政治家要冒风险，在上海华界刺杀国民党领袖、著名政治家宋教仁更要承担风险，而且也非常困难。当时上海华界是国民党的大本营、陈其美的地盘。陈其美等革命前就在上海打拼耕耘，革命后建立了地方政权沪军都督府。长期的努力为他在上海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也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一定的社会威望。革命后南北统一，袁世凯中央政府一时对上海鞭长莫及。1912年7月沪军都督府撤销，上海重归江苏省，上海地方行政体系和人员结构暂无大变。陈其美虽然辞去了沪军都督，但他的亲信好友遍布上海权力要害部门，他与帮会、士绅、军警等各方面的关系依旧良好，他的权势还在，上海实际还是由他说了算。

陈其美向以精敏骁勇著名，在国民党内算大佬级人物，属于有实力的行动派。他的地盘，一般谁都不愿上门惹事，即使袁世凯也要思量再三。假如主要因为“去袁拥黎”的酝酿而要杀宋，那么从两湖开始理由就已存在，一直到上海这一路上不乏动手的机会，可是结果却发生在属于上海华界的沪宁火车站。有人说这是袁世凯狡猾之处，行刺于国民党的地盘可蒙蔽公众，嫁祸于人，使人们相信这是国民党内争所致。^①这个

^① 《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6页。

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它建立在整个暗杀行动天衣无缝的基础上，可是谁能保证这一点。要在上海行动，尤须小心谨慎，毫无差错，这里面有个把握问题，没有把握不如不做；有个保密问题，包括前期准备的保密（策划、物色杀手、布置任务等），杀手的安全（跟踪、行刺、脱身等），特殊情况的处理（被捕者坚不招供、不留任何人证物证等）。这一切对外来者来说究竟有多大把握，答案很明显。既然把握不大，袁世凯怎么会顶风冒险选择在上海行刺。

如此疑窦丛生、充满诡异的成功暗杀，绝非“强龙”袁世凯所能计划和安排，如果要把“主谋”强加在他的头上，那真是为难他了。有一些不可理解的事实存在可以坚定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一旦它们聚集一起纳入所要讨论的视野，便会产生一定的说服力。

一个事实存在，宋教仁没有得到应有的人身保护。一个即将组阁的大人物既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明令保护，也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实际保护，甚至没有得到本党力量的有效保护。如果说对尚未组阁的宋教仁政府不承担保护义务，那么在这段过渡时期里国民党的机构应该负起责任，给予保护，可是从两湖一路东下没有，到了本党大本营上海也没有。其实无论公开协调军警还是暗中组织会党保护，国民党上海机构完全能做到，公众也不会觉得不正常。当时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专门组织了护送队，即将北上组阁的宋教仁连起码的护卫都没有。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案发当晚在沪宁火车站这个公共场所，宋教仁身边竟然没有一名卫士，对他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以至于凶手仅凭一把手枪行刺后从容逃逸。有史料记载，连车站警察是时也不见踪影，“不知所司何事”，^① 巧合还是什么，不得而知。要强调的是，这事发生在国民党地盘上，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被人轻易地刺

^① 《民立报》1913年3月21日。

倒在自己家门口，而且那个人轻易地脱身走了。上海英文报纸《共和辩护士报》编辑孔天增说：“我去过行刺现场，凶手竟能逃之夭夭，使人奇怪。”^①再一个事实存在，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在最关键的时候忽然暴毙狱中，捕获的直接唆使犯应桂馨数月后竟也能逃出监狱，这两个离奇同样发生在上海华界、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里。显然，有些事不是袁世凯想做就能做的。

五、书证的新解读

“宋案”发生半个月后，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市民举报会同法租界巡捕拘捕了疑犯应桂馨，并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结果查获大量涉案电文函件，其中涉及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于是这些电函成为了袁世凯“主谋”说的权威证据。查获的这些电函主要系洪述祖、应桂馨之间的往来，也有一些摘报和其他人的电函作为附件。根据查获、公布的整个过程和电函内容来看^②，它符合法学意义上的“证据”要求，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属于书证，但是关键在于

-
- ① 《孔天增来函》（1913年3月23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 ② 1913年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在袁世凯和革命党人的一致要求下，联名发出了《宋案证据通电》，并于次日将应桂馨住处查获的有关电文函件在报上公布。原电函等初由上海租界巡捕在应宅搜获，后随案犯一并移交上海华界地方检察厅，旋由程德全、应德闳接受。程德全、应德闳邀请黄兴、伍廷芳、王宠惠及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在中央驻沪公署共同检审、译校、整理，最终将其中可能涉案的五十三组电函“循序编次”，“间附案语”，报呈中央，并向社会公布。在整个过程中，正如袁世凯说：“政府办理此案，既未一步放松，亦未稍形操切，无非按照法定手续，使外交方面勿生阻力以成信狱，而伸法纪。”见《致各省都督维持大局》，徐有明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七，函牍。

这些证据究竟能够证明什么，能够证明到什么范围和程度，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各具有多大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信度。

查获的五十三组涉案电函，证明洪述祖、应桂馨为案犯当确凿无疑。其中，第40组，《应桂馨致洪述祖函》（1913年3月13日）：“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屏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证明是日应桂馨已有暗杀宋教仁的想法，函中“木”为“宋”的析字，指宋教仁，“去宋”即除宋，所谓“釜底抽薪法”。第41组，《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同年3月14日晚）：“梁山匪魁，项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证明是时应桂馨已发出暗杀令，手下开始伺机行动，“乞转呈候示”即希冀洪述祖将目前事态禀报上峰并获得指示。第43组，《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同年3月18日）：“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证明洪述祖不仅知晓应桂馨的暗杀计划，而且鼓励督促应桂馨抓紧落实，积极为之。第44组，《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同年3月19日夜）：“事速进行。”即洪述祖再次催促。第45组，《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同年3月21日晨）：“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意为行动令已经发出，请呈报上峰，惟“廿四十分钟”不解。第46组，《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同年3月21日晚）：“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意为目的已经达到，任务执行者都已安全，请转呈上峰。第47组，寄报馆油印品《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四十二份，此文与案发后出现的欲盖弥彰之离奇传单内容相同，从另一方面证明应桂馨与案有关。^①

^① 以上所引电函均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刺杀宋教仁案”一节。

洪述祖，字荫芝，江苏常州人。曾先后做过台湾巡抚刘铭传和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务部秘书，得内务部总长赵秉钧赏识倚重，实系政府特务头目。^①被人目为“其人术木险狠，尤有敢作敢为之胆量”^②。

应桂馨又叫应夔丞，浙江宁波人。家财颇丰，好挥霍交际。曾承父命在家乡办学，因仗势欺人犯案，避捕混迹上海，成为流氓帮会头目。上海光复前，革命党人曾以文元坊应宅为秘密活动据点，应桂馨也奔走出力，提供过情报。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以谍报科长相委，旋孙中山抵沪，也由他负责照料，并组织卫队护送至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卫队司令，继兼庶务，因贪污公款又开枪逞凶被解职。后返沪重操旧业，于1912年7月将部分青帮、红帮、哥老会等帮会势力改组为中华民国共进会，出任会长，时陈其美列名发起人之首。^③

洪述祖、应桂馨为案犯，那么涉案电函语涉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是否同案犯。时人和后人之所以指认袁世凯为“刺宋”主谋，主要依据即此。其实，不抱成见地重新审读这些电函，再联系已知的相关史实，可以发觉事实并非如此。

五十三组电函中，语涉袁世凯的有二十二组共二十九处，有些明显与本案无关，有些似有疑问，有些被视为“主谋”之证据。现将似有疑问和视作证据的电函全部列下，逐项析解：

第2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10月24日）：“中央加委一层，总理甚赞成。明后弟见大总统再定。”民国成立后，不少帮会恃功自傲，成了扰乱社会的消极因素，遭到各地当局的严厉镇压。在此背景

① 其子洪深为著名剧作家，一生不涉政治。

② 《黄兴程德全报告宋教仁遇刺电》（1913年3月2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③ 《中华国民共进会广告》，《民立报》1912年6月19日。

下，应桂馨拟将传统帮会改革整合，“剪除其旧染之习惯”，使之成为合法的民间积极力量，于是成立了共进会。可是共进会成立后没有如旨行事，应桂馨本人因参与湖北马队暴动遭黎元洪通缉，各地会员时常为非作歹，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因此遭到地方政府通令查禁，也引起中央关注。9月，袁世凯在京会见陈其美时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同月29日以总统身份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①10月，洪述祖受袁世凯和内务部委托，南下磋商谈解散共进会事宜，到沪后持张绍曾介绍函造访了应桂馨，由此相识结交^②。两人商定由应桂馨负责解散共进会，中央政府则给予应桂馨一定的名分和经费。10月16日，洪带应赴宁拜见程德全，见面时应表示遵从中央通令，“情愿效力”，于是程德全当面委任应桂馨为江苏驻沪巡查长^③，并答应给予经费。袁世凯当天接到程德全密电，18日复电同意月支经费三千元，其中一千元由省政府解决，其余二千元“由中央拨付”，并且表示“唯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④此段文字便是洪回京请示和落实中央给予名分一事的反馈。

第4组，《洪述祖致应桂馨电》（11月2日）：“总统（盼）（真心）〔括号及括号内的字为原有，作者注〕弟北上，允准三万。”袁世凯觉得应桂馨可以任用，拟拨给解散共进会活动费三万元，并希其来京直接晤谈。此段文字为洪述祖通报此信息。

第5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10月29日）：“连日为足下之事，请

① 《通飭严禁秘密结社文》（1912年9月29日），徐有明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政令。

②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刺杀宋教仁案”一节。

③ 江苏驻沪巡查长“专司稽查江苏地方匪踪、匪巢及匪党一切秘密不正行为”。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88页。

④ 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8页。

大总统特下赦令，又请黎副总统取消通缉之案，幸目的均已达到。……至大总统听见鄙人陈述各节，甚为许可。日昨传谕嘱鄙人函知足下，将各项成绩，可以办至若何，具一条陈前来。譬如共进会成〔此处似有脱字——作者注〕之处，决无扰害治安为一项，如裁兵可以省餉为一项。种种界限，手段经验，由足下自具说帖，寄由兄处转陈，大总统可以据以任命或委任。缘说歹话人多，有此则大总统易于措词也。”洪述祖 10 月 23 日回京后，伺机在袁世凯面前为应美言。不久袁世凯下令将应桂馨“特予赦典，取消通缉”，^①黎元洪也取消了对应桂馨的通缉令。^②惟让应桂馨将有关成绩整理上报，以便“任命或委任”出自袁世凯嘱托一节不能确定。此段文字通报美言效果，并嘱进一步将成绩和设想整理上呈。

第 9 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11 月 29 日）：“连日俄蒙事忙，今日国务院会议，始决定三万之款准发。至宝山一节，陆军、参谋两部，尚须研究。缘颇有人为宝山运动，不独朱瑞与吾弟反对也。总统极盼吾弟速来。……克日前来，一谒总统，并领取款项，即行回南，亦无不可……。兄亦待款孔亟，并欲设法加一浙江巡查长，以便与朱合而为一……”自应桂馨投效政府，在协助解散共进会、调处军队与土匪闹事、安抚裁减军人等方面，确实做了一定的工作。尤其遵照中央政府指令，凭借私人关系，调和徐宝山与张勋的矛盾，做得“于各方面不落着痕迹”，至少使赵秉钧“至佩服”，^③于是国务院批复了解散共进会活动费三万元，总统也望晤谈。此段文字系通报此事，并建议应尽快来京谒见总统，领取拨款。值得注意的是，函示洪述祖十分

① 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 2 卷，“刺杀宋教仁案”一节。

② 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 2 卷，第 87 页。

③ 《赵秉钧致应桂馨密电》（1912 年 12 月 11 日），《宋教仁血案》，第 336 页。

需要钱，还打算兼职浙江巡查长，公私兼顾，可见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热乎劲中，还夹着以公济私的念头。

第12组共四件，第一件，《赵秉钧致洪述祖函》（1913年1月9日）：“应君领字，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才行。”1912年12月，应桂馨应邀入京，不仅受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传见，还得到袁世凯特批的解散共进会活动经费五万元，比原定金额多了两万元。袁世凯的接见和经费特批，使应桂馨非常感激，为表忠心，他请求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以便利用所熟悉的帮会系统，侦探各政党的情报。此函发于应桂馨离京回沪前，赵秉钧的这段文字意思是，以后与应桂馨联系，仍由你洪述祖一手负责，不过这事还得总统确认。

第13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1月5日）：“顷接总理谕，嘱吾弟开一南边办法手所以气摺（即如何解散及取缔之法等事），明日面交。又言次长处，明早十钟往辞为妥，此次渠甚力也。大总统处，或星期二早，往禀辞为妥。”此段文字转告赵秉钧要求呈交落实计划的书面报告，并建议离京前择时拜别内务次长和大总统。

第15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1月9日）：“总统嘱开办法，已说明礼拜二送去，切勿误。……弟一见大总统时，可谢其发款，略将以后办法陈说。”此段文字系提醒周二将落实计划的书面报告送交总统，及见总统该如何表达。

显然以上电函涉及的袁世凯及他与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发生的关系，都围绕解散共进会及取缔秘密结社这一主旨，一点看不出与“宋案”有关的影子。

第29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2月4日）：“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1913年1月14日，应桂馨离京返沪前夕，赵秉钧交给一本密

电码，囑有秘密结社情报直接密电国务院。其时“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电报告，以防漏泄”，^①属于正常。惟中央与应桂馨发生关系，原在解散共进会和取缔秘密结社事，而应桂馨为报知遇之恩，主动要求扩大职责范围，将中央主要竞争对手国民党纳入特务事项，而此与推荐人洪述祖心思不谋而合。2月1日，洪函致应：“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2月2日，洪述祖函致应桂馨：“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径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似亦不宜太迟也。”^②显然，洪述祖所鼓动的不是一般性的情报侦探，而是有实质性对国民党打击行动的实施。与此同时，应桂馨也有同感，并着手派人在日本搜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劣史”，准备“用照片辑印十万册”，从横滨发行，以此破坏国民党领导人形象。应桂馨将此举密电赵秉钧，并认为：“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③此电发于2月2日，电报代码冬，简称“冬电”。此段文字系电达后袁世凯欣喜并鼓励其事的通报，另告报酬奖励需呈实物。

第31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2月8日）：“日内宋〔此处一字不清——作者注〕有无觅处，中央对此颇注意也。”国民党国会大选获胜后，宋教仁踌躇满志，锋芒显露，受到袁世凯等密切关注。此段文字系表中央对宋教仁的重视并望搜集情报。

第35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2月22日）：“来函已呈总统、总理阅过。”函不得见，内容不晓。此段文字系告袁世凯、赵秉钧已阅。

以上数函涉及的袁世凯及相关人的关系，均针对破坏对手形象、搜集宋教仁情报这样的问题，与“宋案”没有关联。

① 《赵秉钧致各省都督民政长自辩通电》（1913年4月28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25页。

②③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00页。

第36组,《洪述祖致应桂馨函》(3月6日):“除邓一案……亦可在《民强》登其死耗……。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此函十分关键,也许“宋案”之酿发其端。联系前后,可知“激烈之举”即人身消灭,而洪述祖暗示鼓动为始作俑者。此段文字系催促成果,或有损宋形象的实物,或采取更厉害的行动。^①

第39组,《洪述祖致应桂馨电》(3月13日):“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此为行动催促和回报许诺,惟“酬勋”并非易事,因“毁宋”而“酬勋位”更不可能,因为这不是正大光明事。赵秉钧于案发后对该条“证据”的辩解推论是有道理的,辩电说:“《临时约法》授予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系评议。如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由何人呈请,何人评决。洪电诳应,岂难推定。”^②另,根据前后语及第36组函中的提示,“毁宋”并非予人身消灭,也可解出丑予形象破坏,两者均可。

以上电函虽未涉及袁世凯,但正处酝酿,内容重要,故作为“宋案”背景仍予列出,以辨原委。

第40组,《应桂馨致洪述祖函》(3月13日):“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火〔原文如此——作者注〕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之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屏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2月15日宋教仁乘江新

-
- ① 除邓案及《民强》,《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等查无线索,暂且存疑,待请专家指教。
- ② 《赵秉钧致各省都督民政长自辩通电》(1913年4月28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27页。

轮由汉抵沪，当夜住进黄浦路汇中饭店（今中山东一路和平饭店北楼），后迁居同孚路（今石门一路）21号黄兴寓所。自此除短时离沪赴杭州、南京鼓动宣讲外，集中精力主要在上海活动，为北上组阁作最后的准备。此时政治激情愈加高涨，话语词锋也愈加犀利。他公开指责袁世凯现政府是“不如人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①应桂馨愈来愈感觉宋教仁对现政治格局的莫大威胁，决定抓紧时间，铤而走险，采用极端手段，为当局分忧解难。此段文字为刺宋意向的第一次明确表露，并及行动经费问题，当为“宋案”正式起始。

第41组，《应桂馨致洪述祖电》（3月14日）：“梁山匪魁，项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应桂馨追电申明己意，并告已下达刺杀令，请“转呈候示”。转呈对象，袁世凯、赵秉钧也，候示者，有什么指示。应桂馨希望转呈，关键洪述祖转呈了没有，会不会转呈，能不能转呈。只要袁世凯看到电文，知晓内情，且未下令阻拦，那就是主观故意，“主谋”说便可成立。袁世凯知晓与否，此处不可确定。

第43组，《洪述祖致应桂馨电》（3月18日）：“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

第44组，《洪述祖致应桂馨电》（3月19日）：“事速进行。”此段文字与上列文字均为洪述祖的行动催促，未语涉袁世凯。

第45组，《应桂馨致洪述祖电》（3月21日）：“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此为刺宋行动实施后的第一份电报，希望转呈。但袁世凯知晓与否，同样不可确定。

第46组，《应桂馨致洪述祖电》（3月21日）：“匪魁已灭，我军

① 《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3月9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66页。

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此为第二份电报，报告战果，并请转呈。但袁世凯知晓与否，同样不可确定。

第50组，《应桂馨令朱荫榛稿》（3月20日）：“照得本属公费，奉中央核定，按月由大总统拨给洋二千元，以济公需在案。兹自二年正月至三月，共三个月，计应请领公费洋六千元正。特缮具公文一角，印领一纸，令仰该差员朱荫榛，即日赍赴北京，亲投总统府，呈递领款回南，勿得玩误。”^①此为委任状，系派朱荫榛进京代领江苏驻沪巡查长“由中央拨付”的每月二千元经费，共三个月计六千元。此处“大总统”显然与“宋案”无涉。

上列各电函，无处可证袁世凯主故涉案，没有一条属于犯罪学上的证据，从此可见，传统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袁世凯为主谋的依据事实上根本不成立。洪氏电函，不仅一面之词，而且充斥谎言、大言和假言。上述“毁宋酬勋位”，即为一例谎言。又“冬电到赵，即交兄手，面呈总统”，也属虚构，纯粹假言。赵秉钧驳道：“各部员司谒见总统，向有该部长官带领，总统府门禁森严，来宾均先由传宣处登记。本总理既无带领洪述祖谒见总统之事，而查阅总统府门簿亦无洪述祖之名，其为不根之谈显而易见。”^②另冬电致总理，可直接呈交总统，何必转手小小内务部秘书面呈。“即交兄手，面呈总统”，明显大言。

六、小 结

综合以上，从袁世凯的一贯信仰和当时的身份、地位，从宋教仁

① 以上所列电函均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刺杀宋教仁案”一节。

② 《赵秉钧致各省都督民政长自辩通电》（1913年4月28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27页。

对袁世凯构成的威胁程度，从在上海行刺的困难程度，特别是对“主谋说”原证据的逐条解读考析，我们认为对袁世凯的传统指认是缺乏真实依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没有主观故意的痕迹，正如他自己所辩：“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甲乙谋杀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① 没有其他相应证据，仅凭洪、应往来函电认定同案，法理上确实不能成立。

袁世凯因“宋案”而得罪党人，受疑天下，之后“主谋”渐成定论，长期背着沉重黑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宋案”的受害者。

^① 《袁世凯为宋案复黄兴电》（1913年4月2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262页。

民初总理赵秉钧的悲剧

王晓华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进入二十世纪第十一个年头，中国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内阁制度。中华民国第三任内阁总理便是赵秉钧，时在1912年8月。

袁世凯也曾许下诺言，如自己能上台当大总统，就让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然而，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顶得厉害，最后双方妥协，推出唐绍仪这个折中人物为内阁总理，赵秉钧“屈就”内务部总长。但唐绍仪只是个摆设，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在王之祥任直督的问题上，袁世凯竟违反约法，在内阁总理未副署之时，隔过内阁，擅自做主。唐绍仪一怒之下，负气而去，才干了三个多月。

这样，赵秉钧呼之欲出，而袁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尘埃已定。赵秉钧对于袁世凯，是亲信，是心腹，更是股肱之臣，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奴才。是奴才，总会有代人受过的时候，总有“奴才该死”的那一天。

一、赵秉钧其人其事

清咸丰、同治年间，河南临汝县的街上，有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要饭孩儿，无爹无妈。有好心人问其身世，这孩儿便说：“俺不

问爹妈是谁？家在何方？哪年哪月生的？只知小时候被人贩子拐了，天天不是骂就是打，俺只好逃出来到处要饭。”

那位好心人见这个孩儿口齿伶俐，头脑管用，不由动了恻隐之心，领其回家并送其去念私塾。先生按《百家姓》取姓名为赵秉钧。就这样，此人的姓名、籍贯、生日皆凑合有了。

后来有人说赵秉钧不学有术，不亏“智庵”。其实他也念过几年私塾。书法写得不错，章士钊说：“赵智庵吾未尝见过也。彼以营书起家，后来作小尺牍，字颇不俗。吾却见其与蠖数札，纸八行作三四行写，殊飞舞可观。”^①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赵秉钧学会另一种本领，即如何看人脸色行事，这是在白眼和打骂的煎熬中，忍耐、磨炼出来的“财富”。成人之后，为不被人欺负，赵秉钧又学了儿套拳脚功夫。于是到衙门中当了一名捕快；后由捕快升为捕头，又由捕头升为牢头，居然也混得体面起来。

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征讨白彦虎。赵秉钧投军，隶属张曜部。原来，在太平天国后期，赖文光等太平军到达陕西，陕甘地区回民纷起响应。后在甘肃宁州形成白彦虎等十八营。1872年左宗棠西征兰州，大破白彦虎部。白彦虎遂率军西退星星峡，进入新疆地区；并与俄国阿古柏侵略军勾结起来，欲自立为国。左宗棠奉旨远征新疆，率大军出玉门关。有道是：“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赵秉钧随先锋官金顺进入星星峡戈壁滩时，遇上暴风雪。他连人带马，陷入齐腰深的雪中整整三天三夜，几乎冻馁而死。幸亏他的身体被压在马腹之下，仅赖马体些微体温，未遭冻僵。在奄奄一息时，一位蒙古军医撬开赵秉钧的嘴巴，用葫芦中的马鹿血灌入，终于

^① 章士钊：《书赵智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2页。

使他苏醒过来。然而，赵秉钧久被压于马下，筋骨折伤，虽有伟男之躯，却形同虚设，一生不能近女色。^①

1905年，清廷改制，设立巡警部。赵秉钧升任清巡警部侍郎以后，官邸建在内务府街，豪华气派。扬州有某盐商为得到运盐的特别执照，绞尽脑汁去打听赵秉钧的嗜好。终于知道赵侍郎年逾不惑，尚未婚配，特地从江南挑选了一个未开苞的雏妓，认作女儿，托人说合，给赵侍郎做妾。并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妆奁和厨娘、大姐。赵秉钧来者不拒，大摆宴席，广待宾客。一时冠盖如云，热闹非凡。新婚三日，此妾下厨，会烧一手正宗的维扬菜。

赵秉钧是干特务的出身，认为将此女留在身边，早晚是个祸害。没过几天，他便以“吴语不通”为借口，将其遣回。这件事表面上是水不惊、鱼不跳，只有与赵秉钧相交颇深的巡警厅丞朱启铃知晓个中蹊跷。他后来透露说：“赵侍郎年近五十，唇上无须，貌类阉寺，其伤残不堪御女，置妾何用？”赵秉钧因为身体残疾，只能与鸦片烟相依为命。^②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2月，中英两国就鸦片泛滥严重的问题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十年禁烟协议。光绪皇帝在上谕中说：“……我若不如期禁查，何以答友邦政府之美意？何以慰各国善士之苦心？此机一失，时不再来。若永远困于沉痾，势必无以为国。”

清廷严令合朝文武百官立即戒烟，否则将予以严惩。于是翎顶貂裘的王公大臣们皆口是心非地表态：从此坚决与阿芙蓉一刀两断。有的还烧了烟具，一副金盆洗手的模样。当时，京师内外，以戒烟而死

① 关于赵秉钧的材料，均采自朱启铃致章士钊的几封信。朱启铃在前清时与赵秉钧同为巡警部同僚；北洋政府时，赵秉钧为国务总理，朱启铃为交通总长，他的说法是可靠的。

② 关于赵秉钧的出生材料，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46页；章士钊：《书赵智庵》。

者，不在少数。

身为民政部右侍郎的赵秉钧，却具折向慈禧太后要求免其官职，准予告老还乡。慈禧太后认为，当官的没有不恋栈的，何独赵秉钧要辞职呢？于是单独召见，问其原因。赵秉钧跪奏：“臣昔年投入金顺大军西征，在星星峡被大雪掩埋，伤筋折骨。只能依赖洋药（即鸦片）苟延残喘。今朝廷严令戒烟，必要微臣性命，恳请将臣开缺回籍，以维残年。”慈禧太后网开一面，特准免赵秉钧戒烟。有了这块“免死金牌”，赵秉钧抽大烟是奉了懿旨的。

二、中国警察制度的作俑者

赵秉钧西征时，袁世凯尚未发迹，但其叔父袁保恒以翰林奉旨监军，赵秉钧的精明能干给他印象极深。从新疆归来，赵秉钧在河南做过典史；1895年，经袁保恒推荐，入袁世凯幕中，充任营务处委员。但他与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不是一路，那几位专攻练兵布阵；而赵秉钧钻研侦探与警察两门，独辟蹊径，开创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之滥觞。加上他为人处事，很有心计，于是大得青睐。

1900年，义和团风起云涌于北方，打出“扶清灭洋”的大旗，控制了京津一带，引起八国联军镇压。不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病死，袁世凯补其遗缺，驻防天津。当时天津正处于清军与八国联军协防之际，一部分地区被外国军队控制。中外双方因权限之争，经常引起纠纷，交涉频繁，搞得袁世凯也很头疼。幸亏有赵秉钧手腕灵活，处理妥当，与天津租界的各国巡捕协调警务，与洋人杂错相处，因应咸宜，化干戈为玉帛。袁世凯便任其充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为与各国的警察制度接轨，赵秉钧招聘了不少日本教官，用外国教材和路数训练中国新型警察。

1905年，清政府决定派出五大臣去欧洲各国考察宪政。9月24日，第一次出国访问的五大臣，在五城御史及步军统领衙门官兵的保护下，神采飞扬地在正阳门车站登上火车。一个名叫吴樾的革命党人，提着个竹篮混上火车，篮子上覆盖了一块布，下面藏着两枚土造炸弹。当车轮启动时，猛然震动，两枚炸弹碰撞在一处，“轰隆”一声巨响，血肉横飞，硝烟弥漫。吴樾当场身亡，五大臣受了轻伤和惊吓，此事件震动朝野。

赵秉钧见时机已到，建议袁世凯：“五城御史及步军统领衙门不能保护治安，当今各国皆行警察制度，朝廷应该立即设立巡警部，京城内外设巡警厅。”经袁世凯争取，朝廷终于改革机构，设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为左侍郎，赵秉钧为右侍郎，负责管理部务。其时，皇族官僚皆住内城，旗人、汉人，包括百姓、商贾、引车卖浆者流以及革命党杂处其中。治安状况混乱。新官上任三把火，赵秉钧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整顿治安：

1. 设京师内外巡警厅，各司其责，分段治事；
2. 实行巡警站街值勤制度，以代替五城御史巡街之责；
3. 调查户籍，以便控制管理外来人员；
4. 处理百姓违警之罪。

他任命王治馨为内城巡警厅丞，朱启铃为外城巡警厅丞，将辖区管理得头头是道。不久，巡警部权利范围扩大，改为民政部，将工部、礼部、太常寺、鸿胪寺皆归并其中，统一其责。

1908年11月，朝廷发生七级地震，风烛残年的慈禧太后已走到生命的尽头。而奇怪的是，光绪皇帝却抢在老佛爷之前“驾崩”。这件公案也成为清王朝最后岁月中的难解之谜。有人传言，慈禧在垂危之际，叫人谋害了与之不合的光绪皇帝；还有人言之凿凿，认为是袁世凯的阴谋，出谋划策的便是赵秉钧。几十年后，朱启铃认为此种说法系空

穴来风、无稽之谈。朱启钤活到九十二岁，生前做过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及一届国务总理。朱启钤与赵秉钧皆为佐杂官出身，又是直接关系，两人交谊密切。朱启钤的话，应该可以相信。

光绪死后，慈禧太后以光绪之弟载沣之子溥仪即位登基，载沣摄政监国。载沣想为光绪报戊戌变法失败之仇，欲杀袁世凯。朝中军机大臣张之洞和庆亲王奕劻竭力反对；加上北洋各镇都是袁世凯的羽翼，恐生变故。于是载沣只得宣统帝名义，明降上谕，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借口，“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袁世凯采纳赵秉钧的韬晦之计，离开京城，隐居安阳洹水之上。披蓑戴笠，垂钓嬉戏，装出一副悠游林泉的模样，掩人耳目。但他所居的养寿园的绿树深处，竟秘密架设着电报天线，随时与京中党羽信息往来，静观风云变幻，以图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相继独立。清廷竟无人收拾鱼烂之残局。袁世凯操纵汉口前线的北洋军，不听指挥。清廷只好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将大权交出。在袁世凯内阁中，赵秉钧为民政部大臣。此时，南方民军与北洋军正在交战，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向袁世凯承诺：如果能使清帝退位，就将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

在波诡云谲、大局未定之际，赵秉钧出了个怪招，即令全体阁员罢工，不上朝，这叫“搁车”，将朝政晾在一边。一下子憋了好多天，把个隆裕太后急成热锅上的蚂蚁。

三、功高震主，袁世凯以总理职位酬谢

1912年2月，袁世凯“逼宫”，清帝逊位。抬轿子吹喇叭，干实

际工作的却是赵秉钧，袁世凯是坐享其成的。原来，赵秉钧家中有一麻脸大管家，身躯伟岸，点子极多，常与宫中的太监小德张过从甚密。小德张是隆裕太后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虽说不像明代的“秉笔太监”能批红，但也是说了算的角色。赵秉钧用金银财宝贿赂麻脸管家。小德张软硬兼施，连哄带吓唬：“皇上早点颁布退位诏书，还能弄个优待什么的。否则，性命难保。”

隆裕太后抱着六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失去主见，一点法儿都没有。眼看火候已到，袁世凯这才压着四方步，晃悠悠进了紫禁城的东暖阁，见了隆裕太后一个劲地擤鼻涕，用手巾擦着泪说：“皇帝不退位，革命军就北伐，看咋办吧？”隆裕太后搂着小皇帝最后说：“你看着办吧。”袁世凯暗暗得意，说：“那行，即刻下诏宣布退位吧。”在无可奈何之中，孤儿寡母只好垂泪写诏退位。于是南北停战，天下共和。孙中山不失诺言，当即宣布将民国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这一切的运作，少不了“智庵”的功劳，于是答应第一任内阁总理“非赵兄莫属”。

孙中山为防止袁世凯独裁，践踏民主政治，欲实行“责任内阁制”来制约袁世凯。孙、袁斗法，起初革命党势力犹强，袁世凯只得暂时妥协，将第一任国务总理给了南北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唐绍仪。他虽然与唐绍仪是老朋友，但还是窝了一肚子气。唐绍仪却励精图治，不时地向袁世凯提一些新建议。袁世凯先前还应付，后来干脆沉下脸，不耐烦地说：“少川（唐绍仪之字），我已经老了，你来做总统吧！”唐绍仪如梦方醒，大受刺激，知与虎谋皮，大祸临头。于是偷偷留下一张请假条，借口患了“风热”，一去不回头。

第二届内阁总理换了个“洋博士”陆征祥，此人是个书呆子。他自诩为“名流内阁”总理，也只是银样镞枪头，尸位素餐，没有三个月，袁世凯把陆总理摆治得像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名流”内阁总理，变成了“贼流”内阁总理，搞得灰头土脸，只得宣布辞

职。总之，不是袁世凯的心腹谁也别打算干下去。国务总理一职，自然落入赵秉钧的夹袋，他还兼任内务总长一职。

孙中山、宋教仁为了牵制袁世凯，游说赵秉钧加入国民党。赵总理去向袁世凯汇报这件事，不料，袁世凯笑着说：“那好啊，宋教仁不正到处鼓吹要搞政党内阁嘛？你加入国民党，就是政党内阁，就可以向我夺权啦！”赵秉钧大惊失色：“大总统，你这样讲，我可担待不起，这顶大帽子太大……”

袁世凯哈哈大笑：“我不过是和你开玩笑。不过，你该参加还是参加，我们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打听孙中山等人的动静。”

在老同盟会会员、内务部会议事务局局长、开封籍人氏程克的介绍下，赵秉钧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相识，并谈得很投机，建立了较好的私谊。不久赵秉钧的胸前，也挂起国民党的证章。

四、背黑锅，成了“替罪羊”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踌躇满志，带着一整套政党内阁和省长民选的主张，准备从上海动身北上。在沪宁车站与前来欢送的黄兴等话别，转身向检票口走去。这时，在黑暗中，一个刺客向他的后背打了黑枪，伤在要害。延至22日晨4点47分，宋教仁在上海医院不治身亡。悲痛万分的黄兴将此噩耗电告袁世凯、国务院及参议院。袁世凯当即下令缉拿凶手。

不久，宋案的凶手武士英、应夔丞很快就被上海租界捕房擒获。搜查出来的证据表明：他们与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有密电往来，而洪述祖直属赵秉钧领导。案发不久，3月24日，洪述祖忽然潜出北京，逃往青岛。这一来，赵秉钧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兴致电袁世凯，明确指出：“此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

犯。”上海的民众团体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披露，涉及二公。望总统以国法为重，掣同总理即日辞职，接受法庭之裁判。”后来，几乎所有的史料和文章，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赵秉钧谋杀了宋教仁，这已成历史的铁案。而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其实，洪述祖隔过赵总理，直接听袁世凯的指令，赵秉钧对此很恼火；更不愿代人受过，背上不仁不义的骂名。根据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

1913年3月21日上午，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星期二、四、六国务院例开会议）。总理赵秉钧与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旁设一席，以书记录。

根据条例规定：国务会议时，除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和第三科科长担任会议记录外，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会议进行中，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然闯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得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

赵秉钧听完脸色大变，猛然站起来，手背拍着手掌，环绕长长的会议桌转了一圈又一圈，口中喃喃地反复念叨着：“人家岂不说是我打死了钝初（宋教仁之字）吗？岂不说我卖友吗？哪能算人？”^①

他这种失态的举动，使在座的阁员们皆面面相觑，不敢出声。过了一会儿，一位秘书进来报告：“大总统来电话，请赵总理即刻去公府。”

赵秉钧这才缓过神来，说：“诸位，我去去就来，接着再开会。”说完仓皇而去。阁员们伸长脖子直等到12点多，也不见赵秉钧的影子，饥肠辘辘，只得各自散去。但赵秉钧关于宋教仁被害的那些话，却给在场的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赵秉钧知道，社会舆论会将杀宋教仁的罪名栽到他的头上。因

^① 《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为，宋教仁北上的目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争取国民党组阁，当责任内阁总理。那么，宋教仁即是袁世凯与赵秉钧的政敌。人们肯定认为宋教仁之死与赵秉钧有关。

3月28日，赵秉钧径直去总统府见袁世凯，拿着《申报》说：“大总统，报上说我主使洪秘书，收买杀手谋杀宋教仁。听说几天后上海会审公堂要进行审判。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要辞去总理之职，去上海与凶手进行对质，到底是不是我干的，总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袁世凯内心有鬼，却另有一番说辞：“你不干总理才会授人以柄，如果单凭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往来电报就算证据，黄兴不是也与应夔丞有密信和银钱往来吗？就算洪述祖有罪，就能说是总理犯罪吗？”

3月30日，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追悼宋教仁大会，参加者有千余人。赵秉钧特派亲信王治馨为代表，前往参加追悼会。而群情激愤的国民党员看见赵秉钧的代表，更是火上浇油，纷纷指责宋案为赵秉钧所为，要求赵秉钧到会说明。王治馨为赵秉钧辩白：“洪述祖虽说是内务部秘书，但他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赵总理无关，总理对此毫无预闻。我这里有洪述祖与应夔丞的来往电文，请主持会议的吴景濂先生查收。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决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说话听音，锣鼓听声。显然，王治馨的话，意有所指。在场的记者们迅速将其讲演内容见报。次日，袁世凯怒气冲冲将这段消息的剪报递给张国淦说：“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想干什么？”

“宋案”发生后，赵秉钧称病，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避入法国医院。数日后回自己家，约张国淦见面。赵秉钧神色张皇，对张国淦连连作揖，口称：“有一件事求君帮忙！”张国淦诧异地问：“何事？请你只管说。”赵秉钧说：“我现在只求免职，才可免死。”张国淦问：“何至如此？”赵秉钧说：“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就非死不可。须君向

各个方面进行转圜。由段祺瑞做总理，事事好办！拜托，拜托！”^①

当时有国务院一位庶务秘书程世经（即京剧泰斗程长庚之孙），是赵秉钧的亲信，了解一些内幕，在案发前曾对人说：“洪秘书（即洪述祖）奉赵总理之命去沪，临行前进总统府谒见总统。洪秘书到沪后有数封密电是经我手转给总统府的。”“宋案”发生后，程世经畏祸，避至青岛。

袁世凯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要杀人灭口。王治馨后来招来杀身之祸，根子实基于此。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了一段谈话，他说：“我和宋教仁，一任内务总长，一为农林总长，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的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还的。”这其实是实话，当时刊登出来，却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上海会审公堂在审问“宋案”凶手时，武士英一口咬定：“因为宋教仁要当总理，所以我要杀他！”但在4月24日，武士英七窍流血，暴死于监狱的牢房中。

黄兴闻讯立即怒气冲冲致电袁世凯：“此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即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能上诉至中国法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相扰，此实为一大疑问。会审公堂应将此案移交中国方面，在上海组织一个特别法庭来进行审理。”

赵秉钧通电辩解：“关系洪（述祖）案，自出于本总理及政府意料之外，且洪述祖虽系内务部秘书，然内务总长于其行政法上之犯罪，虽有怠于监督之责任，于刑法上之犯罪，则无代为受过之理。”

^① 《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司法总长许士英认为司法程序不符，无此先例，反对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结果，弄巧成拙，越描越黑。而袁世凯则利用各地报纸纷纷谴责之形势，暗示宋案为赵秉钧所为。

1913年5月3日，赵秉钧借口有病，要求辞国务总理和内务总长职。袁世凯不准，令给假十五日，“俾资调理”。6月15日，赵秉钧再上辞呈，袁世凯批令再给假半月，所请仍毋庸议。赵秉钧第三次辞呈，袁世凯心知肚明，赵秉钧是对他有意见，故于7月16日，令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辞职，令其改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没过几天，又任赵秉钧为北京警备司令官。为了羁縻赵秉钧，袁世凯又令赵秉钧的亲信王治馨代理内务总长，后令署内务次长。

1913年12月16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署理直隶都督，调其去了天津。这一举动，说明袁世凯对这个不听话的“智囊”已不再信任，赵秉钧真的走到“走狗烹”的地步了。某晚，赵秉钧与其书记官黄季刚饮酒长谈。赵秉钧神色惨然地说：“天下杀机已开，我也不知杀了多少人；然而我被人杀的日子也不远了。”黄季刚大惊，急问：“何出此言？”赵秉钧摇摇头：“你等着看吧！”

这时，袁世凯、赵秉钧二人的依存关系不复存在，赵秉钧不欲代人受过的言行，令袁世凯如芒在背，于是动了杀赵之心。他了解赵秉钧的饮食习惯，知道赵秉钧平常最好吃葡萄，遂将新疆进贡之葡萄，用毒针射入毒剂于其中。他收买了赵秉钧手下的一个特务，以大总统的名义去给赵秉钧送去葡萄。赵秉钧虽有怀疑，却不敢推辞，勉强吃了一串。没过一顿饭的工夫，便感觉腹疼如刀搅一般，急忙上厕所，则大泻不已。其家人奇怪为何赵秉钧进去半天不出来，等进去看时，赵秉钧已僵死在厕所之中。时为1914年2月份。^①

^① 章士钊：《书赵智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2页。

消息传来，袁世凯急召内务总长朱启铃进府商议赵秉钧后事，特派朱启铃代表大总统去天津治丧；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代表袁世凯个人与朱启铃同赴天津吊唁，给予极高的规格，备极隆重。袁克文在《丙辛秘苑》中说：“予就赵尸，见其目合口张，面肤青灰，握其右手，指尚微柔，开而不敛，指甲青紫，唇黑紫，似有涎流出已经试涤者。臂肉坚，亦青色。”^①

五、身后哀荣与当事人的下场

袁克文是著名书法家，代其父为赵秉钧撰写挽联。在赵秉钧的灵堂上，中置赵秉钧身着北洋上将军大礼服的大幅遗照；上有横额为“沧怀良佐”；两边的楹联为：“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复殊勋懋管萧。”落款为“大总统”。挽联中用了四个历史人物的典故，即皋、益、管、萧。皋即皋陶，为舜之贤臣，掌刑狱之事，寓意赵秉钧曾掌管巡警部；益是大禹有功之臣；管即管仲，为齐国之相；萧为萧何，是西汉之名相。该挽联将赵秉钧比作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又反衬出袁世凯是英明之君，用心良苦。

袁克文只知道“赵为先公所最赏，论为上材，畀以直督”，对其间复杂曲折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故对外间“或谓（赵秉钧）为先公所杀”，认为是“殊诬之甚也”。^②

赵秉钧大殓后，其棺暂厝赵宅后院之中。有人议论，应将其葬在崇陵之旁。崇陵即光绪帝之陵墓。原来这其中有个故事：清末有个官僚叫梁鼎芬，由湖北按察使升迁广东宣抚使。未及赴任，武昌起义爆

^{①②} 袁克文：《寒云日记·丙辛秘苑》，《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4辑，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发，他逃至北京，因无官可做，去晋见清逊帝溥仪，溥仪只好封他为崇陵种树大臣。他在清西陵入口处小山坡上的一座龙王庙里住了三年，一切生活费用，均由赵秉钧提供。梁鼎芬对此感激不尽。赵秉钧死后，梁鼎芬提议在西陵旁边，用修建崇陵剩下的材料和人工，为赵秉钧营建墓地，并改龙王庙为赵公祠。工程由赵秉钧一手提拔的一个叫马荣的人负责。墓地建好后，大约在1918—1919年棺木下葬。赵秉钧所谓的“家人”，只有一妾及一子。所谓妾，不过是个灶下烧火的婢女，荒年在河南从难民手里买来的，一个字不认识。那个儿子，只是收养的螟蛉子，后来被赵秉钧之妾害死，大约为争夺财产吧。另外还有两个侍奉赵秉钧起居、开饭、烧烟的变童，赵秉钧一死，就树倒猢猻散了。

“宋案”的参与者与知情者，皆没有好下场。王治馨虽任内务部次长、代理总长，赵秉钧一死，就被免官。肃政使夏寿康等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名弹劾王治馨在京兆尹任内，定价卖缺。其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14年10月21日，袁世凯以贪污五百元的罪名，将王治馨押入死牢。王治馨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人，袁克文说：“与王有谊者，如阮忠枢、雷震春、江朝宗、段芝贵等十数人，咸跪于先公（即袁世凯）前，或请褫勋为赎，或请罢职为赎。先公一一扶之起，笑曰：‘王治馨乃小站旧吏，予必有以处置。’阮等见先公无死之之意，欣然退。先公命法吏至，诏之曰：‘王治馨一案，密讯勿泄，立定罪。可代拟一令，与判书同进。事宜速，勿使一人知。’法吏承命。”就这样，王治馨在未经过司法审判的情况下，又未经过大理院复核，被袁世凯直接下令“立予枪毙”。23日深夜，由他的好友江朝宗监刑，将王治馨押至高化门外刑场，由军法处将其处死。王治馨永远闭上了那张不甘寂寞又无遮拦的嘴。

事后，袁世凯假惺惺地对江朝宗说：“王治馨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与我相知二十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不是我非要他死，而是宪法刚刚颁布，不可枉法。而王治馨的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袁世凯遣人发给王治馨的家属一千块大洋，令厚葬之。

洪述祖潜逃后，在京奉铁路火车的包厢中暗杀了另一知情者、即越狱逃跑的应夔丞。洪述祖本人在袁世凯死后，堂而皇之地露面。没想到天网恢恢，他在上海的大街上，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撞个正着，扭送捕房。1919年3月，被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庭判处死刑，在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执行绞刑。该绞刑机刚从国外进口，第一次使用，而洪述祖身体太胖，竟将绞机坠断，洪述祖本人身首异处。洪述祖死前，赵秉钧已死多年，而洪述祖在辩护书中，却未涉及宋案为赵秉钧指使。如果真系赵秉钧的命令，洪述祖亦无须替其遮掩，如此反而能减轻其罪行，何而不为呢？

还有一名原国务院庶务秘书程经世，在1919年也病死了。总之，案件的一系列知情者都死了。然而，赵秉钧却代人受过，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这也算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否应当改正呢？^①

^① 赵秉钧的材料，参见王晓华：《京华名士袁寒云》中有关章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重评北洋时期冯玉祥治军

郭绪印

(上海师范大学)

冯玉祥从1902年投入北洋军，到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脱离北洋军序列，他在北洋军中达二十二年之久。他在治军模式、作战理念等方面，不可避免受北洋军的影响，但他的治军模式却没有全盘因袭北洋军的一套，而是多有创造性。他的治军，对北洋军来说一方面是一种“变异”，^①另一方面也承袭了北洋军的“家长制”传统。学术界前人早有阐述冯玉祥治军的著述，^②但大都列举了有关史实，未能综合归纳、各有异同，未能进一步分析原因，尤其是仅阐述了他积极的方面，而未能指出他受到北洋军阀影响的消极方面。这就无法理解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一败涂地、三十万军队迅速土崩瓦解的原因。本文不同于前人著述的方面在于进行了梳理、归纳，选择了重点，尽力探索其原因，认为北洋时期政治环境“宽松”成为冯玉祥独立推行治军方式的重要条件。并提出其受北洋军阀影响的消极方面。不妥之处请专家们赐教。

① “变异”一词原出于生物学，同一起源的生物体之间在形态特征或生理特征等方面所表现的差异。此处引用于历史学。

② 如高兴亚遗稿：《与冯玉祥谈话的回忆》、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张知行《西北军练兵的一些特点》等。这些著述的出版社等，本文中另有详注。

一、冯玉祥治军对北洋军的“变异”

北洋军阀起源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随后北洋六镇奠定了北洋军阀的基础。北洋军一方面成为中国军事全盘近代化的产物，成为军事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是既维护晚清腐朽统治，又维护外国侵略者在华利益的工具。就这支武装力量的特色来说，反动和卖国是其基本方面，但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中国军事的全盘近代化。然而，北洋军中起家的冯玉祥部，却成为一支“变异”的武装力量。冯玉祥从担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到担任陆军检阅使驻北京南苑练兵期间，所表现出的治军思想与实践，显然构成了对北洋军的“变异”。主要表现如下：

（一）提倡爱国教育

冯玉祥从就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起，每到一地即抓紧时机练兵，在练兵过程中，不仅注重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的培养，而且突出对官兵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北京南苑任陆军检阅使期间，编写了《爱国精神》等小册子，还将八国联军、中日甲午战争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件和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史实为素材，并亲自编写了《国耻歌》向官兵讲解，教官兵歌唱：“军友们大聚齐，我把如今的事提一提：恨又恨国家受人欺，甲午年日本来侵犯，夺我大沽口，赔款割台湾。庚子年列强来侵犯，夺旅顺、抢大连，强占我胶州，割据广州湾。……”^①

可见歌词竭力唤起民族危机感，而语句朴实，通俗易懂，适合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官兵歌唱。

^① 冯纪法：《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十五年》，《回忆冯玉祥将军》，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

冯玉祥每晨赴操场阅操时，常集合队伍或部队头目进行一系列精神教育问答，例如问：“你们为何要当兵？”答：“保国卫民，捍御外侮！”^①1922年12月6日，冯玉祥集合学兵讲话：“民国元年，京保兵变，外人以保护外侨为名，增兵中国，此亡国之征也。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冯玉祥批评当今的某些部队“外侮不能御，内患不能平，反到处骚扰苛索，甚于盗匪”^②。1923年1月6日，冯玉祥集合官兵讲话，宣传民族危机，指出：“俄白党将侵我外蒙，日本将侵我内蒙。吾军当此危难交迫之秋，应如何自惕自勉？”^③9日，冯玉祥对四十三、四十四两团讲话中指出：“自欧战结束，一般人都说公理战胜强权，人道战胜兽道，实则在今国际间，尚未达到那步田地。……故我辈军人，生此弱肉强食之时代，当思捍卫国家，保护疆土。”^④15日，冯玉祥为学兵团讲话说：“国家养兵所以安内攘外，当此国家将被（注：列强）共管之时，切宜振奋精神，御此外侮。”^⑤

冯玉祥重视利用五七国耻纪念活动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4月27日，他集合营长以上官长及各处处长、参谋，告以5月7日为吾国奇耻大辱之纪念日，各团营门外须扎标牌，中间大书“国耻纪念，万不可忘”八个字，左右书“二十一条”，是日唱国歌并对国旗敬礼。又说：“是日，全军须高声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三声，并放大炮十余响，以唤醒醉生梦死之北京人也。”^⑥5月7日国耻纪念日，

① 《冯玉祥日记》1922年12月1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册，第263页。（以下凡引此书不再重注版本，只注日记的年月日）

② 《冯玉祥日记》1922年12月6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不重注版本，只注日记的年月日）

③ 《冯玉祥日记》1923年1月6日。

④ 同上书，1923年1月9日。

⑤ 同上书，1923年1月15日。

⑥ 同上书，1923年4月27日。

冯玉祥于晨6时半集合营长以上官长讲话，共讲了六条，大意是：“卧薪尝胆，誓雪国耻”，其中讲道：要“推翻阻碍爱国运动之势力者”，“国势危殆，决非狂言壮语所能挽救，全赖拿赤血黑铁去拼。”他在此提出的要“推翻阻碍爱国运动之势力者”，显然是暗示直系北京政权，为其不久之后发动“北京政变”作出舆论准备。五七当日，冯部举行了阅兵式等仪式。部队于中午用餐时，馒头上一律印有红色“勿忘国耻”四字。12时，冯玉祥集合全军及各界来宾、各校代表讲话，举出韩国亡于日本的沉痛教训，并指出日本国对我国的蛮横行为。他说：“韩人于亡国之后前仆后继，反对日本，志固可嘉，时则太晚，是可惜耳。吾人惜韩人，千万勿令后人惜吾人也。”^①这天冯军还举行了实弹演习，为纪念国耻，将日本军队扮成假设敌人，施放地雷。

18日，冯玉祥集合营长讲印度、高丽亡国惨史，他说：“吾人当乘国尚未亡之时，努力奋斗，免致国亡以后欲爱国而无从也。”^②6月7日晚间，冯玉祥集合教导团、手枪营、学兵团、差遣队讲话，其中讲：“日本房屋出租时，上书除中国人与高丽人均可来租。如此侮辱，大家勿忘也。”又说：“物必先腐，然后虫生之。当局诸公曷不知此言耶。”“国家已到此等地步，一班要人犹复拥姬未醒。”^③

以上可看出冯玉祥结合当时中国民族危机形势，经常、反复激发部属的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尊心，同时也从其“物必先腐然后虫生之”的言论中，透露出他对当局的不满，成为他在不久之后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为首的中央政权的原因之一。

① 《冯玉祥日记》1923年5月7日。

② 同上书，1923年5月18日。

③ 同上书，1923年6月7日。

从北洋军的整体来说，与爱国主义大相径庭，以致背道而驰。冯玉祥部作为北洋军序列中的一部分，从1918年起属于直系。冯玉祥部在北洋军阀统辖下，能够对部队推行爱国教育，其原因如下：

客观原因：

1. 当时中国在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之后，掀起了民族危机思潮，有正义感的军人也以卖国为可耻、爱国为荣耀，这一思潮影响到冯玉祥对部队进行爱国教育。

2. 北洋军事集团中派系矛盾尖锐，派系互相攻击中常以对方卖国行为为把柄，同时将自己方面标榜成爱国者，例如直皖战争前，直系以揭露皖系卖国行为大肆制造舆论，如此一来既激发直系士气，又造成皖系士气低落。这些客观氛围也影响到冯玉祥以爱国主义作为对属下的凝聚力。

主观原因：

1. 冯玉祥虽然受正规学校教育很少，但靠自学并向部队中有文化的人讨教，读了很多书，例如他早年即读过《饮冰室文集》、《纲鉴易知录》，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施公案》、《彭公案》，请人为他讲《论语》、《孟子》，后来又读了孙子兵法、中外军事名著、《曾文正公全集》、《曾胡治兵语录》、《孟子要略》等等；辛亥革命前读了《大彼得》、《哥伦布》、《富兰克林》、《班超》、《司马光》等几十本少年丛书。既有“耳目一新”方面，又受到了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影响。滦州起义前，冯玉祥与革命党人接触中，接受了革命思想，据冯玉祥自述：“余为督队官时，即变忠君之志，而抱革命思想。”^①从此，改变了“忠君”思想为“革命”思想，但却保留了并发展了传统的爱国思想。他在北洋军第二镇，后改编为第二十镇时，参与组织秘密革

^①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命团体“武学研究会”，参加筹备滦州起义，响应辛亥革命。以后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参加讨伐张勋复辟。总之，冯玉祥的民主共和意识和爱国思想是有一定底蕴的。

2. 冯玉祥是一位有雄心大志而又有政治眼光的军人，他憎恨当局腐败^①，力图有所作为，他感到爱国主义符合时代潮流，爱国得军心、民心，何况他具有响应辛亥革命、参与筹划滦州起义和反对帝制复辟的光荣履历。

3. 冯玉祥意识到要和当局腐败势力作斗争，必须以爱国主义作思想武器。古代名将大都以“忠君”为有力的思想武器，并以“忠君”加强部属的凝聚力。现在民国废除了君主制，爱国主义便成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部队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冯部当时在北洋军中是弱勢团体，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就使他的部队在精神支柱上成为强者。

4. 冯玉祥年轻时亲身感受到民族灾难，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期间，他所在的练军部队溃逃，冯玉祥只得在保定城东一位姓赵的朋友家避难，亲眼看到外国兵对中国老百姓惨无人道的欺压，尤其是日本兵“拿老百姓当靶子，随意瞄射……奸淫的事更是层出不穷”^②。亲眼看到同胞不堪外国侵略者凌辱，痛不欲生，投海、跳城、上吊，有一户十数口人一同投井自杀。血淋淋的事实激发了冯玉祥的爱国、救国之志。

以上四方面是冯玉祥大力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层次原因。

（二）提倡为百姓服务

北洋军事集团就整体来说是残害百姓的武装力量。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肆意烧杀、草菅人命的现象十分普遍。然而从北洋军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369、383—389、397、398页。

②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0页。（以下引此书不再重注版本）

中起家的冯玉祥部却一反北洋军事集团的惯例，冯玉祥教育部队爱护百姓，并在部队中提倡为百姓服务，这方面又是冯部对北洋军的“变异”现象。

提倡为百姓服务是冯玉祥治军的又一特色。他经常向部队宣传：军人“以保民为天职，以利人为人为主义。须知爱人者人恒爱之；利人者人恒利之”^①。冯军驻处，冯玉祥大都令军医为老百姓施诊；全部队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修建桥梁、道路，改善交通；为地方上打扫垃圾，清理环境，并由军队带头，在地方上开展“灭蝇运动”。冯部驻北京南苑期间，“又在各团部设平民学校一处，以本团官佐为教员，每校学生约三五十名不等，凡南苑附近居民无力求学者，至是皆有求学机会”。^②

冯玉祥得知医院中有贫穷无钱购血而急需输血的病人，自己带头去无偿献血。在他的带动下，此后部队官兵争先无偿献血，救助贫苦病人。^③

冯玉祥在检查营房或检阅部队时，常常高声问士兵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士兵回答：“我们是从农村来的。”问：“你们的父母亲戚是什么人？”答：“都是老百姓。”又问：“你们吃的穿的是什么人供给的？”答：“是老百姓供给的。”^④冯玉祥经常询问的目的是要士兵不要忘掉老百姓，不要欺压老百姓。

冯玉祥经常组织部队为驻地附近的百姓服务，春播时将部队的骡马借给农民耕地、拉车；收割时，部队官兵帮助农民收割庄稼。因此，冯部深受驻地附近百姓的爱戴。当地百姓曾编了一首歌谣：“冯玉祥驻南苑，替俺收麦和种田，不喝俺的水，不吃俺的饭，这样的军

① 《冯玉祥日记》1923年1月11日。

② 李泰棻著：《国民军史稿》，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印行，第83页。

③ 同上书，第84—85页。

④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第28页。

队真少见。”^①

1924年8月，永定河水陡涨，丰台南一带，水势高出平地两丈余，两岸堤圩岌岌可危。8月15日，附近居民向冯玉祥报告了险情，“时值夜半，冯立即派兵两团，前往抢护。至则波涛汹涌，黄土坡附近河堤已冲没三十余丈。南苑一带居民，扶老携幼，相率奔避，为状至惨，而黄土坡居民已逃避不遑，妇孺啼号，声震遐迩。冯悉后聚集安全地方，并备大宗米粮，日给以粥，并令所部军队，受河务局人员指挥，伐树挂柳，麻袋盛土，堆积其上，……次晨9时，冯率五旅长及团营长，亲往参加抢护工作，军队精神愈振，从事抢护奋不顾身，决口堵塞，而受伤者百余人。时水势仍至汹涌，且狂风巨浪，声若虎吼。冯率所部官兵，日夜守护，不即归营。冯夫人因兵民伤病至多，当集军官眷属，组织看护队，住黄土坡，分别看护，如临大敌。结果居民田产得免淹没，京津铁路亦免冲坏。至今黄土坡前有碑纪念。与居民谈及，津津乐道焉。”^②

冯玉祥还在其他方面制订了许多避免军队扰民的规定，例如：“行军驻地如没有营房或帐篷不敷，只准住庙宇、教堂和其他机关的闲屋（但一般不许住学校），不许人民房，不许直接借用民间东西，万不得已，经中间人和一定手续，借了东西，必须如期奉还，损坏赔偿。任何驻地，离开时必须打扫清洁，不许有丝毫损伤。……对于士兵个人来说，不请假不准上街，绝对不许入茶房、酒店、剧院和公共娱乐场所。”^③制订这些规定是为了避免军队与老百姓的矛盾冲突。

①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第28—29页。

② 李泰棻、宋哲元编述：《西北军纪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七），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印行，第85页。

③ 高兴亚遗稿：《与冯玉祥谈话的回忆》，《回忆冯玉祥将军》，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28页。

冯玉祥如此重视教育部队爱护老百姓，如此重视搞好军民关系，这在北洋军中是罕见的。探讨其主要原因如下：

1. 冯玉祥少年时期家境十分贫苦，他在保定康格庄与贫苦农民一同从事过艰苦的劳动，他说：“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难以想像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们练军队的方法。”^①这是影响冯玉祥治军推行“爱民”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冯玉祥是胸怀大志的军人，他从古书中吸收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思想，经常结合军史向部属阐述经验教训。例如1923年初，他对部属官兵说，近年来，其他军队有的被消灭，有的削弱了，而我军安然存在并发展，此皆我们“吃苦爱民之结果也”^②。他向官兵讲述康熙、诸葛亮等古人的勤奋，指出：“诸葛亮不过为一刘氏耳，今吾等所为者四万万同胞也，其责任如此之大，应如何惕励自警”，“故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不能不真努力”。^③总之，冯玉祥教育军队“为老百姓服务”、“爱民”与雄心大志是相联系的。

3. 冯玉祥的教育部队“爱民”与教育部队“爱国”是不可分的。冯玉祥自述起初在北洋第六镇，所受的是“忠君爱国之义”的教育，于是“立志以忠臣自见，盖以忠君即忠国也”^④。辛亥革命时期，受革命党人影响，明白“国家”不应再是君主的国家而是民众的国家，改变“忠君忠国”的初衷，建立“爱国即爱民”的思想。他于1913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1页。

② 《冯玉祥日记》1923年1月6日。

③ 同上书，1923年1月7日。

④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年在京卫军任左翼第一团团团长时对部队训话指出：“人民为吾辈之主人翁，而吾辈军人，应对于主人翁加以敬重，不可蛮横举动。”^①冯玉祥所带的队伍尊重老百姓“以是能得民心焉”^②。

4. 冯玉祥的“爱民”思想受到中国古代以来传统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冯玉祥在《自传》中称：“荀子云：‘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又曰：‘善抚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吾服膺斯义，故吾军于民党成立之始，尝对官兵谆谆告诫，以兵民合一之旨相勸勉，并汇集古人之爱国保民之嘉言懿行若干条，名之为《军人精神书》……使之诵习，身体而力行之。”^③

以上四方面，说明冯玉祥提倡为百姓服务的治军思想和实践，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形成了他带兵的一贯作风。

（三）提倡长官爱护士兵、官兵“同甘共苦”

北洋军事集团从整体来说，普遍存在着长官欺压士兵、剥削士兵的情况，上级欺压下级的事例不胜枚举，而从北洋军中起家的冯玉祥部却一反常态。冯玉祥在部队中提倡“官兵一致”^④，长官“与士卒共甘苦”^⑤。这方面，冯玉祥的治军又是对北洋军的“变异”。

关心和爱护士兵是冯玉祥的一贯作风。冯说：“打仗是拼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⑥他

①② 《冯玉祥自传》，第20页。

③ 同上书，第25页。

④ 丘权政编：《回忆冯玉祥将军》，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24页。

⑤ 《冯玉祥自传》，第29页。

⑥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73页。

又说：我练兵的方法，有两个要点：（1）官兵一致；（2）使兵“劳而不苦”。第一项，首先是官兵生活一致“包括衣、食、住”；“其次是操作一致”；“第三是纪律一致”；“第四是官不离兵，官不能离开军队另住，要随时与兵在一起。”第二项，是使士兵终日作有秩序有节制的活动。冯玉祥尽力为士兵创造生活卫生条件，如勤洗澡、互相理发、勤换洗衣服、教会每人自己缝补衣服等。^①

冯部驻南苑时，更加强调官兵“同甘共苦”。冯玉祥曾带头献血抢救一位生命垂危的士兵，激起了官兵争先献血，“那个病兵不久便完全痊愈”。这件事使全体官兵都感到官长与士兵不但共着甘苦，而且是同命相连的。^②冯玉祥经常对属下官佐说：“古今来带兵之道，千言万语，一句话概括起来说，要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③他本人以身作则，属下高级军官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很简朴。生活享受上尽量与士兵一致。当然，因政治条件、历史条件的制约，冯玉祥的主张和实践还不可避免的有很大局限性。

为了保障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生活与收入，冯玉祥特别规定了“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送下级礼物，不准下级送上级礼物。因为在旧军队里，上级往往借故敛财，纵不然也开了敬奉贿赂、钻门子的道路”^④。

大力提倡官兵的文化学习，是冯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又一特点。不少士兵入伍时目不识丁，几年后能够写信。冯军中还经常举办士兵文化学习比赛，以提高士兵文化学习的兴趣并促进全体提高文化水平。此外冯军中每一阶段都专门招收一部分学兵，学习军事、政治、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26页。

② 同上书，第375页。

③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27页。

④ 高兴亚：《与冯玉祥谈话的回忆》，《回忆冯玉祥将军》，第527—528页。

文化等项，作为后备干部的培养人才。对官佐设有军官讲堂，春秋两季考试。冯玉祥主张全军“智德体三育并进”^①。上述冯玉祥提倡长官爱护士兵、官兵同甘共苦的事例是多方面的，举不胜举。探讨其主要原因如下：

1. 冯玉祥是行伍出身，亲身体会过下级士兵的苦处，正如他自己所说：“余出身行伍，凡士卒之情绪甘苦，知之最悉。故余治军数十年，凡事以身作则，未尝厚以养己，薄以待人，逸以待己，劳以责人也。”^②正由于冯玉祥是从下级士兵一步步升为高级将领的统帅人物，他十分了解士兵的心理特征。他以“亲情”打动官兵，使官兵上下同心同德。冯玉祥曾有多次在士兵宿营地亲手为士兵打洗脚水和亲自为士兵剪脚指甲，使士兵感动得流泪的事例。他曾对人说：“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要靠子弟兵。”^③冯玉祥一贯强调：“先贤说了许多带兵的话，归结的道理在‘得兵心’三字。”^④这就揭示出冯玉祥推行的长官爱护士兵“与士卒共甘苦”的根本出发点。

2. 冯玉祥提倡爱国、爱民，自然要爱兵，兵即是穿上了军装的“民”。何况身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吸取了基督教“博爱”的教义，运用于同情穷人和下级士兵，因而他的爱兵是真诚的。

（四）提倡生产技能训练

北洋军事集团普遍没有生产技能训练，而且每占领一地常以破坏生产为能事。而起家于北洋军的冯玉祥部却对军队及官佐眷属进行生产技能训练，即部队及眷属从事生产劳动，这是冯玉祥治军的又一“变异”。

① 《冯玉祥日记》1923年4月15日。

② 《冯玉祥自传》第29页。

③ 笔者访问张寿龄的记录，张寿龄曾在冯玉祥部任参谋处长。

④ 《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早在冯部驻常德时，因当地竹器盛行，冯玉祥即要求部队就地取材，学习竹器生产，他自己也亲自参加劳动。部队驻北京南苑期间，冯玉祥更是力主军队从事生产事业。他曾通电主张军工、军农、军路、军矿，即教化军队学习做工、务农、筑路、开矿。^①这样，既有利于减轻国家财政经济负担，又能在将来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各有一技之长，不致成为地方上的负担；否则退役后的官兵，大都有可能沦为土匪，危害社会治安。

冯玉祥把自己部队帮助地方上挖河修水利，作为“提倡军人作工之先导”。他希望其他军队能够效法，使不生产的军队变为从事生产的军队。^②冯玉祥在部队中大力推行种菜、植树、种植苗圃、开办工厂，令军人学习工艺。他在南苑创办了一所规模较大的工厂。据记载：“共分十二科，如织毡、造胰、铁工、木工、藤工、纽扣、缝纫、织布、制革、织袜、织巾、旧式制鞋等皆是，每科分若干室，并附售品所。出品如肥皂、毛巾、藤器、地毯、鞋袜等，除供全军使用外，并能销行市场。出品中之最新颖者，为织成中国形式之地毯。……凡士兵日用所需，几无一不可自给。工作时间，每天半日在厂，半日在营。”^③“冯自选习铁工一种，以示提倡，无论如何繁忙，每日必到厂工作一二小时。各官兵所习，均自随所好，全厂资本仅两万元，开办未及半载，每月产品所值超过成本，其成绩亦可概见。”^④冯玉祥又令：“工厂四壁满贴格言如：‘当兵是国民的义务，不是职业，作工乃是真职业’、‘为人要有正当职业，靠人吃饭最可耻’、‘没有职业的高级游民不如下等苦工’、‘神圣劳工’……又设残废工厂，为残废官兵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② 《冯玉祥日记》1923年3月20日。

③ 李泰棻、宋哲元编述：《西北军纪实》第83—84页。

④ 同上书，第84页。

工作之所，编制藤竹器，出品甚佳。内设游艺室、图书馆等，以供工余时间之游戏。”^①

冯玉祥对做工的学兵们说：“给汝等以钱财，不如教汝等以工艺，可为终身养生凭藉。”^②冯玉祥为了使军官家属能生活自理并提高文化，特办立培德学校，“半日读书，半日作工，工作是纺织、缝纫之类……这是为中下级军官照管老婆，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还设有军官子弟学校”^③。上述冯玉祥主张军队从事生产劳动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北洋军中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主张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的。

冯玉祥部驻南苑期间，国内正掀起“废督裁兵”运动高潮，工商界为减轻经济负担和减少战乱之苦，最积极地呼吁“废督裁兵”。冯玉祥马上发表了自己对裁兵问题的主张。认为：“中国之兵，不患裁并之无方，而患容纳之无术”，即所裁之兵的出路是大问题，“国家多裁一兵，即民间多增一匪，兵愈裁而匪愈多。”他提出了解决裁兵出路的四个方面即：“工、路、矿、农。”^④将裁下的兵学做工、修路、开矿、务农。这与当时孙中山的“兵工政策”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这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主张，在当时北洋军阀暴政下，是不可能推行的，但在治军思想史上却有一定意义。冯玉祥提倡军队及军人眷属参加生产技能训练，与他一贯重视生产劳动有关，又与他多年来思考从根本上消除国内匪患有关，这也是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之一。

上述冯玉祥治军对北洋军种种“变异”的表现，时间限定于北洋时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治军思想有

① 李泰棻、宋哲元编述：《西北军纪实》，第84页。

② 《冯玉祥日记》1923年9月27日。

③ 丘权政编：《回忆冯玉祥将军》，第527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所发展，不在本文阐述范围。冯玉祥治军能够“变异”是以北洋时期政治环境“宽松”为前提的，使冯玉祥在北洋政府统辖下治军方式有相当独立性，否则不可能“变异”。

二、冯玉祥治军中的家长制弊端

冯玉祥既然从北洋军中起家，他治军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都有北洋军的影响。北洋军事集团是中国军事全盘转向近代化的体现，而北洋军阀的统治是中国从专制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它是旧质与新质并存的军事集团。在北洋将领中，对冯玉祥成长影响较大的有王化东^①、陈宦^②、张绍曾^③、陆建章^④等人，这些人物既有一定的维新意识，又有相当的封建意识，他们对冯玉祥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他们都是袁世凯培养出来的将领，而袁世凯治军的家长制在北洋军中是有传统的，影响到冯玉祥也是不足为怪的。

冯玉祥治军的主要弊端在于家长制和一手包办。冯玉祥起家的关键是担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该旅是直属中央的，有一定的独立性，有利于冯部的发展壮大，同时也养成了冯玉祥一手包办、一人指挥的习惯。这在部队规模小时，表现为凝聚力强的优点，但以后部队庞大了，就呈现出各将领只服从冯玉祥一人的弊端。1926年当冯玉祥一度离开部队赴苏联考察时，恰遇南口防御战，各高级将领互不相辖，群龙无首，成为冯部全军大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冯玉祥治军的家长制作风还表现为战略决策上不发扬民主，不善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101—102页。

③ 同上书，第105页。

④ 同上书，第125—126页。

于听取属下将领的合理化建议，而是独断专行、一意孤行。例如，“中原大战”之前，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大家都不同意冯联阁讨蒋的决策，冯玉祥大怒说：“你们不愿干，我和鹿钟麟两人一人一支手枪也要和蒋介石打到底……”^①大家谁也不敢发表异议了。当时从冯军的作战素质来看远超过蒋军，但战略决策上一再失误，冯玉祥未能采纳刘骥等人的合理建议，结果以惨败告终。

“中原大战”时，曾有冯玉祥的属下将领建议应留守相当军力保卫陕甘后方根据地，但冯玉祥未采纳这一正确意见，而是“倾巢出动”，将所有兵力调到前线，这与冯部在北洋时期是一支隶属中央的部队，本来就缺乏重视根据地的观念有关，结果前方溃败时，后方也沦入敌手，无“家”可归，一败涂地。

总之，冯玉祥治军对北洋军的“变异”，使之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但沿袭了北洋军家长制作风的弊端又使他后来“中原大战”的战略决策一再失误，结果惨败。

冯部虽然溃败了，但由于这支部队原本具有良好的素质，因此以后仍然涌现出不少名将，如赵博生、董振堂（宁都起义领导者），佟麟阁、赵登禹、何基沣（卢沟桥抗日三名将），孙连仲（台儿庄大捷主力部队将领），张自忠（抗日战争时期英勇捐躯的第一位上将）等，都是原冯部将领。这与冯玉祥治军不无关系。总结冯玉祥治军的成败得失，对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是有一定意义的。

^① 张寿龄口述，笔者笔录，张寿龄为“中原大战”时冯部的参谋处长。

附录

袁世凯在朝鲜

刘路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一、“无成例可循”的使命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日本在东方的崛起，原来与清王朝有着宗藩关系的周邻国家，先后沦为西方国家或日本的殖民地。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朝鲜成为仅存的一个。它与清朝龙兴之地接壤，且地近畿辅，而且长时期以来，两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又极为密切，尽管清王朝自存尚不从容，诸多因素仍然促使清政府对维护两国宗藩关系给予最大的关注和努力。诚如袁世凯上韩王的《朝鲜大局论》所说：“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则控扼津烟咽喉之冲，无朝鲜是无东壁也。……故缅甸可容，越南可缓，而朝鲜断不可失。”^①

光绪八年和十年，两三年之间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和甲申两次事变，朝鲜政府不得不公开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平息有日本人插手的国内政争，这既表明了上述宗藩关系的复杂性，也促使清政府下决心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几经反复权衡，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主张，于光绪十一年，任命在平息两次政变中崭露头角的年仅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取

^①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62页。

代两年前派出的陈树棠，为“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交涉事宜”。其使命对外明讲是“就近咨商”朝鲜政事^①，而真实用意则是“坐探国政”^②，对朝鲜政局“隐为扶持，相机匡救”^③，也就是“略其名而行其意”的监国^④。所以，就名分讲，这个职务不过相当于总领事。

而袁世凯却心领神会地自称为“小钦差局面”^⑤。但是，袁世凯也深知其处境的尴尬与艰难，就袁世凯的使命而言，他并没有对朝鲜政务“显为干预”的权力；就当时的清王朝而言，它既失去了盛世时的威仪，也缺乏保护朝鲜不被列强染指的能力，也就是说，袁世凯没有保证执行使命的可靠的政治和经济、军事实力后盾；就朝鲜的李朝君臣而言，一方面他们对清王朝的离心倾向日益增长，无时无刻不在谋求摆脱藩属名分的羁绊，另一方面，他们内外处境都十分艰难，又十分需要清王朝帮助维护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以至抵制东西方列强的侵入；而就东西方列强而言，他们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关心的是在这个远东战略要地上的力量平衡，多数完全否认清韩宗藩关系，而不承认袁世凯在韩的特殊政治地位。客观局势使袁世凯处于不利地位的夹缝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居半主之间”^⑥，“无成例可循”^⑦，“交际之间，卑亢均难”^⑧。

① 李鸿章：《拟复美使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86页。

② 李鸿章：《议驳徐孙麟条陈并派袁世凯驻朝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第48页。

③ 袁世凯：《袁道来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1页。

④ 《清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第288页。

⑤ 袁世凯：《致二姊函》（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天津博物馆馆藏手札。

⑥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270页。

⑦ 沈祖宪辑：《养寿园电稿·电禀稿》，台湾文海出版社，第4页。

⑧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957页。

袁世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把自己使韩的任务概括为：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客观形势下，“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①。其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在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以维护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对内，帮助朝鲜李朝政权，稳定并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外，依照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帮助朝鲜政府抵制东西方列强的觊觎。袁世凯使韩九年，就是奉行的这个准则。

二、“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

清韩宗藩关系史有定例，“必也正名”。面对朝鲜日益增长的离心情绪，袁世凯把“尊上国之体用”，“严属邦之名分”^②，作为他“扶持”“匡救”韩政的首要任务。

第一，确定自己在韩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明白宣示他不同于各国驻韩使节，而是上国代表。同朝鲜国王的会晤，因无先例可循，经请示李鸿章，袁世凯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比照司道谒见亲郡王的礼仪^③，直入宫门至内署门前始降舆、揖礼、侧坐^④。同各国驻韩使节之间的交往，袁世凯也认定，他的使韩“与供差边防省同例，固不应自居外国人之列，至与各国使员往还，亦不应统入各公使之下”，“故每有公会知单，或不署名，或不应赴”^⑤，更不以使节身份与外国使节共同活

①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957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530页。

③ 李鸿章：《寄汉城袁道》，《李鸿章全集》（一），第617页。

④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19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531页。

⑤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770页。

动。韩赵太妃发丧，驻韩美国公使约袁世凯一起路祭，袁世凯明白以中韩两国有旧章，不便与其同往为由拒绝，而单独别行一套礼仪^①。遇有朝鲜官方与各国使节公会，袁世凯则坚持必须居于“宾中之主，应坐于朝鲜官主位之上”^②。总之，严格把握，随时注意，绝对不与各国驻韩使节以平等身份交往，由此而引起纠纷口舌亦在所不惜^③。

第二，监视纠查朝鲜奉行清王朝正朔，遵守来往文书的礼仪格式。光绪十四年六月，袁世凯收到的朝鲜电报局收条和电报封皮上，有“大朝鲜电报总局”和“大朝鲜开国若干年”的字样，立即行文向朝鲜外督办指出：“查中国朝鲜往来文函，或曰朝鲜，或曰敝邦，向未有大朝鲜等字，此时何遽以此称谓？”严责电报局违制^④，迫使朝鲜外督办立即道歉，并且责成电报局改具款式，将草本送袁世凯审查^⑤。

光绪十八年，朝鲜新铸洋式钱币，上面只铸有“大朝鲜开国若干年”，而没有清王朝年号，袁世凯立即电禀李鸿章：“韩钱向不纪年。近见韩交换局铸洋式银铜钱，俱注大朝鲜开国若干年，无华年号以作通宝，殊乖奉朔。”^⑥同时与朝鲜当局交涉。朝鲜政府被迫答应删去“大”字，达成妥协解决^⑦。

袁世凯维护上邦体制，对朝鲜几乎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光绪十

①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286页。

② 《办理朝鲜商务章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373页。

③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530、2560、2600、2770页；《李鸿章全集》（一），第617页，（二），第619页。

④ 袁世凯：《有关电报局款式改订之札函》，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404页。

⑤ 赵秉式：《有关同上件之回答》，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464、465页。

⑥ 袁世凯：《袁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520页。

⑦ 《养寿园电稿·津院去电》，第63页。

二年六月，韩外署致袁世凯的公文中，称韩王为“主上”，并抬高一格，袁世凯即以有违体制，拒不接受，并责令更改^①。朝鲜赵太妃去世，韩派赴中国的告诉使节录上谕电告韩廷，电文与上谕小有出入，袁世凯即说这是“韩人欺罔故习”，有意“与原旨不符”而电禀李鸿章^②，连清廷都认为袁世凯是横生枝节，“殊属冒昧，著李鸿章传旨申饬”^③。

第三，坚持在朝鲜对外事务中的中国宗主权。对于韩廷危及中国宗主权的离心行动，袁世凯毫不犹豫地持强硬态度对待，丝毫不作让步。光绪十二年夏，韩俄第二次密约事发，袁世凯即采用了一些超乎寻常的强硬手腕。一面向朝鲜官员大发雷霆，声言请中国派兵来韩^④武力解决，一面起用韩王政敌大院君李崐应，派他人韩宫对韩王、赵太妃以及闵妃施加压力^⑤，一面向李鸿章建议“速派大员率兵查办”^⑥，并主张“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⑦，甚至已经为李崐应代拟了致各国照会的草稿^⑧。李鸿章亦采纳了袁世凯的意见，准备扶植大院君行废立之事^⑨。只是清廷权衡利弊，密令采取“先以整军备俄为主”和外交解决的方针^⑩，俄国和韩王迫于形势，亦极力否认有密约之事，事情才不了了之，废立之事才告平息。

① 《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第38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289页。

③ 李鸿章：《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第293页。

④ 徐承祖：《徐使来电》，《李鸿章全集》（一），第704页。

⑤ 袁世凯：《袁道来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第108页。

⑥ 同上，第109页。

⑦ 同上，第101、102页。

⑧ 李鸿章：《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一），第849页。

⑨ 李鸿章：《筹朝鲜私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第99、100页。

⑩ 《译署来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第105、106页。

韩俄第二次密约风波刚过，次年，光绪十三年，即又发生了中韩关系史上著名的韩国遣使朴定阳赴美案。韩国君臣打算以独立遣使之举动表明对清朝宗主权的挑战，袁世凯则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采取强硬态度，步步为营，节节阻挠，坚持上国体制。事前对遣使之举订立种种约束，事后更要求处分“违纪”使臣。面对袁世凯、李鸿章步步紧逼，韩廷则处处敷衍塞责，拒不实行。双方僵持不下，交涉拖宕四年之久，最后还是乘袁世凯回国探亲不在朝鲜之机，朝鲜政府才通过代理职务的唐绍仪之手了结此案。

第四，迫使朝鲜政府遵守宗藩礼仪。光绪十六年，朝鲜赵太妃病故，袁世凯认为这是向各国、向韩君臣凸现强调清韩宗藩关系的大好时机。在赵太妃病危时，袁世凯即献计于李鸿章，“顷闻赵太妃已殂，尚未发表，似明日必可颁布。惟查韩有大丧，例派吊使，而各国驩驻汉城，韩王欲存自主体，或不愿华派钦使。然值此机会，正宜明彰体制，宣示各国。可否乞预商枢廷核办”^①。果然，赵太妃去世后，韩王命韩驻津商务委员向李鸿章请求“照顾付之例”，不专派钦使^②。袁世凯则再次向李鸿章进言阻拦：“顺付祭贖，未见有此成案”，“赵太妃为韩王母，历事回朝，倾心慕华，反不荷祭贖，似无此礼”。倘此时“华派吊使，王例须郊迎”^③，正可特别显示两国间宗藩关系。韩王请求“顺付”不成，又请求清朝钦使在马山浦下船，而不在仁川登陆。袁世凯明白韩王知道：“韩此请似乎恐在仁祥人瞻，损体面”^④，坚持钦使在仁川登陆。最后，韩王不得不遵守旧式典礼，按照藩属礼仪，亲自出汉城，行跪拜大礼，郊迎清朝致祭钦使，极不情

①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238页。

② 李鸿章：《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第201页。

③ 袁世凯：《袁道来电（二则）》，《李鸿章全集》（二），第252页。

④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297页。

愿地在臣民和外国人面前表明其藩属国地位。

维持体制和名分与否，在清韩双方看来都是势必力争、至关重要的。在清朝看来，这是不可更移的祖制，它体现、代表着天朝上邦的权威；在朝鲜君臣看来，这是有损民族形象、最伤民族感情的事情。每有交涉，均遭韩方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袁世凯执行起来，也经常不能得心应手，在许多情况下，都只得视韩方能够接受的程度而提出折中的条件，例如韩铸新钱上的年号一事，李鸿章就指示袁世凯，仅坚持去掉“大朝鲜”的“大”字，而不强求加铸清朝皇帝年号或干支纪年，以免“伊必不从”，而可“容易收束”^①。有的时候，甚至不得不仅做做维持体制的样子，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袁世凯除了尽力维持“体制”外，还把“内修政治”、稳定朝鲜政局作为匡扶韩政的重要任务。袁世凯使韩面临着一个十分动荡的局势，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三年两次政变。他深感只有使朝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保持一个居于藩属地位而具有牢固统治地位的政府，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袁世凯在上任伊始就说：朝鲜之“急务大端，最要有二：曰内忧，曰外侮。以今日时势而论，内忧急而外侮尚缓也”^②。他在就职前后，利用帮助练兵和平息政变所取得的好感，以上国使臣的身份，通过一系列上书，如《摘奸论》、《上朝鲜国王书》及其附陈《谕言四条》和《时弊十款》、《朝鲜大局论》等，以及多次同朝鲜国王的晤谈，为朝鲜设计了“内修政治”的蓝图。概括起来是：（一）“亲中国”，恪守同清朝的宗藩关系，依恃中国以自立。中国可依恃的条件有六：“中韩毗连水陆……，缓急能通，其势可待”；“为将出师，不索兵费、不责供给……其德可待”；“不郡县其国，不租

^① 李鸿章：《复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第521页。

^② 袁世凯：《与朝鲜国王笔谈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56页。

税其地，但期唇齿相固，人民相安……其心可待”；“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其泽可待”；“强邻憬伺”而“中韩固结，无隙可乘……其威可待”；“降待中以为固，内乱不作，外侮无恐，及时修明刑政，任用贤能，图治励精，富强徐致，其机可待”^①。（二）“慎修内政，以固根本”^②。其最要之点是：第一，“收民心”。“民心涣散，急须挽回。民为邦本，未有本动而枝叶能茂者”。应该严政令，苏已极之民困，除“极弊之政”，“议举贤守，令与民兴利去害”。第二，“明赏罚”。“质必信，罚必行，人心亦翕然归服”。第三，“节财用”。“量入为出”，“开源节流。迨国帑充裕”然后而“吸国局、制药局、种桑局，机器轮船等局”，“次第为之，徐图富强”。第四，“慎听闻”，任贤臣，远小人^③。

袁世凯不仅为朝鲜国王设计了一个传统的“贤君”的模式，劝说其去实行，还俨然以朝鲜一国柱石的姿态自居。他把朝鲜和中国比作一个院落的东偏院和正堂，而自称为“派在东偏之司门者”。他又把当时的朝鲜局势比作“木已朽腐”的“破舟”，朝鲜国王及“诸臣民皆舟中人也”，而自称为修复破船，易木换篷，以求其固的“舟匠”^④。还在甲申之年，袁世凯就在政变突发、与国内文报不通、请示授权不及的紧迫情况下，独立决断，率领军队，以武力平息了变乱。在他正式使韩以后，又多次策划雇请刺客，或派韩人赴日本，刺杀流亡“谋叛首犯”金玉均^⑤。当金玉均在上海被刺后，袁世凯又电

① 袁世凯：《朝鲜大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60页。

② 袁世凯：《与朝鲜国王笔谈节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454页。

③ 袁世凯：《时弊十款》，《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53—2155页。

④ 袁世凯：《谕言四条》，《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52页。

⑤ 李鸿章：《寄日本徐使（电二则）》，《李鸿章全集》（一），第627、630页；《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第3、4、54页；《中日交涉史料》第9卷，第10—11页，故宫博物院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005页。

请李鸿章“设法救护”刺客洪钟宇^①。

光绪十九年，朝鲜东学党起事。袁世凯一面亟“劝韩廷严缉惩办”，并指出局势的严重性：“邪教不除，诚为祸根。如敢犯京，剿灭尚易。倘居险号召，恐非时日能殄灭。似宜即派重臣，率京兵及江华兵千名，前往抚谕，诛其渠魁，倘拒即剿。”同时还通告在韩外国使节，对于东学党起事，“华有弹压责”，“有华弹压，毋过虑”。一面电请李鸿章：“即电飭水师迅遣两船来仁，以尽弹压责”^②，又代韩方请李鸿章为朝鲜购置或借给朝鲜镇压所需的枪炮^③。袁世凯在致其堂弟袁世承的私人通信中，显得更为跋扈自信，他说：“韩匪幸散，然未翦除，其渠仍生事。有容（袁自号容庵）在此，小丑岂可猖獗。如再胡闹，只取灭耳。”^④次年，甲午年间，东学党再起，袁世凯即应朝鲜政府之请，电请清政府直接派兵代为镇压，从而成为中日甲午战争导火索。

袁世凯驻韩期间，几乎成为朝鲜内部动乱的清道夫，同时又参与朝鲜重大对外交涉的最后决策（有关内容，后文将述及），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隐为扶持，相机匡救”的使命。

此外，袁世凯还通过赈灾一类救济措施，帮助朝鲜政府稳定社会秩序，收拾民心。袁世凯使韩期间，朝鲜曾发生数次饥荒，袁世凯都电请国内上海、天津各海关开禁，并免税出口米粮，运往朝鲜，以平抑米价，救灾度荒^⑤。

袁世凯以扶植亲华势力，间接插手韩内政决策，作为“明尊”、

① 袁世凯：《寄李中堂》，《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电稿》，第106—107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三则）》，《李鸿章全集》（二），第540、551页。

③ 袁世凯：《寄李中堂》，《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电稿》，第80页。

④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家书》，第101页。

⑤ 袁世凯：《三港运进米粮的免税期限明示要请》，《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532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044、3226页；李鸿章：《寄译署并江海道》，《李鸿章全集》（二），第52—53页。

“定惑”，“匡救”朝鲜局势的主要辅助手段。为了扩大清朝在韩政坛上的影响，袁世凯十分注重利用传统思想，扶植、网罗朝鲜政界的亲华势力，即所谓“事大党”。触角所至，自王公亲贵、近臣、中官以至中下级官员。清政府改变初衷，送回大院君李昱应，其目的也在于此。袁世凯在护送李昱应回韩之后，即在使韩王清楚地意识到李昱应始终都是自己的牵制力量的同时，又着力调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相安共处，起码能使李昱应容身的地步^①。

袁世凯结交的重臣主要有金允植、鱼允中、韩圭嵩、闵泳翊等。袁世凯曾说：“韩廷中能明大义者，允植而外，更无其人。”^②韩国保存的钞本《袁世凯书牍》中有袁世凯致金允植十余封信函，尤可概见袁金交往之密切。光绪十一年夏，清政府有送大院君回韩之议，尚在筹谋而无定局之时，袁世凯即私函告知金允植说：“泰西及都下士大夫多谓朝鲜为无父之国，傅相深以为忧，欲顾存朝鲜局面，因有归太公之议。商于政府，尚无定局。”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遭攻讦，被迫回国，金允植致函慰问，袁世凯复函痛陈心境遭际之后，引金允植为知己说：“孟轲宿昼，大夫留行。阁下与弟也。”而光绪十二年四月，金允植被贬官逐出汉城之后，袁世凯则大鸣不平并善言和慰，寄以厚望说：“清流浮言，无时不然。为大臣当大事者，当任劳任怨也。”“此时外交方在相持，内忧时将防范，凡我辈力启大局者，固直任劳任怨，一片赤心，永矢千古，天下后世，自有公论。”^③袁世凯甚至借用李鸿章的名义，出面压迫朝鲜当局收回成命，恢复金允植原职^④。并明告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第49页；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45页；《袁世凯来禀》，《袁世凯与朝鲜执政诸臣笔谈节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571、575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11页。

③ 《袁世凯书牍》（钞本），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图书馆藏。

④ 《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第53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14页。

韩王近臣，起复金允植，是朝鲜“可释华疑，可安民心，可静各国”的唯一决定因素^①。

闵泳翊是闵妃内侄、韩廷重臣，袁世凯极为看重。光绪十一年，闵泳翊曾因政见不合出走国外，袁世凯即禀告李鸿章，说闵泳翊“性本公直”，不满“诸闵误国，愤恨远避”。“招其速回，相机维持”朝鲜政局^②。闵泳翊回国后，同袁世凯过从密切。袁世凯在致二姊的家书中说：“闵泳翊乃此间第一公忠臣也。前回来，方商办一切内政外交，故日夜应酬商办，或终日或终夜。”^③

袁世凯颇为重视笼络朝野人士。他得悉金玉均在上海被刺的消息后，立即请李鸿章派人焚毁金玉均来往书信^④，以免朝鲜当局据以兴狱株连，以安朝鲜国内出于不同目的与金玉均有联络的人士。袁世凯在韩结交十分广泛，凡有用者皆利用之，甚至包括袁世凯自己已知其“在官稍贪，人颇短之”的李冕相，“每以聚敛生财等计，立效献媚”，“众怨丛归”的闵泳骏^⑤这样一类为人、为官均不甚清正的官员。

袁世凯培植亲华势力，一面作为他在韩推行宗藩政策的奥援，一面也在于一旦出现不测，可以扶掖亲华势力上台执政，使朝鲜能够按照清政府要求，继续甚或更进一步“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却并不能随心所欲。除了朝鲜朝野离心情绪外，各种政治力量也各有自己的利益。大院君李昰应在第二次韩俄密约事发后，虽曾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力图再起，但终不能实现废立之谋，而

① 袁世凯：《袁道来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第59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305页。

③ 袁世凯：《致二姊函》，天津博物馆馆藏手札。

④ 李鸿章：《寄上海聂道》，《李鸿章全集》（二），第659页。

⑤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34、3133页。

且从此使袁世凯更为韩王所忌。金允植则被韩王目为“袁党”而旋起旋落，并最终被罢黜。闵泳翊在第二次韩俄密约风波陡起之后，不仅拒绝为自己事前向袁世凯的告密作证，反而公开了袁世凯曾与他密议过废立之事^①，并交出了袁世凯代李崐应所拟的致各国照会^②。事后，又为韩王献计，利用西方国家牵制清朝对韩政策，所谓“清素畏洋，我派使结洋，清必畏我”^③，从而促成了韩派使赴美的决策，中韩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即因此而起。

三、“商务日盛，驭属事权日增”

袁世凯奉命驻扎朝鲜之时，西方列强已经来到东方多年，并深深介入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与东方传统很不相同的西方文明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袁世凯既必须处理一些传统宗藩关系中所从未有过的事务，也从西方学来了一些新的统驭藩属的办法。其时，接受了西方社会学说，具有改革精神的先进思想家的“商战”主张已经提出，有眼界的政治人物和接触外国事物较多的外交界人士已经把这种主张付诸政治、经济活动，成为同光新政的一个部分。光绪七年，清政府使日大臣黎庶昌就以“通商可以制外”的理由，劝诫朝鲜当局发展对外通商^④。袁世凯也秉承着李鸿章的旨意，从西方抄来发展通商这种形式，作为维护宗藩关系的手段。

正如袁世凯在向李鸿章的禀文中所说：“历年来卑府仰承钧海，

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688页。

② 李鸿章：《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一），第849页。

③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第861页。

④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45页。

督饬各员，认真整顿，多方招徕，诚以在属之商务日盛，即驭属之事权日增。”^① 增加驭属事权，是袁世凯发展中国在韩商务的主要指导思想。

中朝两国之间，过去只有宗藩性质的使行贸易和边市贸易，而没有两国民间商人公开正式的到对方国家进行商业活动。光绪八年八月，中朝两国订立《水陆贸易章程》，双方才有民间商业往来。袁世凯使韩以后，在增加驭属事权的思想指导下，多方设法发展对韩的商务事业，促使其逐渐发展起来。韩国藏档案《旧韩国外交文书》中袁世凯同朝鲜当局关于商务的交涉文书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据统计，此档案中，袁世凯使韩九年间致朝鲜外督办的交涉文件共存有七百九十一件，按其内容，分类大致如下表^②：

表一

类 别	件数	所 占 百 分 比	
有关中国驻朝官员人事变动的通报	40	5.05%	35.4%
有关朝鲜内政外交的交涉	240	30.3%	
有关中国对朝民间贸易的交涉	187	23.6%	64.6%
有关租界、电线、借款、航行等非政治性质事件的交涉	107	13.5%	
有关海关事务	65	8.2%	
有关刑事案件	152	19.2%	
总 计	791	100%	

^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2734 页。

^② 资料来源：《旧韩国外交文书》第 8、9 卷。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表中“有关刑事案件”一栏所涉及的中国方面的人员，除了极个别者外，大多数是商人及他们的伙计或雇用的船只水手，内容一般都与商业活动有关，也是通商以来所产生的新问题，因此，此处也作为与商业有关的文件来对待。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商务有关的文件，已占了袁世凯对韩交涉公文之三分之二左右。诚然，许多与政治、国家关系有关的交往或多在幕后进行，并不用正式形成文件的。但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袁世凯所处理的日常工作事务，已不单纯是过去传统的宗藩关系，有关民间或政府间经济往来、商务往来的管理，而是已经居于一个突出的地位。袁世凯与其前任陈树棠的官名分别叫做“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和“总办朝鲜商务”，也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为了发展在韩的商务，袁世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华商的措施，其主要手段有：第一，设法维持在韩华商商业区治安。中朝民间通商开放以来，来韩的华商渐多，并且在汉城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华人商业区。但是商业区内社会秩序颇为令人担忧，时常有刑事案件发生。光绪十三年十月初，汉城南门内华商一夜被火焚烧四家，烧死三人^①，经袁世凯多次行诸公文，请朝鲜方面追缉凶犯，收效甚微。但袁世凯看到：“日本商家咸聚设于南山下泥岬地方，鳞次比居，派设巡捕数名警察防范，绝少盗焚等案。”便借鉴日本人的做法，在汉城华商区组织华商集资创办了巡查，订立制度，昼夜纠查^②。此后，汉城华商区盗焚等案发率下降甚多。反映在《旧韩国外交文书》中韩双方来往文件中，除发生一宗巡捕与酗酒韩兵格斗案之外，再无恶性

① 袁世凯：《三和兴号等四家之火灾与放火犯捕获要请》，《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387—388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628—2636页。

案件发生。袁世凯还在通往汉城的重要渡口麻浦，设立了稽查，以维持秩序^①。此外，各通商口岸华商租界内，袁世凯也颇重视建立巡查，维护治安。

第二，帮助华商发展在韩的经营条件。光绪十四年，轮船招商局扩大经营，在仁川码头栈房缺少，袁世凯就代表招商局向朝鲜外督办借用海关栈房，并要求不收租金。韩外督办赵秉式以没有栈房和恐别国援以为例而婉拒。袁世凯仍不甘休，再次照会韩外督办，指明已查到第三号栈房尚可出借，并说，中朝两国通融各事，他国向不过问，也不能援例均沾^②。

光绪十五年，朝鲜铸了不够分量的当五铜钱，引起市场混乱。华商申诉，韩民可持此钱购买华商货物，而华商用以购买韩货则遭拒绝。袁世凯立即照会朝鲜外督办，要求进行整顿^③。仁川港经纪金在田等二十五家朝鲜商人设立均平会社，垄断市场，限定外地来仁川的商贾负贩，在缴纳政府税厘之外，必须再到该社加交规费。袁世凯即照会韩外督办指出：“该会社实于华商大有妨碍，亟应禁办而安商务……希即将该会社撤销，并禁嗣后永不许再为设立，免妨商务而符定章。”^④

第三，维护华商利益。光绪十五年，北帮商人公和顺、东来顺号办领了护照，到朝鲜黄州等地采办土货，并经朝鲜有关方面同意所有税务到仁川一并完纳。但黄州地方势力崔景一强行向华商收税，遭到

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991、3010、3011页。

② 袁世凯：《有关仁川海关栈房借用之札函》，赵秉式：《有关同上件之回答》，袁世凯：《有关仁川海关栈房第三号借用之札函》，《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460、461、463页。

③ 袁世凯：《有关因当五新铜钱流行的清韩两商间弊端整顿之照会》，《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537—538页。

④ 袁世凯：《仁川港私设平会社之撤废促求件》，《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685—687页。

华商拒绝，崔又申通兵役，将华商拘禁。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多次与朝鲜外督办交涉，要求捉拿违章私行收税的崔景一及韩官差役，退还华商钱财，以保护华商正当贸易^①。仁川海关遗失华商东兴号货物，袁世凯以官方身份出面索赔^②。仁川海关办事人员马士苛待华商，袁世凯又要求调换马士^③。华人商店被焚，袁世凯要求朝鲜当局惩凶。华商帆船遇风漂流遭抢，袁世凯要求朝鲜方面派人查办。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在上表所列民间贸易栏的一百八十七件公文中，除了一小部分是要求韩方发给华商护照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上述事件，袁世凯要求保护华商利益的交涉文件。

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日本已经大军入朝的严重关头，袁世凯也没有忘记在朝鲜的中国商人。在他内渡回国以后，还曾请盛宣怀在上海租外国轮船到仁川，接运中国商人回国，以使他们脱离险境^④。

在袁世凯使韩九年间，中国人在朝鲜的商务有了长足的发展，来朝鲜贸易的中国商人迅速增多，贸易额迅速增大。历年来在汉城、仁川、釜山、元山四处中国商署登记的中国商人数目如下：

表二^⑤

年 份	汉 城	仁 川	釜 山	元 山	总 计
光绪十一年	111 名	50 名	107 名	91 名	359 名
光绪十二年	120 名	205 名	87 名	57 名	469 名

- ① 袁世凯：《对于黄州地方清商之地方收税禁止要请件》等，《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654、684页。
- ② 袁世凯：《仁川清商遗失货物赔偿件督促》，《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卷，第165—166页。
- ③ 袁世凯：《有关抗议仁川海关扞手马士之清船虐待与公乎办理要请》，《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284页。
- ④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4219页。
- ⑤ 资料来源：《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045、2209、2978、3138、3276页。

(续表)

年 份	汉 城	仁 川	釜 山	元 山	总 计
光绪十三至十六年	数字缺				
光绪十七年	751 名	563 名	138 名	37 名	1 489 名
光绪十八年	957 名	637 名	148 名	63 名	1 805 名
光绪十九年	142 家 1 254 名	117 家 711 名	21 家 142 名	10 家 75 名	290 家 2 182 名

从表中可以看出，八年之中，华商增加了五点一倍。再从华商在海关所纳税数目来看：光绪十二年，仁川、元山二口华商交纳税款为三千一百零五元，其中元山口为一千六百二十五元^①。是年缺釜山口华商纳税的数字。据表二，华商在釜山、元山二口人数，大体保持着前者为后者两倍的水平。以釜山纳税数亦大体为元山两倍计算。光绪十二年釜山华商交纳关税约在三四千元之数，仁、釜、元三口总计当在三万五千元左右。而到光绪十八年，华商在朝鲜三口所交纳的关税已达十四万五千零六十七元^②。六年之间增加三倍有奇。纳税数目增长的速度，可以大致地反映出交易数额增长的速度。

中日两国在韩贸易比例变化，是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据林明德的统计数字^③，光绪十一年，中国在朝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日本对朝鲜进出口总额的2.33%，到光绪十八年，已达到45.68%。其中对朝鲜输入额，从光绪十一年的22.74%，上升为80.43%，几乎可以相匹敌。

华商对朝贸易的迅速扩大，与袁世凯对华商的积极扶植和提倡有

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221页。

② 同上，第3137页。

③ 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00—201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6）。

很大关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于华人在商务方面的发展的评估，还应该持客观的态度。第一，这些商业远远不是近代意义的商品输出，仅仅只是中国传统工商业的向外延伸。从商人的成分来看，以光绪十五年的汉城情况为例，汉城内外，华商店铺八十余家，而匠伙手艺及担负零沽之人则有五百多名之众^①。整个华商社会还不能形成一个近代化商人的群体。从所经营的商品来看，华商对朝输出的商品主要仍然是传统的绸缎、土布以及为数有限的转口的洋布、洋纱、洋火，甚至于一些商人还是携带银两入朝。从朝鲜贩回的主要是米、豆、牛皮之类的土产品。这样的贸易，显然还不具备近代商品输出的性质。第二，袁世凯从西方抄袭来的保护扶植中国商业利益的手段，其首要出发点仍然是维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即所谓“属邦商务，有关时局”。这种赤裸裸的从政治利益出发来保护商业经济利益，与近代西方以工商为本的经济思想是不同的。因此，中国商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韩的华商往往自卑地表白：“因近年水旱为灾，多失耕业，改农为商，服贾糊口。”^②这种视工商为末业的价值观念，在官方的袁世凯和民间的商人中间，仍然牢牢地居于统治地位。第三，尽管数年间商务发展的数字翻了几番，但由于基数太小，所以从中国全国商业范围来看，对朝贸易还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也还找不出什么材料说明它们对国内正在出现的近代工商业有何明显的促进意义，更没有对东道国朝鲜的近代化进程起过明显的促进作用。

除了发展商务，袁世凯从西方抄来的新方法还有以下几种：

开辟航运。商务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航运的急需。当时中国商人来往朝鲜，除了极个别走陆路者以外，主要通过水路，或驾驶帆船

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2629 页。

② 同上，第 2857 页。

或搭乘日本开设的中韩航班轮船。袁世凯接受日本开辟中韩航运的启发，在光绪十四年筹议开设来往中国朝鲜的客货轮船航班。他认为亟需开通到朝鲜航运的理由有二：一，华商搭日轮，日方对中国人百方勒抑，以致迭出案件；二，韩为华属，不可听日人垄断，须设法巩固利权。然而，当时华商来往水脚收入，尚不敷轮船来往支出。袁世凯提请仿照日本商轮政府补贴的办法。由烟台、上海税司在来韩华商所交税项中每年酌提万余元，再加上华商包贴的水脚，开辟烟台仁川定期航班^①。结果，李鸿章接受袁的建议，以东海、江海两关每年拨一万二千两津贴，招商局派船每船每二十日航行仁川一次^②。

中朝航线开通以后，袁世凯又利用较优越的政治条件，开辟朝鲜内河航线，于光绪十八年筹议成立在仁川到汉城之间航行的中国小轮船公司，抵制外国人对朝鲜内河航行权的觊觎。光绪十一年，德国世昌洋行利用对韩贷款，曾取得漕米运输权一年^③。光绪十六年，日本人亦曾托税司史纳机商请韩外署，准予内河航行权^④。遭拒绝后，又用朝鲜人的名义，开辟了仁川汉城间的航运^⑤。袁世凯积极竞争，到光绪十八年，终于利用朝鲜要求贷款的机会，向朝鲜政府提出：“华商集股购驶小轮，作为韩接运船”，“来往仁川、汉城及沿江各处”^⑥。朝鲜国王批准了这一要求，并且规定韩国漕运不许再与他国定约^⑦。

电报线作为近代化的快捷通讯手段，在中国最早使用于军事和政治，而不是商务。光绪十一年，中国架设了从凤凰城经义州到汉城的

① 李鸿章：《寄江海甯道东海关盛道》，《李鸿章全集》（一），第 932 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2597—2598 页。

③ 同上，第 2000 页。

④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 237 页。

⑤ 袁世凯：《袁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 506 页。

⑥ 袁世凯：《袁道来电》，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 506 页。

⑦ 李鸿章：《寄译署（电二则）》，《李鸿章全集》（二），第 506—507 页。

电报线。在此之前，袁世凯作为军人已在朝鲜驻防两年多，深感通讯不便之苦，他在致陈树棠的信中叹道：“孤军海外，输运文报每月余不达，奈何，奈何！”^①到袁世凯正式使韩以后，就十分重视在朝电报线的建设以及控制管理权问题。袁世凯曾力劝朝鲜政府架设釜山至汉城的电报线，并交中国施工、管理^②，并约定朝鲜向中国的电报线“借款未清之日，一切局务仍由华员主持，秉承汉局总办，以一事权”^③。为了有效地控制朝鲜的电报事务，袁世凯甚至不顾盟兄盛宣怀的情面，坚持要求撤换不能在对韩交涉中统一步调的朝鲜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的亲信陈同书^④。

干涉朝鲜海关事务。朝鲜海关成立时，即归属清朝海关管辖，而保证中国顺利控制朝鲜海关的关键是掌握朝鲜税司的任命权，这虽然不属于袁世凯的职权范围，但他深明在通商条件下，海关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所以，十分注意以清政府正式使韩代表的身份，影响朝鲜海关税司的去留和任命。税司穆麟德因策动韩俄密结被撤职后，滞留朝鲜拟另谋新职务，袁世凯为排除这个不合作因素，极力驱赶穆麟德离朝^⑤。袁世凯认为史纳机尊重中国宗主权，便在光绪十七年七月、十八年七月先后两次建言，请将史纳机留任^⑥，还曾同史纳机一起，谋划对付朝鲜收回海关自派税司的举动^⑦。新任税司到朝鲜上任，袁世

① 《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版，第129页。

② 《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电禀稿》，第6页。

③ 《釜山电线条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版，第504页。

④ 李鸿章：《寄朝鲜袁道》，《寄烟台盛道》，《李鸿章全集》（二），第66、67页。

⑤ 《袁世凯来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册，第573页；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第575页。

⑥ 李鸿章：《寄江海龚道东海关盛道》，《李鸿章全集》（一），第2898—2899页；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492—493页。

⑦ 李鸿章：《寄译署》；《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209页。

凯亦坚持由他自己代表中国政府先行将新任命通报朝鲜政府，然后才由新税司通报到职，以体现税司是由中国任命的^①。

经营租界。袁世凯受命使韩以前，东西方列强在朝鲜的租界已经设立，清政府亦效法各国在韩辟设了租界。在袁世凯任内，对租界的经营，又做了下列的事：（一）新辟并扩展釜山清商租界^②；（二）扩展了仁川三里寨租界^③；（三）维持租界内正常商业及生活秩序，强化治安管理^④；（四）在租界内进行了一些基本建设，修整道路沟渠，平整了土地，提供了较好的商业投资环境，以致元山租界附近的地价上涨了一倍^⑤。此外，在元山商请朝鲜官府修海堤^⑥，为仁川租界准备了设立医院、建立消防队等公共设施的经费^⑦；（五）对到韩的中国人员进行登记注册，颁发执照，加强在韩华人的管理^⑧。

对朝鲜举借贷款，利用经济手段攫取政治权力，这是袁世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统驭朝鲜的又一重要手段。他说：“历年韩事操纵两杂，……实无妥善之术。如能贷予巨款”，“阳示抚字，阴为钳制，因事制宜，洵为要机”，所以，“今取属大计，惟贷款为至要关键”。袁世凯总结贷款“有利驭属权利者大要有六”：（一）朝鲜“遇有急需有

① 袁世凯：《袁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06页。

② 袁世凯：《有关釜山清商租界设施的照会》，《釜山港共同租界新增地段地图送呈件》，《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册第320页、第九册145页。

③ 袁世凯：《仁川租界的三里寨地方扩张要请》，《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册，第305—306页。

④ 袁世凯：《有关仁川三里寨地方的韩清共同巡察之札函》，《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册，第457—458页。

⑤ 袁世凯：《有关元山清租界附近地价引上件》，《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册，第206—207页。

⑥ 袁世凯：《有关元山港清租界的堤防工事件》，《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册，第187—188页。

⑦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887页。

⑧ 同上，第2905页。

所依恃，自将憎薄洋人，悦服中国”；（二）中国“可操其财政之要”；（三）朝鲜“不敢轻为抗违”；（四）中国“其势愈重，其权愈大”；（五）朝鲜“属邦之凭证愈确，并可永杜其外贷之路”；（六）“韩之贷款愈巨，即华之（海）关权愈固”^①。所以，袁世凯极力主张利用朝鲜经济困难，通过贷款而全面控制其政治经济。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一）设立贷款基金，随时应付朝鲜政府的需要^②，以垄断对韩贷款。（二）劝止朝鲜当局向别国贷款，并以低息吸引其向中国贷款^③。（三）对于韩已在商谈的外国贷款，以提供优惠条件迫使债权一方降低条件^④。袁世凯如此做法，韩方初时甚为疑虑^⑤，其后，通过两次共二十万两贷款的实施，尚颇得“韩君臣感悦”^⑥。袁世凯最初设想的目的初步得到实现。

此外，袁世凯也曾议论过在朝鲜开矿山、修铁路的事情。

四、“外联邦交”“以夷制夷”

早在袁世凯使韩以前，为对付日本征韩的野心，清总理衙门在光绪五年就为朝鲜制定了“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⑦的政策，并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以个人身份致书韩国

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17—3119页。

② 同上，第3117页。

③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482页。

④ 袁世凯：《袁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一），第582页。

⑤ 袁世凯：《袁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107页。

⑥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526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34页。

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劝朝鲜交聘各国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310—311页。

和李裕元，劝朝鲜“幡然改图，量为变通”，实行上述“以敌制敌之策”^①。光绪七年初，清廷明令有关朝鲜事宜由礼部改归北洋大臣及驻日公使办理^②，从此，李鸿章成为朝鲜事务实际上的主要决策人。李鸿章在授命前后，又曾致书韩王，力劝改变对外政策，与西洋各国订约，并代为草拟通商约章^③。其实，清政府、李鸿章为朝鲜制定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多少新东西，不过是其自己对外政策——“以夷制夷”的复制品。其运用于朝鲜的具体模式就是：与欧美各国逐渐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防御俄国^④。

袁世凯使韩，自然奉李鸿章的既定政策为圭臬。袁世凯上任伊始，就反复向朝鲜君臣陈述国际局势，为朝鲜政府规划对外交涉的原则，即在对东西方各国贸易已经开通的环境下，“御外侮之道，惟亲中国”^⑤。他认为，依恃中国，慎修外交，是朝鲜对外交往的政策核心，而当时的国际局势下，只有中国可以依恃。朝鲜虽与各国通商，但通商的目的只是引来欧美列强势力，以杜日御俄的，并不是请他们来保护朝鲜的，而且他们东来的本意也不在保护朝鲜。袁世凯说：历史表明，英国、法国一贯“亡人国家，利人土地”，靠他们保护，无异于“引虎入室”；德美也不可依赖；至于日本、俄国，则是朝鲜御外侮的主要对象^⑥。

袁世凯认为，各国在朝鲜应该是通过通商而互相制约，保持均

① 薛福成：《代李伯相三答朝鲜国相李裕元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第338—341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百二十。

③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开导朝鲜外交并代拟通商约章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314—316页。

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朝鲜宜联络外交变旧制折》，第312—314页。

⑤ 袁世凯：《与朝鲜国王笔谈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56页。

⑥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60—2163页。

衡，列强国家不该有单独的商业特权，更不能允许在通商之外谋取直接的政治权益，以危及朝鲜的主权 and 中国的宗主权。本着这一宗旨，他在使韩期间，力所能及地帮助朝鲜政府抵制东西方国家在主权、政治和经济方面索要的过分的权益。其主要的是：

第一，审慎订立条约。俄国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提出订立《韩俄陆路通商条约》，袁世凯在正式使韩以前护送大院君返国谒见朝鲜国王时，即建议朝鲜应以韩俄边界未清，待勘定之后，再行议商为由婉拒^①；使韩以后，又指使朝鲜外务署采取拖宕政策。他明确指出：“韩俄陆路交界，荒苦异常，通商原无利益”，“俄期速成，不过欲开来往之路”。朝鲜应该从容延缓，“得以详审防范之宜”^②。到光绪十三年，韩俄议约开始，袁世凯又针对俄国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本，提请朝鲜方面注意防微杜渐，堵塞俄国借机渗透的漏洞。他提出：（一）坚持通商之地只在边界，不许俄商深入内地；（二）拒绝俄国在商路“派送本国驿站，发文行走”的要求，以防“倘有战事”，俄国借此为由“另设驿站，分派兵弁屯驻”，作为军事通道；（三）通商和游历各为一款，通商须议定经过关卡，按界行走，随时呈验，不便混游历通商为一事；（四）应加重税率；（五）应添加对两国逃犯“明定互相拏交之约”。此外，还提出一些必须坚持的细节^③。朝鲜谈判代表按照袁世凯的意见，对明显危害朝鲜利益主权的条文，坚持做了多处修改^④。

韩俄《陆路通商条约》订立后，光绪十五年，法国公使要求援例

① 袁世凯：《九月初四日谒见国王笔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580—581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277页。

③ 同上，第2277—2292页。

④ 对比草约及正式文本即可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281—2292、2507—2515页。

“均沾”，袁世凯即嘱韩外督办，“韩法无交界，不能援沾”，驳复拒绝^①。在此之前，光绪十二年，韩法订立通商章程时，袁世凯亦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帮助朝鲜谈判代表，“严词”“驳拒”法国强迫朝鲜允许订约传教的无理要求^②。

第二，抵制各国染指朝鲜主权。袁世凯使韩后，对于已经发生的韩英巨文岛交涉，积极支持朝鲜收回主权的的要求，坚持英国必须交回^③。光绪十二年，俄国派船到朝鲜永兴岛测量，意存覬覦，英国立即提出派兵船开往永兴，代朝鲜防守。袁世凯洞悉其借机占据永兴的企图，明确表示拒绝，说恐怕“再如巨文，断不可行”^④。光绪十五、十六年，俄国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以储煤和开租界为借口，先后两次提出租借绝影岛。袁世凯深刻地剖析了俄国的企图：绝影岛“犹威海之刘公岛，实釜（山）港锁钥”^⑤，该岛与釜山“远隔海面，固不能架设桥梁，相为交易，其意不在商务，已可概见”^⑥。因而告诫韩外督办，要“力持”拒绝，“免误国罪”^⑦。光绪十八年，俄又“索釜山地造船”，袁世凯亦嘱韩“外署力拒之”^⑧。

日本曾试图谋求商船由内河航行到平壤^⑨，攘夺釜山到汉城修筑铁路权^⑩，开采朝鲜矿山^⑪，以至提出同中国非法走私商人均沾到朝

①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3页。

② 《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第20—24页。

③ 《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第8页；李鸿章：《寄译署〈电三则〉》，《李鸿章全集》（一），第606、607、610页。

④ 《养寿园电稿·电禀稿》，第25—27页。

⑤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48—49页。

⑥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747页。

⑦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48—49页。

⑧ 同上，第474页。

⑨ 《李鸿章全集》（二），第237页。

⑩ 李经方：《李使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456页。

⑪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049页。

鲜内地贸易权^①，也曾提出租绝影岛^②，等等，均被袁世凯协助朝鲜政府设法拒绝。直到甲午六月上旬，日军已经出兵朝鲜，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之际，袁世凯仍打算用向英商贷款，倒填日期，并订明“限半年内不许向他国贷款及议矿路事”，来杜绝日本可能提出的“设电开矿、借巨款、造铁路等事”^③。

总之，在袁世凯任内，东西方列强在朝鲜攫取的权益基本上没能扩大，过分要求大都遭到拒绝，大体上保持势力均衡的状态。当然，袁世凯的出发点，是出于维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他也很讨厌那些在朝鲜政府供职的美国人如德民等，说他们“皆有许人自主之癖”^④。因此，尽管他们在受中国指派初到任时，袁世凯对他们大都表示真诚的欢迎，而最终也大都都不欢而散。

袁世凯在韩的对外交涉的重点是联络欧美各国敌御俄日。御俄比较单纯明了。首先清政府朝野和袁世凯一致认为俄为强敌，对俄南下战略有较明确的认识。诚如袁世凯所反复说明的：“俄与朝鲜犬牙接壤，包藏祸心，非一朝夕，夫人知之。”^⑤“俄人欲在亚洲占据海口，屯驻水师，以遂其鲸吞之志，如不取诸韩，将焉取之。”^⑥其次，由于朝鲜朝野离心倾向增长，时有联俄之议，以至光绪十一、十二两年连续两次发生韩俄密约的重大风波。从清政府到袁世凯对此事都十分重视，防范十分严密，甚至不惜用出兵备战，废立韩王一类最激烈的手段来反对。再加上国际环境对俄不利，日本的牵制以及劲敌英国抵制

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646—2647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48—49页。

③ 同上，第764页。

④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897页。

⑤ 袁世凯：《摘奸论》，《李鸿章全集》（一），第577页。

⑥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61页。

的战略格局，都使在袁世凯任内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俄国在韩的势力未能恶性膨胀。

拒日的局面就比较复杂了。虽然拒日同样是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共识，但是，与他们的御俄心态则大大不同了。清政府朝野上下，虽曾为日本吞并琉球、染指朝鲜所震惊，但一般都不认为日本足以与中国为敌。袁世凯身处对日交涉前线，且有两次平息韩乱与日人交锋的实际经验，他对日本的潜在威胁估计要严重得多。他说：“甲申以后，（日本）知与朝鲜寇仇已深，不可复合，前此愚弄之计皆无所施，惟派和平柔儒之士，如高平、近藤者充当使员，周旋其间，以弭衅端，而专力于兴起商务，招集商民，盘根植固，倍履中国，其处心积虑不徒为今日计也。”^①袁世凯对于日本方面不怀善意地套近乎，也保持着较高的警惕^②。他的这种认识和态度，颇有见地，也高于时人。但袁世凯也有两败日人插手韩政的经验，有迅速扩大在韩商务、对朝人口几乎赶上日本的经济成绩。他认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不过是“疆域与朝鲜等，徒以改用西法，侈言功利，外强中干，党祸迭起，自谋不暇”^③。因而也没有把日本作为能与中国抗衡的对手看待。这就是说，袁世凯与国内朝野人士一样，没有估计到日本有那么大的野心与能力，在甲申事变十年之后，就发动如此大规模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一经爆发，朝鲜全境迅速失守，中国军队很快一败涂地。

但是，袁世凯毕竟在朝鲜直接同日本打交道有年，凭着许多直观而具体的经验，从出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开始，他就提出了一些有

① 《高平领事致大隈外务大臣函》，《日本外交文书》第21卷，第314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6），第99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138页。

③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61页。

见地的看法和主张。袁世凯认为，“剿匪非难”，问题是出兵可能会引起各国所制造的意想不到的麻烦，“殆难防范”^①。

果然，日本乘机出兵入韩。对于日本出兵将产生的严重后果，袁世凯的觉察也相对地早一些、深刻一些。当他一得到日本出兵的消息，即于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五、初六、初七连续三天电禀李鸿章，认为日本出兵一举“殊非友谊”，近年来，日本“迭有应照约驻兵（朝鲜）挟制之议，今果乘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既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日军来势“甚锐，似非有所得不肯去”^②。

请求西方列强的调停、牵制，是李鸿章等人最寄希望的法宝。尽管袁世凯本人对调停的作用信心不足，认为“非口舌所能争”^③，但是从日本出兵时起，他就在国内的指示下，多方谋求西方各国对日本进行干预。提出“诘责”，直到内渡前都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六月十三日，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之际，袁世凯还抱病会见俄使韦贝，请他出面调停。对各国使节出面调停，日本置若罔闻，甚至公使团会议，日使也借故不参加。其实各国使节的所谓调停，十分软弱无力，最后只对日军的行动表示愤慨，根本谈不上以军事实力进行干预^④。结果从日本出兵到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间，调停不断，唇干舌燥，而事态则向相反方向发展，日本的气焰越来越嚣张。面对日军的大举行动，许多人所寄望的国际调停，也就是“以夷制夷”，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袁世凯在五月底得出结论说：“日蓄谋日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兵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⑤

①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 688 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电三则）》，《李鸿章全集》（二），分见第 680、691、694 页。

③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 709 页。

④ 李鸿章：《寄译署（电数则）》，《李鸿章全集》（二），第 694、719、777、786、709 页。

⑤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 752 页。

除非光荣孤立，所谓均势就是互相牵制。在这个意思上说，也就是“以夷制夷”。倘若当时的袁世凯和清政府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作后援，主动在我，再利用东西方各国的矛盾，寻求有利时机，自然可以左右朝鲜的局势。但是，他缺乏这个雄厚的根基，结果成了诸夷制我，朝鲜成为东西方列强交易的筹码。平时尚好，一旦他们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整个朝鲜便成为牺牲品，袁世凯苦心经营多年的东方藩屏顷刻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五、“奉使高丽，颇得人望”

中法战争之后，袁世凯奉命使韩，在东西方列强争夺的夹缝之中维持中韩宗藩关系。在袁使韩九年中，通过他的纵横捭阖，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政局的控制，基本上实现了“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朝鲜政局呈现了一种在危急中的稳定状态。为了完成使命，袁世凯除了沿用传统手段之外，还抄袭了许多西方列强的带有近代色彩的方式方法，与国内的洋务派“西学为用”的改革运动里外呼应，成为同光新政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宗藩关系，袁世凯并没有从根本上学到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精髓。所以，他也并没有帮助朝鲜利用时机，发展民族工商业，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或者为近代化打下基础），使朝鲜富强起来，建立起抵制列强入侵的实力。袁世凯在参与朝鲜对外交涉中，唯一武器是“以夷制夷”，其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结果，一旦东西方列强在朝鲜的平衡打破，日本发动了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出现朝鲜几乎无还手之力的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袁世凯使韩九年的是非功过，长期以来，言人人殊。但是，当时人们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所做的评论，是值得注意的。翁同

稣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即“奉使高丽，颇得人望”^①。他所说当包含中韩两方面人士的意思。朝鲜君臣，除对袁世凯力持上国体制，痛感有伤民族感情而时露不满外，对于袁世凯帮他们维持内外局势则是十分感激的。朝鲜国王曾表示：袁世凯“拯我于危，扶我宗社，人谁无情，岂能忘其大德”^②。光绪十八年袁世凯省亲返韩后，帮助朝鲜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加强内治，他与朝鲜君臣前期的紧张关系得到很大缓和。朝鲜当局上下，对袁世凯是称意的，普遍认为袁世凯为他们稳定了国内政局，可帮他们抵御外侮。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大兵开进朝鲜，袁世凯奉调回国，朝鲜一些官员还多方与袁世凯联络，或追随袁世凯到东北前线，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③。

在当时的国内，青年袁世凯也在朝野上下被普遍看好。光绪十六年，袁世凯请求内调，刚刚亲政而欲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就曾面谕李鸿章：袁世凯“甚有才识，我用他事甚多，可令其好好办，不可令其回来”^④。李鸿章说：袁世凯是一位“才识英敏”，“胆略兼优”，器识“深沉细密，历练和平，徇属体用兼备之才”^⑤。不仅朝廷和权臣如是说，就连在甲午战败刺激下，具有改革意识、愤然而起的爱国官员沈增植、叶昌炽等，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均引袁世凯为同道，从而联袂发起强学会。这个史学界公认的事实，说明了当时的袁世凯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袁世凯使韩九年，历练了才识，开阔了眼界。长期厕身于对外交

① 《翁文恭公日记》乙未八月十一日。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453页。

③ 如平安港监司闵丙爽、外督办赵秉稷、外务参议闵尚镛、经理闵泳骏、韩驻津商务委员李冕相等，资料见：《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第44页，（下），第484、489、492、492、496页。

④ 袁世凯：《致二姊函》（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天津博物馆馆藏手札。

⑤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723、2724、3007页。

涉事务中，对世界大势有了直接的感受。这些感受，再经甲午战败的事实启发，使他得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历观中外交涉情形，万国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两国条约，为承平无事时言之；强邻奥援，又为彼图自利者言之。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而国家富强的前提则是练兵。这种主张，符合甲午战后国人普遍的舆论，也符合清政府的需要。袁世凯乃迎合着国人的舆论和清政府的需要，更进一步，舍弃前赴浙江温处道实任，而凭借在使韩期间赢得的声誉和好感，去谋求编练新式陆军的差使。清政府内外重臣，如李鸿藻、刘坤一、王文韶等，也都认为袁世凯是编练新军最佳人选。早就有意思重用袁世凯的光绪皇帝就把这个系以国命的重任交给了他。以此为契机，袁世凯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

（原载台湾《韩国学报》第11期）

袁世凯与河间、彰德会操

张华腾

(安阳师范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1905、1906年),清政府调动数万名新军先后在直隶河间、河南彰德进行了两次规模巨大的军事演习,即会操。这两次会操展示了袁世凯领导的晚清军事改革的成就,标志着中国陆军正式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次会操造成的重大影响,还直接关系到晚清政局。但到目前为止,对两次会操似没有专文研究。本文试作以探讨,以期补苴罅漏,抛砖引玉。

一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袁世凯督练的北洋新军六镇正式成军。为考察一下这支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练兵处计划于当年在直隶河间举行会操。八月十九日,练兵处官员——总理练兵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练兵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办练兵事宜兼署兵部尚书户部右侍郎铁良、会办练兵事宜兼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联衔上奏皇帝:

窃谓战备必须豫立,操法尤戒参差,东西各国每于秋冬间举行大操,详求赴机应变之方,实行攻守战阵之法,使各军步列如出一人,通国营队联为一气,故无不务不虞之患,易收必克必胜

之功。……现陆军编练各镇分扎直东，尚未会合操演，自应参仿举办秋操，以司戎备而验实行。^①

会操除考察北洋新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外，还有另外两个明显目的：一是让北洋军为正在训练中的各省新军做出榜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二是向东西各国显示一下中国军事改革的成就，有明显的展示作用，即练兵大臣所陈述的“此次秋操实行攻战，事属创举，内为外省标准，外系列国观瞻”。^②练兵处的计划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并派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按练兵处计划如期进行。

河间会操时间定于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由于参加会操的北洋新军为袁世凯一手操练的，袁世凯又是练兵处会办练兵大臣、这次会操的阅兵大臣，所以，袁世凯无疑是这次会操的策划者和最高指挥。为保证会操的成功，充分显示北洋新军的实力，袁世凯在会操前精心进行了安排和部署。首先设立了会操的总指挥机关阅兵处，袁世凯任命自己的部下二品衔署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总参议兼评判处首领，“总理阅兵处各处事务，遵奉阅兵大臣之谕施行方略，监视军情、评判战况并指导演习等事”。^③阅兵处下设评判处、综理处、递运处、传宣处、执法处、接待处、信号处等七处，分工负责会操的有关事宜。其次，制定了会操的各项条规，如行军纪律、宿营禁令、野操私斗治罪条例等。第三，为保证会操的安全，袁世凯还从天津调来了捕盗营、消防队等。第四，由于调集几万军队会操，粮饷器械、军需供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军务）第53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1—442页。

② 同上，第442页。

③ 《练兵大臣袁世凯等为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事奏折》，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0页。

应为最重要之事，袁世凯选择“河间府属之臧家桥、沙河桥适中地方暂设军粮分所，就近馈米粮之外，量给饼干、柴草，麸料，兼储并蓄”。^①至于枪炮、子弹、车辆、马匹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参加会操的北洋新军共两镇四混成协，总兵力为四万五千零二人，^②几占北洋新军的三分之二。这两镇四混成协分为南北两军。南军由第四镇全镇和第四、第九混成协组成，王英锺为总统官，陆锦为总参议。第四镇统制官为吴凤岭，兵力为：步队两协计十二营，马队一标计三营，炮队一标计三营，工程队、辎重队各一营。第四混成协统领官为张怀芝，兵力为：步队两标计六营，马队、炮队、工程队、辎重队各一营。第九混成协统领为马龙标，兵力为：步队两标计六营，马队、炮队、辎重队各一营。以上南军官佐目兵夫役共二万二千五百一十三名。

北军由第三镇全镇和第一、第十一混成协组成，段祺瑞为总统官，李世锐为总参议。第三镇统制官为段芝贵，兵力为：步队两协计十二营，马队一标计三营，炮队一标计三营，工程队、辎重队各一

① 《练兵大臣袁世凯等为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事奏折》，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第566页。

② 关于参加会操的兵力，几乎所有涉及这次会操的著作都搞错了，都认为是两万多人。如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第105页）：“1905年10月末，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正式的野战演习。北洋六镇中抽调两万多人，分成两军，由王英锺、段祺瑞分别担任总统官，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张一文主编《中国近代军事人物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398页）、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05页）等均持此说法，不知何所依据。笔者根据练兵处会操计划、当时报刊对会操的报导，尤其是阅兵大臣袁世凯等在会操后向光绪皇帝汇报会操情况的奏折以及附加的会操部队编制清单，核实参加会操的兵力为两镇四混成协，四万五千零二人。见《练兵大臣袁世凯等为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事奏折》附件三：《陆军会操南北两军编制清单》，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第575—576页。

营。第一混成协统领官为曹錕，兵力为：步队两标计六营，马队、炮队各一营。第十一混成协统领官为陆建章，兵力为：步队两标计六营，马队、炮队、工程队、辎重队各一营。以上北军官佐目兵夫役共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九名。

河间会操的总方略是南攻北御。南军由江北登陆，整队北上，道经徐淮达济东，拟派一支队渐向直隶前进。驻扎直隶之北军，或由铁路，或由徒步，逐渐南御，其一支队已抵保定附近一带。

河间会操的时间虽为九月二十四日，而在此前，南北军内部的军事演习早已开始了。南军第四混成协先期由直隶迁安开拔，经开平乘火车抵军粮城下车，渡海河历小站至马厂，与第四镇汇合，同由马厂、小站分段前进，循青县、沧州、南皮而达东光；第九混成协则先期由山东济南开拔，经平原、禹城、德州而至东光合军，沿途各分队操演，均于九月二十三日齐集交河一带。北军第十一混成协先期由南苑开拔，经涿州、定兴、安肃而抵保定，与第三镇及第一混成协会合。该镇协亦先在中途逐日操演，至是合军进发，二十三日齐集高阳一带。

九月二十四日，会操正式开始。是日，南北两军的先锋骑兵到达献县和边渡口之间，各以小分队试探前进。二十五日为两军骑兵冲锋战，步兵遥相掩护。南北两军齐向河间进发，在太平庄相遇，南军大呼先行突阵，北军排开阵势迎击，彼此冲锋各不相让。终因南军兵力较弱，为北军所挫，退至高家林附近，北军扎营于龙化店附近。二十六、二十七日为两军实力拼搏战。二十六日清晨6时，南军分三纵队沿子牙河线路北进。北军亦分三纵队于午前8点30分沿肃宁一带线路南下。其在龙化店之马队，闻南军出动大队步队，遂分为两支，向西北方向退却，一支退至刘善寺一带，一支退至八里铺一带，在本军两翼运动警戒。南军马队因得步队援助，进蹙北军马队，至东甄里警

戒本军左翼备战。10点30到11点，南军各纵队之前锋进抵八里铺西南郭家楼一带，沿堤岸据守。北军各纵队之前锋渐达小刘庄、大小曲地、大于庄等处，各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与此同时，南军炮队四营在郭家楼一带严阵以待，北军炮队亦在大小曲地之间陈列并峙。11点30分，两军先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在炮弹横飞尘土飞扬的硝烟弥漫之中，双方指挥官各命其步队冲锋，两军迭进角逐，南军主力向北军之左翼包抄，北军之主力亦向南军之左翼进攻，枪炮互施，势不相下，直至午后1时，阵线愈逼愈近，几乎兵刃相接。正值双方激战激烈之时，阅兵处下了停战令。

二十七日，北军占据高垒城、窰庄、小白洋村一带，布定守局，藉林木堤堰以为障蔽，并施防御工程。南军发起几次进攻，均遭失败，几不得前，遂遣大队赴其右翼，且伏且进，节节抄击。北军以攻为守，遣其精锐之师扑向南军之右，彼此甚为得手。在战斗最激烈之时，北军之总预备队第十一协，南军之总预备队第九协全部调至前线。待两军主力相交，几乎白刃相搏之时，阅兵处停战令下达。

二十八日，南北两军均着军礼服会集河间，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会操圆满结束。^①

会操期间，袁世凯和阅兵处官员观操于形胜之地、跃马于两军之中，指陈得失，评判优劣。一个随同观操的日本人挥笔记下了一幕幕情景：“直督袁官保亲统率三军演武于河间之野。当此秋高气爽马肥人勇之时，剑光凛凛，枪烟蒙蒙，阅其兵马驰逐之状，洵足令人神飞色舞也。”^②

① 《津报纪陆军会操战状》，《时报》乙巳年十月十日、十月十七日；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第566—567页。

② 《节录日人河间观操纪略》，《时报》乙巳年十月十一日。

光绪皇帝、西太后对河间秋操极为关切，会操期间曾发电慰问，“此次两宫深眷注于此大操，前日有电来询，并欲劳军以牛酒，惟因购办不易，故两帅定由每一协发给二千五百金为酬”。^①

河间会操结束后，袁世凯将会操情况详细向两宫作了汇报，并将反映会操实况的照片、办事章程、方略命令及战况评判、训词等上呈。光绪帝、西太后阅后甚为高兴，下特旨对袁世凯、铁良等人进行表彰，并鼓励其进一步努力，精益求精。

二

河间会操后一年，清政府决定再进行一次大规模会操，由练兵处和兵部联合奏请皇上批准，仍任命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地点选在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故称之为“彰德会操”。

彰德会操与河间会操相比有三个鲜明的不同特点：第一，会操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积极邀请外国军事人员前来观操，允许外国报馆前往现场采访，要求各省派要员观操并充当评判员。当时报纸曾评论说，“去年河间操演，当轴务执秘密主义，其意似恐外宾或有洞察军机，即如观察访员犹不免拘束。至此次操演，全出于开放主义，无牵强之机，亦军务之一进步也”。^②当时西方主要国家英、美、俄、法、德、意、奥、荷、比等和日本均派人参加。西方著名报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字林西报》，俄国的《警卫报》，德国的《营报》，美国的《月报》以及日本东京《时事新闻报》、大阪《每日新闻报》等均派记者前来采访。国内重要报刊《申报》、《时报》、《大公报》、《华字

^① 《河间观操日记》，《申报》1905年11月5日。

^② 《华字汇报》1906年9月18日。

汇报》等当然不放弃对这次重大事件的报导。国内各省各特区观操者更加踊跃，除西藏、蒙古外均派人参加。参加彰德会操的中外观操员共计有四百八十七人，^①“此次秋操，各省来观人员极多，较之去年尤盛”。大操将近之期，“各省随观员皆纷纷到彰德，均暂自行借寓客栈，故火车站旁之客栈甚多，皆有人满之患”。^②

彰德会操不同于河间会操的第二个特点，是参加会操的军队不仅仅是北洋新军，还有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按军队驻防区计，为直隶、山东、湖北、河南四省和京师，范围更为广泛。所以这次会操的意义更加深远，诚如袁世凯所说：“上年秋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风声所树，耸动寰球。此次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③参加会操的北洋新军各军组成北军，仍任命段祺瑞为总统官，陆锦为总参谋官。北军总兵力为一镇一混成协，共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二人，是由上年未参加河间会操的部队临时拼凑而成的。具体为：从驻扎山东的第五镇内抽出步队一协，马队一标，工程队一营；从驻扎南苑的第六镇内抽调步队一协；从驻扎直隶的第四镇内抽调炮队一标，编成混成第五镇，任命张怀芝为统制官，张绍曾为正参谋官。从京旗第一镇内抽调步队一协，马、炮队各二营，工程队一营，编成混成第一协，任命曹锟为统领官。湖北新军第八镇和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合编成南军，任命张彪为总统官，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官，王汝贤为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官。兵力为一万七千七百八十六人。南北两军总兵力为两镇两混成协，官佐弁兵夫役共三万三千九百

①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折》附件三、六，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7、1411—1414页。

② 《申报》1906年10月27日。

③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下，第1389页。

五十八人。^①

彰德会操的第三个特点是准备更为充分、组织更为严密。由于袁世凯为练兵处主要官员和阅兵大臣，故彰德会操的谋划和总指挥仍为袁世凯。鉴于上次的经验和这次会操的实际，袁世凯为搞好会操，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阅兵处下设综理司、递运司、传达司、内宾接待司、外宾接待司五司，每司均有明确的分工，职权分明。对阅兵处所在地彰德府城，也大加修饰，“此次大操，北洋大臣袁宫保预先派员来彰，会同地方官吏修缮街道，大街一带各业店铺亦令涂饰一新，各店均悬灯结彩，高揭国旗，宫保并由天津派来巡捕四百名，分布巡逻，市街之整洁，人民之肃清，诚中国内地之初见也”。^②对会操部队更强调以严格纪律。袁世凯通过练兵处告知湖广总督张之洞：“今年秋操，中外瞩目，内务外容均宜留意。请飭贵管官长，严明纪律，认真约束，出操兵丁所带枪炮，无箭空子，无论大操、野操，均需详细检查，切勿误将有箭子弹或沙石等类掺杂其中，以防伤人，腾笑远近，并由各管官严谕各兵遵令发枪，慎勿任意乱发，虚糜子弹。”^③至于军需给养，更有严格的要求。为使参加会操的兵士吃上方便可口的食品，阅兵处还新研制了一种行军蒸米，“本年秋季大操兵丁所食饼干异常干燥，须多饮壶水，于行军不大相宜。现有参议处留学生仿照新法，用上白大米淘净，以水渐浸五十分钟，干湿相宜，再用笼蒸热后阴干，不用锅炒，临时携带用水，泡二十分钟即可食用，日前督练处已将米样发给各镇，飭令如法制办，以备南北大操之用”。^④

①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折》附件二，《袁世凯奏议》下，第1396—1397页。

② 《大操中之彰德城》，《时报》丙午年九月十日。

③ 《练兵处致鄂督电》，《时报》丙午年八月十八日。

④ 《新制秋操行军蒸米》，《华字汇报》1906年8月8日。

彰德会操实际还是南北新军的第一次较量。甲午战后张之洞和袁世凯率先采用西法练兵，进行军事改革，且均取得显著成效。但张之洞为元老重臣，在李鸿章、刘坤一先后去世后则显得更为重要。袁世凯是朝廷新贵，西太后的宠臣，在新政中大显身手，坐镇直隶，为各省督抚表率。张、袁互不服气，矛盾重重。彰德会操，将把南北新军同时展现在各国、各省面前，故无论是张之洞，还是袁世凯，都对会操给予高度重视，在正式会操前，双方都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日夜加紧演习，尤其是张之洞。张之洞在会操前一个月就将湖北新军带往南湖训练，“官保督宪（张之洞）日昨谕令张虎臣统制，传谕赴操各营于初六齐集大东门外南湖地方，操练行军，官保督宪亲临，大加简（原文如此）阅”。^①不仅如此，由于河南新军成军较晚，张之洞惟恐训练不力，从而影响整个南军，故特咨河南巡抚，待湖北新军抵河南后，先在新乡一带与湖北新军汇合演习熟练后，再北上与北军会操。而河南巡抚认为会操在河南境内，尤其是河南新军也参加会操，是一大幸事，对此也倍加重视，很早就把第二十九混成协从开封拉到郑州训练。北军由于驻扎分散，各部队在汇合行军过程中自行进行了演习，北军混成第五镇于八月初六、十七等日，各由驻防地开拔，二十日后，全抵广平府，旋分队在广平府北界之曲甫市及邱县自行演习。混成第一协则于八月二十日自保定拔队，由铁路至邯郸，转赴邯郸所属之码头镇操演，三十日在码头镇与混成第五镇会齐，亦全军合操一次。九月初三日，即齐集彰德府北界之刘家辛庄及丰乐镇一带。南军湖北新军第八镇八月十五日开拔北上，乘火车至卫辉下车。河南新军八月十六日、十七日在新乡与第八镇会合，三十日在卫辉附近全军会操一次，九月三日齐集淇县北关一带。虽说会操仅仅是几天的事情，

^① 《检阅赴操营兵》，《华字汇报》1906年8月17日。

但会操前的准备工作则是大量的。到九月三日，南北两军均按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形成了对垒之势。^①

彰德会操仍是南攻北御。其总方略为：南军主力由扬子江岸分江苏、安徽两路北进，其一支队利用京汉路侵入河南。北军聚兵山东北界，尚未齐备。南军方略：南军任务在速进威胁敌军之侧背，以妨碍其聚兵，并力求参与本战，至卫辉府下车，九月初四日宿营于淇县北方，其马队宿营于大赆店附近。北军方略：北军有击退敌军黄河以南之任务，由保定派至卫辉方向，九月初四日薄暮，到丰乐镇及刘家辛庄附近，其马队宿营于彰德南关。^②

九月初五日会为操之第一日，主题为南北两军骑兵冲击战。早 8 点，南军马队由大赆店拔队沿姬家屯、宜沟方向北上，10 点钟抵达后小滩，由于前锋马队将在汤阴东南五里村的阅兵大臣卫队误认为北军马队，随即向五里村奔来。北军马队早 7 点 50 分由彰德起程沿钟官屯、王官屯、小张盖、木佛一带南下，10 点 40 分，抵达南店村附近。散哨马于士得、南城、望攸等处。此时南军主力马队已由伏道镇向士得方向疾驰。两军相距八九里时，相互发现了对方，随即变换队形，南军腾蹕而前，奋呼突阵，北军有备而来，按辔徐发，一转瞬间，两军相交，互相冲锋，蹄迹交错，几于挺刃相寻。正当此时，阅兵处停战令下。按此日预定方略，本拟令北军退却，但由于南军误探分军，致使主力较弱，又疾驱前进，马力过乏，冲击力太小，使北军占了优势，阅兵处官员不得不临时令南军退却。^③

九月初六日为两军主力之遭遇战。上午 8 时，南军左翼第八镇由

①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详细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下，第 1390 页。

②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详细情形折》附件四，《袁世凯奏议》下，第 1398 页。

③ 《本馆特派员随观九月五日两军马队遇战报告》，《申报》1906 年 11 月 7 日。

宜沟，右翼第二十九混成协由车屯北上，9点50分抵达汤河南岸，为避免背水作战，遂分成五路纵队迅速渡过汤河，左翼由史庄、刘家庄、七里铺、文王庙一带向龚官屯、十里铺方向前进，右翼由杨村一带向黄土岗、杨庄方向进发。炮队则先占领黄土岗迤北一带高地。北军混成第五镇8点20分由彰德城南大吴村、张官屯一带南下，混成第一协由彰德城南十里堡、杜官屯一带前进。北军共分成三路纵队，左纵队有步兵三标，炮队两营，工程一营，马队一营；中央纵队有步兵二标，炮队两营，工程二队，马队一队；右纵队有步兵一标，马队一队。10点钟前后，左纵、中央纵队两路行至何官屯、薛庄一带，右纵队行至二十里铺一带，嗣探得敌军已过汤河，乃令右纵队停止于十里铺迤北及龚官屯一带，中、左纵队则疾驱前进，中央纵队即在东西滦村之间展开，其炮队则占领洪唐口南侧。左纵队则在小张盖之西展开，其炮队则占领东滦村东北之阵地。11点时，南军在黄土岗的炮队有四营，而北军在洪唐口之炮队仅二营，但北军左纵队三营炮队已占领小张盖迤西地面，早与中央纵队之炮队相联络。北军炮火显然占据了优势。南军右翼阵线仅达杨庄迤东，而北军左纵队阵线已达木佛方面，在南军右翼以东约长五六里，且南军在黄土岗、杨庄之步兵仅有二标，而北军左、中两纵队相联合在小张盖、洪唐口一带，有步兵五标。南军战线既促，兵力又薄，被北军中左纵队团团包围。南军右翼虽然失利，但左翼明显占据优势。南军分置在左翼七里铺、大黄庄一带的兵力计有步兵四标、炮队一营，而阻守之北军右纵队仅有步兵一标、马队一队，两军实力悬殊，北军右纵队被南军左翼围困。是日，南北军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①

初七日为南北军一攻一防之大战。初六日停战后，阅兵处令北军

^① 《本馆特派员随观九月初六日南北军步炮等营遇战报告》，《申报》1906年11月8日。

退至彰德所属之二十里铺、小吴庄一带，令南军在汤阴之滦村、十里铺分投屯扎。初七日北军因地为守，构筑防御工事，依据沟垒，凭险而抗。不过北军指挥官没有消极地等待南军来攻，而是在作好充分的防守准备后派少数步队散布于二十里铺及小营耳、马家庄一带诱敌深入。南军长驱直入，连续攻占了凉水井、郭村集等地，并以炮火猛轰北军炮队阵地，继而以步队重兵扑向二十里铺、小营耳、马家庄。12点45分，北军发现南军全力攻击其沟垒阵地，而王官屯以西与马家庄小营耳之队伍不相联络的漏洞，乃抽出步队一标由王官屯西北突出，将南军中央队之左侧包围。同时北军之右翼由高地驰下将二十里铺、小营耳之敌兵围攻。南军大队急行运动，欲期与左翼联络而一时未易展布。斯时南北两军全部出动，战斗颇为激烈，迨至鏖斗愈酣，势将不可分解之时，阅兵处发令停战。^①

初八日，参加会操的各军在彰德府城外小张村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南北军均着军礼服，厉兵秣马，雄赳赳气昂昂地齐集阅兵场。遵照预颁教令，依次排列，按分列式、密集队运动等不断变化，队伍整肃，军容壮盛。袁世凯、铁良率诸将佐着军礼服，佩刀乘马，绕场检阅，各部队或持刀或持枪向阅兵大臣敬礼。阅兵式后，袁世凯在彰德城大摆宴席，款待中外观操者及两军将校，彰德会操告竣。

三

河间、彰德会操是晚清军事改革成就的一次展示，标志着袁世凯领导的晚清军事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标志着中国陆军正式步上

^① 《本馆特派员九月初七日随观南北两军步炮等营会战报告》，《申报》1906年11月10日。

了近代化轨道，标志着中国野战军的正式形成，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晚清军事改革，肇端于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创设自强军，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力行新政，加快了军事改革的步伐，尤其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练兵处设立后，以北洋陆军为榜样，加强了对全国各省军事改革的指导和监视，计划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逐渐取代旧军，奠定新的国防力量。至1905年，晚清军事改革已进行了十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北洋练成了六镇，湖北等省成就可观。为检阅前此军事改革的成就，加速进一步军事改革的步伐，清政府不惜巨资，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连续两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河间、彰德会操。

河间、彰德会操达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光绪皇帝、西太后在看了袁世凯等人上报的河间会操的材料及其图像后甚为高兴，下特旨对袁、铁等人进行表彰：

据陈此次会操始末情形各节，并披览单图，南北两军部署之宜，攻守之术颇为完密，袁世凯、铁良督率将士，简练有方，深堪嘉许，所有该镇协官佐目兵步伐正齐，一切指挥筹办尚能合法，大改旧观。仍当督飭，认真训练，协力同心，精益求精，毋忘申儆。并著各省将军督抚按照定章，共图振励，讲求兵学，力底精强，务期有勇知方，规模日臻美备，俾坚众志成城，用副朝廷整军经武实事求是之至意。^①

晚清的军事改革，通过两次会操清晰可见，成就是巨大的。从规

^①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427—5428页。

模上来说，河间会操参加部队两镇四混成协，总兵力达四万五千零二人，战马五千八百余匹，运输车辆一千五百余辆，阵局之远三百余里，战役之长二十余里。彰德会操参加部队为四省一区两镇两混成协，总兵力为三万三千九百五十八人，战马二千七百四十三匹，接济车、弹药车八百九十八辆，部队运动区域二千余里，战役之长四十余里。清政府调数省数万军队在华北广阔的大平原上进行军事演习，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1908年清政府在江南又举行了太湖秋操，远不能和这两次会操相比。^①舆论曾高度评价河间会操，“中国自来无以军机大臣直隶总督之重任，率两军之重而操行军之战略，战线及数百里，为时逾半月者。有之，自今铁尚书、袁宫保始。是役也，经营半载，糜费百万，与操之众凡四镇，观操者约百余人。操毕，于是中外人士啧啧叹服，曰法令之严明，战术之娴习，中国前此未有也。”^②而彰德会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③河间—彰德会操的成功，充分说明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新军将领，已完全具有了指挥大部队作战的能力。

河间、彰德会操从程度上来说，已完全是近代化的军事演习。练兵处、袁世凯在筹划会操方略时，参考了东西各国军事演习的规章条例，“练兵处采取各国一切大操章程所设条规，颇为文明”。^④外国军事人员给以高度评价，“今日之演操，虽非实战，而亦可据理以理论之，盖欧洲各强国之操法，皆于战时以隐匿兵员并戎器之实数为利”。^⑤参

①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第568—569页；《袁世凯奏议》下，第1389—1390页。

② 《论北洋军队大操后之动作》，《时报》乙巳年十月十七日。

③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详细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下，第1389页。

④ 《时报》乙巳年八月十七日。

⑤ 《节录日人河间秋操纪略》，《时报》乙巳十月二十日。

加会操的各镇、各混成协，均由步、炮、骑、工程、辎重等兵种组成，会操中各兵种相互配合作战，马队侦察，步队冲锋，炮队掩护，工程队架桥等，多兵种合一的合成军制的战斗力得到充分发挥。且会操前各镇、协分驻各省各地，相距数千里，练兵处一道命令，各部队按时赶到指定地点集中，新军的性质，已同八旗、绿营等旧军有本质的不同，河间、彰德秋操，还标志着中国野战军的正式形成，参加河间、彰德会操的军队是集团军之间的对抗。诚如袁世凯所说：“是役也，发纵指示，练兵处实操其总权，各省镇协，禀承于该军总统，各该总统听命于练兵处，无町畦之各别，若指臂之相从。”^①“该镇协原系分扎数省，一经飭令编定，遂使南北数千里声势相联，气脉相贯，侵侵乎有长驾远驭之观焉。”^②中国野战军的出现，标志着清王朝的国防力量的加强。“组成一支近代化的专业陆军，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③

河间、彰德会操，综合利用了近代铁路等交通设施和电话、电报等通讯设施，部队集中十分迅速，信息传达准确敏捷。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第一次。河间会操阅兵处下设递运处，“递运处设递运官及委员，管理铁路、水道各项运送事宜”；设传宣处，“传宣官兼管阅兵处所属电信、电话、递信并统辖电信队”；设信号处，“信号处设信号队一队，管理大操一切信号，以通声息”。^④后来在准备过程中，还购买了汽球、电车，“北洋陆军派员购办汽球一个，无线电车二具，……交第二镇演习，以备应用，昨已电告练兵处矣”。^⑤彰德会操，阅兵处

①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详细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下，第1392页。

② 同上，第1389页。

③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④ 《练兵大臣袁世凯等为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事奏折》附件二，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第574—575页。

⑤ 《时报》乙巳年九月五日。

下设递运司，“递运司委员十五人，掌管铁路运送军队并各军驻屯处所转输等事”。设传达司，传达司传达官，“兼管阅兵处所属电信、电话、递信并统辖电信队”。^①派赴彰德会操的部队，几乎全由铁路运输，“鄂军赴彰德秋操各队均坐火车，军装粮饷亦由火车载往”。^②“驻扎南苑陆军除第六镇十二协二十三、四两标共计六营，马炮辎重并不应操，其余均赴操场……共乘加车四次前往彰德会操”。保定陆军第一镇混成第一协其司令部步军第一营于二十日“由保定乘加车九点半钟开往邯郸县”。^③彰德会操中还编制气球队，在九月六日的演习中，气球发挥了作用，“初六日九点钟，袁、铁两大臣出辕率从骑由火车至汤阴县之七里铺，旋偕张安帅乘马至大黄村前之最高土埠，先观察球队施放大气球……约一点半时，两大臣发令吹鸣号音，气球队悬一赤球，两军当即停战”。近代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在军事上的运用，提高了军队调动的速度，适应了近代化战争的需要，同时也使军队颇增添了几分近代化的成分。

考察一支军队是否近代化，不仅仅看其是否使用了近代化的武器装备，采用了西方兵制，更主要的还要看其军纪及其军队素质、文明程度如何，通过两次会操验证，新军纪律严明，军队素质较旧军有本质的变化，这正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清政府军事改革的重要成就。

①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详细情形折》附件一，《袁世凯奏议》下，第1395页。

② 《鄂军与豫军过境之比较》，《时报》丙午年九月二日。

③ 《鄂军与豫军过境之比较》，《时报》丙午年九月二日；《记六日观操情况》，《华字汇报》1906年9月11日。有文章对此有专门论述，本文不再评述。请参阅李援、罗庆旺：《袁世凯对近代军队进行的改革及其评价》，《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革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河间、彰德会操均制定了严明的军纪。如河间会操制定的《行军纪律》规定：“第五条：行军中兵丁不得出队私买食物或饮水，并不得故意落后，违者当面惩办，休息时不在此例，惟不得擅入民居，强买强卖，违者军法从事。第六条：路旁如有人堆积物件，如粮食柴草之类，军队经过不得任意毁弃，违者查明责罚。”《宿营禁令》规定：“第一条：凡经幕营司令官规定之事，各部队皆当遵行，不得任意更改，互相争取……第三条：城市村落凡官弁目兵皆不得任意出入，购买物品者不在此例。”^①《丙午年秋季河南彰德府大操教令》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之土地物产凡因大操致有损坏者，统归阅兵处赔偿。故各镇司令处及各混成协司令处如见有系该镇队损坏之处，务速将其地段及损坏之多寡报告阅兵处。设有不当损坏而亦遭损坏者，则其赔偿即责成该军队办理。”^②

军纪规定详细严密，但会操中执行如何？亲历两次会操、时任北洋新军下层军官（队官）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军纪在会操中得到了坚决贯彻执行。军事演习是严肃的，军纪是相当严明的。河间会操前北军各部自行演习，冯玉祥时在第一混成协，他记述道，“我们一混成协从南苑出发，分成两混成团，沿途自己预行演习”，由于参谋人员的一时疏忽，“后来一个左转弯，两军错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段统制（祺瑞）见状大为不怿，立时吹紧急集合号，对官长指摘错误，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晚间行军遇上了大雨，段祺瑞从实战角度出发令部队冒雨前进，“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

① 《练兵大臣袁世凯等为校阅陆军会操情形事奏折》附件四：《陆军会操各项条规清单》，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第577—578页。

② 《丙午年秋季彰德府大操教令》，《北洋公牍类纂》卷十二，兵政，第923页。

来有五六十斤的帐棚，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大队经过高牌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还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开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事后，段统制向人民家家查察，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①冯玉祥将军的日记，是对会操军队军纪的真实见证。

外国学者也对会操中新军军纪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抢劫、强奸等旧式军队里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新军中很少发生。地方民众对1905年第一次军事大会操的反应可以证实这个结论。老百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事演习时，他们担惊受怕，疑惑重重。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消除他们的疑惧，张贴了安民告示，说明演习部队并无不良动机。部队到达后，民众惊喜地发现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因而感到满意”。^②当时参加观操的英国军官H. 鲍尔上校对北洋新军良好的军纪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几年前，如果一支三万人的中国军队走到这个帝国的任何地方，他们不是忍饥挨冻就是靠抢劫为生。人们纷纷离乡逃难，甚至妇女们会投井自杀。……新军部队循规蹈矩不啻是一场社会革命。”^③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清政府十年军事改革，通过两次会操显示出了它的巨大成就，中国军队开始走上了近代化道路。这在某种程度上，给那些不相信中国人有改良军队之能力的外国人以致命的一击，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3页。

②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35页。

③ F0371/26，使馆警卫队长H. 鲍尔上校撰写的《中国部队军事演习报告》，附在萨道义1905年11月27日致兰斯顿侯爵的第408号文件中。转引自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35页。

因为当“1903年清政府宣布将按近代方式重建中国陆军时，外国观察家们自然十分怀疑中国人最终整治好军事机器的能力”。^①

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清政府军事改革固然取得了如此好的成就，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仅会操中暴露出的就有：首先，步队骑兵配合不紧密，尤其是骑兵在近代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马队侦察敌情一事最觉迟钝”。^②对此袁世凯颇为注意。他说：“至于两军马队，未能探悉敌情，以至主将调度无所依据，直至开战，始识方针。是马队搜索之不力，实有难辞之咎。马队为一军之耳目，洞察敌情，侦探地势，是其专责。苟无灵敏之耳目，确切之情况，虽有良将，亦难运筹，此为行军用兵要著，诚将来亟宜注意者也。”^③外国观操者也注意到，骑兵之举动，“犹以古来之操金戈，驱铁骑纵横驰骤，一往无前，为尽骑兵之能事，而不知今日之战，大异于昔，是可慨也”。^④其次，缺乏实战之意识。中外观操者都看到，“各军步队时有藐视火器功力之弊是也。两军相战，飞丸霰集，一队当前，则一队必受伤损，此易睹之理也。而各队中或有过敌前炮火之中夷然不以为念者，此与兵术甚不相合”。^⑤彰德会操之第二日，“南军主力部队与北军右翼步队相冲突，两军发枪颇激烈，迨至互相接近，将起冲击时，南军卧地发枪，北军竟直立如故”，“第三日，北军混成协步队与南军步队一支队相遇，亦同坐此病，不过前日为北军，此日则在南军”。^⑥此外，各军将领之间的联络不够，以致运调不够灵活等。新军会操出现的这些弊端是正常的、不足为怪的，因为中国新式陆军毕竟是刚刚成

①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导论，第1页。

② 《华字汇报》1906年9月12日。

③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详细情形折》附件五，《袁世凯奏议》下，第1408页。

④⑥ 《论河南秋操》，《东方杂志》第4年第1期。

⑤ 《两军作战之互有得失》，《华字汇报》1906年9月18日。

军，需要努力的还有许多方面。

四

河间、彰德会操为举世所注目，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局。

清政府不惜巨资，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两年举行河间、彰德会操，邀请外国军事人员和新闻记者观操，引起了各国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仅派人积极参加，密切注视着会操的进展，而且还将会操的情况报告国内，^①会操后纷纷对会操进行评价。“此次秋操（河间）一切布置颇为完善，阅操外宾无不同声赞美。”^②总体说来，西方各国对会操的评价高于日本，“去岁之秋，袁世凯以六师团举大演习于河间，其时欧美列国之参列员及新闻记者赞不绝口，即如泰晤士报电通本国，激赏其训练，而静论其未来之进步”。^③“而俄德两国所派之阅操各官则谓中国陆军可与日本相颉颃”。^④英国《字林西报》报道彰德会操，“舆论皆以为此次秋操，两军交战布阵较之去年为胜，且各军兵士亦有进步”。^⑤“西人则谓观此次大操，知中国南北军大行训练之效果”。^⑥日本对中国军队两次会操的重视程度远超过西方各国，彰德会操参谋本部派第一部长松川少将、陆军炮兵大佐青木宣纯、陆军步兵少佐柚原完藏等赴华观操。对会操，日本人之间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①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35页；《华字汇报》1906年9月20日。

② 《时报》乙巳年十一月二日。

③ 译丛：《中国之陆军》，《华字汇报》1906年9月20日。

④ 《申报》1905年11月4日。

⑤ 《申报》1906年10月24日。

⑥ 《论中国亟宜整顿海军》，《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

《节录日人河间秋操纪略》，《时报》乙巳年十月十八日。

比如有人观了河间秋操后说，“中国练勇为大有进步，试见其兵丁多壮龄也，检其驱干皆强健也，加上举止便捷，态度灵活，又能遵奉命令而推进之，其运动犹机械技师使用机器，圆转自如，无有一毫扞隔。呜呼中国之兵制，以昔日之迟钝，而较今日之精锐，将来武备必日有起色”。“此次观操，不过直隶一省之练勇耳，而其精锐已如彼，若夫以一省先为天下倡，举中国全国皆仿而行之，则养兵练武，其奏效当如何也。然则目此次秋操，谓划纪元于东西史可也”。而日本一些报刊则对会操评价较低，“形式可观，而精神未足，以无国民之教育故”。^①欧美日本各国从不同的角度，带着不同的目的评说中国两次大会操，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军队乃至中国社会的极大的关注。尤其是日本对中国新军之关心，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各界对两次会操也非常关切，对会操的成功充满了喜悦之情，对军事改革初见成效的喜悦进而企望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会操一结束，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时报》称河间会操为“中国前此所未有也，不料中国能如是，而后中国可以自强矣”。^②《华字汇报》在彰德会操后撰文说，“今第二次南北秋操毕矣，于军事上仅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则莫不注射于南北之陆军”。^③河南地方上将此重大事件记入史志，“是年九月，命陆军部尚书（此时尚未设陆军部）铁良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大阅直隶、两湖等省陆军于彰德。两湖军驻汤阴北取攻势，直军驻安阳城南逆击之，列阵数十里，错综变化，出奇制胜，极战守之能事，外宾作壁上观者咸称赞不置”。^④中国人民从军事改革成就中看到了希望。不过人们在兴奋之余，没有忘记对清政府

① 《论中国亟宜整顿海军》，《东方杂志》第3年第12期。

② 《论北洋军队大操后之动作》，《时报》乙巳年十月十七日。

③ 《中国之陆军》，《华字汇报》1906年9月23日。

④ 《续安阳县志》卷一。

的忠告，希望清政府不要沾沾自喜，满足于一时之得，而要保持头脑冷静，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以取得更大的成绩，“此次大操后，我之所长者何在，我之所短者何在，我之合宜者何在，我之不备者何在，皆可一目了然，正宜切实调查，以为参考，某应仍旧，某应改良，一一详察而证明之。各呈其意见于参谋处，再行汇总详议，择善而从，庶不虚此一行，不至以百万金钱仅购外人数语之褒赞也”。^①

对会操特别关注的当为清政府中当权的满洲权贵。晚清军事改革虽然由清中央政府领导，但实际实行的为汉族地方督抚，最有成效的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咸、同以来汉族地方督抚的势力越来越大，中央对他们的控制越来越弱，尤其是军权的旁落，满洲贵族是不甘心的。这次军事改革，又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新军军权又掌握在汉族地方督抚手中。尤其是袁世凯北洋新军势力的崛起，清政府一方面不得不给予支持，一方面又非常担心。河间、彰德会操，是十年来北洋军的第一次大亮相，北洋军在会操中的杰出表现，近代化军队军事演习的庞大气势，更使满洲权贵感到了袁世凯势力的危险。数万名北洋军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在长达几十里的战线上或起或伏，或分或散，错综变化，有条不紊，显示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干。张之洞的湖北新军是南方各省新军中最优秀的军队，但通过彰德会操的较量，明显不如北洋新军，无论是军容之整肃，还是将校之指挥，与北洋军比有明显差距。外国观操者对九月初七日南北军作战评价说：“统观两军阵法，当推北军为胜。盖以平时北军之操练与管理实较优于南军也。”^②九月初八日阅兵典礼，“本日上午九点半钟，择地于距彰德府东南约六华里地方举行阅兵典礼，并分列式典队伍齐整，

① 《论北洋军队大操后之动作》，《时报》乙巳年十月十七日。

② 《续志彰德秋操之阵法》，《时报》丙午年九月九日。

军容颇盛，特密集部队运动观操，外国武员大惊进步之速。北洋陆军全部队之兵械、军服、装具、马匹一律鲜明，一丝不苟，其密集运动之步武精神极为活泼。河南之军次之，湖北军队似有逊色”。^①会操结束后人们评论说：“两军作战之大体，首以北洋军为进步最速，从训练及各种兵科之联络，自戎装器具之齐备，至纪律动作较湖北军有如枳橘之殊。”^②和袁世凯一起，两次作为阅兵大臣观操的铁良是满洲权贵中谋取中央军权、打击汉族官僚势力最为积极的一个，与袁世凯矛盾重重，极不相能。袁世凯对北洋军的自如驾驭和北洋军在全国新军中的特殊地位，使满洲贵族再也不能坐视了。所以彰德会操后不久，清政府决定对袁世凯开刀，夺取袁世凯对北洋军的领导权。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九日，彰德会操结束，袁世凯等回京复命。二十一日（1906年11月6日）清廷公布了酝酿已久的官制改革方案，否定了袁世凯等人提出的废除军机处、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大臣的方案。规定军机处、内阁依旧，中央行政各部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邮传部、理藩部、法部、农工商部等十一个部。其中军事方面废兵部，设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及军咨府未成立以前，其所有事务，均归陆军部办理。各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任命铁良为陆军部尚书，寿勋为左侍郎，荫昌为右侍郎（三人皆满族）。^③袁世凯看形势不妙，急忙于十月初三日上折请旨将其所兼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等八项兼差“一并开去”，以减轻满洲权臣妒忌其揽权的压力。同时，将自己督练的北洋新军六镇兵权上交陆军部，“各该镇均

① 《举行阅兵典礼》，《华字汇报》1906年9月12日。

② 《两军作战之互有得失》，《华字汇报》1906年9月18日。

③ 《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578—5580页。

拟请陆军部直接管辖，无庸由臣督练”。只是以“值此客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所有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①袁世凯的奏请立即得到批准，“现在改定官制，各专责成，著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②“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属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③清廷通过官制改革，达到了其加强中央集权、集军权于满洲权贵于一身的目的，而这仅仅是彰德会操后十余天的事。次年，清廷又调张之洞、袁世凯入京为军机大臣，完全剥夺了汉族大臣的兵权。

河间、彰德会操既是对晚清军事改革阶段性成就的一次展示，又是晚清军事改革的一个天然分界线。在此之前，军事改革主要由袁世凯来主持，“练兵处在以袁世凯为主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④袁世凯“是新式陆军真正的灵魂”。^⑤在此之后，军事改革先后由铁良、荫昌等满人主持，军事改革不仅放慢了脚步，而且每况愈下。清廷收回袁世凯北洋四镇的兵权后，将北洋四镇交给凤山统领。凤山不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人才，而是一个昏庸腐败的官僚。他统领北洋新军后的情况，冯玉祥将军的记述最为清楚，“军队一归凤山节制，一切规章，乱加窜改，原来习用的举手礼，又改成了弯腰请安，四纲五目也都一律取消了。一时军队中乌烟瘴气，上下官兵，怨言四出”。“试看凤山到任不久，便擅自任用满人，并开列价目，盗卖官阶：旅长三千两，团长二千两，营长一千两，连长三百两，公开的出卖。这样一来，稍有良心热血的官长目兵，自然都生出反感。”^⑥北洋新军被满洲

① 袁世凯：《陆军各镇请分别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袁世凯奏议》下，第1419页。

②③ 《德宗实录》卷五六五，第5页。

④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54页。

⑤ 同上，第53页。

⑥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76页。

权贵糟蹋成如此模样，无怪乎 1907 年 6 月，袁世凯上折对陆军部进行弹劾：

陆军部设立以来已十阅月，观听所系，尚无振作之气象，兴革之举动，足厌众望而愜群情。凡兵法如何厘定，兵区如何规画，兵备如何筹计，兵数如何扩充，及何以作养人才，何以增进兵格，何以侦察各国之兵势，何以会通东西之兵学，固皆未遑议及，即本部章制，亦迄未见实行，至近畿已成之四镇，举以委诸副都统凤山督练。查凤山初非出身学堂，又未一经战事……才非出众，识非过人，无威望之可言，无功绩之足数，即论其军营阅历，亦甚浅鲜。……举四万众之重任，付诸谬妄人之手，中外腾笑，将士解体……。似此非但武备决无起色，且恐愈趋愈下。^①

袁世凯这里虽在猛烈地攻击政敌，但所据也为实际。晚清军事改革改换为这些人来领导，军事近代化大大打了折扣。而军事改革重大变化所激发出来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所以，河间、彰德会操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晚清变革中的一大事件，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转引自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3—134 页。

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

刘路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复出。有关论著大都认为，清廷起复诏下，袁世凯就借重革命党，要挟清廷，提出出山的政治条件，开始了他窃取革命果实的历程。近年来，学者们先后发表论文，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①。本文拟对袁世凯辛亥复出的条件做一深入探讨，以求重建史实。

一

袁世凯在1909年初被新掌政的摄政王载沣罢斥回籍，宣统一朝，乡居三年，时刻等待东山再起^②。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武昌举义，为袁世凯复出造成了最佳契机。10月14日，清廷颁诏起复袁世凯：“内阁奉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著办剿抚事

-
- ① 据笔者所见的主要论文有：〔美〕路康乐：《清政府对武昌起义的反应——最初的三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31—2640页；郑焱：《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与清廷关系析》，《湖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郑焱：《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辨》，《求索》1991年第6期，等等。
- ② 关于袁世凯在隐居时期的情况，参见拙文：《彰德养病时期的袁世凯》，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66—386页。

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同日又颁上谕，明定袁世凯的职责：“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①由于君臣之间有三年前罢黜的过节，载沣命内阁派遣同袁世凯亲厚的人“赉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②。于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特派阮忠枢到袁世凯隐居的彰德洹上村劝驾。

其时，恰逢袁世凯寿辰，前来祝寿的亲信谋士，就奉不奉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袁世凯斟酌再三，最后表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当天即做了决定，应诏出山^③。次日，袁世凯复信奕劻，表明了自己应诏的态度。袁的复信全文如下：

王爷钧座，敬肃者：久疏音敬，驰慕时深。阮参议来彰，盥诵赐笺，敏聆壹是。章京幼读父书，粗知大义，山林钟鼎，皆出天恩。区区愚诚，神人共鉴。承传监国摄政王密谕各节，感悚涕零。即捐糜顶踵，亦不足云报称于万一。惟章京旧恙实未全愈，在平日精神尚可支持，近因入秋骤寒，突患痰喘作烧之症，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赶加医治，一面料理筹备，一俟稍可支撑，即力疾就道。病中昏瞆，不能尽言。余属阮参议详达。所有应行筹办各事，另具函牍呈候训示祇遵。谢恩折已在赶缮，明日拜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1996年版，第245页。

② 刘体智：《异辞录》卷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页。

③ 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5页。

发。肃复，恭叩崇安，惟祈垂眷^①。

16日，袁世凯上《谢恩折》^②，正式向清廷表示了自己应诏的态度。

袁世凯在向清廷应诏谢恩的同时，亦致函内阁，表示应诏复出之意，随信还附了一个《应行筹办各事清折》^③，向清廷提出了复出的条件，并借口需要“延医赶加调治”宿疾新病，以及“一面筹备布置”，在洹上村等候清廷的答复。这封致内阁函和所附《清折》随着袁世凯《谢恩折》一起，于16日由阮忠枢带回京师。

清廷迅速做出了积极反应。第二天，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共同署名复函袁世凯：“苓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并交泽公阅过，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④可见袁世凯所提出的条件，在清廷和政府那里，都未遇到阻难。

袁世凯的《应行筹办各事清折》，至今未见诸国内外公私收藏者的公布，甚至未见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所提及，故未能窥其全豹。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10月18日袁世凯复其表弟张镇芳的信中所做的概述。信中说：

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宸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

① 袁世凯：《复上庆邸》，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59—1560页。

②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新授湖广总督袁世凯奏折》，《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3页。“调治”多半系借口，而“筹备布置”，“急切恐难就道”则多半系实情。

③ 袁世凯：《复上庆邸》、《致内阁总理协理大臣》，《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59—1562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55页。

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①。

据袁世凯信中的上下文意所说，“节略八条”，当系致内阁函中所说的《应行筹办各事清折》无疑，而且又可知《清折》的内容为八条。但信中所述内容归集起来，只有募兵、筹饷、不为遥制等三条。

另查，《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收有袁世凯 19、20 日两个电奏，当系袁世凯根据奕劻、那桐、徐世昌函中所嘱“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者。其内容除上述各条外，尚有：一、“请旨飭令王士珍襄办军务”；二、“请飭令（冯国璋）迅速来彰，筹商一切，并同凯南下，协商布置”；三、调集将领，名单为张锡奎、倪嗣冲、段芝贵、陆锦、张士钰、袁乃宽，并请飭第四镇统制吴凤岭迅赴前敌^②。

如此，总共才六条。还有两条，目前看不到直接的文字。但据媒体相传，袁世凯还奏请赈灾。23 日天津《大公报》说：袁世凯“所主张之要义在先抚民后剿匪……，以近来灾民遍野，革党乘机煽惑，最易酿乱。弭乱之道，救灾实最急问题。盖救灾如救火，刻不容缓。倘长此拖延，不惟民多涂炭，且令匪势更见猖狂，甚非计之得也。故

① 袁世凯：《复张提法镇芳》，《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 1579—1581 页。原件为幕僚所拟信稿，袁世凯在信稿后批：“缮，送下”。

② 《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卞孝萱辑：《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 年第 1 期，第 61—62 页。

项城电奏内又有救灾之请”^①。20日清廷所颁的上谕，也有“现将孝钦显皇后所遗宫中内帑内拨银二十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员在湖北一带核实振济，以惠灾民”^②。由此看来，赈灾也是袁世凯所开条件之一，而清廷的上谕则是对袁世凯的公开答复。

再分析此两日清廷上谕，另有两条与武昌起义有关。其一为：“内阁奉上谕，其为首作乱之人，实属罪大恶极，自为法所不容。……其有为匪所逼身被裹胁者，如早自拔来归，无论兵民，均准予以自新，不咎既往。……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株连。”其二为绿营缓裁^③。第二条系准陆军部议，与袁世凯无涉，而第一条，当也是对袁世凯所请的公开答复。

综上，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共八条。

在清廷方面，尽管奕劻、那桐、徐世昌回信说，载沣、载泽口头已答应，真正到了用上谕形式承诺之时，却未能立即全部兑现。募兵、赈灾、宽容起义者，很快就有了答复^④，调将三条，亦均获准。而袁世凯所请的“款”，则没有下文。至于袁世凯所请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上谕则仅答复为：“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⑤，避而不提“不为遥制”、“不绳以文法”的内容。

① 《要闻》，《大公报》1911年10月23日第3、4版。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58—259页。

③ 同上，第256—257页。

④ 清廷关于募兵的答复是：10月21日，“电寄袁世凯。据电奏，请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召募壮丁一万二千五百人，照武卫左军现行营制编集二十五营，作为湖北巡防军等语，著照所请”。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6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57页。

筹款的确需要一个过程，数目亦可磋商，而不肯承诺“不为遥制”，则说明清廷对袁世凯仍有疑忌，不放心交给他独力节制的军事权力，哪怕仅限于“湖北军务”。袁世凯的条件得不到满足，自然也就仍然留在彰德继续“赶加医治，一面料理筹备”，不定南下日期。

然而，局势的迅猛变化，促使了袁世凯与清廷君臣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束。10月22日，革命军占领长沙、西安，湖南、陕西独立。23日，九江新军起义。25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在广州被革命党刺杀。京津谣言纷起，人心惶惶。于是，袁世凯不再坚持在洹上村坐等清廷答应全部条件，于26日电奏清廷，确定30日起程南下督师，并保证“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①。清廷亦于次日，一连发出四道上谕，全面答应了前几天不肯答应的各条：颁发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承诺了“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未便过拘文法”，并“调荫昌回北京”^②。从此全面依赖袁世凯处理军事危机。

二

在《应行筹办各事清折》中开出的“节略八条”之外，当代史籍经常引用的关于袁世凯在复出时向清廷所提条件，是另一个“六条”的版本。1930年出版的李剑农先生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说，清廷起复诏命下后，袁世凯“便以‘足疾未痊’四字力辞，不肯出山”。“徐世昌见他不出，便微服出京亲往彰德劝驾。……袁便以徐

①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从彰德进京建议设督办军务处统一策划镇压革命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71—272页；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6—107页。

世昌、奕劻为介，提出六个重要的条件来，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其条件如下：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这六条亦为关于辛亥革命、袁世凯的许多重要著述所引用，只是各条的顺序和文字小有不同。李著引述资料不注出处，后来引述六条的史家，亦均未注明出处。至于“六条”所提出的日期，李著未具体指明，有的著述则指明为10月20日。

时在军咨府任要职的冯耿光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亦说有此六条：奕劻“遣徐世昌于八月二十九日特意到彰德见袁，去和袁进行了密谈。谁知袁竟提出就职的六大条件，总的来说，就是组织内阁，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和剿抚的全权，保证饷糈供应”^②。但冯耿光先生的回忆录没有说明他的消息来源，无法排除是受李剑农先生论述的影响。

从现在掌握的史料分析，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考察，这个袁世凯出山的“六个重要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首先，如前文所述，袁世凯拜折应诏复出之时，提出了“节略八条”，其史料依据分别来源于影印的袁世凯信稿和原始档案，且不同来源的史料还可相互印证，史料链条基本无缺失环节。“八条”的内容亦如前文所述，其原文至今虽未发现，笔者的推断可能会小有出入，但其中没有政治内容则是可以肯定的。前述袁世凯复张镇芳函即是证明。张镇芳，河南项城人，袁世凯长兄妻弟，与袁世凯有乡谊、

① 李剑农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7月版、1980年8月第2次印刷，第110页。据《重印前记》说：本书“原名《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初版”。

② 冯耿光：《荫昌南下督师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353—354页。

戚谊。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张镇芳任长芦盐运使；辛亥年袁世凯任清内阁总理大臣时，张镇芳署直隶总督；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时，张镇芳任河南都督。从其职务，即可见其为袁世凯的铁杆心腹。每有政治变动，袁世凯往往为之通报消息。现在仍可见到袁世凯为张镇芳通消息的其他材料。如：1912年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谈，袁世凯曾命其子克暄向张镇芳通消息，此信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张镇芳存札·第一函》中。按两人的关系，袁世凯在信中说：“用撮举大略奉告”^①，当然不会不经意地略去或有意瞒着最为重要的政治内容，诸如成立责任内阁，提前召开国会、开放党禁等等。且“八条”提出的时间，明白在10月16日，而不是所谓20日。

其次，10月16日，袁世凯提出“节略八条”，18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共同署名复函，谓载沣、载泽已分别“阅过，均可照办”。19日，袁世凯已遵嘱开始将其内容分别“电奏请旨遵行”。袁世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于20日节外生枝，再提出“六个条件”。在清廷方面，倘袁世凯的条件中有提前开国会、废除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开放党禁等重大政治变动，是不可能不经阁臣讨论、请示隆裕太后，仅凭载沣和载泽一过目，立时就答应各事“均可照办”的。

第三，上述袁世凯的“出山八条”在君臣之间磋商之时，徐世昌作为袁世凯的私人密友，10月17日前已往复电报，互通消息。17日，他又派专人送信来沪上，向袁世凯通消息并举荐人员^②。三天之后，20日，徐世昌已无必要自己再冒险违制“微服出京”，专跑一趟彰德同袁世凯策划所谓复出条件。

第四，此时武昌起义刚刚爆发，各地尚未响应，朝廷还在讨论军

① 袁世凯：《复张提法镇芳》，《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79—1581页。

② 袁世凯：《复徐中堂》，《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63—1564页。

事解决革命党人的起义问题，政治解决方案尚未提上议事日程。袁世凯本人尚在向清廷争“不为遥制”而不得，提出政治条件，客观上不具备可能性。

第五，10月25日，袁世凯向内阁发了一通很长的密电，电文如下：

王弼、中堂钧鉴：蒸密。兵机贵乎迅速，运筹要在缜密。现中央筹办军务衙门计有数处，遇事辗转咨商，恐涉迟缓。尤虑各署员司稍杂，难防泄漏。鄂匪党伏各处，不可不防。查昔年遇有兵事，历设军务处为中央统一机关，似宜援成案设督办军务处，或会议军务处，在大内借公所办事，内阁、军咨、海陆军、度支诸大臣会办其事，各署慎选可信之员司一二人，附同阁员，随办文牒，不但机关统一，事可迅决，亦可不至泄漏事机，贻误大局。我邸、相与国共休戚，有力任艰难，无可瞻顾。但事关中央大政，非外臣所敢妄议，祈由邸、相酌量请旨，以挽危局。至切盼祷。世凯谨肃。支。印^①。

袁世凯以一个外臣的身份，在这通电报中建议清廷设立军务处为中央统一机关，以通盘调度、部署指挥全国的行动。建议中的军务处，自然有管辖他的权力。这说明，在此一时期，袁世凯还是以清廷大局为念，并没有意存要挟的打算和行动。

三

与袁世凯向清廷提出“节略八条”并做南下督师准备的同时，提

^①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从彰德进京建议设督办军务处统一策划镇压革命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出以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作为解决政治危机的药方者，确实大有其人，他们是清政府中部分文臣武将和资政院。

武昌起义后，江苏巡抚程德全“睹时局至此，思为清廷尽最后之忠告”，乃邀张謇聚谈，由张謇起草奏稿，并通电吁请各省将军督抚联衔。热河都统溥颐、山东巡抚孙宝琦复电赞同列名。端方、张鸣岐复电云：“时机尚未至。”岑春煊表示赞成之意而不允列名。于是，10月16日由溥颐、孙宝琦、程德全联名电京（后张鸣岐又来电愿意附名）。通电忠告清廷：“上绍祖宗之成法，旁师列国之良规，先将现在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其酿乱首祸之人，并请明降谕旨，予以处分，以谢天下。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①。28日，弼德院顾问大臣陈宝琛上奏折：“亲贵与政，不独为立宪政体所不宜，征之往史，揆诸祖制，亦不常见。……臣愚以为宜由监国摄政王下教自责，以为大臣引咎之倡。立即简择刚正廉明足系人望之大臣，任以总、协理，令其另行组织内阁，参照各立宪国通制，俾负完全责任。”^②29日，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上奏折认为：“岂有大局败坏而政府犹偃然在位者。朝廷不立予更换，何以图治？”要求“另行组织内阁”，并提出：“今各部大臣，亲贵几居大半。……此为革匪藉口之大端，亦即人心离散之根本。”^③这些奏折表现了清政府疆吏和京官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清廷的压力。

10月22日，到了资政院第二次开院之期，清廷本寄望于资政院能够在政治上帮助它渡过难关。其时，到会议员甚少，“甚至有数省

① 《热河都统溥颐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会同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辛亥革命》（四），第48—51页。

② 《宣统三年九月初七日陈宝琛奏折》，《辛亥革命》（五），第468—469页。

③ 《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折》，《辛亥革命》（五），第475—476页。

竟无一人到会者”^①，不足法定人数。但资政院仍然提出了他们久已不满的国会、皇族内阁和党禁问题。26日，资政院总裁大学士世续等上《请本标兼治以救危局折》，提出：“拟请朝廷斟酌情势，迅速组织完全责任内阁，以一事权而明责任。并于明年提前召集国会，共筹大局，俾人心有所维系。”^②29日，他们又连续上了《请速开党禁以收拾人心折》、《请明诏将宪法交院协赞折》、《请另简贤能组织联责内阁折》等三折^③，以民意机关对清廷施加压力。

对清廷压力最大的是军事将领的奏折。10月29日，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等联名电奏，要求改革政治、开国会、改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电奏危言：“当此时局岌岌，亿众之向背，实为可虑，万一中路遄征，军心不固，大局将益不可收拾。”^④掌军将领上折，近乎兵谏，更何况所率军队驻防靠近京畿，尤令清廷不敢轻视。

在全国各地，继湖南、陕西独立，广州将军凤山被炸死后，10月29日，革命军占领太原，山西独立，直隶与畿辅危机。在内外压力交加之下，30日，清廷于一日之内连下四个诏书：罪己，著资政院制宪，罢除皇族内阁，开放党禁^⑤。希望能以此换得内部及后方的安宁。

① 《候补参议陈毅奏资政院开会不足法定人数重要事件应俟国会召集时再议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5页。

② 《资政院总裁世续等奏请本标兼治以救危局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63—365页。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92—95、596—597页。

④ 据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张绍曾顿兵滦州》，第197—199页；并参见10月30日上谕：“昨日统制张绍曾等电奏具陈管见一折，其间颇有可采择之条，已归入本日谕旨一并宣示矣。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83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78—281页。

同在这一天，按照 26 日的电奏所定，袁世凯离开了他居住了将近三年的彰德，起程南下督师。目前，尚未见到袁世凯与文臣武将们关于政治改革的主张有联系的资料。

郑焱先生根据一些迹象，认为“出山六条”纯属虚构^①。我以为，李剑农先生当年撰著《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这样的学术著作，论及袁世凯出山这样的大事，总该有所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清廷档案不开放，研究者无从利用，但清末民初之际，新闻媒体（比如报纸）已经十分发达，社会舆论亦十分自由，研究者不难从中撷取所需要的资料。承同仁李振武先生示知，《盛京时报》就有类似袁世凯出山六条的报道。经查，《盛京时报》10月21日报道，袁世凯提出出山四条件：“闻项城日前向内阁提出条件四项，要请允准，否则不肯出山。概略如下：一、明年须开国会。二、解除党禁。三、实行责任内阁制度。四、收回严缉党人命令。”^②10月27日，《盛京时报》又报道袁世凯上奏折提出出山的八项条件：“如蒙俞允方能赴鄂。其所奏概闻数项如下：全权大臣便宜行事，长江水陆各军统归节制，□用旧属人员，明年开设国会，开设责任内阁，剿讨革党以宽大为主，解党禁等语。监国摄政王已交内阁筹议。”^③10月24日，《申报》报道：“据传袁世凯要求节制荫昌之军，始允出山。”^④

① 参见郑焱：《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辨》，《求索》1991年第6期，第120页。在这篇长约千字的文章中，郑先生指出疑点有三：第一，自10月12日清政府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后，他俨然已以总督身份行事，丝毫没有提出严厉条件，否则决不出山的态度。清廷还曾在10月21日嘉奖他“筹办一切，均属妥协”。第二，袁世凯早在10月27日以前就已决定离彰德赴任，此时所谓六个出山条件还没有其中的任何一项得到完全满足。第三，据1911年10月20日到10月22日的《内阁官报》，徐世昌这三天每天都参加了召见议事，没有离开过北京。

② 《中外要电》，《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第2版。谨此向李振武先生致谢。

③ 《要闻一》，《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第3版。原电报只此七项内容。

④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24日第1张第4版。

此外，各报纸都还有一些袁世凯出山条件的零星报道^①。这些条件的共同特点是：袁世凯提出了严厉的政治条件。

当时的媒体报道的袁世凯出山条件，有相同之点，也不乏互相抵牾之处，即使同一家报纸，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盛京时报》10月21日刊出出山四条同一天的第7版，则又报道说：“闻二十四日下午四点钟，内阁接袁慰庭官保来电，仍系托病力辞鄂督之任，并云剿匪事宜，身可担任。至湖广总督一缺，务请代奏收回成命，另简贤员接替等语。”^②次日又登消息说：“闻袁项城现拟督带冯国璋之第二军及姜军门所率毅军亲自出征。”^③

这说明了新闻媒体消息来源的复杂，也反映了社会舆论的纷繁。但当时的社会舆论为什么帮袁世凯设计这么多政治条件呢？我认为，这与当时认为清政府朝野中流行政治改革以消弭革命的思潮有关，上文所述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立宪的文臣武将及资政院，就是这种思潮的最典型例子。《盛京时报》就发表《论说》称：“革党之势力，弥漫若是，求所以消弭之者，盖惟促宪政之进行，而不复蒙饰假面具，以欺惑人民。……近日朝廷举动最不愜民意者，为亲贵内阁，为修改资政院章程，为违法借债，为铁路收归国有的数者。……而鄂乱则确乎，其为革命举动，政府又焉敢等闲视之。然而政府之实力，因亦有限者也，则与其侥幸于不可胜，曷若铲除致乱之源，而一意推行宪行之为得耶。否则，盖犹治丝而焚之，庸有济乎。”^④直截了当地捧出促宪政以消弭革命的药方，与在朝的文臣武将和资政院的政治方案，如出一辙。舆论的制造者们，为了扩大自己药方的影响力，将自己的

① 例如《要闻一》，《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第3版。

②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第7版。

③ 《项城督军南下消息》，《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第2版。

④ 《论武昌失守事》，《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八月廿三日第1版。

良方，打起当时人们普遍寄予希望的袁世凯的旗号贴上袁记标签，这是很自然的。

袁世凯南下督师与清廷颁布的政治举措在时间上的吻合，再后来，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是实际得利者，都很容易误导人们产生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相关的联想，相信了这些当时为了消弭革命而制造出来的消息。辗转相传，陈陈相因，袁世凯的出山军事八条就变成了政治六条。

四

八条和六条的核心内容是绝然不同的。袁世凯在对张镇芳的信中称他提条件的基本出发点“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并只募兵、筹饷、不为遥制等三条，自然是八条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可见，八条的核心内容是纯然围绕着剿平湖北革命党起义的军事问题而提出的，就袁世凯来说，这是报效朝廷、对付革命党起义的必须条件；对朝廷来说，也是命将出师之所必须。我把它总结为“军事八条”。而六条的核心内容则是攫取全国军政大权，是乘革命危机要挟朝廷为目的，是“政治六条”。

袁世凯出山条件八条与六条之不同，实际反映了对辛亥革命初期形势和袁世凯能量、能力的不同评估。

八条的提出，是在于迅速扑灭突然爆发的革命危机。对于八条的提出和满足，清廷与袁世凯君臣之间有过讨价与还价，这是因为三年前发生的“养痍”之事，造成了君臣之间很深的过节，由于共同对敌的缘故再次走到一起，清廷与袁世凯的关系骤然转折，由相互不信任、疏离到重新合作，君臣双方确需要一个新的整合过程，“八条”的提出和予以满足，使他们寻找到了适当的合作形式。若袁世凯当时

提出居心险恶而叵测的政治条件，想来清廷的当政人物不至于愚蠢到看不出它的背后用意。

晚清，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外重内轻的局面已形成。地方督抚有相当独立的财、政、军权。但是，一些大的行动仍然需要中央协调。这时，君臣之间就会讨论条件。袁世凯的八条，有出山条件的意味，也有工作条件的意味，基本上在臣子的职分之内，又是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清廷并没有认为不妥而给予任何责难。相比之下，岑春煊与袁世凯在同一道上谕中起复任四川总督。但自诩为忠臣且痛诟袁世凯的岑春煊，也有过出山条件。朝廷满足了他“准许添募八营”，并“拨饷银一百万两”巨款^①的条件，但他仍然没有遵谕“迅速赴任”，先行逗留观望，最终仍旧拒不赴命。

与我们现在尘埃落定之时倒看历史不同，武昌起义爆发后，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包括清廷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也包括武昌新军的起义者（虽然他们处于死地求生地位，有着特殊的诉求），都处在“史前”的“黑暗”阶段，对事态下一步发展，都仅是一种基于自己所获得信息基础上的预测。虽然对于历史发展的远期后果或者说历史发展趋势，连清王室都看到了，否则不会有九年立宪、五年立宪之决定。但对近期形势发展的评估，清廷和袁世凯并没有预见到形势发展会如此迅猛。而六条则意味着，从革命党人武昌起义之初，袁世凯就预见到革命党的这次起事将要推倒清廷，因此进一步认定了它是夺取天下的政治筹码，所以在清廷起复诏下之日，就意存要挟，提出攫取全国大权的政治要求。一开始就立意脚踩两家船，操纵局势，双向取利，取代清朝又攫取革命果实。按照这个逻辑，看似深刻揭露了袁世凯的丑恶用心与嘴脸，其实，这是在鬼化了袁世凯动机和道德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76页。

的同时，也神化了袁世凯的能力和能量，更重要的是，亵渎了孙中山等革命派。

不过，袁世凯的出山八条具有效忠朝廷与自己抓权的双重意义，看似低调，但却是明白局势、切中肯綮、把握时机、捞取实权的进退有据之作。历史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辛亥革命爆发之初，革命党、清廷、袁世凯都没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各方力量互相较量博弈，袁世凯逐渐把握了政局，而出山八条只是一个开头。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

苏全有

(华中师范大学)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关键人物，近些年来，学界对之极为重视，讨论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本文拟从经济近代化的角度对袁世凯的发展工业思想与实践予以论述，以推动对袁世凯的重新认识。

一、对外理性抗争，构建工业发展的基础

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的对外理性抗争问题，张玉法曾评述道：“此种争胜与对抗之策，有别于义和团式的对现代事物之排斥，而是利用现代的方法与工具，与外人作理性的竞争。当时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在资金与技术上也都处于劣势地位，此种竞争之心成为改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基本动力。”^①笔者认为，对外的理性抗争包括两方面的内涵：首先是抗争性，即在主权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的必争性；其次是理性的即非感情用事型的抗争。抗争——抵抗外国侵略是原则，而冠以“理性抗争”又要求具有一定的策略灵活

^①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257—258页。

性。对此，我们从这一时期袁世凯对外矿权的交涉中可以明显看出。而其对外理性抗争的客观效果，则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工业基础的构建。

开平煤矿土法采煤始于明代，洋务运动时采用西法采煤，始具近代性质。1892年，张翼“以候选道员资格”投效北洋，颇得李鸿章赏识，因此得以出任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兼开平矿局督办。八国联军侵华时，“不谙战时国际公法”的张翼投靠外人，以求保护。开平煤矿虽避免了八国联军的破坏，而矿权却平白落入英人之手。1902年袁世凯接任直督后，对开平矿务局事件极为重视。他先于上海就开平矿务局撤去中国国旗事件与英使交涉，待了解真相后，袁世凯“深怒张燕谋竟敢私将官矿国家河道盗卖外人，案情重大”，遂于1903年3月13日“据情呈奏”，又于1903年12月11日和1904年3月31日连参张翼^①提请清廷与英国交涉，收归利权。1905年，张翼至伦敦英国法庭起诉，没有结果。回收开平矿权至此陷入僵局。面对这种形势，袁世凯另建“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命周学熙为总理，以限制、打击、对抗英人，即“以滦制开”，进而收开。正如其公司宗旨所说：“开辟地利，保守主权，官家得用煤之便益，股东享天然之美利。”^②妙在滦矿地址设于开平矿“原定之矿区范围外，取包围之策”。英方虽鉴于滦矿成立，恐为所制，遂提出抗议，称凡矿苗所至之处，皆属开平矿务公司范围，他人不得开采，阻挠要挟，无所不至。但袁世凯一面据商部矿务章程五条，矿道不得越三十里之说与之抗争，一面促滦局逐步进行，英人遂无可奈何。英商见阻挠不成，遂与滦矿展开竞

① 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54—856、916—918页。

② 魏子初：《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09页。

争。二者终于在 1912 年合并成开滦矿务总局。“吾国开矿事业，自日俄战争以来，收回运动异常热烈，煤铁公司经国人收回自办者，为数殊属不少。”^①而袁世凯交涉开平煤矿，始于 1902 年，先于全国收回利权运动两三年。此后，袁世凯又在东北漠河金矿，山东胶济路和胶沂路、津浦路矿权，河北临城煤矿等利权问题上进行理性抗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利权回收运动的开展，极有利于构建清末民初我国工业的基础。

二、倡国货、拒洋货，营造有利的工业发展氛围

袁世凯倡国货、拒洋货，与日本的影响有关。1903 年 3 月他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周学熙在其《东游日记》跋言中写道：“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②袁世凯深受启发并大力提倡。

袁世凯竭力倡办的北洋实业正是以倡国货、拒洋货为其根本宗旨的。这一点从直隶工艺总局附属各厂、所的宗旨可以得到证明，诸如天津考工厂拟有采购本国各省工业制品章程九条，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以本国材料仿外洋式样所制者，宜取之，如能丝毫不逊外洋固妙，即或稍差而价较廉，亦须酌购，可考求改良，以期进步，而杜漏卮。”第四条又规定：“凡不仿外洋而足以与外洋物品竞美，或较优利用者，皆当取之”；^③教育品制造所也是以“仿造教育上各种品物、仪器，专备学堂教科之用，以浚发学识，挽回学界漏卮为宗旨”；而北

①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第 14 页。

② 赫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 页。

③ 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卷十七，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 1906 年版。

洋劝业铁厂之设“以创造机器开工艺先声，挽利权而便民用为宗旨”等等。袁世凯既授意于前，又批示于后，该厂“以制造机器之用，洵为振兴实业要图，所呈试办章程八条，尚属妥协，应准立案。”^①天津劝工展览会章程并规定：“陈列货品并非夸奇斗博，不过为振兴本国工艺，故外国货物暂不列入，其中国货物不拘何省、何县，均可贩运入场，以便互相考较。”^②该会还向袁世凯申请：“所有预会货品，均由职局验明给予凭单，转请津海关道发给护照，免纳税捐。”而免税规则也规定：“劝工展览会既专收土货不收洋货，所有会场出口土货应准免纳厘厘，其洋货概不准夹带影射，如查出前项情弊，照例充公。”袁世凯充分肯定该会“请免税捐，系为奖励工业要举，自应准照。候行津海关道及天津厘捐总局查照，转饬各分关局卡，一体遵照办理”^③；此外，直隶工艺总局在考工厂设立津益拍卖处，为各民立工场专设代销公柜。袁世凯认为：“所拟设立津益拍卖处，系为提倡商业起见，自属可行，应准立案。”“设立公柜为民立工场存货畅销起见，该局保护维持用意甚善，应即照办。”^④

1902年10月7日，袁世凯上奏提出发展机器纺织工业，此举的出发点是鉴于“洋货进口，尤以纱布为大宗”，“遂为中国一大漏卮”，“今欲筹倡导之方，莫如试办机器纺织”^⑤。对于洋商在我国内地开设行栈之事，袁世凯于1905年8月23日下令：“严行查禁，以儆效尤。”^⑥此外，袁世凯在其“所辖学校和兵营内一律禁止使用外国棉布”^⑦。

①④ 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八，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1906年版。

②③ 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1906年版。

⑤ 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1页。

⑥ 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1页。

⑦ 仓桥正直：《清末的振兴实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121页。

1905年8月4日，袁世凯为“泰西创设无线电报，并有暗中入中国之事”而上奏主张：“无论何国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国境内私设无线电报，如不遵行，按例科罚。”^①欧战爆发后，袁世凯认为发展中国实业的良机来临，故而面谕国务卿：“亟宜乘此时机将内地制造设法扩充，足敷本国人民应用，未始非工商发达的转机。凡各省种种实业，俱应切实整顿，所有大小工厂，悉予竭力维持，一面乘外货入口稀少之时，改良土货，仿造外货，俾得销数日增，畅行全国，既可享永久之利益，并可保国内之和平。通商惠工，在此一举。”并令农商部“总长妥筹善策，通行各省，一体遵行”^②。袁世凯大力提倡国货、排斥洋货活动，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引进外资，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

1907年底，袁世凯任职外务部尚书，曾阐述过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对苏杭甬铁路，袁世凯力主借款，备述所抱之见，略谓路矿两项，皆中国目前急宜举办之要政，刻不容缓，无如开办路矿，动需千数百万巨款，各省民穷财尽，断无此等能力，势必迟滞延缓，不仅不能免外人之干涉，且亦非我中国之福。“况泰西各国，初因国内空乏，借他国之款，举办各项要政，由此获利渐至富强者颇多，全在立约时利权二字，界线划清，但能不失主权，不必一经借款，便视为无穷之祸患，故吾决意主持假款开办各省路矿，而苏杭甬铁路，

① 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8—1169页。

② 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1页。

特其见端耳……向例经手假款，均有九五扣项，藉饱私囊，我立志分毫不取，应得扣项，全抵作正数，只求国民少担一分国债，即算我多尽一分心力，至公是公非，日久自见，岂可以一时人言之指责，遽夺我素定之宗旨云云。”^①在此前后不久，“有伊最亲信之某副都统往谒，谈及苏杭甬路款，谓近阅各报所登，风潮甚大，如徇两省绅民之请，则英人未必退让，若专用压力，又恐绅民不服，激出意外，袁微笑不答，既而谓某副都统曰……如宁波一郡，认集路款，竟至五百万元之多，徒快一时激昂之口，果令照缴，则临时未必能以实践……所惜者若辈不知大局，无端纷扰，而枢府诸人，又毫无定识定力，致令吾平日抱持之政策，不克实行，亦国运使然等语。闻某副都统出告同人，深服袁识见之超越，不为众议所摇，洵不愧为国家柱石云。”^②

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在民国成立自任总统后仍持素志。1912年，他与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签订的八项主张之一即是“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③，这种大办快办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是颇有远见的。他并发表言辞强调：“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互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寓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子母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日报》（3），台湾1969年6月1日影印，第257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民国日报》，台湾1969年6月1日影印，第337页。

③ 沈云龙：《袁世凯史料丛刊续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11），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40页。

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比诸藏窖而忧贫者，何如？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①

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一方面是因为他意识到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本国内不多，需借款于资本输出国；另一方面，袁世凯对华侨资本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在《令保惠侨民》通令中说，保惠侨民，宜有劳来之政。各省军民长官于藉隶于该省之侨商，均应设法招徕，随时拊喻，并晓谕国外各中华商会，切实劝导各商，集货回国，兴办企业，其已经归国者，尤必悉心保护。务使安居乐业，各泯猜虞。华侨多在我国东南沿海数省，故袁世凯又专门下达《布告闽粤等省保护华侨文》：“责成各该督民政长通飭所属认真保护，其有藉端需索，意存侵害者，务当随时查察，按法严惩，俾遂侨民内向之诚，益彰民国大同之治，特此布告。”^②为贯彻袁世凯的意旨，工商部于1912年10月下令各地对华侨“务宜尽力保护，俾获安全之福”，以发展工业，扩张“海外贸易”^③。

四、引进、推广机器，扶持民族工业发展

机器是技术的物质形态。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④“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⑤人们从中可知生产工具——机器

① 沈云龙：《袁世凯史料丛刊续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11），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苏全有：《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河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第1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8页。

⑤ 同上，第255页。

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1903年，袁世凯派天津教养局总办凌福彭赴日，随行的有教养局教习日人藤井恒久。10月，二人到达日本的和歌山县，考察了织布工场，立即购进织布木机一百四十副，其中四十副装置齐全，其余一百副购买了铁轮和织梭，在天津自行装配。^①这种布机为松田式的日本制自动脚踏机，归教养局与广仁堂使用。1904年末，实习工场替代教养局后，其所需脚踏机为日本租界的加藤洋行等商行提供，而后实习工场与北洋劝业工厂也开始出售自产的脚踏机了。1906年周学熙说：“伏思宪台锐意振兴工业，现在各属风气渐开，多有设厂购机之议，然本国无制造机器之厂，动辄须赴外洋，往往因款绌、运艰遂废。然中止是俗提倡工艺，非自创造造机器之厂不可。”^②于是北洋劝业铁厂诞生了。劝业铁厂自成立后，效果显著，截至1907年10月，已能制造的产品有锅炉、汽机、汽剪、汽锤、汽碾、车床、钻床、洗床、起重机、抽水机、铅印机、压力机、织布机、造火柴机、榨油机、磨面机、棉花榨机、消防水龙、喷道水车等。劝业铁工厂是造机器成绩较好的，它推动了直隶工业机械化的程度，增强了我国工业进口替代的能力。据天津劝工陈列所1912年9月的报告说：在天津市从1902年到1911年开办民立工场共四十五家，其中使用机器生产的二十四家，占了一半以上，大多是劝业铁工厂提供的。^③

由于袁世凯大力提倡，致使直隶省成为全国搞新政最活跃的省份，社会上称之为“北洋实业”。北洋已成为“新政权輿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袁世凯也因之声誉鹊起。甘眠羊在《新天津指南》中评价道：

①② 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八，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1906年版。

③ 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教育科技现代化》，《安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天津虽属通商大埠之一，而工艺发达实创始于项城督直设工艺总局及实习工厂，以后纺织厂、织布厂、制油厂、制革厂、麦粉公司、颜料公司、精盐公司、制棉公司固已次第成立。其幕僚周学熙亦说：“今宫保锐意振兴工艺，洵为直隶士民之福。”^①由此可知袁世凯振兴民族工业影响之大。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仍大力提倡发展工业，并采取了许多发展工业的硬措施。如提倡和保护民间兴办企业、推行奖励制度、对新办企业予以保息、对工业产品及原料调整或减免捐税、设立示范场所以劝导人们兴办实业、开办国货展览会和参加外国博览会等等。^②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民初工业的发展，使民初出现了兴办近代工业企业的热潮。

袁世凯在中国工业近代化问题上极富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化意识，并能付诸实践。其发展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最主要战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扶持周学熙近代工业企业集团以为示范，二是扶持近代民族资本蓬勃发展以增强国力。袁世凯扶持周学熙集团的代表性公司是启新洋灰公司与华新纺织公司这两个大型企业，他给予了资金和政策上的优惠、倾斜。依靠袁世凯的支持，周学熙近代企业集团势力发展庞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因此可以说：“周学熙一生事业的发展，是我国民族企业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类型。”^③扶持集团资本之余，袁世凯对其他民族资本也积极予以帮助：政策上鼓励、引导，资金上以官款拨助，市场上协助推销产品等等。

① 张金喜、何杰：《北洋实业的开拓者周学熙》，许涤新主编：《中国企业家列传》（2），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0页。

② 张学继：《论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张金喜、何杰：《北洋实业的开拓者周学熙》，许涤新：《中国企业家列传》（2），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民国初年，袁世凯仍致力近代化实业，使民族资本步入黄金期。过去一般论著总认为民初民族资本黄金期的形成是由“一战”造成的，其实不尽然，如果没有袁世凯等新派的近代化意识及其全力投入开发，只有“一战”这一外部因素，“黄金期”的形成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世界上并没有如此“奇迹”出现过。^①

^① 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1638076_人文社科新论丛书_袁世凯与北洋军阀_作者 :
苏智良等主编_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6.06

作者=

页数=683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 苏智良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欢迎词 / 骆平安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 张华腾

袁世凯成败简论 / 谢俊美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对袁世凯的重新解读 / 张华腾

袁世凯简论——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作用 / 徐松荣

顾维钧眼中的袁世凯 / 张艳

袁世凯与禁毒 / 苏智良

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 / 邵雍

袁世凯与禁赌 / 霍晓玲

莫理循与袁世凯——读《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 / 侯宜杰

袁世凯及其政治顾问莫理循与《二十一条》 / 窦坤

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 / 张学继

评袁世凯 / 朱东安

晚清袁世凯与归国留学生关系浅析 / 姜新

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 / 康大寿 康黎

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改革 / 王先明

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 / 梁严冰

论清末立宪中袁世凯活动的原由与影响 / 肖育雷 岳琰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 冀满红 李慧

袁世凯组阁的法制意义 / 陈晓东

浅议幕府在袁世凯练兵活动中的作用 / 冀满红 刘文军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建树和失败 / 袁伟时

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 / 马平安

袁世凯政府与边疆地方势力的经济关系——以广西为视域 / 唐凌

民初袁世凯政府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 / 沈晓敏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 马勇
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特点初探 / 赵虎 岳珑
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 / 石源华
关于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 / 曾景忠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 / 苏全有
袁世凯与俄国 / 景东升 苏全有
从“壬午兵变”到甲午战争——评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活动 / 杨涛
《袁世凯全集》介绍 / 骆宝善 刘路生
清练兵处及其档案 / 丁进军
关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一种新的解释——《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述评 / 崔志海
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 / 傅德华
袁世凯与袁林 / 史军红
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 / 刘路生
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 / 廖大伟
民初总理赵秉钧的悲剧 / 王晓华
重评北洋时期冯玉祥治军 / 郭绪印
附录
袁世凯在朝鲜 / 刘路生
袁世凯与河间、彰德会操 / 张华腾
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 / 刘路生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 / 苏全有